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八章（下）

2020年9月

目录

毛泽东逝世。[。。。。。。。。。。。。。。。。](#)第 5 页

打倒四人帮。[。。。。。。。。。。。。。。。。](#)第 63 页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第 99 页

尼克松、福特、卡特与里根。[。。。。。。。。。。](#)第 175 页

1960、1970年代的美国与西方世界。[。。。。。。。。。。](#)第 352 页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

第八章

1966年-1976年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6%B3%BD%E4%B8%9C%E4%B9%8B%E6%AD%BB>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北京时间0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病逝，享寿82岁（虚龄83

岁）。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联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联合发表讣告，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并总结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讣告由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耿绍光（即夏青）担任广播，称：“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在当年，这已经是第三位国家重要领导人逝世（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

晚年病情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1971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疾病又影响心脏。1973年，毛泽东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衰退，在1972年初曾发生严重休克。此后毛泽东又发生白内障，双目失明，直至1975年手术后恢复一半视力。

1974年6月，毛泽东健康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

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医疗组存在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7月，身患多种疾病之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7月18日毛泽东抵达武汉，进行眼病会诊。8月间，经来自各地之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毛泽东两腿和双脚浮肿，在11月29日至12月4日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4次，到12月5日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1975年2月，毛泽东说话含混不清，两腿时常疼痛，医生建议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毛泽东之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时间多。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第二天毛泽东之左眼能看见东西。

1976年，毛泽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周恩来于1月8日在北京病逝。5月起，毛泽东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毛泽东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7月，毛泽东许多时间处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进入8月，毛泽东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昏迷状态。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之最后一份文件。9月8日，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

生前身后

1976年9月8日中秋节，毛泽东血压开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

批前往看望毛泽东；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202别墅内病逝。新华社发布通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告》。中共中央至今尚未公布毛泽东因何病而死。参与了毛泽东遗体解剖的刘雪桐后来说，毛泽东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曾任毛泽东医疗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院长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称，两位医生诊断毛泽东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而不是帕金森氏症。李志绥称毛泽东死因是渐冻人症及心血管疾病。9月9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宣告毛泽东逝世；同日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人担任了其治丧委员会的成员。9月11日起，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举行了长达6日的吊唁活动。9月18日下午，其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共计约有数十万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民众参与了此追悼大会。此外，联合国总部和其安理会也在毛泽东逝世后以不同形式对其致哀，包括美国时任总统福特在内的多国政要也通过声明、唁电等形式表达哀悼之意。但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方面反应冷淡。

在广播中第三次播送《哀乐》后，曾出现了“现在播送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的播送事故。

毛泽东遗体被放置保存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至今，供人参观与瞻仰。

由于毛、朱、周三位重要领导人接连逝世，致使中央权力出现了一定的真空，因而政治局面顿时变得异常复杂，这也促使北京权力中心的各方加快了相关的计划与行动。在毛泽东逝世将近一个月后，1976年10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连同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高层元老采取果断措施，将江青等“四人帮”成员予以控制并隔离审查，一举结束了已进行十年有余的“文化大革命”，史称“粉碎四人帮”。事后，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正式成为了新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治丧委员会委员

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公安部部长）

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叶剑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部长）

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韦国清、刘伯承、江青（女）、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女）、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宋庆龄（女）、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粟裕、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江华

追悼大会

1976年9月11日至9月1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毛主席吊唁仪式，各方代表30多万人参加吊唁；9月18日下午3时，“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开始。9月18日下午3时，“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站了前来悼念毛泽东的民众，人数估计多达几十万，估计北京有几十万民众参加，全国各地同时举办相关的追悼活动，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

各方反应

在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世界主要的媒体，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都报道毛泽东的死讯。

9月9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9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逝世发唁电；9月21日在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与会140多个国家之代表为悼念毛泽东肃立默哀。

123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共169件唁电和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其代表或政府代表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使领馆吊唁。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共计55个国家为毛泽东逝世下半旗致哀：

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民主柬埔寨、越南、老挝；

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叙利亚、北也门；

加拿大、塞浦路斯、法国、西德、新西兰、瑞士、土耳其、南斯拉夫；

阿尔及利亚、贝宁、博茨瓦纳、乍得、刚果、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扎伊尔、赞比亚；

阿根廷、智利、圭亚那、巴拿马、委内瑞拉。

澳大利亚、牙买加、毛里求斯、荷兰、塞拉利昂等国议会举行追悼仪式或通过决议，对毛泽东逝世致哀。

各方反应

美国：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第一时间向北京致唁电：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访问北京时曾有幸会见了毛主席。我们的谈话促进了美中关系沿着我们两国早先设想

的路线发展。请让我现在象那时一样申明，美国决心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我们关系的正常化。这将是赞扬他的远见的恰当的方式，也将有益于我们两国人民。”

此后他又在记者会上发表了声明：

“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以他的行动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国家的发展的领导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同美国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比较积极的时代。我相信，毛主席帮助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改善的趋势将会继续对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我代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于1972年历史性访华的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致哀：

“.....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气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一些年以前，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毫无疑问，他只争朝夕地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样强烈信仰的原则而努力。”

杰拉尔德·福特委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致哀；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官员也前往吊唁。美国媒体对毛泽东逝世及毛泽东评价不一，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毛泽东不会为中国人所怀念，而会使他们所怀恨”，纽约时报则称呼毛泽东为“中国的斯大林，疯狂废除旧秩序的制度”。

苏联：由于中苏交恶，苏联方面只在官方报纸的角落简短提及毛泽东去世，并通过塔斯社批评了毛泽东思想。不过苏联与其六个卫星国曾在9月14日以党的名义集体发出唁电，但由于中苏交恶的持续影响，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拒收。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里尔·马祖罗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前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致哀。

朝鲜：1976年9月9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向中共发出唁电：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一向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诚心诚意地支援我们，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在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者而进行激烈斗争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阻挠，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用鲜血援助了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毛泽东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也是朝鲜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毛泽东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留下的崇高业绩将与世长存。”

金日成于9月11日亲自前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吊唁。朝鲜政府还将9月10日至18日定为全国哀悼期，下半旗志哀，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中华民国（台湾）：中国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9月10日的头版以标题“祸国殃民·百死莫赎 毛匪泽东毙命”刊登毛泽东的死讯，并在副标题称“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显未完成 为匪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9月1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蒋经国发表《告大陆同胞

书》，号召大陆同胞、中共干部、官兵及驻外人员“抗暴革命”。并将《告大陆同胞书》透过中华民国国军各空飘与海漂系统，传送到大陆各地。前线国军各播音站，也向大陆广播了这份《告大陆同胞书》。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于9月10日发表声明，呼吁大陆同胞“于毛匪毙命、匪党内部权力斗争加剧之际，加强反共抗暴斗争，早日摧毁反人性、反人权的匪伪政权”。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黎玉玺与四十五个单项运动协会则呼吁大陆运动员，“把握出国访问及比赛的机会，投奔自由”。由于香港无线电视制播《毛泽东特辑》，被认为是“通共媚匪”，中华民国各家电视台中国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公司、台湾电视公司发表共同声明，抵制无线电视的节目、影片，停止各方面合作，这一行为一直到1980年代《楚留香》在台湾掀起热潮，才宣告结束。至于台湾民间，则在报道翌日，街头有人放鞭炮、贴标语、挂出中华民国国旗等不同的方式表示庆祝。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唁电中说：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和成功的革命的领袖，这一革命是人类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各国人民为摆脱外来统治、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争取更加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罗马尼亚人民亲密的朋友。他努力发展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利于两国人民、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在这极其沉痛的时刻，我们以最大的同情，和中国共产党人、全体中国人民分担这一悲痛。我们相信，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团结将继续加强和日益发展。”

齐奥塞斯库于9月11日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罗马尼亚政府将9月18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并举办了毛泽东追悼会。

巴基斯坦：9月9日，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发表声明：“作为改变了占人类四

分之一的人民生活的中国革命之父，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人类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 · · · ·毛泽东主席一贯关心巴基斯坦的幸福和进步，这使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巴基斯坦人民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起哀悼这位伟人的逝世。”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发表声明：

“· · · · ·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永远象太阳一样指导人民和各国的命运。· · · · ·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开始时，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 · · · ·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同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将仍然是人类反对侵略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我们巴基斯坦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乔德里总统和布托总理亲赴中国大使馆吊唁；巴基斯坦全国下半旗七天致哀。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兼总统铁托评价：“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杰出的领袖。如果没有他，现代中国是难以想像的。”

越南：越南劳动党以最高规格发表唁电：

“· · · · · ·在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共同精心培育了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一友谊得到了日益美好的发展，正如胡志明主席所说‘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 · · · ·越南人民永远铭记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

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这一充满情谊的话语。我们越南人民无比深切地感谢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给予我们革命事业的巨大的、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分别于9月10日、11日前往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吊唁。9月18日，根据越南政府会议决定，越南各机关、部队、工厂、矿山、企业（包括工地）、学校及停泊在越南港口的越南船只下半旗致哀。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督约翰·克尔爵士说：“我知道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今天都象一个家庭失去最敬爱的家长一样”，总理约翰·马尔科姆·弗雷泽评价：“在他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国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

日本：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众议院议长前尾繁三郎、内阁官房长官井出一太郎、大藏大臣，前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前首相田中角荣、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公明党代表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等人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志哀，前往中国大使馆和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吊唁者共计达一万余人。

日本政界人士就毛泽东逝世纷纷发表谈话：

三木武夫：

“获悉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不禁感到惊讶和深切的悲痛。这位主席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八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建立了巨大的业绩。我对毛主席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所展示的领导力量一向表示深切敬意。 我们决心遵循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为了永远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今后也要进一步不断作出努力。 ”

大平正芳：

“深感失去了本世纪最后一位巨人。这对今后的中国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就不胜感到寂寞与孤单。毛先生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汪洋的大人物，也是对日本很了解的。”

宫泽喜一：

“不用说，毛主席是本世纪世界上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也许他是最后一个人了。．．．．．毫无疑问，毛主席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一九七二年中国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同年又同美国改善了关系。从这种情况来看，很明显，身居中央的毛主席对中国作出重大决断起了指导作用。”

中曾根康弘：

“衷心悼念二十世纪产生的伟大英雄和领导人毛泽东主席逝世。由于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恢复了独立和主权，其国际地位在世界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党将永远不会忘怀毛主席对恢复日中两国间的和平与加强友好所显示出来的热情。我确信，毛主席的这种热情在任何时代的中国都将得到继承。我们也同样决心越来越加强这种友好。”

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共官媒也在日本官方释出极大善意之后，重申北京支持日本主张收复被苏联占领的北方四岛的要求。

英国：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表声明：

“首相和他在政府中的同事们获悉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极其悲痛。毛主席是本世纪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他将

作为一位具有伟大远见的人和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思想家而为人们所铭记。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与伦比的成就的纪念。”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致唁电，首相詹姆士·卡拉汉说，“毛泽东主席漫长的一生中，他把自己全心全意地贡献给他的祖国和人民。中国的复兴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杰出领导的不朽见证。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克罗斯兰、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前往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吊唁。

法国：法国总统德斯坦发表声明：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他来自中国人民的下层，使中国人民摆脱了昔日的屈辱，他以他行动上独有的魄力和果敢的思考，成功地使他们处于历史所承认的中心地位。法国人民通过她的总统，向失去他们称之为他们伟大舵手的广大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

”

他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唁电中称：

“毛泽东主席来自中国人民大众，他使中国摆脱了昔日的屈辱，使中国恢复了历史赋予她的中心地位。．．．．．他从事的伟大事业和表现出来的果敢才能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深刻。法国不会忘记，正是毛泽东主席和深切敬仰他的戴高乐将军一起促成了我们两国互相接近。．．．．．”

德斯坦于9月17日亲赴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吊唁，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外交部长路易·德居兰戈等法国高级官员也前往吊唁。9月11日，巴黎一万余市民举行游行集会，哀悼毛泽东的去世；9月18日，根据法国总统府的决定，法国所有公共建筑物下半旗致哀。

西德：西德总统瓦尔特·谢尔在唁电中称，“毛泽东决定性地参与创造了本世纪的历史”；

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则称，毛泽东“是给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他将为贵国人民和世界所永远铭记[。”西德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社民党主席，前总理威利·勃兰特、联邦议院议长伦格尔前往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吊唁；9月18日，西德所有国家机关下半旗致哀。

身后安排

早在1956年，毛泽东曾在遗体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在其他场合，毛泽东还说过希望死后归葬湖南湘潭。后来，毛泽东曾在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虽然毛泽东生前鼓励火化、并在火化同意书上签名，但出于政治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他的遗体做永久保留。初时暂厝人民大会堂，完成防腐处理后被安放在水晶棺内。1976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动怀仁堂事变，从而结束“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动乱。10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正阳门北侧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永久保存其遗体以此来供后人瞻仰。该纪念堂于1976年11月24日奠基，纪念堂半年后完工，盛放遗体的水晶棺也制作完成。

1977年8月29日，盛放有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被移入纪念堂内。1977年9月9日，在毛逝世一周年之际，举行该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正式对外开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维护和运营。1980年8月21日和8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时表示将会保留该纪念堂，并且还同时还承诺将会永远保留天安门城楼上的在“两个‘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间的毛泽东头像。后来，参观毛主席纪念馆成为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红色旅游项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o_Zedong

毛泽东

毛泽东，又名毛主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从1949年开始统治中国大陆，直到他于1976年去世。作为一名在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理论、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被统称作毛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湖南韶山一个殷实的农民的儿子。在他生命的早期，他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观念；他尤其被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所影响。后来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始成员。1927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北伐，进行与北洋军阀的内战。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领导江西苏维埃激进的土地政策，最终在长征期间成为中共领导人。尽管在抗日战争（1937-1945）期间，中共在统一战线下暂时与国民党结盟，但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又重新开始，1949年毛泽东的军队击败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共控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党制国家。随后几年，他通过打地主、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掌控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与联合国军作战；共造成数百万中国人死亡。1953年至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推行计划经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启动工业化计划和发起“两弹一星”工程。1955年至1957年，毛泽东发动清洗运动和反右运动，反右运动至少有55万人被迫害，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旨在将中国经济从农业经济迅速转变为工业经济的大跃进，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1958年至1962年间造成1500万-5500万人死亡。1963年，毛泽东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

场历时10年、以激烈的阶级斗争、广泛的文物破坏和空前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为标志的清除中国社会“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千百万人在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而死亡人数的估计数量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其中包括刘少奇，中国的第二任国家主席。毛病多年后，1976年突发心脏病，享年82岁。毛时代，中国人口从5.5亿左右增长到9亿多，而政府没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毛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也被称为政治知识分子、理论家、军事战略家和诗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卷入了朝鲜战争、中苏分裂、越南战争和红色高棉的崛起。他的统治中国的政权是一个专制和极权的政权，负责大规模镇压，以及破坏宗教和文化文物和遗址。它还造成了大量死亡，估计有 4000万 到 8000 万受害者因饥饿、迫害、监狱劳动和大规模处决而死亡。毛的支持者认为他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转变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提高了识字率和预期寿命。

早期生活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在湖南韶山村。他的父亲原是一名贫困农民，后来成为韶山最富有的农民之一。毛在湖南农村长大；毛形容他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管教者，他会殴打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毛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试图缓和丈夫严厉的态度。毛泽东小时候也成为了佛教徒，但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放弃了这种信仰。8岁时，毛被送到韶山小学。在学习了儒家的价值体系后，他后来承认，他不喜欢宣扬儒家道德的

中国古典文本，而是喜欢《三国志》和《水浒传》等流行小说。13岁时，毛完成了小学教育，他的父亲将他与17岁的妻子实行包办婚姻，从而联姻了他们的地主家庭。毛拒绝承认她是他的妻子；他成为包办婚姻的激烈批评者，并暂时离开家乡。1910年，其妻子在当地名誉扫地，逝世。

在父亲的农田工作时，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郑观应的小册子，并从中发展出“政治意识”；该小册子哀叹中国权力的衰落并主张采用代议制民主。毛对历史感兴趣，受到乔治·华盛顿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实力和民族主义热情的启发。长沙饥荒后爆发的哥老会领导的抗议活动塑造了他的政治观点；毛支持长沙抗议者的要求，但政府武装部队镇压了抗议者们并处决了他们的领导人。饥荒蔓延到韶山，饥饿的农民抢夺了毛父亲的粮食。毛不赞成他们的行为，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16岁时，毛搬到附近东山的一所高等小学，在那里他因农民背景而受到欺负。

1911年，毛在长沙上中学。这座城市的革命情绪高涨，人们普遍对溥仪的专制君主制怀有敌意，许多人都在鼓吹共和主义。革命党的领袖是孙中山，他是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徒，领导着同盟会。在长沙，毛泽东受到孙中山的报纸《民立报》的影响；并在一篇学校作文中呼吁孙中山作中国总统。作为反抗满族君主的象征，毛和一个朋友剪掉了他们的辫子；这辫子是对满族皇帝臣服的标志。

受孙共和主义的鼓舞，军队在中国南方起义，引发了辛亥革命。长沙巡抚逃跑，共和人士统治这座城市。毛支持革命，加入了叛军，但没有参与战

斗。北方诸省仍然忠于皇帝，为了避免内战，被支持者称为“临时总统”的孙中山与君主主义将军袁世凯妥协。君主制被废除，创建了中华民国，但君主主义者袁成为了总统。革命结束后，毛在服役六个月后于 1912 年退伍。大约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一篇报纸文章中发现了社会主义；在继续阅读中国社会主义党的学生创始人江亢虎的小册子时，毛仍然对社会主义这个想法感兴趣，但还不相信。

长沙第四师范学校：1912-19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毛泽东先后从警察学院、肥皂生产学校、法学院、经济学院和官办长沙中学辍学。毛独立学习，长时间在长沙图书馆读书，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古典自由主义核心著作，以及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如达尔文、密尔、卢梭和斯宾塞。多年后，他将自己视为知识分子，承认此时他认为自己比劳动人民更好。他被弗里德里希·保尔森启发；保尔森的对于个人主义理念的强调，导致毛相信，强烈的个性不应由道德准则约束，而应争取更大的利益；并接受“不择手段”的理论，即相信，只要结果正确，手段就是正确的。毛的父亲认为儿子的知识追求毫无用处，就断绝了他的津贴，并强迫他住进穷人的宿舍。

毛立志当教师，就读于长沙第四师范学校，不久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毛的教授兼益友、杨昌济鼓励他阅读激进报刊《新青年》；该报刊是由杨的朋友陈独秀创立的；陈在北京大学任院长。虽然陈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但陈认为，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净化和去除自己的迷信与专制。

在第一学年期间，毛结识了一位年长的学生萧子升；他们一起在湖南徒步旅行，乞讨、写对联以获得食物。

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学生，1915年毛被选为学生会书记。他组织了学生自治协会，并领导了反对校规的抗议活动。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指导读者增强体力为革命服务。毛加入了长沙文人为效仿哲学家王夫之所创立的革命团体“王夫之研究会”（船山学社）。1917年春，他被选为学生志愿军的指挥官；该学生志愿军是为了保卫学校免受士兵的袭击而成立的。毛越来越对战争的技巧感兴趣；他带着浓厚的兴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也开始认识到，工人团结的重要性。毛与萧子升、蔡和森一起进行身体锻炼，并与其他年轻的革命者于1918年4月成立了“人民研究会”，以辩论、讨论陈独秀的理念。共有70-80人加入了该组织；他们想要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转型；其中许多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1919年6月毛泽东毕业，当年名列第三。

早期的革命活动

北京、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17-19

毛搬到北京，因为他的导师杨昌济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杨认为毛“聪明又英俊”，为他争取到了大学图书馆馆员李大钊的助理工作；李大钊后来成为一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写了一系列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青年》文章；在此期间，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

克党夺取了俄罗斯政权。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倡导者；该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创立；李大钊的文章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学说中引入了马克思主义。

毛在政治理念上变得“越来越激进”；毛泽东最初是受到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影响；该无政府主义理念是一种迄今为止最突出的激进主义思想。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者呼吁在社会关系、家庭结构和妇女平等方面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而不是像早期革命者所呼吁的那样，对政府形式仅仅进行简单改变。1919年冬，毛加入李大钊学习组，“迅速走向马克思主义”。

毛的工资很低；他和另外七名湖南学生住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但认为北京的美丽提供了“生动的生活补偿”。在北京大学里，毛因湖南乡音和地位低下而受到其他学生的冷落。他加入了大学哲学与新闻学会，并参加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讲座和研讨会。1919年春，毛泽东与准备前往法国的朋友一起前往上海，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回到韶山，他的母亲在那里身患绝症。她于 1919 年 10 月去世，她的丈夫于 1920 年 1 月去世。

新文化和政治抗议，1919-20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抗议中国对日本在中国扩张的抵抗力不强。爱国者被日本的影响所激怒；——日本于1915年向

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来串通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中国在凡尔赛条约失利（其中日本被允许在山东接受德国的辖地）。这些学生示威活动点燃了全国的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人们将中国的外交失败归咎于社会文化落后。

在长沙，毛开始在修业（音译）小学教历史，并组织抗议湖南省亲段祺瑞的省长张敬尧；由于他的腐败和暴力统治，他被俗称“毒蛇”。5月下旬，毛泽东与何叔衡和邓中夏共同创办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了6月的学生罢课运动，并从7月开始每周出刊一份激进的杂志《湘江评论》。他使用大多数中国民众都能理解的白话，主张建立“人民大联盟”的必要性，加强能够进行非暴力革命的工会。此时，他的思想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概念的影响。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学生集会

张敬尧禁止学生会，但毛在担任自由主义杂志《新湖南》的编辑后继续发表文章，并在流行于当地的报纸《大公报》上也发表文章。其中有几篇文章倡导女权主义观点，呼吁中国社会妇女解放；毛受到他被迫的包办婚姻的影响。

1919年12月，毛帮助在湖南组织了一次总罢工，争取到了一些让步，但毛和其他学生领袖感到受到张敬尧的威胁；毛回到北京，探望身患绝症的杨昌济。毛发现自己的文章在革命运动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便着手争

取支持推翻张敬尧。毛在此期间阅读到托马斯·柯库普、卡尔·考茨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以及新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尤其是《共产党宣言》；——他受到了他们越来越大的影响，但他的观点仍然不拘一格。

毛泽东在搬到上海之前访问了天津、济南和曲阜；在上海，他做洗衣工并遇到了陈独秀；毛后来指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在我生命中可能处于最关键的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上海，毛泽东遇到了他以前的老师，易培基；他是一个革命者、中国国民党成员；国民党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影响。易将毛介绍给谭延闿将军，一位国民党高级成员；谭将军率领着驻扎在湖南与广东边境的军队。谭将军密谋推翻张敬尧；毛组织长沙学生帮助他。1920年6月，谭率军进入长沙，张敬尧逃跑。在随后的省政府改组中，毛被任命为第一师范学校初中部负责人。毛现在收入丰厚；1920年冬与杨开慧结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22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1年由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上海的法租界成立的。该党的成立，是作为一个研究学会，以及一个非正式的网络。毛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沙分会，并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分会和文化书社，开设书店，在湖南各地宣传革命文学。他参与了湖南自治运动，希望湖南宪法能增加公民自由，使他的革命活动更容易。当湖南自治运动在湖南新军阀的领导下成功建立起湖南自治政府的时候，毛没有参与。

在1921年早期的时候，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团体；他们决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始召开中央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毛泽东。当局派间谍警察到大会后，代表们搬到浙江嘉兴附近南湖的一艘船上，以躲避侦查。

虽然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几位代表也出席了该会议，但第一次代表大会无视了列宁的建议；列宁主张让中国共产党人与同样主张中国民族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国国民党）一起建立起临时联盟。相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即只有城市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毛现在是驻长沙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为了在那里建党，他采取了各种策略。1921年8月，他在清代初期反抗满清的湖南哲学家王夫之的研究会的馆舍内创办了自学大学，读者可以通过该大学接触革命文学。他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大众教育运动以扫除文盲，尽管他编辑的教科书中包含激进主义的情绪。他继续组织工人罢工，反对湖南省长赵恒惕的行政。然而，劳工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当时，成功而著名的安源煤矿罢工（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学家所叙述的内容相反）取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结合的战略。在罢工运动中，刘少奇、李立三、毛泽东不仅动员了矿工，还成立了学校和合作社，招募了地方知识分子、士绅、军官、商人、红帮头目，甚至教会神职人员。

毛声称他错过了 1922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

他丢失了地址信息。代表们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同意为了“民族革命”的利益而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希望将其政治向左推进。毛热情地同意了这个决定，主张在中国的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结成联盟。毛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帝国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中，他猛烈抨击日本、英国和美国政府，称后者是“最凶残的刽子手”。

与国民党的合作：1922-27

1923 年 6 月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重申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承诺。毛被选为共产党委员会的成员；他留在上海、居住下来，以支持党的这项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策略。1924年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提出了四项将权力下放给委员会城乡局的决议。他对国民党的热情支持使他引起了湖南同志李立三的怀疑。

1924年底，毛回到韶山，也许是为了养病。他发现农民越来越不安，有些人从富有的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建立公社。这使他相信农民的革命潜力，这是国民党左派而不是共产党人提倡的想法（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重点仍然是在于发动城市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理论）。1926 年 5 月至 9 月，他回到广州主持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干部，为他们的战斗活动做准备，使他们通过军事训练演习，让他们学习基本的左翼文本。1925年冬，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引起赵恒惕当局的注意后逃往广州。

当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于 1925 年 5 月去世时，蒋介石继任领导中国国民党；后者开始边缘化左翼国民党和共产党。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支持蒋的国民革命军，后者于 1926 年开始对北洋军阀进行北伐战争。在这次远征之后，在军阀被打败的地区，农民起义造反、侵占了富有地主的土地，这些地主在许多情况下被杀害。这种起义造反激怒了国民党的高级人物，他们本身很多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背景；这种矛盾鲜明地显示了，革命运动中日益扩大的阶级分歧和意识形态分歧。

1927 年 3 月，毛出现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该会议试图通过任命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领导人来剥夺蒋将军的权力。在那里，毛在农民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一套“镇压土豪劣绅条例”辩护；该条例主张对任何被判犯有反革命活动罪的人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认为在革命形势下，“和平方法是不够的”。

1927 年 4 月，毛被任命为国民党五届中央土地委员会成员，敦促农民拒绝支付土地租金。毛带领另一组起草了《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要求没收属于“土豪劣绅、贪官、军阀主义和村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在进行“土地调查”时，他说任何拥有超过 30 亩土地，占人口 13% 的人，都是反革命的。他承认全国各地的革命热情差异很大，需要灵活的土地再分配政策。在扩大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他的结论时，许多人表示疑议，有些人认为它走得太远，有些人认为还不够。最终，毛的建议只得到了部分实施。

内战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1927年

在北伐取得成功后，蒋介石的目光转向了共产党，他们现在在中国已经有数万人了。蒋无视驻武汉的国民党左翼政府的命令，向共产党民兵控制的上海进军。在上海（此前，共产党人在上海组织发动了暴力游行，武力夺取了上海政权），蒋的部队实行了白色恐怖，在青帮的帮助下屠杀了 5000 人。在北京，19名共产党领导人被张作霖杀害（此前，张作霖突袭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发现了李大钊与苏联政府通信、主张出卖蒙古等中国利益的证据）。那年五月，数以万计的共产主义者和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被杀害，中共失去了其25,000名成员中的约15,000人。

中共继续支持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党左翼政府，这是毛泽东最初支持的立场；但到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农民民兵身上。当武汉政府于 7 月 15 日将所有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时（与张作霖类似，汪精卫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进一步密切联系），这个问题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中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也就是俗称的“红军”，与蒋战斗。1927 年 8 月 1 日，朱德将军率领的一个营奉命攻占南昌市，这就是著名的南昌起义。他们最初取得成功，但五天后被迫撤退，向南进军汕头，并从那里被赶到了福建的荒野。毛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在秋收起义中率领四个团攻打长沙，希望能在湖南引发农民起义。在进攻前夕，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他现存最早的诗——《长沙》。毛的计划是在 9 月 9 日从三个方向攻击这个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但第四团叛变、投靠国民党，攻击第三团。毛泽东亲自率领的部队前进到了长沙，但不能攻取；9月15日，毛接受了失败，并与1000名幸存者向东开赴到

江西的井冈山。

Jung Chang 和 Jon Halliday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声称起义实际上是被毛泽东破坏的，目的是阻止士兵跑到任何其他中共领导人那里。张和韩礼德（Jung Chang 和 Jon Halliday）还声称，毛说服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包括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的苏联外交官；张和韩礼德声称他们控制了中共的大部分活动），让他们只在长沙发动袭击；然后在袭击发动以后，毛就从该次行动中撤退。Chang和Halliday报道了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秘书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其中认为撤退是“最卑鄙的背叛和懦弱”。

井冈山基地：1927-1928

躲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将毛从他们的队伍中和湖南省委员会中开除，以惩罚他的“军事机会主义”、关注农村运动、以及对“坏绅士”过于宽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他长期倡导的三项政策：立即成立工人委员会、无条件没收所有土地、以及拒绝国民党。毛的反应是不理会他们。毛在井冈山县建立基地；这是井冈山区的一个地区；在那里他将五个村庄统一为自治州，并发动没收富地主的土地；这些地主被“再教育”，有时被处决。他确保该地区不发生大屠杀，并采取了比中央委员会提倡的更为宽松的做法。他宣称“即使是瘸子、聋子和瞎子，都可以对革命斗争有用”，他增加了军队的人数，将两组土匪编入军队，建立了一支1800名士兵的队伍。他给士兵定了规矩：服从命令，没收的东西上缴政府，贫农的东西一律不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将他的手下塑造成一支训练有素、高效的战斗部队。

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革命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1927 年 2 月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1928年毛泽东关于针对国民党斗争的建议

1928年春，中央下令毛的军队前往湘南，希望引发农民起义。毛有些怀疑，但还是答应了。他们到达湖南，在那里遭到国民党的袭击，损失惨重后逃之夭夭。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入侵井冈山，使他们没有基地。毛的军队在乡间徘徊时，遇到了朱德将军和林彪领导的中共一个团；他们联合起来，企图夺回井冈山。他们最初是成功的，但国民党反击了，把中共打了回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在山区打了一场战壕游击战。中央再次命令毛进军湘南，但他拒绝了，并留在了他的基地。相比之下，朱顺

服了，带着他的军队离开。毛的部队在晚上离开营地寻找增援部队时，抵抗了国民党 25 天。他与被歼灭的朱军重聚，一同返回井冈山，夺回了据点。在那里，一个叛逃的国民党团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山区，他们无法种植足够的庄稼来养活每个人，导致整个冬天的粮食短缺。

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29-1934

1929 年 1 月，毛、朱带着 2000 人和彭提供的 800 人撤离基地，并带领他们的军队南下，到江西铜鼓和信丰附近地区。撤离导致士气下降，许多军队不听话，开始偷窃。这让李立三和中央委员会感到担忧，他们将毛的军队视为流氓无产阶级，他们认为这些流氓无产者无法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意识。

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李认为只有城市无产阶级才能成功地领导革命，并认为不需要毛泽东的农民游击队；他命令毛将他的军队解散成小组单位，派去传播革命信息。毛回答说，虽然他同意李的理论立场，但他不会解散他的军队，也不会放弃他的基地。李、毛都把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关键，相信中共的胜利将引发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被推翻。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官方路线。莫斯科的官员希望对中共进行更大的控制，并通过把李立三召到俄罗斯、调查他的错误，来解除李的权力。苏联人用受过苏联教育的中国共产党人取代了李立三；那些受过苏联教育的中国共产党人被称为“28个布尔什维克”；其中博古和张闻天两人控制了中央委员会。毛不同意新的领导层，认为他们对中国的

情况了解甚少；毛很快就成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1930年2月，毛泽东在其控制的地区建立了赣西南省苏维埃政府。11月，他的妻子和妹妹被国民党将军何健俘虏并斩首后，毛遭受了情感创伤。毛随后与18岁的革命者贺子珍结婚；贺在接下来的九年里为他生了五个孩子。面对内部问题，江西苏维埃成员指责毛过于温和，因此认为毛是反革命。12月，他们试图推翻毛，导致了福田事件，在此期间，毛的拥护者酷刑折磨了许多人、并处决了 2000 至 3000 名不服从者。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它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地区。十一月宣布江西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虽然毛被宣布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但由于他对红军的控制权被分配给了周恩来，毛的权力被削弱了。与此同时，毛从肺结核中康复。

国民党军队采取了围剿红军的政策。毛泽东以受孙子等古代军事战略家作品影响的游击战术作为回应；但周和新领导层遵循公开对抗和常规战争的政策。红军成功地击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战役。蒋介石对他的军队的失败感到愤怒，亲自前来领导这次行动。他也面临挫败并撤退，以应对日本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危险政治局面。由于国民党将重点转移到保卫中国对抗日本扩张主义，红军得以扩大其控制范围，最终将其辖地人口控制在 300 万。毛继续他的土地改革计划。1931 年 11 月，他宣布启动“土地核查项目”，并于 1933 年 6 月扩大行动规模。他还策划了教育计划并实施了增加女性政治参与度的措施。

蒋将共产党视为比日本人更大的威胁，并返回江西，在那里发起了第五次围剿战役。这次战役中，蒋的军事行动涉及到在该地区周围建造混凝土和带刺铁丝网的“火墙”，同时进行空中轰炸。在蒋军的攻击面前，周恩来领导的军事防御策略失效。被围困的红军士气低落，因为食物和药品变得稀缺。领导层决定撤离。

长征：1934-1935

1934年10月14日，红军带着8.5万名士兵和1.5万名党员干部在江西苏维埃西南角信丰突破国民党防线，开始了“长征”。为了逃脱，许多伤者和病者以及妇女和儿童被留下，由一群游击队员保卫。这些游击队后来被国民党屠杀。

100,000共产党人在逃亡湘南的路程上，在湘江经历激战；然后渡过贵州舞阳河，并于1935年1月攻取贵州遵义。他们在遵义短暂休息，并在那里开了一个会议。在这里，毛泽东当选为领导人，成为党的政治局主席、和事实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毛当选的部分原因是，他的候选人资格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毛坚持他们应当作为游击队运作；他制定了一个目的地：中国北方陕西省的苏维埃根据地；从那里共产党人可以集中精力与日本人作战。毛认为，共产党人专注于反帝斗争，会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中国人民就会放弃国民党。

毛率领部队从遵义到娄山关，在那里遭到武装阻击，但成功渡河。蒋飞到

该地区率领军队阻截毛泽东部队，但共产党战胜了他并渡过了金沙江。面对更艰巨的抢渡大渡河的任务，他们于五月在泸定桥战斗，夺取泸定。穿过马鞍山周围的山脉，在川西牟公，他们遇到了张国焘五万余人的中共四方面军，一起前往冒儿凯（音译），然后是甘肃。张和毛在前进方向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两者分道扬镳，朱德与张国焘一起。毛的军队向北前进，穿过数百公里的草原；这是一片泥潭，在那里他们遭到满族部落的袭击；许多士兵死于饥荒和疾病。终于到了陕西；他们在穿越岷山和六盘山到达陕西苏维埃根据地之前，击退了国民党追兵和伊斯兰民的骑兵；只有 7,000-8000 人幸存下来。

长征巩固了毛泽东作为党内主导人物的地位。1935年11月，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从那时起，毛是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尽管他直到 1943 年才成为党主席。

Jung Chang 和 Jon Halliday 在他们的书《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中对这一时期的许多事件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例如，在泸定桥并没有发生战斗；中共经过泸定桥的时候并未受到军队阻截；长征不是中共的战略而是蒋介石设计的（因为蒋介石通过派遣军队追击中国共产党，可以使那些国民党军队进入当时被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四川等地，并随后控制那些省份的政局）；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并没有走长征，而是在担架上被抬着完成长征的。然而，虽然在大众媒体中广受欢迎，但张和韩礼德的著作却受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

与国民党结盟：1935-1940

毛的军队于1935年10月抵达陕西延安、苏维埃根据地，并在宝安定居，直到1936年春。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社区建立了联系，重新分配和耕种土地，提供医疗服务，并开始了扫文盲教育计划。由于贺龙的湖南部队的到来，以及朱德和张国焘的军队从西藏返回，毛泽东现在共有15,000名士兵。1936年2月，他们在延安成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新兵。1937年1月，他们开始“抗日远征”，派出游击队进入日本控制的领土进行零星袭击。1937年5月，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情况。西方记者也抵达了“边区”（因为苏维埃已更名）；最著名的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艾格尼丝·斯梅德利（Agnes Smedley），前者将自己的经历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基础，后者的及时叙述报道使国际社会关注毛泽东的事业。

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头部被弹片打伤。她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毛遂与她事实上离婚，娶了演员江青。毛搬进了一间窑洞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照料花园和理论研究上。他开始相信，仅靠红军是无法打败日本人的，应该与国民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组成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防政府”来实现这一目标。虽然鄙视蒋介石为“国贼”，5月5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议结成军事同盟；这是斯大林倡导的行动方针。虽然蒋有意无视毛的信息，继续与共产党内战，但他在西安被他自己的一位将军张学良逮捕，导致了西安事变；张强迫蒋与共产党讨论这个问题，导致在1937年12月25日形成了双方都让步的统一战线。

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和南京——导致了南京大屠杀（关于这个暴行，毛泽东

一生从未谈过)——并将国民党政府推向内陆的重庆。日本人的残暴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战斗,红军从 50,000 人增加到 500,000 人。1938 年8月,红军组成新四军和八路军,名义上由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指挥。1940 年8月,红军发起百团大战,其中40万大军同时在五个省份袭击日军。这是一次军事上的成功,导致 20,000 名日本人死亡、铁路中断和煤矿损失(也导致毛对其领导人彭德怀的批评,以及日本的“三光”屠杀政策)。毛在延安根据地在他的部队撰写了几部著作,其中包括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处理游击和机动军事战术,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思路。

恢复内战: 1940-1949

1944年,美国人向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名叫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的特使。根据 Edwin Moise 在《现代中国: 历史》第二版中的说法:

“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印象深刻。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似乎没有那么腐败,更加团结,并且在抗日方面更有活力。美军飞行员在华北上空被击落……向他们的上级证实,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广大地区既强大又受欢迎。但是,最后,美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接触努力,并没有带来什么有益成果。”

二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对国民政府进行军事援助。苏联通过占领中国东北向毛提供了准秘密支持,这使得解放军能够大规模行动并得到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大量武器。为了加强红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任命他的亲密伙伴朱德将军为总司令。1948年,在毛泽东的直接命令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用饥饿围困的方法，摧毁了守卫长春市的国民党军队。据信至少有 160,000 名平民在从 6 月持续到 10 月的围攻中饿死丧生。解放军中校张正隆在他的著作《雪白血红》中记录了这次围困，将其与广岛原子弹轰炸相提并论：“伤亡人数差不多。广岛用了九秒；长春用了五个月。” 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军队在与毛泽东军队的决战中损失惨重。1949年12月10日凌晨，解放军围攻重庆、成都；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

中国的领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周晚些时候，毛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50 年冬天，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重点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革命、外交政策、铁路、海军基地和苏联的经济与技术援助。由此产生的条约反映了斯大林的统治地位和他帮助毛的意愿。

毛推动党改革社会和扩大控制的运动。1950年10月，毛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这场赴朝战争与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改革运动同时进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入朝鲜战争，美国对它实施贸易禁运，一直持续到理查德尼克松改善关系。至少有18万中国军队士兵在战争中阵亡。

毛指示行动到最细微的细节。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总司令、党的主席。中国驻韩军队由时任新任

总理周恩来统帅，彭德怀将军任战地司令员兼政委。

在土改运动中，大量地主富农在共产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被打死，土地被剥夺，分给贫农；极大地减少了经济不平等。党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针对前国民党官员、被控“扰乱”市场的商人、西方公司的前中国雇员、忠诚度受怀疑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批判、批斗、甚至处决。1976年，据估计，至少一百万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至少八十万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杀。

毛本人声称，在 1950 年至 1952 年期间，共有 70 万人在“镇反运动”中被杀。然而，由于有一项政策是“几乎每个村庄都选择至少一个地主，通常是几个地主”，通常认为死亡人数在 200 万和 500 万之间。此外，至少有 150 万人，可能多达 400 万到 600 万人，被送往“劳动改革”营地，许多人在那里丧生。毛在组织大规模镇压中发挥了个人作用，并建立了处决配额制度；在基层实际执行中，该配额经常被超过。毛为这些杀戮辩护，认为这是确保权力所必需的。

人们普遍认为，毛政府在 1950 年代通过无限制的镇压和社会改革消除了鸦片的消费和生产。千万吸毒者被强制戒毒，毒贩被处决，鸦片产区种植新作物。剩余的鸦片生产从中国边境以南转移到金三角地区。

从 1951 年开始，毛泽东发起了连续两次运动，旨在通过针对富有的资本家和政治对手来消除城市地区的腐败，即“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是对

政府、行业和党内官员的集中清洗，而五反运动则将目光放宽，针对一般资本主义分子。工人告发老板，配偶互相背叛，子女告发父母；受害者经常在斗争会上受到羞辱，目标人员将受到口头和身体上的虐待，直到他们承认犯罪。毛坚持，罪行轻微的罪犯要被批斗、改造、或送进劳改营，“其中最严重的应该被枪杀”。这些运动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其中很多是自杀。

在上海，从高楼跳楼自杀变得司空见惯，居民避免在摩天大楼附近的人行道上行走，因为担心跳楼自杀的人可能会落在他们身上。一些传记作者指出，在毛泽东时代，驱使被视为敌人的人自杀是一种常见的策略。例如，菲利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记中指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明确指示“不杀干部”，但在实践中却允许保安部队的首长康生驱使反对派自杀；“这种模式在毛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过程中不断重复”。

随着权力的巩固，毛泽东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旨在结束中国对农业的依赖，以成为世界强国。在苏联的帮助下，一些新的工业厂房建成。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是为了鼓励毛在 1958 年发起第二个五年计划。毛还启动了一个快速集体化的阶段。中共引入了价格控制以及旨在提高识字率的简化汉字。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项目。

在此期间进行的运动包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表示他愿意考虑关于如何治理中国的不同意见。鉴于表达意见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开始反对共产党并质疑其领导地位。这最初是被容忍和鼓励的。然而，几个月后，毛政府改变了政策，迫害了那些批评党的人，总共可能

有 500,000 人，以及那些仅仅持有轻微批评意见的人，即所谓的反右运动。一些人声称百花运动只是一种铲除“危险”思想的诡计。

毛的医生李志绥表示，毛最初将这项政策视为削弱党内反对他的势力的一种方式，但他对批评的程度以及针对他自己的领导的批评感到惊讶。直到那时，他才使用它作为识别并随后迫害那些批评他的政府的人的方法。百花运动导致许多公民的被审判、消声和处决，也与毛泽东的反右运动直接有关，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大跃进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启动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随后进行了“大跃进”，该计划旨在将中国迅速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替代模式来替代苏联模式，即党内其他人提倡的重工业模式。在这个大跃进经济计划下，迄今为止形成的相对较小的农业集体迅速并入了更大的人民公社，许多农民被命令从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钢铁生产。一些私人粮食生产被取缔，牲畜和农具实行集体所有制。

在大跃进下，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下令新公社实施各种未经证实和不科学的农业新技术。劳动力转移到钢铁生产和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周期性自然灾害的综合影响导致 1959 年粮食产量下降了约 15%，1960 年又下降了 10%，1961 年没有恢复。

为了博得上级青睐，避免被清剿，党内的每一层都夸大了自己手下的粮食产量。基于捏造的成功，党的干部被命令征用不成比例的大量虚拟收成供国家使用，主要用于城市和市区，但也用于出口。结果，饥荒在一些地区因干旱而在另一些地区因洪水而加剧，导致农村农民没有自己的食物，数千万人在中国大饥荒中饿死。中国城市地区的人们每个月都会得到食品券，而农村地区的人们则要自己种庄稼，并将部分庄稼上交给政府。中国农村地区的死亡人数显然超过了城市中心的死亡人数。此外，中国政府继续出口那些本可以分配给该国饥饿公民的食品。这些因素导致估计有 5200 万公民死亡。饥饿是 1959 年至 1962 年间约 3,000 万中国农民死亡的直接原因。此外，许多在多年艰苦奋斗和生存斗争中变得消瘦和营养不良的儿童在大跃进后不久就死去了。大跃进于 1962 年结束。

毛对局势严重性的了解程度一直存在争议。毛的医生认为他可能不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愿批评他的政策，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愿意夸大或彻头彻尾地报告虚假食品生产成果。在得知饥饿的程度后，毛发誓不再吃肉，他的工作人员也随之采取行动。

香港历史学家弗兰克·迪克特(Frank Dikötter) 质疑毛不知道全国各地的饥荒：——

“认为国家错误地从农村拿走了太多粮食是因为它认为收成比实际大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至多仅在 1958 年秋天部分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党非常清楚它是在饿死自己的人民。1959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毛泽东特别下令党比以往多采购三分之一的粮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在会上宣布，‘平均分配资源只会毁了大跃进。吃不饱就饿死。最好让一半人死，另一半人可以吃饱自己

的食物。””

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 (Thomas P. Bernstein) 就毛泽东在 1959 年 3 月 25 日的会议上关于饥饿的声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这表明毛准备接受大规模的人员死亡。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是毛泽东使用夸张的一个例子，另一个是他在核战争期间随意接受一半人口死亡。在其他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并不接受大规模死亡。周的年表显示，1958 年 10 月，毛泽东对云南有 40,000 人饿死表示真正的担忧。3 月 25 日的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担心 2520 万人面临饥饿的危险。但从夏末开始，毛泽东基本上忘记了这个问题，直到如前所述，1960年10月‘信阳事变’曝光。”

在大跃进初期，社区成员被鼓励在公共食堂吃饭，后来许多食堂因食物和燃料耗尽而关闭。

托马斯·伯恩斯坦教授在 2006 年发表于《中国季刊》的《毛泽东与 1959-1960 年的饥荒：关于“故意性”的研究》一文中也讨论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不同阶段的态度转变：

“1958年深秋，毛泽东强烈谴责大跃进的普遍做法，即让农民劳作无食、无休，导致瘟疫、饥饿和死亡。毛泽东当时明确承认，官场反右压力是造成‘拼死生产’的重要原因。虽然他不愿意承认只有放弃大跃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他确实强烈要求解决这些问题。1959年7月与彭德怀在庐山发生冲突后，1960 年春天，毛在一场新的、极其严厉的反右运动的背景下复兴了大

跃进；他坚持不懈地推行了一些他自己以前曾经谴责过的激进政策。直到1960年春天，毛泽东才再次表达对非正常死亡和其他虐待的担忧，但他未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阻止它们。鉴于他已经了解到大跃进极端主义给农民带来的代价，毛应该知道继续实施大跃进政策将付出类似甚至更大的代价。相反，他为了实现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目标，故意忽略了第一个激进阶段的教训，而继续坚持和扩大‘大跃进’的政策。”

在《饿鬼：毛的秘密饥荒》中，贾斯珀贝克尔指出，毛对他收到的农村粮食短缺的报告不屑一顾，拒绝改变方向，认为农民在撒谎，右派和富农在囤积粮食。他拒绝打开国家粮仓、救济灾民，而是发起了一系列“反粮食隐瞒”运动，导致无数次清洗和自杀。其他暴力运动随之而来，党的领导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寻找隐藏的粮食和食品储备，而不仅仅是谷物，因为毛泽东发布了猪、鸡、鸭和鸡蛋的配额。许多被指控藏匿食物的农民被折磨致死。

不管这场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毛在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中都失去了尊重。1962年，他最终被迫放弃政策，政治权力被刘少奇、邓小平等温和派领导人抢走。然而，在全国宣传机器的支持下，毛泽东基本上否认他对这场饥荒负有重要责任。1959年4月27日，毛泽东被迫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但得以继续担任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职务。刘少奇随之担任国家主席。

大跃进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悲剧。虽然官方宣称已经达到了钢铁产量目标，但几乎所有所谓的农村土法炼钢的产品都是质量不合格、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因为它是由各种废金属在自制熔炉中制成的，没有可靠的燃料

来源，如煤炭。这意味着无法达到适当的熔炼条件。据大跃进时期上海农村的几何老师张荣梅（音译）说：

“我们拿走了家里所有的家具、锅碗瓢盆，我们所有的邻居也都这样做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大火里，熔化了所有的金属。”

最严重的饥荒被引向了国家的敌人。正如贾斯珀·贝克尔（Jasper Becker）解释的那样：

“中国人口中最脆弱的部分，大约 5%，是那些被毛称为‘人民公敌’的人。任何在以前的镇压运动中被贴上‘黑分子’标签的人在食物分配方面的优先级最低。地主、富农、原国民党政权成员、宗教领袖、右派、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死亡人数最多。”

1962 年 1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大型共产党会议上（被称为“七千干部会议”），国家主席刘少奇谴责大跃进，将中国普遍的饥荒归咎于大跃进的错误政策。绝大多数代表表示同意，但国防部长林彪坚决为毛辩护。在毛和林暗中策划卷土重来的同时，国家经历了短暂的自由化经济时期。刘少奇和邓小平通过在一定程度上解散人民公社、引入对农民小农场的私人控制型经济、以及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粮食，来减轻饥荒的最坏影响，并试图挽救经济。

结果

在1959年7月/8月的庐山会议上，几位部长对大跃进没有按计划取得成功表示担忧。其中最直接的是时任国防部长和朝鲜战争老将彭德怀。在彭对大跃进的批评之后，毛策划了对彭及其支持者的清洗，扼杀了对大跃进政策的批评。向毛报告饥荒真相的高级官员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场反对右翼机会主义的运动被发动，导致无数党员和普通农民被送到监狱劳改营，许多人随后死于饥荒。多年后，中共得出结论，在这场运动中，多达600万人受到了错误的惩罚。

大跃进期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是极具争议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当中国政府最终公布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时，人们对中国农村的灾难规模知之甚少，因为在此期间允许进入中国的少数西方观察员仅限于示范村庄。他们被欺骗相信大跃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有一种假设是，主要通过香港和台湾传到西方的个别饥饿报告一定是局部化或夸大的，因为中国继续声称创纪录的收成，并且是针对非洲大陆的粮食净出口国。另外，由于毛想早点在1960年至1962年偿还苏联19.73亿元的债务，于是出口增长了50%；并且，中国向其他同伴的共产主义政权，朝鲜，北越和阿尔巴尼亚所提供的粮食都是免费的。

中国于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了人口普查。美国人口学家朱迪思·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博士首次尝试分析这些数据以估计饥荒死亡人数，并于1984年发表分析结果。数据可靠性存疑，难以确定准确数字。尽管如此，班尼斯特得出的结论是，官方数据表明，在1958-61年间，中国发生了大约1500万的额外死亡人数，并且根据她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建模，并考虑到饥荒期间假定的报告不足，该数字大约是3000万。胡耀邦给出的官方统计数字是2000万人死亡。杨继绳，前任

新华社记者拥有其他学者没有的访问特权和联系，估计死亡人数为 3600 万。弗兰克·迪科特 (Frank Dikötter) 估计，从 1958 年到 1962 年，至少有 4500 万人因大跃进而过早死亡。其他各种研究来源已经将这一数字置于 2000 万到 4600 万之间。

中苏分裂

在中国的国际外交局势方面，这一时期主要是表现为中国的进一步孤立。中苏关系破裂导致赫鲁晓夫把所有苏联技术专家和物资援助撤离该国。分裂影响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苏联有一个它支持的国际共产党网络；作为竞争对手，中国现在创建了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网络，以在许多国家争夺左翼的地方控制权。Lorenz M. Lüthi 认为：

“中苏分裂是冷战的关键事件之一，其重要性与柏林墙的建造、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中美和解同等重要。分裂影响了冷战的总体框架，并特别影响了越南战争的进程。”

分裂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于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后继任、并形成更加温和的苏联领导层以后发生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公开站在中国一边，从而形成了阿中两国之间的联盟，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 1976 年毛去世后。由于苏联有了核武器，所以毛泽东尽量把威胁降低。贝克尔说：“毛认为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对赫鲁晓夫说，中国在核战争中损失 3 亿人也无所谓：另一半人口会活下来以确保胜利”。

在毛控制中国共产党之前，斯大林就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者的地位，因此毛从未挑战任何斯大林主义学说的适用性（至少在斯大林在世时）。斯大林去世后，毛相信（也许是因为年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领导权将落到他身上。由此产生的赫鲁晓夫（在政治和军事上占优势的政府首脑）和毛（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更高的理解）之间的紧张关系侵蚀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共之间以前的赞助人-客户关系。在中国，以前高高在上的苏联人现在被谴责为“修正主义者”，并与“美帝国主义”一起被列为反革命。

在部分地已经被韩国、日本和台湾的敌对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情况下，现在，中国在北部和西部方向面临着来自苏联的新威胁。内部危机和外部威胁都需要毛以非凡的政治家风度来面对、处理；但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十年，中国的政治家们相互对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 1960 年代初期，毛泽东开始关注思考 1959 年后中国的状态和性质。他看到革命和大跃进已经用新的统治精英取代了旧的统治精英。他担心当权者与他们所要服务的人民疏远。毛相信，一场文化革命将推翻和扰乱“统治阶级”，使中国处于“永远革命”的状态；理论上，这将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特权精英服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赞成取消毛作为中国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的实际权力，但保留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仪式性和象征性角色的想法；党坚持承认毛对革命的所有积极贡献。刘邓他们试图通过控制经济政策和在政治上维护自己的主张来边缘化毛泽东。许多人声称，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回应刘、邓的路线。一些学者，如高默波，声称这种说法被夸大了。其他人，例如弗兰克·迪克特（Frank Dikötter），则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报复那些在大跃进中敢于挑战他的人。

文革从红卫兵运动开始。由于相信社会中某些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继续威胁社会主义框架，因此，被称为红卫兵的年轻人团体与社会各级当局进行斗争，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法庭。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数百万人受到迫害。文革期间，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校和大学都关闭了，生活在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被下令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在那里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工作。

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大部分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大量中国公民被监禁，并在该国造成了普遍的经济和社会混乱。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在此期间被毁，因为文革渗透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活着》、《蓝风筝》和《霸王别姬》等中国电影所描绘的那样。据估计，在文化大革命的暴力中，有数十万人，甚至数百万人丧生。这包括刘少奇等著名人物。

当毛被告知这种损失，特别是人们被迫自杀时，据称他评论说：“试图自杀的人——不要试图拯救他们！……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不是说我们离不开几个人。”（尽管国家声称“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当

局允许红卫兵虐待和杀害政权的反对者。国家警察总长谢富治说：“不要说打坏人是错误的：如果好人愤怒，打死了坏人，那就这样吧。”结果，1966年8月和9月，据报道仅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杀害。

正是在这一时期，毛选择了似乎与毛的所有思想相呼应的林彪成为他的接班人。在党章中，林被正式指定为毛泽东的继任者。然而，到1971年，两人之间的分歧变得明显。中国官方历史记载，林正计划发动军事政变或暗杀毛泽东。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领空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他试图逃离中国，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被捕。中共宣布林计划攻击毛；并对已死的林开除党籍。此时，毛对许多中共高层人物失去了信任。最高级别的苏联集团情报叛逃者Ion Mihai Pacepa中将，在逃到西方以后，描述了他与Nicolae Ceausescu的谈话，后者告诉他，克格勃曾有一个计划，试图在林彪的帮助下杀死毛泽东。

尽管被一些人认为是女权主义人物和妇女权利的支持者，但美国国务院2008年公布的文件显示，1973年，毛泽东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宣称妇女“没有见识”，并开玩笑说“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别的东西没有多少，多余的是女人……让她们去你的地方。她们会制造灾难。这样你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当毛提出送给美国一千万妇女时，基辛格回答说毛“正在改进他的提议”。毛和基辛格随后同意从公共记录中删除他们对女性的评论，这个建议是由一名中国官员提出的，他担心毛的评论如果被公开可能会招致公众的愤怒。

1969年，毛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实际上，众所周知，1976年才是文化

大革命的真正结束时间；当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逮捕。

毛泽东晚年的健康状况下降，患有帕金森氏病、或者（根据他的医生）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以及肺部疾病（由于吸烟）和心脏疾病。一些人还将毛的健康下降归咎于林彪的背叛。毛因健康情况不好而处于隐居状态；但共产党内的各个派系已经因为预期毛死后的权力斗争而动员起来。

文化大革命现在被官方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重挫折”。学术界通常将其视为对中国具有极大破坏性的时期。尽管毛泽东政权发表了有利于穷人的言论，但他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贫困。

对文革期间死亡人数的估计，包括平民和红卫兵在内，差别很大。据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称，估计大约 40 万人死亡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最低数字。MacFarquhar 和 Schoenhals 断言，仅在中国农村就有大约 3600 万人受到迫害，其中 750,000 至 150 万人被杀，而永久受伤残疾的人数大致相同。《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声称，多达 300 万人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暴力。

历史学家 Daniel Leese 指出，在 1950 年代，毛泽东的个性变得刚硬：

“从文学作品中浮现出的毛个性印象令人不安。它揭示了从一个脚踏实地的领导者到一个越来越无情和自我放纵的独裁者的某种时间发展。他在无可争议的时候和蔼可亲，偶尔会反思自己的权力极限。毛接受批评的宽容程度不断下降。”

国事访问

毛泽东只出过两次国，两次都是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他第一次出访是为庆祝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71岁生日，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瓦尔特·乌布里希特和蒙古共产党总书记 Yumjaagiin Tsedenbal出席了此次活动。

第二次对莫斯科的访问是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其中的亮点包括毛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他在红场参加了苏联军队的年度阅兵式，以及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宴会），和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那里他会见了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如朝鲜的金日成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1959年4月27日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职位后，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进一步的外交国事访问和出国旅行，但毛本人不再出国。

死亡和后果

毛的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每况愈下，这可能是因为他连续不断地吸烟而加重了病情。他晚年患有多种肺部和心脏疾病，这已成为国家机密。有未经证实的报告称他可能患有帕金森病或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也称为“渐冻人”病）。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已知的最后一张他活着的照片——是在1976年5月27日，当时他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

卡尔·阿里·布托。当年，他遭受了两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一次在 3 月，一次在 7 月，然后在 9 月 5 日发生了第三次，使他失去了生命能力。将近四天后，他于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去世，享年 82 岁。共产党将他的死讯宣布时间推迟到当天 16:00，当时全国广播电台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呼吁党的团结。

披着党旗的毛泽东遗体在人民大会堂安放了一个星期。一百万中国人鱼贯而过，向毛致以最后的敬意，许多人公开哭泣或表达悲伤，而外国人则在电视上观看。毛泽东的官方肖像挂在墙上，横幅上写着：“把毛主席留下的事业继续下去，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9月17日，尸体被一辆小巴士送往305医院，在那里，他的内脏用甲醛保存。

9 月 18 日，全国各地的枪声、警报声、哨声和号角同时吹响，人民默哀三分钟。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数百万人，军乐队演奏了《国际歌》。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以20分钟长的悼词进行了仪式。毛泽东的遗体后来被永久安放在北京的毛泽东纪念堂的水晶棺里。

遗产

毛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遗产在中国和国外几乎没有一致意见。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也被称为政治知识分子、理论家、军事战略家、诗人和有远见的人。支持者普遍赞扬他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统一了中国，并结束了过去几十年的内战。他还因

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以及提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而受到赞誉。2013 年 12 月，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一项民意调查表示，在接受调查的 1045 名受访者中，大约 85% 的人认为毛的成就大于错误。

在他 27 年的统治期间，他的政策导致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比任何其他 20 世纪领导人都多；估计在他的政权下死亡的人数从 4000 万到多达 8000 万不等，死于饥饿、迫害、监狱劳动和大规模处决。然而，支持者指出，尽管如此，在他的统治期间，人口预期寿命、教育和医疗保健有所改善。他的支持者声称他迅速使中国工业化；然而，也有人声称他的“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政策阻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他的支持者声称他的政策为中国后来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而其他人则声称他的政策延迟了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只有在毛泽东的政策被广泛放弃后才能快速增长。在他的统治下，中国人口从大约 5.5 亿增加到 9 亿多，而政府没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过剩危机。一些外国共产主义起义者使用毛泽东的革命策略；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为世界各地的许多共产党组织所接受。

“如果毛泽东在 1956 年去世，他的成就将是不朽的。如果他在 1966 年去世，他仍然是一个伟人，但有缺陷。但他在 1976 年就去世了。唉，还能说什么呢？”

——陈云（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中国大陆，毛被许多共产党员和拥护者所崇敬，被广大民众尊为“现代中国的奠基人”，被誉为“赋予中国人民尊严和自尊”。高默波在其 2008 年出

版的《为中国的过去而战：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称，毛将平均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1975 年的 63 岁，为“一个经历内战外患”的中国“与世界大国平起平坐”奠定基础。高还称赞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改，提升女性地位，提高大众素养，积极“改造中国社会，使之面目全非”。中国以外的学者也认为毛时代提高了识字率（1949 年只有 20% 的人口可以阅读，而 30 年后这一比例为 65.5%）、预期寿命翻了一番、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以及发展了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为其成为世界强国的地位铺平了道路。

然而，毛泽东也有许多中国批评者。反对他的人或意见，可能会导致在中国大陆受到严厉审查或职业受到影响。在西方，毛泽东经常被谴责为独裁极权者，他的经济理论广受质疑——尽管对一些政治活动家来说，他仍然是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影响的象征。即使在中国，邓小平和赵紫阳等市场改革者也公开否定了毛的经济理念。

尽管，由毛泽东塑造的中国共产党，今天在实践中拒绝接受毛泽东大部分意识形态中的经济基础理念，但它保留了毛统治时期建立的许多专制主义统治权力：——它控制着中国的军队、警察、法院和媒体与出版，不允许在全国或地方层面进行多党选举，香港和澳门除外。因此，很难衡量中国大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遗产的真正支持程度。就党本身而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继续正式将毛视为民族英雄。2008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在他的家乡湖南省中部向游客开放了毛泽东广场，以纪念他诞辰 115 周年。

对毛泽东的遗产仍有分歧。原党委书记苏沙赤（音译）认为“毛是一个最大的历史罪犯，也是一股向善的伟大力量”。同样，记者刘宾雁将毛泽东描述为“既是怪物又是天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大暴君之一”，是一个与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相当的独裁者；毛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希特勒与斯大林。

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让·路易斯·马戈林写道：“毛泽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经常被称为红色皇帝……他在整个系统中建立的暴力远远超过我们在中国可能会发现的任何该民族传统暴力。”

毛经常被比作中国的秦始皇（秦始皇以活埋数百名学者而臭名昭著）；毛个人很喜欢这种比较。1958年，毛泽东在对党干部的讲话中说，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远远超过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活埋了460名学者，而我们埋葬了46,000人。在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们不是杀了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曾经和民主人民辩论过：你说我们像秦始皇，你错了，我们比他厉害一百倍。”

由于这种策略，批评者指出：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现了在 20 世纪所有主要专制政权中都可以看出的压迫倾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些政权中的每一个都发生了故意下令进行的大规模清洗和灭绝。”

其他人，如菲利普·肖特，拒绝在《毛泽东：一生》中进行这样的比较，认为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统性和蓄意的，而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死亡是饥荒的意外后果。肖特指出，由于毛泽东相信通过思想改革进行救赎，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但他们并没有作为人群被消灭（他们被剥夺土地并被进行了思想改造）。相反，他将毛泽东与十九世纪的那些中国改革者们进行了比较（他们在中国十九世纪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的时代挑战了中国的传统方式）。肖特认为，“毛泽东的悲剧和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坚持自己的革命梦想直到最后……他将中国从儒家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他所承诺的光明的红色未来却变成了一个枯燥的炼狱。”

在他们的2013传记《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作者 Alexander V. Pantov 和 Steven I. Levine 断言，毛泽东既是“一位成功的创造者，也是一位邪恶的毁灭者”；但也认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应被奉为圣人或沦为恶魔，因为他“确实尽力为他的国家带来繁荣并赢得国际尊重。”

毛的英文翻译西德尼·里滕贝格在他的回忆录《留在背后的人》中写道，虽然毛“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领袖”，但他也是“一个大罪犯，因为不是他想要，也不是他打算这样做，而是事实上，他的疯狂幻想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毛的私人秘书李锐更进一步，声称毛对他的政策造成的苦难和死亡不屑一顾：“毛的思维方式和执政方式很可怕。他不重视人的生命。别人的死亡对他而言根本不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对毛泽东的生平和影响提出了非常批判性的

观点。例如，他们注意到毛很清楚他的政策将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1958年 11 月，毛在谈到水厂、炼钢等劳动密集型项目时，对他的核心圈子说：“这样工作，这么多项目，中国可能要死一半。如果不是一半，也会有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五千万人——死亡。”

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认为，这句话断章取义，声称：

“然而，中文原文并没有那么令人震惊。在讲话中，毛谈到了大规模的土方灌溉工程和众多的大型工业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他说，如果这些项目全部同时进行，‘毫无疑问，中国将有一半人口死亡；如果不是一半，则将是三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死亡人数将达到 5000 万人。’毛泽东随后以前任广西省委书记为例（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前一年因未能防止饥荒而于 1957 年被撤职），补充说：‘如果在 5000 万的死亡人数下你没有被撤职，我至少应该被撤职；我是否应该被砍头也是有问题的，安徽想做这么多，倒是可以，但要以不死人为原则。’”

Jasper Becker指出，“Dikötter 收集的档案材料……证实中国领导层对饥荒绝非无知或被误导，而是一直被告知此事。他揭露了共产党对农民使用暴力的程度”：

“大屠杀通常与毛泽东和大跃进无关，中国继续受益于与柬埔寨波尔布特或苏联斯大林更有利的比较。但是，新而丰富的档案证据表明，胁迫、恐怖和有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基础，在 1958 年至 1962 年之间，粗略估计，大约 6% 至 8% 的死者是被酷刑致死或被判处死刑的。——至少有 300 万受害者被杀害。”

迪科特认为，中共领导人“美化暴力，习惯了大规模的生命损失。他们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即以目的正确而为手段辩护。1962年，四川省已因大跃进而失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当时，四川省领导人李井泉把这些人的死亡与长征（只有十分之一的共产党人走完了长征）相比；他说：“我们不弱，我们已经变得更强，我们挺住了脊梁。”

对于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迪科特强调，尽管毛清楚地知道人力成本，但那些工程持续了数年有增无减，最终夺去了数十万精疲力竭的村民的生命。他还指出，“清水和甘肃的村民称这些项目为‘杀戮场’。这种‘杀戮场’，正是后来的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令人不寒而栗的真正杀戮场的序曲。”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入朝鲜战争，美国对它实施贸易禁运，一直持续到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有助于应对苏联。

电视剧《传记》说：“[毛泽东]把中国从封建的死水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推翻的中国制度是落后和腐败的；很少有人会否认他把中国拖入了20 世纪。但以人类的生命为代价是惊人的。”

打倒四人帮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89%E7%A2%8E%E5%9B%9B%E4%BA%BA%E5%B8%AE>

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当时称为“一举粉碎四人帮”，又称怀仁堂事变，指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联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党政军要人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央政治局联络员毛远新五人于北京市中南海以“隔离审查”名义抓捕并拘禁的事件。事后，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结束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四人帮及其主要追随者均遭到政治清洗，有的被刑事追究。

背景

十年文革使得国家陷入一片混乱，民众支持邓小平整顿秩序、发展经济的政策，而对掌握大权的四人帮及其激进路线不满。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权力真空，通过文革造反起家的四人帮与文革中受到打击的老干部在路线上存在巨大分歧，内部斗争异常激烈。

策划

1976年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指示其工作人员米士奇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在事前电话约定后，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到西皇城根9号院李先

念临时住处，谈话不到十分钟。华国锋谈到：同“四人帮”斗争不可避免，是时候解决了。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请求叶剑英意见，又同他研究此事；当天华国锋又请求汪东兴给予协助，汪东兴同意了。9月14日，李先念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外出，转往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李先念传达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当天，李先念即向华国锋汇报谈话内容和叶剑英的态度。

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提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华国锋以此将中立的纪登奎排除在行动以外。

9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主要议题为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以及毛远新是否需要回到辽宁。四人帮与华国锋及叶剑英发生争执。之后，华国锋又获得了陈锡联与苏振华的支持。

9月21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讨初步方案。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方案，吴德提出“逮捕”和“投票否决”的形式，经商议确定采用逮捕（李先念反对投票方式）。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

9月29日深夜23时，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

开，主要讨论国庆节的各项活动安排。期间江青要求散会，留下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六人。江青要求，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人去处理；但华国锋没有回应。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国庆座谈会。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人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三人又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再次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10月2日，毛远新调派沈阳军区1个坦克师开往北京，同时要求上海民兵、北京大学民兵和清华大学民兵做好准备。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向叶剑英报告毛远新出动部队，叶立即下令军队退回原地。四人帮住宅戒备森严，每个住宅有二重以上警备。同日15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交换意见。当晚，汪东兴、华国锋、吴德三人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交谈；华国锋之后秘密召见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获得了支持。10月4日下午，华国锋等三人最终敲定了方案。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原定部署国庆节后准备10天视情况再动手；叶剑英提出改为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华国锋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剑英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剑英即到汪东兴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之行动方案周全可行。

行动

10月6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内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下午，汪东兴对行动人员召开短会。下午5时，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也有小型会议分配任务。汪东兴、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于晚上6时30分、7时20分和7时40分到达怀仁堂。晚上8时，是同“四人帮”斗争胜负之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江青住处宣布执行同样决定。张春桥先到场，立即被捕；王洪文企图反抗，被控制；姚文元只说了声“走吧”，就跟着士兵离开。江青则在中南海春藕斋西侧201号楼被宣布隔离审查；江青在宣读后问“能不能再念一遍”，然后写了一封信并密封交给工作人员，随即被运送至秘密地点软禁近8个月，再转至秦城监狱。同时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也被捕。晚上10时，耿飚到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华国锋的手令交给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然后派人迅速控制了中央三台。

后续

四人帮都被拘捕后，华国锋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连夜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晚上10时许，出席会议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剑英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华国锋正式成为继毛泽东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会后，即下发关于华国锋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会议开到10月7日凌晨4点多才结束。李德生根据华国锋、叶剑英命令逮捕毛远新等人。

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一系列指示，说明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之经过、以及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指导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把一举粉碎“四人帮”公之于世。时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当天还即兴填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当时流传甚广：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

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查运动。

1980年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并判处相应刑罚。

影响和评价

中共官方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从此结束”来评价此事。“四人帮”曾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拉帮结派，在党内造成极其恶劣之影响；如果不把“四人帮”罪行彻底清算，摧毁其帮派，就不能肃清他们在各方面之影响。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4人之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下发“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1978年，全国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取得决定性之胜利；运动之目的基本实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结束全国揭批“四人帮”之群众运动。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ng_of_Four

四人帮

四人帮是一个政治派别，包括四个中国共产党官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声名鹊起，后来被指控犯有一系列叛国罪。该团伙的头目是江青（毛泽东的最后一任妻子）。其他成员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控制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机关，尽管尚不清楚哪些重大决策是毛泽东做出并由四人帮执行的，哪些是四人帮自己策划的结果。

四人帮，连同1971 年去世的林彪将军，被列为文化大革命的两大“反革命势力”，并被中国政府正式指责为十年间发生的最严重的社会混乱负责。1976 年 10 月 6 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仅一个月后，他们的垮台在北京

街头引发了重大庆祝活动，标志着中国动荡政治时代的结束。

他们的垮台并不等于拒绝文化大革命。它是由新领导人华国锋总理和其他在此期间崛起的人组织的。后来，随着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回归和华的权力逐渐丧失，对整个变革过程的重大否定才开始。

形成

该小组由江青领导，由她的三位亲密伙伴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组成。1976年已经死亡的另外两名男子康生和谢富志被列为“帮派”成员。陈伯达和毛远新，后者是毛的侄子，也被认为是帮派的一些亲密伙伴。

大多数西方说法认为，文革的实际领导层由更广泛的群体组成，主要是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最著名的是林彪，直到他被声称从中国叛逃并在1971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陈伯达经常被归类为林派的成员，而不是江青的派系。

角色

文革初期，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后来非常著名的文章，批评《海瑞罢官》。文章认为，这部戏剧实际上是对军事英雄彭德怀的改良主义努力的同情写照，因此是对毛主席大跃进的攻击（毛在彭对

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以后清除了彭的权力)。这篇文章被引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火花。

文革期间江青导演革命戏曲，会见红卫兵。

这个团体的下台有时被认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毛于 1966 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领导人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毛让他的妻子江青负责国家的文化机构，江青是一位前电影演员，在 1966 年之前没有担任过公共政治角色。张、姚和王是上海的党的领导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毛泽东保卫上海发挥了领导作用。

1971年林彪去世前后，文革开始失去动力。鉴于中苏边境的危险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指挥官要求恢复秩序。接受文革但从未全力支持的周恩来总理在1973年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夺回了他的权威，并利用它使邓小平重新回到了党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刘少奇于1969年死于狱中。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四人帮与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联盟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

没落

周恩来于 1976 年 1 月去世，在随后的几个月的哀悼中，党内高层发生了权力斗争。改革派邓被任命为代理总理，而四人帮开始利用他们的报纸批

评邓并动员他们的城市民兵组织。大部分军队和党的安全仍由中央委员会的党内长老控制，他们在改革派邓小平和激进的四入帮之间通常扮演谨慎的角色。他们同意在四月天安门事件后将邓免职，但采取措施确保邓和他的盟友不会在此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四人帮一直控制着政府媒体，许多文章都以毛临近生命终点的“既定方针”为主题。由激进组织的支持者指挥的城市民兵部队被置于一个高度警戒化的状态的准备。

华国锋总理在 9 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攻击了激进分子的媒体路线；但江青坚决不同意华的意见，要任命她为新的党主席。会议无果而终。10月4日，激进组织通过《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警告说，任何干涉既定原则的修正主义者都将“没有好下场”。

激进分子希望汪东兴和陈锡联等军事要领会支持他们，但华国锋似乎把军队拉到了他的身边。1976 年 10 月 6 日，华逮捕了四个主要激进分子及其一些次要同伙。韩素音详细叙述了他们被推翻的情况：

“当晚，政治局紧急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们必需到会。由于汪东兴曾是他们的盟友，他们并没有怀疑他……他们进门以后被逮捕了。一个特殊的8341部队单元然后去江青的第17号钓鱼台住所并逮捕了她。当晚毛远新在东北被捕，北京大学四人帮宣传员被捕、并在报社被拘留。一切都以安静和高效的方式完成。在上海，该帮派的支持者收到消息，要来北京“开会”。他们来了，都被逮捕。就这样，四人帮的霸权计划，不流一滴血就结束了。”

据历史学家许志永说，这次行动并非完全没有流血——王洪文杀死了两个试图抓住他的守卫，并在被制服前受伤。

从 10 月 21 日开始，全国范围内开始谴责该团伙，最终于 12 月向公众公布了与该团伙涉嫌犯罪有关的文件。该党谴责四人帮“表面上是左派，但实际上是右派”。政府媒体将文革的过激行为归咎于四人帮和林彪。庆祝活动很突出，不仅限于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街道。在全国范围内的“揭批清查运动”中，数百万原“造反派”被公开批评，认为他们与四人帮有关。

后果

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总理、叶剑英元帅和经济沙皇陈云、李先念组成下一届党的领导核心。这四个人，以及后来重新出任职位的邓小平，在加上汪东兴，在1977年8月的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华是党的主席）。在政治局层面，所有四位在世元帅、七位其他将军和至少五位与军事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的成员资格反映了对国家稳定的深切关注。

审判

1981年，四名被罢免的领导人受到审判，被判犯有反党活动罪。庭审过程中，江青尤其反抗，大声抗议，时而泪流满面。她是四人帮中唯一一个愿意为自己争论的人。她申辩的论点是，她始终听从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张春桥拒绝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姚文元、王洪文表示忏悔，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检方将政治错误与实际犯罪分开。后者包括篡夺国家权力和党的领导权；1966 年至 1976 年期间，约有 750,000 人受到迫害，其中 34,375 人死亡。审判的官方记录尚未公布。

江青、张春桥被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王洪文、姚文元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二十年有期徒刑。四人帮的所有成员都已经死了；江青于1991年自杀，王洪文于1992年去世，姚文元和张春桥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出狱，2005年去世。

陈伯达、毛远新等四人帮的支持者也被判刑。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4%BA%BA%E5%B8%AE>

四人帮

四人帮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形成于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成员按“粉碎四人帮”时中共中央公布的顺序依次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合称“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江青为毛泽东第四任妻子，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泽东从上海提拔到中共中央并委以重任，四人在文革后期皆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和张春桥二人在中共十大上更是成为排名第三和第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陈锡联以及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等人联手粉碎四人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五人拘禁，其主要追随者亦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遭到清洗。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的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四人帮被公审的时候，四人帮被正式命名为“江青反革命集团”。

词源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亲自讲话来劝告四人帮。这次会议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谈话时，他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历史

四人帮被视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派重要政治势力，被视为毛泽东贯彻其文革思想的主要推手。

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导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倒台。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成为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陈伯达等人对张春桥发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击；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四人中最年轻的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也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总理周恩来。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重新崛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合称“三副一长”），实际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特别是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四人帮的组阁计划以失败告终，四人帮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晚年的毛泽东虽然并未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之后

也没有再削弱四人帮的势力。相反，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却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再次打倒邓小平。在逝世前，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

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具体职务是（按中共党内地位高低顺序）：王洪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具体权力，却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

粉碎四人帮

1976年4月，有很多群众在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中表示了对四人帮和文革的不满。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开始加紧夺权，如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秘书直接绕过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命令各地方主要领导有问题需要请示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人在获得中央警卫部队领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后进行逮捕行动，分别拘留了四人帮及该派系的核心成员（如毛远新、马天水等人），继而隔离审查，一般以此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

事后华国锋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和公安部部长，成为最高领导人。王张江姚四人随后被中共中央永远开除党籍，当时给这四个人的定性是“形左实右”。中共中央对王、张、江、姚四人发起大批判，罪名包括“破坏无产阶级大革命”、“破坏批林批孔”等等。

审判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逐渐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倡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对四人帮和林彪等两个集团在法律上进行审判和定罪。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有意把张春桥的政敌陈伯达划归四人帮集团，以避免林彪问题的复杂化。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第一次开庭，对江青等人进行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宣判，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为无期徒刑）。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其他：陈伯达、毛远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至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在法庭上，江青是唯一为自己辩护的四人帮成员，她的辩护理由是她不过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评价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揭露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并对老同志进行无情迫害，对人民、对国民经济犯下了滔滔罪行。其中用漫画形式来形容四人帮，如“政治流氓”王洪文、“狗头军师”张春桥、“白骨精”江青、“吹鼓手”“文痞”姚文元等。

郭沫若所写的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上半阙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成员结局

江青于1991年在秦城监狱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77岁。

王洪文于1992年因肝癌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56岁。

张春桥于2005年因胰腺癌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88岁。

姚文元于1996年刑满出狱，于2005年因糖尿病死于上海，终年74岁。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9%9D%92>

江青

江青（1914年3月5日－1991年5月14日），本名李云鹤，乳名进孩、淑蒙，艺名蓝苹，女，山东诸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演员、文艺理论家、摄影家、共产主义者，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毛为其第三任丈夫），“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人帮”之首。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年轻时从事戏剧和电影表演；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去延安，后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结婚（结婚时毛泽东尚未与妻子贺子珍办理离婚手续）。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开始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与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并称“四人帮”。1976年在毛泽东病逝后被抓扣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公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其艺名江青并非毛泽东取自唐代著名诗人钱起《湘灵鼓瑟》最后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而是早在奔赴延安之初已经起好。在此之前江青的艺名为“蓝苹”，改名“青”意味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生平

诸城时期

江青，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淑蒙”或“李进孩”。父亲李德文在县城开木匠铺，母亲李栎氏是李德文的二房，曾为后来中共特工领导人之一康生家作帮佣，两家住得不远，江青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康生家门口。1921年夏，入小学时，取学名“李云鹤”。1926年因向老师吐口水，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投奔姐夫王克铭（奉军军官）。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了三个月的童工。

济南时期

1928年王克铭随奉军溃退，李云鹤母女去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1929年夏，15岁的李云鹤进入济南赵太侔任校长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了一年戏剧。1931年初随该校老师王泊生组织的晦鸣剧社前往北京演出。5月返回济南，嫁给济南富家子弟裴明伦。7月，与裴明伦离婚，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青岛时期

1931年7月—1933年4月，李云鹤在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梁实秋为馆长），并通过赵太侔的妻子俞珊结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黄敬）。俞比李云鹤大三岁，是大学生物系学生、共产党地下宣传部长。1932年，18岁的李云鹤与俞同居。开始进入“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戏。1933年2月李云鹤由俞启威介绍，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同年4月俞启威被捕，李云鹤逃往俞的老家上海。

上海时期

李云鹤抵达上海之后，因俞家不肯承认她，只好投奔在济南学戏时候的老同学魏鹤龄。魏介绍她认识田汉。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沅介绍，到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旁听。7月，由田汉等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张淑贞），在沪西郊区北新泾镇店员识字班当教员。10月，重新参加共青团，加入左翼教联。同时参加业余剧团的话剧演出。

1934年9月，她在上海曹家渡被捕入狱，同年12月被释放。然后去了北平与已释放的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改名“蓝苹”。6月，蓝苹因主演话剧《娜拉》受到好评。随后在《自由神》及《都市风光》两部电影中担任配角。9月，与影评人唐纳同居。

1936年4月，蓝苹与唐纳结婚，在杭州六和塔下参加集体婚礼。但婚后不久因她仍与俞启威保持联系发生婚变，7月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

回沪后，蓝苹加入联华影业公司，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嫂。

1937年2月，主演的话剧《大雷雨》（章泯导演）公演。并主演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未遂。1937年6月，蓝苹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我的自白》，并与导演章泯同居，同时被联华影业公司解聘。

延安时期

与毛泽东结婚（1940年代延安）

1937年7月中旬，“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蓝苹离开上海，经武汉抵达西安；8月，到达延安，改名为“江青”；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是蓝苹到达延安之后首先接触的人，受理蓝苹的恢复党籍申请。江青申请恢复党籍时，与朱光关系密切。从外部到达延安的人，需要住在“招待所”里不准出门接受审查；蓝苹与毛泽东“结婚”后改名为江青。1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8月改演京剧《打渔杀家》得到肯定，随即调任军委办公室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照顾毛泽东起居（毛泽东当时的妻子贺子珍正在苏联“长期养病”）。1938年11月20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一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未同意），江青与毛泽东结婚。1940年8月初，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下一个女儿李讷（李姓取自毛泽东的化名“李德胜”）。

北京时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0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1964年）。1964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谈京戏革命的记录整理稿上批“已阅，讲得好”。

1965年春，毛泽东让江青到上海联络姚文元。1965年11月，受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组织编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同意，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此后，她组织力量改编《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批判、禁绝其它各种戏剧、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迫害其他的文化文艺界人士，造成“八亿人民八部戏”的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她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号召红卫兵学生打倒了一大批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其中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1967年，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成为此后全国群众之间进行武斗的理论依据。1967年7月21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时讲话中说：

“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江青是毛泽东晚年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1969年中共九大上，江青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甚至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联盟，即后来被中共所批判的“四人帮”，与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有权力斗争。1974年2月江青借题发挥制造“蜗牛事件”，导致中国滞后五年引进彩电生产线，直接损失约七亿元人民币。9月借题发挥制造“风庆轮事件”，批判洋奴哲学和卖国主义路线。

失势及审判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开始行动，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等人逮捕。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表示“谁跟四人帮走我就抓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表示效忠华国锋，北京军区司令员受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之命“全权负责北京安全”，意即可以调动北京军区的武装力量镇压任何反对者，终于使其他中央委员认可了其合法性。

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之后，被关押在中南海某处地下室。1977年4月10日凌晨，转移到秦城监狱，被换上囚衣。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江在受审时说“当年撤出延安时，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妇女只有我一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

怕你们打。”

1980年江青受审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了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将对江青原判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但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84年5月4日获准保外就医。

死亡及后事

江青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关于自杀地点，新华社在同年6月4日发表的简短电讯[10]中报道：“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秦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何殿奎曾经表示过“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她保外就医之后的实际居住地就是秦城监狱内的原来的“战犯洗衣房”。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刊登了据称是江青的绝命书，其中写着：“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江青的遗体进行尸检后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封存，并化名“李梓”。1991年5月24日，在武装押运下取走，并在八宝山火化。2002年3月，骨灰下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碑文上写“先母李云鹤之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九一年，女儿、女婿、外孙敬立。”

摄影是江青晚年的爱好。江青的摄影作品很多。毛曾数次为江青的摄影作品题诗，包括《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和《为女民兵题照》等。她曾经数次筹办个人影展，由于毛泽东的干涉没有成功。

江青也能模仿毛泽东的字迹“毛体”，她写的字曾被人当作毛泽东手稿展出。

晚年的江青生活上十分挑剔。例如吃药的时间一定要和自己的手表对上，时间不对就将药吐出来。但据她的护士说，她并不是那种乱发脾气的人。

1974年，江青让文化部的同志仿照中国古代唐、宋、元时期的妇女服饰优点，给全中国女性设计了一种连衣裙，带有左右对称的V字领（与今版汉服的y字领稍有不同），被戏称为“尼姑服”，指令女干部带头穿，想要最后推广到广大中国妇女都要穿这种衣服，但江青服最终在江青被打倒后迅速消失。

江青被捕后，她身边放着毛泽东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泽东的像章，床上放着一张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

评价

江青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女性，一生充满争议。文革时期，江青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旗手”。文革结束后，又一度被称为当代的“吕后”、“武则天”、“慈禧”，甚至“白骨精”。西方也有人称她为“中国的伊娃·裴隆”。

毛泽东曾评价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1967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74年）

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捕，贺子珍对江青倒台被捕没有作评论，只是对女儿李敏说：“我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只是写写回忆。”

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发表《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问他“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邓小平说：“零分以下”，“江青这个人坏透了，她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7%9A%E6%96%87%E5%85%83>

姚文元

姚文元（1931年1月12日－2005年12月23日），浙江诸暨姚公埠人，“四人帮”成员之一。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7年被开除出中共。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生平

文革前

1948年7月姚文元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在中国作协、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

姚文元之父翻译家姚蓬子是胡风的朋友，姚文元也一度想成为胡风的“入室弟子”。

1955年，姚文元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线》，引起张春桥注意。1955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审查姚蓬子的问题。1955年5月底，姚蓬子以“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审查；姚文元也受到影响，被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审查。

1957年6月14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1965年10月28日，姚文元署名“葛铭人”在《心理科学》发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

文革时期

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革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此战功成发迹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

他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7年；参与上海夺权）、中共九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宣传组成员。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1970年；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文革中几乎不写文章，只发表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文革后

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称，他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

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满出狱，隐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有生之年的两个愿望：出版回忆录与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近42万字的回忆录，但要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核而不准由海外出版。而最终却不了了之，有传因初稿版本审查未获当局通过而未能如愿（有“五不准”批示：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上海市人民政府答应每月拨出人民币四千元津贴改善姚文元夫妇的生活起居，还派警卫保护他们。后来姚文元又写了一个5万字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

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出以下不足百字新闻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四人帮成员。

身后

姚文元与妻子合葬，墓碑上只有妻子金英的名字，上面的女儿、女婿等全部只有名字没有姓氏。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色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

曾为四人帮成员撰写传记的叶永烈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特意选择周五的下午时间，以周末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A%E5%AF%B9%E8%B5%84%E4%BA%A7%E9%98%B6%E7%BA%A7%E7%9A%84%E5%85%A8%E9%9D%A2%E4%B8%93%E6%94%BF>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张春桥1975年4月1日发表的文章。

历史

1975年中共中央下发的《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姚文元写的文章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的文章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圈阅后，发表在《红旗》等报刊上。

内容

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后被批判者称为“全面专政论”。

“四个一切”。张春桥将马克思的话“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称为“四个一切”。

所有制要用政权力量大规模改变。“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后被批判为违反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

影响

国际主义革命运动后来将“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总结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All-Around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5%9B%BD%E9%94%8B>

华国锋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原名苏铸，字成九，男，山西交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领导人，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二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是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华国锋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逝世后，先后继承两人的职务，是1949年以来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同时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领导职务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早年参加了抗日战争，并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当选中共湖南湘阴县、湘潭县委书记，后升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快速晋升，先后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直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指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身为国家代总理的华国锋率先亲临救灾现场。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与汪东兴、叶剑英等合手粉碎了四人帮，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拨乱反正时期维持了毛泽东生前的一些政治路线，并被普遍认为是1977年“两个凡是”的提出人，与希望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经历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退出中共核心领导集团。

生平

早年革命时期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民国十年正月初九（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南关街（今交城县天宁镇永宁南路46号）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河南省范县苏家堡。父亲苏庆惠、母亲王二女。苏铸是家中第四子，亦是最年幼的儿子。1928年，父亲苏庆惠去世，苏铸和三哥由母亲王二女抚养长大。同年，入读交城县南关小学。1935年，就学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

1938年，苏铸投身抗日战争，参加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取意“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而改名“华国锋”，并于同年10月由李伯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恒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1940年初，华国锋担任在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45年，改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委。

1948年冬，中共中央从华北抽调五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收南方城乡，华国锋随军南下。1949年1月，他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并在此时与韩芝俊结婚。8月2日，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共和国初期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在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因为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这一调动直接影响到华国锋的仕途和后续政治生涯。上任后的他着手改善当地交通；1952年8月，他升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并组建韶山农村互助组。1954年2月，成立合作社。同年11月，他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兼任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1955年6月，毛泽东乘火车到达湖南，华国锋在长沙见到毛泽东，衣着纯朴、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留下良好印象。

当时毛泽东急于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在中央受到了邓子恢等人反对；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毛泽东希望通过此会讨论合作社问题。首次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华国锋，在会上介绍了湘潭的农村合作社经验，他撰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得到毛泽东赏识。

1956年5月，他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次年11月，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当时湖南正配合中央进行反右派运动，时任湖南第一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对此表示“很不理解”，不久借病去山东休养；与此同时的华国锋却仍然坚持中共中央的指令，继续推行反右运动。1958年7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959年的庐山会议直接改变了湖南政局、也直接影响了华国锋。会上因为彭德怀上书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彭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

被视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受到打压。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由张平化接任，华国锋升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虽然身为湖南省委领导，华国锋仍然坚持坚持下乡蹲点，他组织“社会主义教育”，并率团到广东参观学习农业生产经验，这些事情均受到毛泽东赞许。1964年7月1日，他主持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建设，10月1日落成。1965年，他还担任总指挥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在这期间，他重视湖南经济建设，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并大力支持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尽管文革使中国陷入大乱，而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受到冲击。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担任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华国锋主管农业。华国锋组织新田县和安乡县进行水利改造，并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1969年，主持湘区委员会纪念馆。

这些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好感，华国锋的名字也因此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中。1970年，他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并随后被选举为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成为湖南的第一把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时，赞赏华国锋道：“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实人。”斯诺回国后将此事写入文章并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开始受到国外关注。

进入中央

1971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农业、财贸、值班室等工作。1971年3月3日至28日主持召开全国棉、油、糖会议，为纠正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农业方针，得到周恩来与中央的同意。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华国锋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走访了全国六省17个县18个公社19个大队。7月底突发阑尾炎在上海华东医院手术住院。

1971年毛泽东秘密访问南方各省，并在武昌提醒华国锋，暗示在中央内部中他与林彪的矛盾。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出逃苏联时在蒙古坠机身亡。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成员。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长谢富治病逝，毛泽东借此提名华国锋，此时王洪文、李德生也陆续进入中央，王、华、李形成新的党、政、军接班人。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和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部长。

进入中央的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与四人帮没有瓜葛，也未与周恩来、叶剑英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他往往保持中立，只忠于毛泽东。1973年底，毛泽东提议调回邓小平，并在次年提议邓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74年10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长沙，然而中央政治局随后陷入新的对抗，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发生激烈对抗。先是邓小平占领优势，并进而取代李德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促使王洪文

地位动摇；之后四人帮渐渐得势，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促使邓小平再次下野。在这样的双方斗争中，始终中立的华国锋逐渐脱颖而出。1975年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对邓小平的错误批评。此后，邓小平被停止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请求毛泽东指定一人牵头主持国务院，三人辅佐具体工作。1月21日，毛泽东听汇报，提出国务院工作“就请华国锋带个头”。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就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首先是按照毛泽东意图，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同时，势力强大的叶剑英元帅被毛泽东劝去养病。4月4日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4月5日晚上10时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进入广场，驱赶和逮捕滞留在广场之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活动之群众遭到残酷镇压。

随即，华国锋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当天天安门事件经过情况之汇报，并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四人帮攻击邓小平为幕后主使。4月7日，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认为问题性质变了，据此建议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

过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决议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后，华国锋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正式确定华国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成为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在治丧初期华国锋就计划解决“四人帮”问题。9月11日，华国锋向李先念交底，通过李居中联系，与叶剑英取得一致意见。华国锋积极行动，又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军委负责人陈锡联、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对比上完全压倒了“四人帮”。华国锋考虑过开会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9月21日与叶剑英密谈后初步确定以后者“隔离审查”的方式强硬解决。9月26日晚，华征求李、吴的意见后一致认为，在政治局会议获得多数票有把握，在中央全会则无把握，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程序已无法顺利拿下“四人帮”，遂决定“先斩后奏”，待果断处置“四人帮”之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叶剑英获悉商议结果后表示完全同意。这种“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陈云“不可避免”、“下不为例”的表态支持。汪东兴负责抓捕行动，10月4日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10月6日，抓捕行动按计划展开，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开会，晚8时左右，三人先后抵达，即由华、叶、汪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几乎同时，江青、毛远新分别在住处被宣布“隔离审查”和“就地监护”，谢静宜、迟群等“四人帮”党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时许，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遗愿、“四人帮”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解决“四人帮”后，华国锋派耿飚等人连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等机关。随后，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控制了“四人帮”的根据地上海，消除了“四人帮”余党发动民兵叛乱的隐患。毛泽东晚年言语不清，常使用纸条，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以毛泽东生前留下的题词“你办事，我放心”，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至此华国锋成为最高领导人，随后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群众庆祝粉碎四人帮游行，被称为“英明领袖”。10月14日，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欢声沸腾，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沉闷局面一扫而空。随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党中央的正副主席，叶剑英继续担任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连同1976年以来一直担任的国务院总理于一身，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兼任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一把手的领导人（国家主席职务已废除）。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拥戴毛泽东是华国锋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在对待毛泽东遗体问题上，华国锋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遗体供后人瞻仰。

两个凡是

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各个领域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和“大干快上”等一系列主张，积极发展工农生产，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混乱状况。

在政治上，华国锋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准备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未出版），且坚守毛泽东的指示，以毛泽东生前的指示为纲领，肯定文化大革命，阻碍党内对彭德怀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对待四人帮，华国锋将其定为“极右派”，避免一切涉及评价文革的言论。

“英明领袖”

此后，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华国锋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并享有同毛泽东一样的拥戴。歌颂华国锋的歌曲《交城山》也同《东方红》一并播送，一时间全国把他视为了“伟大领袖”的化身。在各大媒体上，以“英明领袖”作为他的代称。

南罗经验

外交上，华国锋积极发展与美国、红色高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的关系，继续敌视苏联，奉行“三个世界”的外交路线。华国锋时期，中国与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开始交恶。期间华国锋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日本、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等国。

经济上，华国锋延续了“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的文革路线，继续以大寨作为农业发展的模范，扩大投资，急躁冒进，设置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口号；并不顾国力，过多地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和大举外债，以实现高速度发展，人们称之为“洋冒进”。拨乱反正时期，他的经济政策被邓小平批评为“重复1958年的冒进错误”。

修改国歌

他执政期间，相继召开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大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五届人大上，通过了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继续保留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继续了1975年宪法党政不分的模式，是华国锋时期的纲领文件。同时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被填以新歌词，歌词以“我们万众一心高举毛泽东旗帜”为主轴，为华国锋“新长征”口号呐喊助威。

二简字

他在任期间，国务院再度简化汉字，称为二简字，之后在1986年被废除，因而成为华国锋时期的标志符号。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支持资历深厚的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稳定局面；而局面稳定后，“求是派”与“凡是派”展开权力斗争，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邓小平渐渐在舆论和中共高层权力中获胜，而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邓小平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他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党内元老们取代，他的权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断削弱。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赵紫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华国锋亲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开始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华国锋的格局。

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很多人提出华不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基于党政分开的原则，在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替。10月20日，胡耀邦掌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要求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的像和题词。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过去

四年的执政问题。陈云认为，华国锋不适合当主席。胡耀邦认为，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全盘继承的态度，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化大革命，并要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同时李先念等人也在会上向华提出严肃批评，华作了许多解释和自我辩护，不肯承认错误，会议一再延长。叶剑英在会上检讨自己之前对华国锋作了过高的赞誉，对华国锋愚忠愚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叶剑英此言既出，华不再辩解，表示接受批评并提出辞职。会议最后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中央政治局向党内通报华国锋犯下的五条错误：“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辞呈得到批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仅象征性担任排名最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退出领导层

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华国锋当选中央委员，但不再列于中央政治局候选名单，完全退出中共中央领导层。

晚年

从1982年到1997年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他都选进中央委员会，是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时间最长（第九届到第十五届）的领导人。尽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简出，但在党内仍然受到尊重，是唯一一个全票在中共十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在1997年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2名年龄过了70岁的，一个是华国锋，另一个是江泽民。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大，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华国锋酷爱书法，写得一手过硬的颜体。毛主席纪念堂匾名、交城城内小学校名均为华题写。晚年隐居的他潜心研究锻炼笔墨，并与书法家李铁梁、姚俊卿为友。

去世

2008年8月中旬，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华国锋病重入院，8月20日12时5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官方新华社发悼文指华国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追悼会在8月31日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时任和前任领导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评价

在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中共中央给予了华国锋很高评价，并未提到“两个凡是”错误路线：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

而对于华国锋的评价，常常因时局和评论者立场不同而有所变化。就“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努力上，主流媒体和舆论认为他的功劳甚大，特别是在怀仁堂事变中的领导作用，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获得极高的政治声誉。然而，在认定文化大革命本质问题、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问题（比如继续宣扬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许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他受到当时反对派的质疑和攻击；以及在党内中央高层资历上，华国锋无法与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元老相匹，最终选择下野并低调度过晚年。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谈及华国锋时，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在个人生活中，华国锋为人谦虚谨慎、廉洁亲民。无论是担任县委书记，还是中共中央主席，他总是保持与生俱来的“平民情节”，普通百姓对他往往持好感。据中央警卫部队退役士兵回忆，他在担任主席时，仍经常自己洗衣服、并带领战士进行大扫除。对下属不乱发脾气、保持和蔼可亲；对工作人员签字合影总是有求必应。唐山大地震时候，身为国家代总理的华国锋率先亲临救灾现场。而在晚年中，更闭口不谈政治，非常低调。

纪念

按照华国锋“魂归故里、不占耕地”的遗愿，在山西省交城县风景区卦山南麓建立其墓地。始建于2009年4月，2011年11月落成，属于交城生态公园的一部分。华国锋陵墓原来由华国锋陵园、华国锋纪念广场、华国锋纪念馆三部分组成。但因媒体称华陵铺张浪费，引起了政府重视。华国锋纪念广场改为吕梁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华国锋纪念馆也改成了晋绥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华国锋陵墓设计参仿为孙中山建设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花岗岩石级共365级，两侧白玉栏杆相护。最顶墓碑为花岗大石鼎，正看如H，取“华”字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既喻华国锋，也有中华之意；鼎高5.5米，寓意华国锋55岁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在建筑陵墓时，当地政府承认承担巨大压力，一方面建造奢侈有悖华国锋一贯俭朴作风；另一方面也希望陵墓能够为交城带动旅游、提高城市品牌和地位。随着对华国锋的纪念逐渐公开化，2014年8月8日20时开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中国影视作品中首次出现了华国锋的形象。

2011年2月16日，华国锋诞辰90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纪念文章。

家族

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原为山西省交城县隆盛裕皮坊的学徒，成为东家王酋的二女婿后，升为二掌柜。苏庆惠和王二女共有四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三子和四子。

华国锋的夫人为韩芝俊（1930年2月21日－），两人于1949年1月结婚。育有四名子女。韩芝俊1975年出任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政治部主任，1980年离休。

长子苏华，空军某部的一位将军，已退休。

次子苏斌，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近十年来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股权投资和企业收购兼并。2005年至2009年任中国煤炭暨焦炭投资基金联席主席；2007年起任香港能源矿产联合会的名誉主席。2011年，担任金山能源非执行董事。

长女苏玲，曾在长沙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读大学，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省委常委、工会主席，200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次女苏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级干部，担任过其父亲的生活秘书。

香港杂志曾谣传，华国锋乃是毛泽东的私生长子，谣称在1920年，毛泽东曾在长沙时与一位姚姓女子相识并同居，姚氏的父亲是从山西到湖南来贩运烟草的商人，并称华国锋晚年要求恢复身世改回毛姓被拒。《苹果日报》则辟谣称，北京医院取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和华国锋女儿苏玲两人的头发做DNA测试，但结果显示两人没有亲属关系。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6%E5%89%91%E8%8B%B1%E8%B4%9F%E9%9D%A2>

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伟，字沧白，男，客家人，广东梅县人，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和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叶剑英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参与北伐战争。1927年12月，组织广州起义。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任中革军

委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务，参与历次反围剿战役及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参加中共代表团，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务，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二月逆流”案。林彪事件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他与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人联手策划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成员，成为中共党内仅次于华国锋的二号领导人。此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废除国家主席时期相当于国家元首）等职。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骨灰安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

生平

出生与成长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3月27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嘉应直隶州（今梅州市梅县区）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1908年，11岁的叶剑

英家境稍微好转，父母将他送到离雁洋10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住校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

1912年1月，叶剑英以“最优秀”的成绩从三堡学堂毕业考入梅县务本中学，这年冬天梅县务本中学与其他三所中学合并受为官办。新校长是一个守旧人物，叶剑英因此联合100多名学生离开学校迁到梅城状元桥畔东山书院，不久在进步人士、学生家长、乡绅和爱国华侨的支持下在县城东山脚下建起新校东山中学。叶剑英随即进入东山中学就读。在此期间，接触了一些宣传社会变革的进步书刊。连任两届学生会会长。1915年秋，叶剑英从东山中学肄业，在与雁洋堡相邻的横山新群小学任教半年。同年冬，随父赴南洋，次年回国。

1917年夏，叶剑英入云南讲武堂。1920年1月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920年夏，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孙中山出巡广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陈炯明军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言岭关大捷，名震一时。

1924年初，因讨伐陈炯明军功卓著，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1924年1月受廖仲恺邀请，参与筹建黄埔军校，1924年5月5日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授《兵器学》。在黄埔执教期间，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1924年7月，应张民达师长请求，返回二师，率部迎击进犯广州的林虎叛军，获胜。后奉廖仲恺命，到香洲创办粤军第二师独立营，兼任该营营长。配合黄埔军校的教学，培训基层军士。1924年10月15日，

与张民达指挥二师参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1月，与张民达率二师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1925年3月，出任梅县县长。1925年5月，任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率新编团参加第二次东征，率部配合友邻部队攻克惠州后，奉命留守惠州、博罗一带维护治安。1925年12月蒋介石电令调其任嫡系部队教导师的团长。后来，教导师改为二十师，叶剑英被提升为副师长。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中共派熊锐同他谈了一次话，谈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因为中共内部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可以吸收，也有人提出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长期考验，双方争执不下。

1926年7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率部参加攻打南昌之役。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北伐军一师师长。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叶剑英颇有顾虑，以身体不好为由谢绝任命。南昌之役收编的孙传芳部队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不好再推辞，只得开赴吉安受命。他选调了一些黄埔的老同学、老同事组建师部机构，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到他麾下。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参见：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

1927年4月12日，江西陷入白色恐怖，吉安全城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机构，清洗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经过再三考虑，叶剑英决定反蒋。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公开宣布：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会后，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了反蒋通电。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时，蒋

介石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的。”陈第二次又去报告：“叶师长真的反对我们。”蒋介石说：“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通电反蒋后，叶剑英率领一批左派军官离开了吉安赴武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留下的左派军官发起吉安暴动。蒋介石得知二师暴动，才终于相信了叶剑英已背离他的事实，宣布开除叶剑英国民党党籍。1927年7月，经李世安介绍、周恩来同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在九江甘棠湖一小划子上与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12月11日，叶剑英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潜赴香港。1928年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特别班学习。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叶剑英与刘伯承等人响应“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参与“国际义勇军”，即前往伯力加入“远东工人游击队”，训练部队，与国民政府军张学良部作战，协助苏联进攻中国黑龙江海拉尔之役。

1930年下半年，叶剑英回国到达上海，与刘伯承等人翻译了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等资料。1931年4月，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前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毛泽东建议诱敌深入，而项英反对。叶剑英对此表示支持毛泽东，随即协助指挥第二、三次反围剿战争。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11月底，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研究确定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建立健全参谋工作制度。1932年10月上旬，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

1933年2月，兼任红十九军军长，指挥东南战区第一、二、三纵队进攻清流县城。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2月，兼任闽赣军区及建宁警备区司令员。1934年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4月，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其后由于连城战斗失利，调任中革军委第四局局长。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时，他遭轰炸负伤。1935年3月，任红三军团参谋长。7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叶剑英得悉后，立即将此事报告毛泽东。随后，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1936年，红军发起东征战役，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国军主力，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中共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力量。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会议后派出代表团，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赶赴西安，三人做出分工：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博古负责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工作，最终促成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3月8日，叶剑英与周恩来同国民政府谈判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就中共承认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及容许中共在适当时期内公开、红军的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等问题达成《“三八”协议》。

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37年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其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被授予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10月，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12月23日，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负责军事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协同周恩来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政府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政府谈判。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1940年3月，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宣讲八路军战绩，驳斥国民政府方面对八路军的攻击。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由于皖南事变，叶剑英返回延安[2]:181，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共军队作战，并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2]:182。11月，叶剑英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月，国共摩擦又起，叶剑英向中共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中共军队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成为首批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的军事将领之一。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与叶剑英在西苑机场。

1945年12月，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国军攻占延安后，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叶剑英和杨尚昆率一部分中央机关赴晋西北；随后，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

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输送了大批干部。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委第一副书记、北平市长、北平联合办事处主任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期间他组织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对傅作义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等。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攻占广州。随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1950年1月，任广州南方大学校长，为南方高等教育作出重要贡献。

1950年9月，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1951年5月，任华南军区司令员。1952年6月，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出席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会议中心内容是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工作中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和“地方主义”错误，叶剑英在会上违心地作了检讨发言。1953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主席。

1954年6月，叶剑英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军队。9月27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

1958年3月，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

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解放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15日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

京西宾馆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10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1967年1月中旬，毛泽东指使陈伯达教唆红卫兵开始批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之后周恩来出面辟谣。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队内部是否展开文革运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执起来。此时叶群突然拿出发言稿批判萧华，当晚红卫兵抄了萧华的家。次日上午，京西宾馆继续开会，萧华讲述被抄家经过，作为全军文革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萧华。徐向前与叶剑英气愤之下敲桌子，而叶剑英亦因此拍伤手骨。该事情被四人帮诬陷为“京西宾馆事件”，为“二月逆流案”之始。

京西宾馆会议刚结束，红卫兵开始批斗杨勇，中央军委工作开始陷入混乱。情急之下，徐向前于1月24日晚，独闯林彪住处毛家湾，并开门见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并要求制定规则。随后林彪表示同意，并请叶剑英、聂荣臻赶到毛家湾，共同商议出七条意见。之后叶、聂、徐三位元帅赶赴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七条意见。后经各军区领导讨论，改成八条意见。1月28日，林彪与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泽东处审批该八条命令。此后该命令得到贯彻，各大军区秩序得以恢复。

二月逆流案

同年2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徐向前同陈伯达就刘志坚问题发生严重争执。2月11日，叶剑英和徐向前等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就军队稳定问题发生争执。2月16日，军方与文革小组的冲突达到顶峰，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纷纷发言怒斥文革小组。会后中共文革小组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表态，文革小组开始制造“二月逆流案”。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多次开会，叶剑英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被冠以“二月逆流”的罪名，遭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围攻批斗。1968年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被诬陷为“黑后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1969年1月3日，毛泽东表示为二月逆流案平反。然而在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

1969年1月，叶剑英被下放到新华印刷厂蹲点。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为中国外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各军队将领被迫疏散离京。其中朱德去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去武汉、陈毅在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在开封，彭德怀在押，此时十大元帅中除罗荣桓和贺龙去世外，只有林彪在北京。1970年8月，叶剑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历史。

复出工作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之后林彪九一三事件爆发，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并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组成，办公会议制度维持至1975年2月。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之战，占领西沙群岛。

国防部长

1975年1月13日-17日，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被任

命为国防部长。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讲话。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任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委员。2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被毛泽东下令“养病休息”，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7月6日，朱德逝世，任朱德治丧委员会委员。8月，与王震交谈时，做了一个手势：“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叶剑英以此表达毛泽东尚没逝世，不方便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王震会意。

改革开放时期

抓捕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任毛泽东治丧委员会。9月11日，到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守灵。在治丧初期，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计划解决“四人帮”问题。9月11日，华国锋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交底，通过李先念居中联系，与叶剑英取得一致意见。9月21日，杨成武来北京西山住地，转告聂荣臻的意见：“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此后陆续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军委常委陈锡联、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对比上完全压倒了“四人帮”。

9月24日，李先念来北京西山住地转达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考虑过开会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与叶剑英密谈后初步确定以“隔离审查”的方式强硬解决。9月2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生前的联络员是否留在北京整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和起草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时，和华国锋等人予以抵制。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程序已无法顺利拿下“四人帮”，遂决定“先斩后奏”，待果断处置“四人帮”之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10月3日，叶剑英、华国锋分别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后，就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行动计划达成一致。10月4日，陈云来北京后海边的住所交谈，陈云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下不为例”。10月5日，在住地与杨成武约谈，请他转告聂荣臻“都商量好了，请他放心”并让杨成武注意掌握总参谋部以及全军部队。

10月6日，汪东兴率8341部队按计划展开抓捕，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开会，晚8时左右，三人先后抵达，即由华、叶、汪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几乎同时，江青、毛远新分别在住处被宣布“隔离审查”和“就地监护”，谢静宜、迟群等“四人帮”党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晚10时许，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遗愿、“四人帮”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时，叶剑英坚决推辞，并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0月8日，和华国锋等一起指挥和部署，彻底扫除“四人帮”在上海大本营的

势力。10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带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稳定局势。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10月24日，在天安门城楼与华国锋等出席首都百万军民举行的隆重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逝世之后的沉闷局面一扫而空。

12月7日，接到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的病情报告，在报告上批示：“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解放军总医院按照批示，将南楼病房五层腾空，秘密安排邓小平入院治疗。1977年2月3日，安排病愈出院的邓小平及全家进驻中央军委服务保障部门管理的北京西山25号楼。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九号文件，通知全党：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负责主持。之后，和聂荣臻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还让自己的儿子去找陈云、王震等人，一起呼吁邓小平复出工作。5月14日，在住所过八十寿辰，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粟裕、余秋里、杨成武、邓小平前来祝寿，叶剑英当着众人的面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师嘛，你是我们老师中的领班。”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分别被选为党中央的正副主席，叶剑英继续担任排名第一的副主席。8月批示“上报军委批办的文件，可先送小平同志”，随即传达军委。

国家元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党内唯一副主席的叶剑英成为仅次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叶剑英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出山起主要作用。1978年3月，叶剑英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废除国家主席时期作为国家元首）。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的追悼大会。邓小平、陈云分别致悼词。1979年1月1日，叶

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10月1日，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出面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就台湾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即“叶九条”。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八二宪法”。

晚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开始拨乱反正，与主张“两个凡是”的凡是派展开论战，求是派渐渐在舆论和中共高层权力中获胜，而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党内的众元老们指责华国锋是“极左路线错误”，华国锋一派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取代。华国锋的权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断削弱。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

处，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任总书记，开始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主席华国锋的格局。基于党政分开的原则，在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辞去了兼任的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很多人提出华不宜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讨论华国锋过去四年多的执政问题。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在会上向华提出严肃批评，华作了许多解释和自我辩护，不肯承认错误，会议一再延长。叶剑英在会上检讨自己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自我批评在宣传华时说了过誉的话，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叶剑英此言既出，华不再辩解，表示接受批评并提出辞职。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的辞呈得到批准，仅象征性担任位列最后的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实际上地位高过胡耀邦，仅次于邓小平，与陈云同级），在军委主席邓小平之前。1983年4月20日，致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人事安排问题的信。6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出任副主席。1985年9月23日，87岁的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和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退休，和六十三位老同志一同退出中央委员会。

去世

1986年10月22日凌晨1点16分，叶剑英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评价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987年10月22日，叶剑英的骨灰安葬于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

纪念

故居和纪念馆

叶剑英元帅的故居位于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雁上村，纪念馆建于1987年7月，馆名由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纪念馆陈列展览有大量珍贵的照片、手稿、题词、文献、文物。2005年5月5日在故居和纪念馆的基础上，整合扩建成为叶剑英纪念园，叶剑英纪念园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广东3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占地面积482亩，总投资1.6亿元，分为人文秀区、纪念景区、生态林区和旅游休闲服务区四个区。纪念园门前有一座叶剑英元帅的全身铜像。

以他命名的事物

剑英图书馆：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书山路，前身为梅县图书馆，1991年更名为梅县剑英图书馆。

剑英体育馆：位于梅州市梅江区，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800平方米。

剑英公园：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新塘一带，园内有一面积达266664平方米的游湖。

剑英纪念大桥：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于1997年开通。

剑英大道：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为市政道路工程，共长2160米、路幅宽60米。

评价

正面

孙中山生前曾评价叶剑英“年轻有为”。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毛泽东对杨成武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提及1935年红军分裂时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那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198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评价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0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叶剑英追悼会，中顾委主任邓小平主持大会，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悼词特别肯定了叶剑英在中共关键时刻所做的贡献。1989年11月，叶剑英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

叶剑英在去世后仍然受到官方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1997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发言，称赞他“党性坚强，信念坚定。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他无私无畏，有胆有识。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负面

一般认为，叶剑英应对原广东军区副司令员陈光之死负主要责任。叶剑英1950年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时，与陈光发生冲突；随后陈光被开除党籍，遭到软禁。陈光1954年6月自焚。

家族及个人生活

叶剑英的祖先宋朝时由中原南迁到梅州。叶剑英祖父叶福智，早年以屠宰为业，育有五子，第五子为叶剑英父亲叶钻祥（1871-1921）。叶钻祥字裕芬，自幼随二哥叶钦祥习武，曾考取梅州武秀才。叶剑英母亲陈秀云

（1872-1944），共生有4男4女，存活2男2女。即儿子叶剑英、叶宜导（1906-1989），女儿叶才英、叶顺英。叶剑英早年在家乡有一门包办婚姻，无子女。1924年初，在广州与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当年11月，生下长子叶选平，后又生了长女叶楚梅。1927年，在广州与曾宪植结婚，生下叶选宁。1937年，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危拱之结婚，二人无子女。1940年，在重庆与吴博结婚。1948年末，在北京良乡与华北军政大学学员李刚结婚，生子叶选廉，女儿叶文珊。1955年二人离异。1955年后，叶剑英没再正式结过婚。身边还先后有过三位女人，主要是照顾叶帅的生活，而没有正式名分，是否有子女亦不详。罗瑞卿之子罗宇回忆说，1956年在北戴河，由于叶与其他护士有染，叶的另一位“小夫人”全身赤裸，欲投海自尽，被警卫所阻，但闹的北戴河“沸沸扬扬”。叶因为妻子、红颜众多，使之在民间也有“花帅”之称。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4%B8%9C%E5%85%B4>

汪东兴

汪东兴（1916年1月9日－2015年8月21日），男，汉族，江西弋阳人，中国共产党前高级领导人，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汪东兴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数排名末位）；曾长期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党主席毛泽东的警卫安全；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掌权后被迫辞职下台。

生平

早年

1916年1月9日汪东兴出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加入河潭乡儿童团，担任团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月，随部进入中央苏区。2月24日，红十军抵达光泽县，组成突击队，汪东兴担任侦破任务，率先攻入城内。随后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第十九师，归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指挥，参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同年7月，组建红七军团，红十一军改编为红十九师，汪东兴调入其中红八十四团，任政治处青年干事。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国军重兵攻占中央苏区黎川县、金溪县，汪东

兴在金溪守城战斗中负重伤，后转中央野战医院治疗。痊愈后，留在总兵站七兵团办事处任青年干事兼侦查排长，随主力转战闽西北，负责转运物资和伤员。之后被送往瑞金九堡彭杨步兵学校学习，后留校任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随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公略步兵学校与彭杨步兵学校合并，汪东兴仍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步兵学校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汪东兴随部参加长征。193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永坪总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东兴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出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47年，国军对中共控制的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被迫离开延安，但坚持在陕北转战。汪东兴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各地，负责警卫工作。6月8日凌晨，国军陕北刘戡部先头部队进入距离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仅一山之隔，毛泽东等人连夜撤退，汪东兴率领一排兵力断后，阻击国军一个团，国军因不明情况，不敢进攻。汪东兴也因战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为毛泽东贴身警卫。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移通过黄河，汪东兴负责后勤及迁移工作。

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汪东兴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1953年，任公安部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55年10月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等职，是罗瑞卿的副手。凭借在公安、警卫工作中的努力，1955年，汪东兴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但没有获勋。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曾外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江西省农垦厅厅长。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1960年至1970年6月，再次返回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东兴逐步受到重用。1961年5月，再次担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天才论”、并与林彪提议重设国家主席问题相互呼应，攻击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派；毛泽东对陈伯达、林彪互相抱团取暖的态度表示反感，然而当时包括周恩来、陈毅、汪东兴等都人均正面支持陈伯达、林彪的立场。为此8月31日，毛泽东亲书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发言指会议有人搞事，并再次强调不当国家主席，否定了天才的说法，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革命纲

领”。至此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公开化，而汪东兴为此连续两次写信检讨。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陈伯达的天才论，随后扩大到对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批判，直接牵连到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1971年毛泽东南巡，为林彪下台制造舆论；而此时林彪集团制作《五七一工程纪要》，策划通过爆炸、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汪东兴负责整个南巡的安全工作，并在主要地点具体安排保卫任务。9月11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北返，并于9月12日抵达天津；促使林彪集团无法按原计划实施暗杀行动。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被迫北逃苏联，飞机坠毁于蒙古，史称“九一三事件”。

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组成，办公会议制度维持至1975年2月。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长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

文革结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治丧初期，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就计划解决“四人帮”问题。9月11日，华国锋向李先念交底，通过李居中联系，与叶剑英取得一致意见。华国锋积极行动，又得到汪东兴、中央军

委负责人陈锡联、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对比上完全压倒了“四人帮”。华国锋考虑过开会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9月21日与叶剑英密谈后初步确定以“隔离审查”的方式强硬解决。9月26日晚，华征求李、吴的意见后一致认为，在政治局会议获得多数票有把握，在中央全会则无把握，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程序已无法顺利拿下“四人帮”，遂决定“先斩后奏”，待果断处置“四人帮”之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叶剑英获悉商议结果后表示完全同意。

这种“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陈云“不可避免”、“下不为例”的表态支持。汪东兴率8341部队负责抓捕行动，10月4日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10月6日，抓捕行动按计划展开，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开会，晚8时左右，三人先后抵达，即由华、叶、汪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几乎同时，江青、毛远新分别在住处被宣布“隔离审查”和“就地监护”，谢静宜、迟群等“四人帮”党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时许，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遗愿、“四人帮”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汪东兴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东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继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后党的四位副主席之一，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

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

失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历深厚的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稳定局面；而局面稳定后，邓小平与华国锋展开权力斗争，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务实派渐渐在舆论和中共高层权力中获胜，而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邓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华国锋一派的领导地位逐渐被邓小平一派取代。

1978年12月，汪东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严肃批评，被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由姚依林取代。胡耀邦担任《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杨德中担任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9月，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连任中顾委委员。

汪东兴随后搬离了中南海，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远离政坛，赋闲居家，与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居宅比邻。晚年的汪东兴热衷于著述，出版《汪东兴日记》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

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满99周岁）。他与亡妻姚湘娥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评价

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和华国锋的讣告相同，中共中央并没有提及两人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是非。汪东兴的去世，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他的离去也“象征了一代人的谢幕”。

汪东兴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为人忠厚。毛泽东为此评价道：“他（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在处理四人帮问题上，汪东兴的果断、迅速和细心，在怀仁堂事件中的处理，受到了各方的赞誉和嘉奖。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束后，阻拦邓小平等中共元老问题上，当时受到支持改革开放的一派批评，并迅速远离政治中心。改革开放以后，汪东兴亦没有继续受到其他派别的苛责；客观上看，当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汪东兴亦解决邓小平两位子女的读书上学问题，为此邓写信表达感激。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ng_Xiaoping

邓小平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 1997年2月19日），是中国革命和政治家，从1978年12月至1989年11月后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邓逐渐升至至高无上的权力，带领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市场经济改革，赢得了“现代中国建筑师”的美誉。

邓出生于清末的四川省，并在20世纪20年代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成

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追随者，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学习共产主义，并返回中国成为一个红军政委。1929年底，邓小平领导广西地方红军起义。1931年因拥护毛泽东在党内被降职，但在遵义会议期间再次升职。邓在以下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征（1934-1935）、抗日战争（1937-1945）和中国内战（1945-194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在西藏和中国西南地区担任区委书记，以巩固中共的控制，直到1952年他返回北京担任中央政府职务。作为1950年代毛泽东领导下的党的总书记和副总理，邓主持了毛泽东发起的反右运动，并在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为中国的经济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1960）。然而，他的右倾政治立场和经济政策最终使他失宠，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两次被清洗。

1976年9月毛去世后，邓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战胜了已故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成为中国事实上的领导人。邓小平继承了毛时代政治运动混乱导致制度混乱和对共产主义失望的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计划，逐渐使国家恢复秩序。1977年至1979年初，他恢复了被文革中断十年的高考，发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指定的经济特区，包括深圳；开始为期一个月的中越战争。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邓小平成为首位访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1980年8月，邓小平通过设置国家官员的宪法任期限制和其他系统性修改，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并纳入中国第三部宪法（1982年）。1980年代，邓小平支持独生子女政策以应对中国的人口过剩危机，帮助建立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启动863科技计划。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原则的治理香港和澳门，以及与未来台湾统一。

邓小平及其盟友进行的改革逐渐使中国摆脱计划经济和毛主义思想，向外国投资和技术开放，将其庞大的劳动力引入全球市场，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他最终被定性为一种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企业相结合的新型思想的“建筑师”，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称为邓小平理论）。尽管从未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者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职务，但邓小平通常被视为中共第二代领导层的“核心”，这一地位载入了党章。1978 年和 1985 年，邓小平被评为时代人物。然而，邓小平因下令对1989 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进行军事镇压，以及没有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受到批评，但是，他因在1992 年的南巡中重申改革计划，以及香港澳门回归，而受到赞誉。

早年生活和家庭

邓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广东嘉应（音译）县（现更名为梅县）（是客家人的重要祖区），几代人定居四川。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邓的祖先可能是，但不是肯定，客家人。

四川原本是邓氏的发源地，直到明代其中一人在广东受聘为官，1671年清朝计划增加四川人口时，又迁回四川。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

邓的父亲是一名中层地主，曾经在成都法政大学念书。他在当地很有名气。邓的母亲在邓小平年少时就去世了，留下了邓和他的三个兄弟和三个

姐妹。五岁时，邓被送到一所传统的中式民办小学，七岁时又被送往更现代化的小学。

邓的第一任妻子，他的一位莫斯科同学，在生下邓的第一个孩子后几天去世，享年 24 岁，孩子是一名女婴，也在同时去世了。1933年邓小平受到政治攻击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离开了他。他的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一位实业家的女儿，1938年入党，次年在延安毛窑洞前与邓小平结婚。他们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邓琳、邓楠和邓蓉）和两个儿子（邓朴方和邓质方）。

教育和早期职业生涯

邓刚上学时，导师反对他取名“先圣”，称他为“希贤”，其中包含“向往”和“善良”两个意思，带有智慧。

1919年夏，邓从重庆学校毕业。他和80名同学乘船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到1927年将有4,001名中国人在法国参加这样的勤工俭学。邓是该组中国学生中最年轻的，刚满 15 岁。重庆当地的运动领袖吴玉章让邓小平和他的叔叔参加了这个项目。邓小平的父亲大力支持儿子参加海外勤工俭学。出发前一天晚上，邓的父亲把儿子带到一旁，问他希望在法国学习什么。他重复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句话：“向西方学习知识和真理，以拯救中国。”邓小平深知中国苦难深重，中国人民必须接受现代教育才能救国。

1920年12月，法国包船，安德烈里昂，驶入马赛，船上有210名中国学生搭乘，包括邓小平。16岁的邓小平曾在巴约和沙蒂永短暂上过中学，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位于巴黎西北部郊区 La Garenne-Colombes 的 Le Creusot 钢铁厂担任钳工。他于 1921 年 4 月搬到那里。巧合的是，当邓后来的政治命运不佳时，1969 年文革期间，他被派去参加工作、劳动改造；他在拖拉机厂重新找到了一份钳工的工作，并证明他仍然是这项技能的高手。

在La Garenne-Colombes，邓小平遇到了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他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欧洲青年团，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欧洲青年团总支主要成员之一。1926年邓小平前往苏联的共产国际联盟，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在那里他的一个同学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返回中国

1927年底，邓离开莫斯科返回中国；他加入了中国西北军事领导人冯玉祥的军队；他向苏联请求援助与该地区其他地方领导人的斗争。当时，苏联通过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结盟。

1927年3月，他到达冯玉祥的据点西安。他是奉天军阀集团中企图阻止国共分裂的一员。这种分裂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蒋介石迫使共产党人逃离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正式解体后，冯玉祥站在蒋介石一边，邓小平等参军的共产党人被迫逃离。1929年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试

图推翻广西国民党政府。起义失败后，邓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政治崛起

尽管邓参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但历史学家高默波认为“邓小平和许多像他[在中国共产党中]一样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希望看到中国站在平等地位与全球大国打交道的革命民族主义者。他们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因为这是他们找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唯一可行途径。”

上海和武汉的激进主义

在西北离开冯玉祥的军队后，邓最终到达了武汉市，那里是当时共产党的总部所在地。那时，他开始使用“小平”的绰号，并在党的组织机器中占据显要地位。1927年8月7日，他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在苏联的指示下，党罢免了创始人陈独秀，瞿秋白成为总书记。在武汉，邓小平首先与毛泽东建立了联系，当时该党激进的亲苏领导人并不重视毛泽东。

1927 年至 1929 年间，邓小平住在上海，在那里他帮助组织了遭到国民党当局严厉迫害的抗议活动。当年许多共产党激进分子的死亡导致共产党员的数量减少，这使邓小平得以迅速晋升。在上海的这个阶段，邓小平娶了他在莫斯科认识的一个女人。

广西军事行动

邓1929年开始在广西参加反国民党军事斗争。蒋介石军队的优势造成共产党队伍的大量伤亡。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对抗策略是失败的，它使得许多对抗强大对手的激进分子共产党人牺牲。对这次失败的反应催生了邓小平传记中最令人困惑的情节之一：1931年3月，他离开了共军第七营，稍后出现在上海。

他的官方传记称，邓在逃往上海（那里有地下共产党的领导层）时，曾被他的上级指控从战区逃跑。虽然他在上海没有受到惩罚，但他传记中的这一事件仍不清楚，将被用来质疑他在文革时期对共产党的忠诚度。

在江西苏维埃

在城市中进行革命的运动对党来说是一个挫折，特别是对共产国际苏维埃顾问而言，他们将城市无产阶级的动员视为推进共产主义的力量。与革命的城市愿景相反，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将农村农民视为中国的革命力量。在毛泽东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江西省山区孕育了中国未来共产主义国家的雏形，正式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更为人所知的是“江西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苏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瑞金，邓于1931年夏接任党委书记。1932年

冬，邓继续在附近的会昌担任同样的职务。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就在那时，他娶了一个在上海认识的年轻女子金维映。

苏维埃在江西的成功使党的领导人决定从上海搬到江西。毛、党的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顾问之间的对抗日益紧张，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支持毛思想的邓被免去宣传部的职务。尽管党内纷争不断，江西苏维埃仍成为中国农村共产主义统治的第一个成功实验。它甚至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信笺抬头的邮票和纸币；蒋介石军队最终决定进攻共产主义地区。

长征

在更强大的中华民国军队的包围下，共产党人于 1934 年 10 月逃离江西。由此开始了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发展转折点的史诗运动。撤退很困难，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在共产党占领的所有地区占据了阵地。穿越偏远山区，大约 100,000 人设法逃离江西，开始了穿越中国内陆的长期战略撤退，一年后有 8,000 至 9,000 名幸存者抵达北部省份陕西。

长征之初的遵义会议期间，以博古、王明为首的所谓28个布尔什维克被赶下台，让苏联失望的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人。亲苏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结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出现了一个受农村启发的新政党。当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时，邓再次成为党内的领袖人物。

然而，两党之间的对抗被日本入侵暂时中断，迫使国民党第二次与共产党结盟，以保卫国家免受外来侵略。

日本入侵

1937年日军的入侵标志着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清末的甲午战争）的开始。入侵期间，邓仍留在北方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那里担任改组后的共产党军队三个师的副政治主任。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他在五台山佛教寺院生活。1938年1月，任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129师政委，开始了与刘的长期合作关系。

在与山西、河南和河北接壤的地区的战争前线与日本的大部分冲突中，邓一直待在那里，然后多次前往延安市；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基础。1939年，在一次延安之行中，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妻子是昆明人卓琳，她和当时其他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也到延安旅行，加入共产党。

邓因参加长征被认为是“革命老兵”。他在百团大战攻势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提高了他在同志中的地位。

恢复对国民党的战争

二战日本战败后，邓小平前往蒋介石在日本侵略期间建立政府的城市重

庆，参加国共和谈。这些谈判的结果并不积极，在重庆会晤后不久，两个敌对方之间的军事对抗就恢复了。

当蒋介石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重新建立政府时，共产党人正在争夺该领域的控制权。共产党人从他们在农村的阵地开始对蒋政府控制的城市及其补给线采取游击战术，扩大他们控制的领土，并吸收越来越多的离开国民党军队的士兵。

邓在针对国民党的淮海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邓再次行使政治领袖和宣传的主要关键作用，作为刘伯承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的政委。他还参与传播毛泽东思想；毛主义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思想基础。邓的政治思想工作，加上他作为长征老兵的身份，使他在共产党击败蒋介石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党内处于特权地位，占据权力位置。

毛时代的政治生涯

重庆市长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北京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言仪式。当时共产党控制了整个北方，但南方仍有部分地区被国民党政权控制。邓担任中国共产党西南局第一书记，负责领导西南地区的平定工作。这个组织

的任务是负责国民党仍然控制的那部分国家地区的最终接管。西藏的独立状态将在一年后结束。

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离开广州，迁都重庆。在重庆，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邓在莫斯科的老同学），想要阻止共产党军队的前进步伐。

在邓的进攻下，共产党军队于 1949 年 11 月下旬接管了重庆，并在几天后进入了蒋介石最后的权力堡垒成都。当时邓成为重庆市市长，同时他是西南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自称人民解放军的共产党军队镇压了忠于国民党旧政权的抵抗运动。1950年，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也控制了西藏。

邓小平将在重庆度过三年；当年他在去法国之前曾在那里学习过。1952年邓移居北京，在中央政府担任一些不同的职务。

北京的政治崛起

1952年7月，邓小平来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不久，他就任财政部长和通信办公室主任。1954年，他被免去所有这些职务，只担任副总理一职。1956年任中共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委员。

1957年正式支持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后，邓担任书记处总书记，与刘少奇主

席、周恩来总理一起主持国家日常事务。邓和刘的政策强调经济学而不是意识形态教条，这与大跃进的群众热情有明显的背离。

刘和邓在 1950 年代的群众运动中都支持毛，在这些运动中他们攻击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并宣传毛的意识形态。然而，大跃进的经济失败被视为对毛管理经济能力的控诉。彭德怀公开批评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虽然比较谨慎，但开始掌管经济政策，将毛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之外。毛泽东同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中国法律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让给刘少奇，同时保留他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的职位。

在1956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支持从党章中删除所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提及。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率领中国代表团会见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斯大林死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这次会晤后，没有达成协议，中苏彻底分裂；当时两个主要的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中断。

1962年“七千干部会议”后，刘、邓1960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普遍受到欢迎，恢复了大跃进中许多先前被拆除的经济体制。毛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威望，采取行动重新控制国家。毛泽东发扬革命精神，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动群众铲除“党内”的右翼资本家。邓被嘲笑为“二号走资派”。

两次清洗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

毛担心邓和刘的改良主义经济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并结束中国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毛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邓失宠，被迫辞去所有职务。

文革期间，他和他的家人成为红卫兵的目标，红卫兵囚禁了邓的长子邓朴方。1968年，邓朴方被拷打，从四层楼的窗户跳出去或被扔出去，成为截瘫患者。1969年10月，邓小平被派往江西省农村新建县拖拉机厂做正式工人。在那里的四年里，邓在业余时间写作。他在全中国范围内被谴责，但受批判的程度比刘少奇主席要小。邓小平与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一起在全国公开受羞辱和批评，1969年至1973年被送到江西农村拖拉机厂。

1971年，毛泽东的第二位正式接班人、党的唯一副主席林彪在空难中遇难。据官方报道，在反毛泽东政变失败后，林正试图逃离中国。这使得邓（内战期间曾担任第二野战军政委）成为其余军队领导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的第三位接班人，但因患癌症而选择了邓。1974年，周说服毛让邓作为第一副总理重返政坛，实际处理日常事务。邓小平着眼于重建国家经济，强调团结稳定是提高生产的第一步。然而，他仍然小心翼翼，避免在字面上与毛主义意识形态相矛盾。1975年1月，他在党的生涯中首次被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增选为党的副主席；李德生不得不辞

职。邓是五位副主席之一，周是第一副主席。

1973年，在邓小平短暂上台期间，成立了以知识分子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组长的政治研究室，受托研究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途径。他亲自带队，在国务院内部管理项目，以免引起四人帮的怀疑。

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以毛的妻子江青为首的激进左翼政治团体“四人帮”在党内争夺权力。四人帮将邓视为对权力的最大挑战。毛也怀疑邓小平会破坏文革的正面声誉；毛认为文革是他最伟大的政策举措之一。从 1975 年底开始，邓小平被要求起草一系列自我批评。尽管他承认在处理国家和党内事务时采取了“不恰当的意识形态观点”，但他不愿承认自己的政策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他与四人帮的敌意越来越明显，毛似乎更倾向于四人帮。毛拒绝接受邓的自我批评，并要求党中央“彻底讨论邓的错误”。

“批邓”运动

周恩来于 1976 年 1 月逝世，全国悲痛欲绝。周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去世削弱了邓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剩余的支持。邓在国葬上发表了关于周正式的悼词后，四人帮在毛的许可下，开始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 年 2 月 4 日，华国锋而非邓小平被选为周总理的接班人。

1976 年 2 月 2 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最高优先指示，正式将邓转移到“外事”工作上，从而将邓从党的权力机构中除名。邓在家里待了几个

月，等待着他的命运。政治研究室被及时解体，邓的顾问，如于光远暂停工作。结果，政治动荡阻碍了邓小平过去一年努力争取的经济进步。3月3日，毛泽东发出指示，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并特别指出邓是一个人民内部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问题。随后，中央向地方党组织下达了命令，要求学习毛的指示、并批判邓小平。

邓小平作为改革者的名声在1976年清明节后的政治权斗中受到了严重打击。在中国传统节日对周进行了大规模的公众哀悼之后，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达到高潮；这一事件被四人帮视为反革命和威胁到他们的权力。此外，该团伙认为邓是事件的幕后主使，而毛本人则写道：“事情的性质已经改变了”。这促使毛将邓从所有领导职位上撤下，尽管毛保留了他的党员身份。结果，1976年4月6日，华国锋总理获得了邓的党副主席的职位，同时获得了周曾担任的党的领导职务，使华成为毛的第四任正式接班人。

1977-1989 年掌权和统治

中国最高领导人

在毛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和四人帮于1976年10月被清洗之后，邓逐渐成为中国事实上的领导人。在此之前、毛泽东去世以后，华国锋想摆脱党内的极端分子，并成功地边缘化四人帮。1977年7月22日，华为首脑的中共中央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使之担任中央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

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通过谨慎地动员党内的支持者，邓以策略战胜了赦免他的华，然后在 1980 年将华从其最高领导职位上赶下台。与之前的领导层变动相反，邓允许华保留中央委员会成员资格并悄悄退休；这有助于开创先例，即在高层领导斗争中失败不会导致人身伤害。

在邓的至高无上的领导时期，他的国家官方职位是，1978年至1983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和1983年至1990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国家政府职位）；1977-1982年任中国共产党副主席，1981-1989年任中国共产党军委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邓在1987年离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以及1989年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之后，他继续作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政策施加影响，直到 1997 年去世。

重要的决定总是在邓小平位于中南海的家中，与其他革命老同志商量完成；他们被称为“八大长老”；其中除了邓小平以外，陈云和李先念也是重要的人物。邓小平虽然从来没有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人，却被称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并先后罢免了包括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在内的三位党的领导人。邓虽然在名义上退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是，在一段时期内他仍然担任国家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被广泛地视为实际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尽管，在名义上，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李先念（以及后来的杨尚昆）是国家主席。

拨乱反正

邓否定文革，并于1977年发起运动，公开批评文革时期发生的暴行和苦难，并恢复了文革期间被取消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同时，他是废除阶级背景审查制度的推动者。在这个推动下，中共取消了被认为与前地主阶级有关联的中国人的就业壁垒。

邓逐渐战胜了他的政治对手。通过鼓励公众对文革进行批评，他削弱了那些因文革而获得政治地位的人的地位，同时加强了像他这样在当时被清洗的人的地位。邓小平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随着邓逐渐巩固对中共的控制，1980年由赵紫阳接任总理，1981年由胡耀邦接任党总书记，华国锋被边缘化。“拨乱反正”时期，文革被否定；到1976年300万多起“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被正式平反。

邓小平成为中国新一号人物意味着必须妥善解决围绕毛泽东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由于邓希望进行深入的改革，他不可能继续毛泽东的强硬阶级斗争政策和群众运动。1982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历史问题的文件》。毛保留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国家和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先驱。文件宣称：“在指出错误之前必须考虑他的成就”。邓小平亲自评价毛“七分好，三分错误”。该文件还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从毛（虽然它确实指出“毛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转移到了四人帮和林彪的“反革命集团”。

国际事务

1978年11月，国家政局稳定后，邓小平访问了曼谷、吉隆坡和新加坡，并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绿化和住房印象深刻，后来派出数万华人到新加坡和世界各国学习经验，带回知识。另一方面，李光耀建议邓小平停止向东南亚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来邓小平也遵循了这一建议。

=====

1978年的时候，由于得到了其他已经恢复官职的党内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上台是必然的。尽管华国锋仍然在正式垄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但在几乎没有人支持的情况下，他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难。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掌权。

从 1979 年开始，经济改革加速了市场模式，而领导人则保持着旧的共产主义式言论。公社制度逐渐瓦解，农民开始有更多的自由来管理他们耕种的土地和在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外贸易开放。1979 年 1 月 1 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民国（台湾）国民政府置于一边，中国与西方的商业往来开始增长。1978 年底，航空航天公司波音公司宣布向中国多家航空公司出售747 型飞机，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宣布了在上海开设生产工厂的意向。

1979年初，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华盛顿会见了卡特总统和几位国会议员。中国人坚持邀请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参加白宫的正式招待会，一方面象征着他们的自信和执拗，另一方面他们期望继续尼克松的破冰倡议。访问期间，邓小平在休斯敦参观了约翰逊航天中心，以及可口可乐公司和波音公司的总部亚特兰大和西雅图。通过这些意义重大的访问，邓明确表示中国新政权的优先事项是经济和技术发展。

中日关系也明显改善。邓小平把日本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的例子，在经济上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改革开放

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引用了一句话“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关键是资本主义方法奏效了。邓和他的团队一起工作，特别是1980年取代华国锋出任总理的赵紫阳和1981年担任党主席的胡耀邦也是如此。邓小平由此上台，开始强调“四个现代化”（经济、农业、科技发展和国防）的目标。他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开放和自由化计划。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撤销了主席一职，以总书记为党的最高领导职位。

华国锋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1981年由邓小平接任此职位。然

而，军队现代化进程进展缓慢。1977-79 年与越南进行的实际边界战争做出了不明智的重大改变。这场战争让外界的观察者感到困惑，但张晓明（音译）认为，邓小平有多重目标：阻止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获得美国对其四次现代化的支持，以及动员中国进行改革和融入世界经济。邓小平还试图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张认为越南因入侵柬埔寨而受到惩罚是一个次要因素。结果，中国军队在装备、战略、领导力和战场战斗方面都表现不佳。中国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苏联，尽管它的士兵相对于中国军队较少，但它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因为它在各种武器技术上都非常先进。1981年3月，邓小平认为解放军有必要进行军演，9月，华北军演举行，成为建国以来解放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此外，邓发起了解放军的现代化，并决定中国首先必须发展先进的民用科学基础设施，然后才有希望制造现代武器。因此，他集中力量精简军队，1985 年裁员 100 万（百万大裁军），退休年长和腐败的高级军官及其亲信。他强调招募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在先进技术最终到来时掌握这些技术。他没有在军官团中搞裙带关系和腐败，而是在所有级别上实施严格的纪律。1982 年，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和工业委员会，以计划使用在民用领域开发的技术。

邓小平在其早期统治期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几乎没有改善与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不良关系。他继续坚持中苏分裂时代的毛主义路线，即苏联是与美国一样“霸权”的超级大国，但由于距离近，对中国的威胁更大。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管克里姆林宫后，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1989年中苏会晤终于恢复了两国正式关系。

经济发展的三个步骤

1987年10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邓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曾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但此时由陈云继任。邓小平继续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方针，推进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在未来七十年内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确保人民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这将在 1980 年代末实现（后来这的确发生了）；第二步，到20世纪末将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于1995年提前实现）；第三步，到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中国人民将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

进一步改革

与外部世界改善关系是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中的第二个重要理念转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尤其是经济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改革的目标是农业、工业、科技、军事四个现代化。

实现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这些目标的战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职责是完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事求是”。（这有点类似于1920 年代列宁主义对新经济政策(NEP)的理论论证，它认为苏联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阶段，需要有限的资本主义才能充分发展其生产资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族政策的实施奠定了良性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理论方法。

这种对毛主义的解释减少了意识形态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邓小平贬低社

群价值观，但不一定批判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不等于共同贫困”。他允许市场力量的理论依据是这样给出的：

“计划和市场力量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定义，因为资本主义下有计划；社会主义下也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力量都是控制方式经济活动。”

与华国锋不同，邓小平认为，任何政策都不应仅仅因为与毛泽东无关而被直接拒绝。与陈云等较为保守的领导人不同，邓小平并不会仅仅因为某项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相似，而反对该政策。

这种对社会主义基础的政治灵活性得到了以下引文的强烈支持：

“我们不能害怕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系统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我们应该防止右，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防止左。”

尽管邓为经济改革的发生提供了理论背景和政治支持，但历史学家的普遍共识是，邓提出的经济改革很少是由邓本人发起的。例如，周恩来总理在邓小平之前开创了四个现代化的先河。此外，许多改革将由地方领导人提出（这些地方领导提出的改革政策在一开始的时候往往不在中央政府指令的允许范围内）。如果成功和有希望，这些改革将被越来越多的地区采用，并最终在全国推行。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家庭农业生产负责制，它首先由一个贫困的农村冒着被定罪为“反革命”的风险秘密实施。这个实验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邓公开支持，后来被全国采纳。许多其他改革都受

到了东亚四小龙的经验的影响。

这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进行的改革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在戈尔巴乔夫模式中，大多数重大改革政策都起源于戈尔巴乔夫本人。邓小平的改革政策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它与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重组方法鲜明不同；这很可能是前者的成功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包括由技术娴熟的官僚对宏观经济实行有计划的、集中的管理，摒弃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式的经济建设。然而，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是，管理是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进行的。邓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毛泽东的遗产，他强调农业产出至上，并鼓励农村经济团队和个体农户的决策权显著下放。在地方层面，将使用物质激励而非政治诉求来激励劳动力，包括允许农民通过以自由市场价格出售自有土地的产品来赚取额外收入。

强调出口

在市场化布局中，允许地方直辖市和省级部门投资他们认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这鼓励了对轻工业的投资。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国的发展战略转向重视轻工业和出口导向型增长。轻工业产出对于来自低资本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由于孕育期短、资本要求低和外汇出口收入高，轻工业产生的收入能够再投资于技术更先进的生产、以及被用于进一步的资本支出和投资。

然而，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类似但不太成功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邓时代的这些投资不是政府授权的。在当时的中国，投资重工业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系统，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消费者存款。邓小平改革的首要项目之一是防止利润的重新分配，除非通过税收或银行系统；因此，国有工业的再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间接的，从而使它们或多或少地不受政府干预。简而言之，邓小平的改革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

这些改革是对毛主义经济自力更生政策的逆转。中国决定通过增加对外贸易量，特别是从日本和西方购买机械来加速现代化进程。通过参与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中国能够通过获得一定的国外资金、市场、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推进四个现代化，从而加快经济发展。从 1980 年开始，邓小平吸引了许多外国公司进入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和市场开放的经济特区。

改革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引入了新的物质激励和奖金制度。销售农民自产产品和公社剩余产品的农村市场恢复了活力。农村市场不仅增加了农业产量，还刺激了工业发展。由于农民能够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国内消费也刺激了工业化，也为更困难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政治支持。

邓小平的市场社会主义尤其是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尼古拉·布哈林的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预见到，私营企业家和市场的作用是基于贸易和定价，而不是基于中央计划。关于这个相似对比的一个有趣的轶事是邓和阿曼德·哈默（与苏

联熟悉亲近的美国实业家）之间的第一次会面。邓小平向这位列宁前苏联的实业家和前投资者施压，要求他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信息。

港澳回归

1980年起，邓小平领导经济扩张，在政治上接手与英国交涉香港领土的谈判，亲自会见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参加了会议，希望保持英国对香港岛和九龙这三个殖民地组成领土中的两个的统治，但被邓坚决拒绝。这些谈判的结果是1984年12月19日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宣布英国在1997年之前将整个香港殖民地归还中国。中国政府承诺在移交后的五十年内尊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和公民自由。

在中国的压力下，葡萄牙于1987年同意于1999年回归澳门，协议大致与香港相同。这两个领土的回归是基于邓小平自己制定的“一国两制”的政治原则，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经济制度的地区在一个政治权威下共存。尽管这一理论适用于香港和澳门，但邓显然也打算将其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以吸引台湾人民最终回归大陆；台湾岛的领土主权仍然存在争议。

人口控制和犯罪控制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几个问题。1982 年的人口普查揭示了人口的惊人增长，已经超过了 10 亿。邓继续实施华国锋发起的限生育一胎的计划，在行政处罚的痛苦下，限制妇女生育一胎。该政策包括强制堕胎。

1983年8月，由于文革后社会治安恶化，邓小平发起了“严打”扫黑行动。据报道，政府在 11 月中旬设定了 5,000 人处决的配额，台湾消息人士称，当时有多达 60,000 人被处决，尽管最近的估计有将被判处死刑的人数估计为 24,000 人。被捕者（有的甚至被判死刑）包括各级政府官员的子女或亲属，其中包括朱德的孙子。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场运动对公共安全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积极影响，但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例如某些法律惩罚是否过于严厉以及该运动是否对公共安全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

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被转化为更大的意见自由，体制内开始出现批评，包括著名的异见人士魏京生，他创造了“第五个现代化”一词，指的是民主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计划中缺失的一个要素。在 80 年代后期，对专制政权的不满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给邓小平的领导层带来了最大的危机。

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

1989 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六四大屠杀告终，是 1989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5 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以及影响全国许多地区的）一系列示威活动；中国六四大屠杀之后不久，许多其他共产党

政府垮台。

抗议活动是由邓小平80年代初曾经支持、但被“八长老”和政治局保守派驱逐的改革派官员胡耀邦之死引发的。许多人对胡耀邦（作为中共领导层中一名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改革派）生前所遭受的不公政治待遇、党对于胡逝世的反应迟缓、和葬礼安排相对低调感到不满。北京的街道和周边地区的大学开始公开哀悼。在北京的哀悼，是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哀悼成为公众对政府中的裙带关系、胡的不公平解职和早逝、以及“老人”的幕后角色感到愤怒的公共抗议渠道。到胡的葬礼前夕，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人数已达到10万人。虽然抗议活动缺乏统一的原因或领导，但参与者提出了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一些人呼吁政府结构内的经济自由化和民主改革，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减少专制和减少社会主义的集中形式。

在示威期间，邓的亲市场经济理念的盟友、党总书记赵紫阳支持示威者并与政治局保持距离。社会主义理念强硬派李鹏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但最初向该市进军的行动遭到居民阻挠。运动持续了七周。6月3日至4日，坦克、直升机、和超过20万名军队士兵被派往该市以武力平息抗议活动，造成成百上千人伤亡。

为了清除天安门示威者的同情者，共产党发起了一项类似于反右运动的、为期一年半的计划。像邓力群这样的老革命的目标是“严惩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的人”；共部署了3万多名共产党员队伍开展这项惩戒运动。

赵被强硬派软禁。邓很快宣布“整个西方帝国主义世界都打算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几个月后，他说“美国卷入学生运动太深”，指的是外国记者向学生领袖提供经济援助，后来帮助他们逃往西方各个国家，主要是通过香港和台湾。

1992 年邓南巡后很快恢复了改革。巡视结束后，他阻止了社会主义强硬派对改革的抨击活动。

邓后来在私下告诉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在六四期间，共产党的派系本可能抢占军队，国家有内战的风险。1991年，邓小平支持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担任副总理。六四的时候，尽管社会主义强硬派向朱镕基施压，但在示威期间，朱镕基拒绝在上海宣布戒严。

辞职与1992年南巡

1989年11月，邓小平卸任中央军委主席，继任的江泽民成为新一任中央军委主席。然而，中国仍处于邓小平时代。他继续被广泛认为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人们相信有幕后控制；1992年的十四大上，在邓的推动和批准下，年轻的胡锦涛（当时49岁）进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被当作是江泽民的接班人。邓小平被正式认定为“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共产党来说，他被认为是为不肯退休的共产党干部树立了榜样。他打破了早先终身任职的惯例；这一新传统（非终身任职）将一直持续到 2018 年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邓经常被简单地称为“小

平同志”，没有附加任何称号。

由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邓小平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共产党内部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保守主义派别日益壮大。为了重申他的经济议程，1992年春天，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中国南巡，访问了广州、深圳、珠海，并在上海过年，利用他的旅行作为他退休后重申经济政策的一种方式。1992年的南巡被广泛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挽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逝世与各界反应

邓于1997年2月19日因肺部感染和帕金森病去世，享年92岁。公众基本上已经为他的逝世做好了准备，因为有传言说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2月24日上午10时，李鹏总理要求人们默哀三分钟。国旗下半旗一个多星期。全国电视转播的葬礼是一件简单（相对于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或毛泽东的葬礼而言）而庄重的事情，由现任国家领导人和邓小平的家人参加；所有电视频道都在播放。葬礼结束后，他的器官被捐献给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随后按照他的意愿撒在海上。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中国官方媒体播放了与邓小平生死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每天晚上19:00的常规国家新闻节目比平时播出时间长、持续近两个小时。

邓的继任者江泽民坚持邓的政治和经济理念。邓小平被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设计师。中国社会主义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奠基人；邓小平理论的创始人”。然而，一些现代中国政治势力元素，尤其是现代毛派和激进改革者（极左和极右），都对邓持否定态度。邓逝世的次年，像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这样的纪念邓改革功绩的歌曲再次被广泛播放。

邓小平之死引起国际反应。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表示，“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经济显著发展的主要设计师”，邓小平将被“整个国际社会铭记”。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说：“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很少有人像邓一样，通过如此深刻而决定性的变化，领导了广大的社会”；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正面地评论了邓在香港回归中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称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台湾国民党主席也发来慰问，表示向往和平、合作与繁荣。达赖喇嘛表示遗憾，邓小平死了，西藏的问题没有解决。

纪念

与其他领导人相比，邓的纪念碑一直低调，这与邓的实用主义形象保持一致。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被防腐处理，而是被火化，他的骨灰撒在海上。然而，有一些公开纪念雕像展示。在深圳的莲花山公园大广场，2000年11月14日，竖立起邓的铜像。这座雕像献给邓小平，因他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促成者。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参观了这座雕像。此外，在沿海地区和海南省，邓的形象出现在路边的广告牌上，强调他的经济改革贡献或一国两制政策。

2004 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西南四川省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市，一座纪念邓小平 100 岁生日的铜像落成。邓穿得随意，坐在椅子上微笑。基座上的字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写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997年播放的纪录片《邓小平》，展现了他的日子，从法国学生到他的1992年南巡。201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连续剧《邓小平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纪念他诞辰 110 周年。

遗产

邓小平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设计师”，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人们记住邓的主要是他发起的经济改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将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数亿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扩大了个人和文化自由，并使该国充分融入世界经济。在他的领导下，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这主要归功于他的改革。为此，有人建议应该授予邓小平诺贝尔和平奖。邓也被认为减少了对毛泽东的崇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代。此外，他的强硬策略被认为有助于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这与当时其他主要的共产主义国家例如苏联1991 年解体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人们还记得邓小平留下了一个继续存在的共产主义政府；记得他曾经践踏人权；记得他曾经发动无数的政治暴力事件。作为最高领导人，他督导了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他在共产党国内为掩盖该事件而继续实行了成功的镇压举措。此外，他与毛泽东统治期间一些最严重的清洗有关；例如，他下令在云南派遣军队镇压穆斯林村庄，这就造成了1600人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还通过谈判结束了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并与美国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1980年8月，他开始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对官员的任期进行了限制；并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中国第三部宪法进行系统修改；198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体现了中国式的宪政。他帮助推动建立了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

尼克松、福特、卡特与里根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Nixon

理查德尼克松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 年 1 月 9 日 - 1994 年 4 月 22 日）是美国第 37 任总统，任期为 1969 年至 1974 年。作为共和党成员，尼克松曾于 1953 年至 1961 年担任第 36 任副总统。

统，曾任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和参议员，他在全国声名鹊起。在白宫任职五年后，美国结束了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与苏联和中国缓和，并成立了环境保护局，他成为唯一一位辞职的总统。原因是水门事件。

尼克松出生在南加州一个小镇的一个贫困的贵格会家庭。他于 1937年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并返回加州从事法律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帕特于 1942年搬到华盛顿为联邦政府工作。二战期间，他在海军预备役服役。1946年，他当选为众议员。他对希斯案的追查确立了他作为主要反共分子的声誉，使他在全国声名鹊起。In 1950，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是1952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随后担任了八年的副总统。他在1960年竞选总统失败，以微弱优势输给了约翰·肯尼迪。1962年，在竞选加州州长过程中，尼克松败给帕特·布朗。1968年，他再次竞选总统职位，并成功赢得大选，以微弱优势击败 Hubert Humphrey / George Wallace。

尼克松于 1973 年结束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参与，同年结束了军事征兵。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最终导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缓和；同一年，他与苏联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他的政府通常将权力从联邦控制转移到州控制。他实施了 90 天的工资和价格控制，强制取消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并开始了抗癌战争。他还主持了阿波罗 11 号登月，这标志着太空竞赛的结束。他于1972年竞选连任时，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差距最大的总统选举胜利之一；当时他以极大优势击败了乔治麦戈戈尔恩。

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尼克松下令空运补给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损失，这场战争导致了国内的石油危机。到 1973 年底，水门事件升级，使尼克松失去了大部分政治支持。1974 年 8 月 9 日，他面临几乎肯定的弹劾和免职，成为第一位辞职的美国总统。之后，他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对他进行了赦免。退休20年，尼克松写了回忆录和其他九本书，多次出访，恢复了老政治家和外交领军人物的形象。1994 年 4 月 18 日，他患上了中风，并且四天后去世，享年 81 岁。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调查将尼克松列为低于平均水平的总统。然而，对他的评估证明是复杂的，他作为总统的成功与他卸任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早年生活和教育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于 1913 年 1 月 9 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Yorba Linda）的一所由父亲建造的房子里，该房子位于他家的柠檬牧场上。他的父母是汉娜（米尔豪斯）尼克松和弗朗西斯 A. 尼克松。他的母亲是一名贵格会教徒，而他的父亲则从卫理公会皈依了贵格会。通过他的母亲，尼克松是早期英国定居者托马斯康奈尔的后裔（托马斯康奈尔也是康奈尔大学创始人埃兹拉康奈尔以及吉米卡特和比尔盖茨的祖先）。

尼克松的成长经历以当时福音派贵格会的习俗为标志，例如不饮酒、不跳舞和不咒骂。尼克松有四个兄弟：哈罗德（1909–1933）、唐纳德（1914–1987）、亚瑟（1918–1925）和爱德华（1930–2019）。五个尼克松男孩中有四个是以中世纪或传说中的英国统治者的名字命名的；例如，理查德就是以

狮心王理查德命名的。

尼克松早年生活艰辛，后来他引用艾森豪威尔的一句名言来形容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很穷，但它的荣耀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穷”。尼克松家族的牧场在 1922 年倒闭，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惠蒂尔。在有許多貴格會教徒的地区，弗兰克·尼克松开设了一家杂货店和加油站。理查德的弟弟亚瑟于 1925 年在短暂的疾病后去世，享年 7 岁。理查德在 12 岁接受体检的时候被发现肺上有一个斑点。由于有肺结核家族史，他被禁止参加体育运动。最终，发现该斑点是早期肺炎引起的疤痕组织。

中小学教育

理查德就读于东惠蒂尔小学，担任八年级的班长。他的父母认为，上惠蒂尔高中导致理查德的哥哥哈罗德在他患肺结核之前过着放荡的生活方式（他于 1933 年死于肺结核），所以他们把理查德送到了更大的富勒顿联合高中。在他高一的时候，他不得不单程乘坐校车一个小时，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后来，他与富勒顿的一位阿姨住在一起（只在周末的时候回家）。他参加了橄榄球校队，很少错过训练，尽管他很少被选上参加正式比赛。作为辩手，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赢得了多项冠军，并在公开演讲方面受到了富勒顿的英语主管 H. Lynn Sheller 的正式指导。尼克松后来还记得谢勒曾对他说，“记住，说话就是谈话……不要对人大喊大叫。与他们交谈。与他们交谈。”尼克松说他因此在公开演讲中尽量使用对话式的语气。

1928 年 9 月高三开始时，理查德的父母允许他转学到惠蒂尔高中。在惠

蒂尔，尼克松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落败，这是他第一次竞选失败。他经常凌晨 4 点起床，开着家里的卡车开到洛杉矶，去农产品市场买菜。然后，他开车去家里经营的商店清洗并摆好这些蔬菜，然后再去上学。哥哥哈罗德在前一年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当他们的母亲带着他去亚利桑那州希望改善他的健康时，理查德的生活变得更忙碌、需要照顾更多的家事，这导致他放弃了橄榄球。尽管如此，Richard 在他的 207 个班级同学中以第三名毕业于惠蒂尔高中。

大学和法学院教育

尼克松获得了进入哈佛大学的学费补助，但哈罗德的持续生病以及他们的母亲需要照顾他，意味着家里经营的商店需要理查德。他留在家乡就读惠蒂尔学院，费用由外祖父的遗赠支付。尼克松为篮球队效力；他也尝试过踢橄榄球，但缺乏踢橄榄球必需的强壮体型。他作为替补留在橄榄球队中，并以他的热情而著称。惠蒂尔没有兄弟会和姐妹会，而是有各种文学社团。学院里面只有一个是对男学生的社团；该社团称为——富兰克林协会；尼克松被这个社团冷落；许多富兰克林协会的成员来自显赫家族，但尼克松并非如此。尼克松对此的回应是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协会，即“公正协会”。除了协会、功课和家里的商店经营工作，尼克松还抽出时间参加了大量的课外活动，成为辩论冠军，并获得了勤奋工作的声誉。1933年，他与惠蒂尔警察局长的女儿奥拉·弗洛伦斯·韦尔奇订婚。他们于 1935 年分手。

1934年，尼克松以优异成绩从惠蒂尔学院毕业，获得历史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尼克松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入读杜克大学法学院。这所法学院是新的，并试图通过提供奖学金来吸引顶尖学生。它向教授支付高薪，其

中许多教授在国内或国际上享有盛誉。法学院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的奖学金数量大幅减少，迫使获奖者陷入激烈竞争。在法学院期间，尼克松不仅一直保持了全额奖学金资格，而且被选为杜克法学院律师协会主席，得到头巾勋章，并于 1937 年 6 月毕业时在班上获得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早年事业和婚姻

从杜克大学毕业后，尼克松最初希望加入联邦调查局。他的申请信没有收到回复，多年后得知自己被录用，但由于预算削减，他的任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并于 1937 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州律师资格。他开始在 Whittier 的 Wingert and Bewley 律师事务所执业，处理当地石油公司的商业诉讼和其他公司事务，以及如遗嘱事务的法律服务。晚年时，尼克松自豪地说，他是唯一一位曾担任执业律师的现代总统。尼克松不愿意处理离婚案件，不喜欢女性坦率的性谈话。1938 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拉哈布拉开设了自己的 Wingert and Bewley 律所分支办公室，并于次年成为该律所总部的正式合伙人。

1938 年 1 月，尼克松出演了惠蒂尔社区组织制作的《黑暗塔》戏剧。在那里，他与一位名叫帕特瑞恩（Thelma “Pat” Ryan）的高中女老师搭档。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将这段经历描述为，自己对她“一见钟情”。帕特瑞恩在最终同意与他约会之前，多次拒绝了这位年轻的律师的求爱。后来，在她同意他的求婚之前，他们保持男女恋爱朋友关系、约会了两年的时间。他们于 1940 年 6 月 21 日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在墨西哥度完蜜月后，尼克松夫妇在惠蒂尔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有两个女儿，

Tricia（生于 1946 年）和朱莉（生于 1948 年）。

服役

1942 年 1 月，这对夫妇搬到华盛顿特区，尼克松在那里找到了价格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他被分配到轮胎配给部门，在那里他负责回复信件。他不喜欢这个角色，四个月申请加入美国海军。1942年6月15日，他被任命为少尉军衔，参加美国海军预备役部队。

1942年10月，他被派遣到爱荷华州的奥塔姆瓦海军航空站基地，担任基地司令的助手。他在那里一直干到1943年5月。他要求出海服役，并于1943年7月2日，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兵25大队，以及南太平洋空中运输司令部（SCAT），支援南太平洋战区作战行动的物流保障。1943年10月1日，尼克松晋升为中尉。在维拉拉维拉，维尔，以及绿岛（尼桑岛），尼克松指挥了SCAT的前线派遣队。他所指挥的派遣队为 R4D/C-47 飞行操作准备了物料清单和飞行计划，并督导了运输机的装载和卸载。

由于这项服务，他从上级那里收到了海军表彰信（并被授予海军表彰丝带，后来更新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表彰奖章），以表彰他在南太平洋战区航空运输司令部“作为负责的军官而出色、高效地履行的职责”。

回到美国后，尼克松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的行政官

员。1945 年 1 月，他被调到航空局工作，在费城的办公室帮助谈判终止战争合同，并收到了海军部长的第二封表扬信，表彰他“立功、不懈努力和忠于职守”。后来，尼克松被调到其他地区的办公室从事合同工作，最后去了巴尔的摩。1945年10月3日，晋升为少校。他1946年3月10日退役。他1953年6月1日晋升为美国海军预备役司令，1966年6月6日从美国海军预备役退役。

崛起的政治家

国会生涯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1947–1950）

加利福尼亚州第 12 届国会选区的共和党人因无法击败民主党众议员杰瑞·沃里斯而感到沮丧。他们希望寻求一个共识候选人，该候选人将对沃里斯进行强有力的竞选活动。1945 年，他们成立了一个“100 人委员会”来决定候选人，希望避免导致先前沃里斯获胜的内部分歧。在委员会未能吸引到更引人注目的候选人之后，惠蒂尔美国银行分行经理赫尔曼佩里建议尼克松，他是战前曾在惠蒂尔学院董事会任职的尼克松家族朋友。佩里给巴尔的摩的尼克松写信。在尼克松和他的妻子兴奋地交谈了一夜之后，他热情地回应了佩里。尼克松飞往加利福尼亚，并被委员会选中。尼克松于 1946 年初离开海军，和妻子回到惠蒂尔；在那里尼克松开始了一年的密集

竞选。他争辩说，沃里斯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并指出，沃里斯得到一个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团体的支持，这意味着沃里斯有激进的观点。尼克松赢得了选举，得到65,586票，而沃尔斯只得到49,994票。

1947年6月，尼克松支持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这是一项监督工会活动和权力的联邦法律；他在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任职。1947年8月，他成为赫特委员会的19名众议院成员之一，该委员会前往欧洲考察美国对外援助的需要。尼克松是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的一位来自于西部州的议员。包括尼克松在内的赫特委员会的倡导，导致了马歇尔计划在国会通过。

1947年2月上旬，美国众议员查尔斯·J·克尔斯滕将他介绍给巴尔的摩的约翰·弗朗西斯·克罗宁神父。克罗宁与尼克松分享了他1945年私下流传的论文“1945年美国共产主义的问题”；尼克松也从FBI的威廉·C·苏利文那里得到很多信息（到1961年，苏利文将在J. Edgar Hoover领导下，领导国内情报部门）。

到1948年5月，尼克松共同发起了一项“蒙特-尼克松法案”，以实施“对美国国内共产主义颠覆这一复杂问题的新方法……它规定了，所有共产党员必需登记，并要求说明共产主义阵线的组织发行的所有印刷和广播材料的来源。”

尼克松曾担任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执行经理。1948年5月19日，上述法案在

众议院以319票对58票通过，但后来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尼克松图书馆将该法案的通过称为尼克松在国会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尼克松于 1948 年 8 月首次获得全国关注，当时他作为 HUAC（众议院反对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帮助破获了阿尔杰希斯间谍案。虽然许多人怀疑惠特克钱伯斯关于前国务院官员希斯是苏联间谍的指控，但尼克松相信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并敦促委员会继续调查。在希斯提起诽谤诉讼后，钱伯斯出示了证实他的指控的文件。1950 年，希斯被判伪证罪，因他宣誓否认他曾将文件交给给钱伯斯。

1948年，尼克松在加州轻松赢得众议员席位的连任竞选。

美国参议院（1950-1953）

1949 年，尼克松开始认真考虑与民主党现任参议员谢里丹·唐尼（Sheridan Downey）竞选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并于 11 月正式参加竞选。唐尼，由于在加州民主党初选中面对海伦·道格拉斯的严重挑战，于 1950年3月宣布退休。

尼克松和道格拉斯分别赢得了加州共和党与民主党初选的胜利。他们两者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其辩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关于朝鲜战争。尼克松试图将公众注意力集中在道格拉斯的自由派投票记录上。作为这项工

作的一部分，尼克松竞选团队分发“粉色传单”，以此强调，道格拉斯的投票记录与纽约国会议员维托·马尔坎托尼奥（后者被一些人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相似，因此他们的政治观点几乎相同。尼克松以几乎 20 个百分点赢得了参议员席位选举。

在参议院，尼克松在反对全球共产主义方面占据突出地位，经常旅行到四处演讲，以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观点。他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保持友好关系，但他小心翼翼地与麦卡锡的一些过份指控保持距离。

尼克松还批评了哈里·S·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处理。他支持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州地位，投票支持少数民族的民权，并支持针对印度和南斯拉夫的美国联邦救灾。他投票反对价格控制和其他货币限制、非法移民福利和公共权力。

副总统（1953–1961）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 1952 年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对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没有明确的意向；共和党官员和党内官员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会面，向将军推荐尼克松。将军同意对于参议员尼克松的选择。尼克松年轻（当时他 39 岁）、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州之一）的政治基地背景，都被领导人视为赢得选票的积极因素。与尼克松一起被考虑的副总统候选人包括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

特·A·塔夫脱、新泽西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德里斯科尔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

在竞选过程中，艾森豪威尔谈到了他对国家的计划，把负面的、攻击竞争对手的竞选活动留给了他的竞选伙伴。

9月中旬，共和党的选情面临重大危机。媒体报道说，尼克松有一个政治基金，由他的支持者维持，用于偿还他的政治开支。这样的基金并不违法，但它使尼克松面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指控。随着艾森豪威尔受到人们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撤换尼克松，1952年9月23日，尼克松上电视对全国发表讲话。当时，有史以来最多的电视观众，6000万人聆听了尼克松的电视讲话。尼克松动情地为自己辩护，称该基金并非秘密，捐助者也没有得到特别优惠。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谦虚的人（他的妻子没有貂皮大衣；相反，她穿着一件“体面的共和党布外套”）和一个爱国者。演讲引起了公众对尼克松的大量支持。艾森豪威尔决定保留他为自己的竞选搭档；他们在11月赢得了胜利。

艾森豪威尔在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期间所赋予他的职责比以往任何副总统的职责都要多。尼克松参与了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在艾森豪威尔缺席时担任会议主席。1953年尼克松的远东之行成功地增加了当地对美国的好感，并促使尼克松认识到远东地区作为工业中心的潜力。他访问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和河内。1953年底回到美国后，尼克松增加了他用于外交关系的时间。

记录尼克松在国会期间的传记作家欧文·盖尔曼（Irwin Gellman）在谈到他的副总统职位时说：

“艾森豪威尔上任后，通过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中向尼克松提供重要任务，彻底改变了这位竞选伙伴的角色。副总统对总统的倡议表示欢迎，并积极努力实现白宫的目标。由于这两位领导人的合作，尼克松名副其实，成为了‘第一位现代副总统’。”

尽管尼克松进行了激烈的竞选活动，再次对民主党进行了猛烈攻击，但共和党在1954年的参众两院选举中失去了对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这些损失使尼克松考虑在任期届满后退出政坛。1955年9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心脏病发作；他的病情最初被认为有生命危险。艾森豪威尔连续六周无法履行职责。此时，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还没有被提出，因此，副总统没有正式的权力采取行动。尽管如此，尼克松在此期间代替艾森豪威尔行事，主持内阁会议，并确保助手们和内阁官员们不为权力争斗。

根据尼克松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的说法，尼克松“在危机期间的行为赢得了高度赞扬……他没有试图夺取政权”。

尼克松精神振奋，寻求连任，但艾森豪威尔的一些助手试图取代他。在1955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议尼克松不要竞选连任，以便让他在1960年总统竞选之前获得行政经验，成为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内阁官员。尼克松认为这样的行动会毁掉他的政治生涯。当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2月宣布要争取竞选连任时，他没有很快就对谁将会成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这个问题及时发表明确意见，而是声称，在他被共和党重

新提名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然而，尼克松在 1956 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中获得了大量支持。4 月下旬，总统宣布，尼克松将再次成为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在 1956 年 11 月轻松地赢得连任竞选的胜利。

1957 年初，尼克松进行了另一次重大的外国旅行，这次是前往非洲。回国后，他帮助国会通过了 1957 年的民权法案。该法案在参议院被削弱，民权领袖对艾森豪威尔是否应该签署存在分歧。尼克松建议总统签署该法案，他也照做了。艾森豪威尔在 1957 年 11 月轻度中风，尼克松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保证，在艾森豪威尔短暂患病期间，内阁作为一个团队运作良好。

1958 年 4 月 27 日，尼克松与夫人不情愿地开始了南美洲的友好之旅。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尼克松即兴访问了一个大学校园，在那里他回答了学生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直到尼克松一行到达秘鲁利马，他在那里遇到了学生示威游行之前，这次旅行平安无事。尼克松来到美洲最古老的大学圣马科斯国立大学历史悠久的校园，下车与学生们对峙，直到被一连串抛出的物体逼回车内。在他的旅馆里，尼克松面对另一群暴徒，一名示威者朝他吐口水。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尼克松和他的妻子被反美示威者吐口水，他们的豪华轿车被挥舞着烟斗的暴徒袭击。根据安布罗斯的说法，尼克松的勇敢行为“甚至让他最痛恨的敌人也对他给予了一些勉强的尊重”。行程结束后，尼克松向内阁报告，声称有“绝对证据表明[抗议者]是由共产党中央阴谋指挥和控制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同意这一观点。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则强烈地不这样认为。

1959 年 7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尼克松前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式。7 月 24 日，尼克松与苏联第一书记和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一起参观展览时，两人在一个美国厨房模型前停下来，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优点进行了即兴交流，这被称为“厨房辩论”。

1960年和1962年选举；狂野岁月

1960 年，尼克松开始了他自己的第一次美国总统竞选。他在共和党初选中几乎没有遭到反对；并选择了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小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他的民主党对手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竞选期间两人的民意支持度很接近。尼克松基于他的行政工作经验进行竞选，但肯尼迪呼吁注入新鲜血液，并声称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政府导致苏联在弹道导弹方面超过美国。

竞选中引入了一种新的政治媒介：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在四次这样的辩论中的第一次中，与朝气蓬勃的肯尼迪相比，尼克松显得苍白，没有生气。尼克松在辩论中的表现在电视的视觉媒体中被认为是平庸的，尽管许多收听广播的人认为尼克松赢了。尼克松在选举中以微弱差距落败；肯尼迪仅以 112,827 票（0.2%）赢得普选。

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有选举欺诈指控，肯尼迪在这两个州均获胜。尼克松拒绝考虑对此争议；认为长期争论会削弱美国在世界眼中的地位，不

确定性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在他1961年1月副总统任期结束时，尼克松和家人返回加州；在那里他作执业律师，并写了畅销书《六次危机》，其中包括希斯案件的报道，艾森豪威尔的心脏发作等等。

地方和国家共和党领导人鼓励尼克松对现任加州州长帕特·布朗在1962年的选举中挑战。尽管最初不情愿，尼克松还是参加了加州州长的职位竞选。公众怀疑尼克松将该职位视为另一次总统竞选的垫脚石、党内极右翼的一些反对、以及他本人对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缺乏兴趣，使尼克松的竞选活动蒙上阴影。尼克松希望一次成功的竞选将确认他作为全国领先的活跃共和党政家的地位，并确保他仍然是国家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但相反，他输给布朗超过五个百分点，这场失利被广泛认为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在选举后早上的即兴败选演讲中，尼克松指责媒体偏袒他的对手，并说：“你们不会再让尼克松攻击谁了，因为，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

1962年11月11日，美国广播公司的霍华德 K. 史密斯：“新闻和评论”节目的标题为“理查德 M. 尼克松的政治讣告”；其中的情节突出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失败。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出现在该节目中，许多公众抱怨说，让被定罪的重罪犯有时间攻击前副总统是不体面的。公众的愤怒导致史密斯和他的节目被停播；公众对尼克松的同情与日俱增。

1963年，尼克松一家前往欧洲，在那里尼克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会见了他所访问国家的领导人。全家搬到纽约市，在那里尼克松成为领先的律师事务所“尼克松、马奇、罗斯、格思里和亚历山大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1964年，尼克松在宣布他的加州竞选活动时曾承诺不竞选总统；他相信自己很难打败肯尼迪，或者在肯尼迪被暗杀后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

1964年，他支持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沃特为共和党提名美国总统候选人；当戈德沃特获得提名时，尼克松被选中在大会上介绍他。尽管他认为戈德华特不太可能获胜，但尼克松还是忠诚地为他竞选。该选举是共和党的灾害；Goldwater 面对约翰逊的压倒性失败与该党在国会和各州州长选举中的重大损失相一致。

尼克松是少数几位没有因灾难性结果而受到指责的主要共和党人之一，他在 1966 年的国会选举中试图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他为许多共和党人竞选，试图夺回在民主党人约翰逊压倒性优势中失去的席位；并因帮助共和党在当年取得重大进展而受到赞誉。

1968年总统选举

1967 年底，尼克松告诉家人，他计划第二次竞选总统。尽管帕特尼克松并不总是享受公共事务生活，她支持她丈夫的志向。尼克松认为，随着民主党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分裂，共和党很有可能获胜，尽管他预计选举结果将与 1960 年一样差距很小。

有史以来最动荡的初选季节之一始于1968年1月发起的春季攻势。约翰逊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出人意料地表现不佳后，于3月退出了候选人身份。6月，民主党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参议员在加州初选中获胜后不久就被暗杀。在共和党方面，尼克松的主要反对者是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尽管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也都希望在初选大会上获得提名。尼克松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提名。他选择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尼克松相信这一选择会团结党，吸引北方温和派和对民主党不满的南方人。

尼克松在大选中的民主党对手是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他在一次以暴力抗议为标志的大会上获得提名。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尼克松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国家动乱和动荡时期的稳定人物。他呼吁那些后来被他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保守的美国人支持他；他们不喜欢嬉皮士反主流文化和反战示威者。阿格纽对这些团体的批评声越来越大，从而巩固了尼克松在右翼的地位。

尼克松发起了一场著名的电视广告活动，在镜头前与支持者会面。他强调犯罪率太高；并抨击说，民主党政策导致美国失去了核优势。尼克松在越南战争议题上承诺“光荣和平”，并宣称“新领导层将结束战争，赢得太平洋和平”。他没有公布他希望如何结束战争的细节，导致媒体认为他肯定有一个“秘密计划”。他的“尼克松是国家所需要的领导者”竞选口号被证明是有效的。

约翰逊的谈判代表希望在大选前在越南达成停火协议，或至少停止轰炸事件。1968 年 10 月 22 日，候选人尼克松收到消息称，约翰逊正在准备一场所谓的“十月惊讶”以在竞选的最后几天帮助汉弗莱的选情，——约翰逊的政府已经放弃了三个不可谈判的条件来达成停火。

在尼克松、汉弗莱和美国独立党候选人前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三人竞选中，尼克松以近 50 万张选票（0.7%）的微弱优势击败汉弗莱。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前副总统、在退位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参加竞选并当选的总统。在他的胜选演讲中，尼克松承诺他的政府将努力将分裂的国家团结在一起。

总统（1969–1974）

尼克松于1969年1月20日就任为总统，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尼克松以前曾经的一位竞选对手）主持宣誓仪式。尼克松的妻子，帕特·尼克松（Pat Nixon）打开《圣经》以赛亚书2章4节；尼克松手按圣经；以赛亚书2章4节上面写着：“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几乎获得一致好评，尼克松说道，“人类历史所能够给予的最大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他的墓碑上。他谈到将党派政治转变为团结的新时代：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美国饱受言语狂热之苦；到处是夸大其辞的言辞；承诺比它所能提供的更多；从粉丝不满变成仇恨的愤怒言论；夸夸其谈的言

辞，并不能让人真正信服；我们不能互相学习，直到我们停止互相大喊大叫；直到我们说话足够安静，这样的话和我们的声音才能被听到。”

对外政策

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之间的关系异常密切。它被比作伍德罗·威尔逊和豪斯上校的关系，或者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关系。在这所有三个关系中，国务院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都被置于次要地位。历史学家大卫·罗斯科普夫比较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性格：

“他们是迷人的一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完美地互补。基辛格是迷人而世俗的先生，他提供了尼克松所缺乏、鄙视和渴望的优雅和对于知识分子机构的尊重。基辛格是国际公民。尼克松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人。基辛格有世界观和适应时代的能力，尼克松有实用主义和战略眼光，为他们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基辛格当然会说他不像尼克松那样具有政治心机——但事实上他和尼克松一样具有政治性，同样精于算计，同样志向远大……他们渴望增强自己的实力，也渴望得到人们的认同。”

中国

在尼克松参选总统之前的一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中说道：“这个小星球上，不应该有一个地方，有着十亿具有很大潜力的人民，却生活在愤怒与孤立之中。”

在与中国交往的冒险经历中，协助他的是基辛格；他负责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将成为他未来的国务卿。他们绕过内阁官员、密切合作。

此时，由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处于最低点——在尼克松执政的第一年发生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冲突——尼克松私下向中国人传达了他希望建立更密切关系的信息。

一个突破是在 1971 年初，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与中国顶尖选手对战。尼克松随后派基辛格到中国与中国官员进行秘密会晤。

1971年7月15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通过电视和广播）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次年2月访华。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保密的外交行为，使得双方领导人有机会为彼此之间的接触在各自国家内部准备好相应的政治气候。

1972年2月，尼克松夫妇前往中国。行前，基辛格花了40 多个小时的时间，向尼克松通报了 准备情况。着陆后，总统和第一夫人从空军一号出来，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迎接。尼克松特意先伸出手来与周恩来握手；以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954 年在日内瓦会面时曾经拒绝这样做。

一百多名电视记者陪同总统。在尼克松的命令下，电视记者比印刷出版物的新闻媒体记者更受白宫青睐，因为尼克松认为视像媒体比印刷品更能捕捉到这次访问的重要瞬间。这也让他有机会冷落他所鄙视的印刷媒体记者。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毛泽东的官邸会见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和周总理；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在那里讨论了一系列问题。毛后来告诉他的医生，尼克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尼克松与美国左派和苏联人不同。毛说他对基辛格持怀疑态度，尽管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称自己与毛的会面是他“与历史的相遇”。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总统一行的正式宴会。第二天，尼克松再次会见了周。在这次会议后的联合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期待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会议之外，尼克松参观了包括紫禁城、十三陵和长城在内的建筑奇观。美国人通过电视媒体的报道，通过总统夫人帕特·尼克松（Pat Nixon）游览北京并参观公社、学校、工厂和医院的摄像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

这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由于担心中美结盟的可能性，苏联屈服于与美国进行外交缓和努力的压力。

越南战争

尼克松上任时，每周约有 300 名美国士兵在越南阵亡，这场战争在美国普遍不受欢迎，反对战争的暴力抗议活动持续不断。约翰逊政府曾同意暂停轰炸以换取无先决条件的谈判，但该协议从未完全生效。根据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说法，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得出结论，越南战争无法获胜，他决心尽快结束战争。尼克松寻求某种安排，允许美军撤出，同时让南越安全免受攻击。1969 年 3 月，尼克松未经柬埔寨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同意，批准了对北越（以及后来的红色高棉结盟军）阵地的秘密B-52地毯式轰炸行动。1969年中期，尼克松开始努力与北越进行和平谈判，向北越领导人致函，并在巴黎开始和谈。然而，最初的谈判并没有达成协议。1969年5月，他公开提议从南越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前提是北越也这样做，并要求南越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而且应当允许越共参加选举。

1969 年 7 月，尼克松访问南越，在那里他会见了他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南越总统Nguyễn Văn Thiệu。在国内抗议要求立即撤军的情况下，他实施了以越南军队取代美军的战略，称为“越南化”。他很快就制定了分阶段撤军的计划，但也授权入侵老挝，部分是为了切断“胡志明小道”，该小道穿过老挝和柬埔寨，用于供应北越军队。尼克松于 1970 年 4 月 30 日向美国公众宣布了对柬埔寨的地面入侵。

5 月 4 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四名手无寸铁的抗议学生，骚乱升级为暴力。尼克松对抗议者的回应包括1970 年 5 月 9 日在林肯纪念堂与他们的即兴会面。

1991 年后从苏联档案中发现的文件显示，北越企图在 1970 年占领柬埔寨，这是在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明确要求下。

尼克松的竞选承诺遏制战争，与升级的轰炸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人们声称尼克松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可信度差距”。据估计，在 1970 年至 1973 年对柬埔寨的轰炸期间，有 50,000 至 150,000 人丧生。

1971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公布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泄露的“五角大楼文件摘录”。当泄密的消息首次出现时，尼克松倾向于无所作为；文件是美国介入越南的历史，主要涉及前任政府的谎言，几乎没有真正的启示。但他被后来基辛格说服，认为这些文件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有害，总统试图阻止出版。最高法院最终做出了有利于报纸的裁决。

随着美军继续撤军，征兵减少，并于 1973 年结束征兵；武装部队成为全志愿人员。经过多年的战斗，1973年初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该协议实施了停火，并允许剩余的美国军队撤出南越，而不需要位于越南南方的16万北越正规军撤出那里。美国的战斗支援结束后，北越与南越双方之间短暂休战，之后战斗再次爆发。1975年北越征服南越。

拉丁美洲政策

在 1961 年猪湾入侵和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尼克松一直是肯尼迪

的坚定支持者。1969 年上任总统后，他加强了对古巴及其元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秘密行动。他通过他的朋友Bebe Rebozo与古巴裔美国流亡社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经常提出一些激怒卡斯特罗的方法。这些活动涉及苏联人和古巴人；他们担心尼克松会攻击古巴，破坏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在结束导弹危机时的相互理解。1970年8月，苏联要求尼克松重申相互谅解。尽管对卡斯特罗采取强硬态度，但尼克松还是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当苏联于 1970 年 10 月开始在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扩建基地时，发生了一场美苏小规模对抗。双方之后达成共识，即苏联不会将西恩富戈斯用于携带弹道导弹的潜艇。美苏重申 1962 年协议的最后一轮外交照会于 11 月发布。

在智利，马克思主义的总统参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9月当选智利总统。这促使尼克松和基辛格追求隐蔽地反对阿连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 年 9 月 11 日的一次智利暴力政变中上台。

苏联

尼克松利用不断改善的国际环境来解决核和平问题。在他宣布访华后，尼克松政府结束了他访苏的谈判。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总统和第一夫人抵达莫斯科，并会见了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以及其他的苏联官员。

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峰会之后达成了增加贸易的协议和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备控制条约：——SALT I，两个超级大国签署的第一个全面核武器限制条约，以及禁止开发旨在拦截来袭导弹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宣告了“和平共处”的新时代。当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宴会。

尼克松和基辛格计划通过尼克松所说的“关联性政策”，把军备控制，与外交关系缓和、以及解决其他紧迫问题联系起来。大卫·塔尔认为：

“把战略武器限制，与中东、柏林以及最重要的越南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联系起来的‘关联性政策’，成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缓和政策的核心。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关联性政策，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和进程，包括美国的核裁军和军控政策，并将其与尼克松前任的做法区分开来。他们还打算通过这种关联性政策，使美国的军控政策成为缓和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关联性政策’实际上还是失败了。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基于有缺陷的假设和错误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假设苏联比美国更希望达成战略军备限制协议。”

为了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中国和苏联都削减了对北越的外交支持，并建议河内在军事上与美国和南越达成协议。尼克松后来描述了他的策略：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任何成功的越南和平倡议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尽可能争取苏联和中国的帮助。虽然与中国和解、与苏联缓和本身就是目的，但我也认为这是加速越南战争结束的可能手段。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华盛顿与莫斯科和北京打交道，河内肯定会感到不自信。如果两个主要的共

产党国家决定退出，那么，河内将被迫谈判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尼克松在美苏关系上取得长足进展，并于 1974 年开始第二次访问苏联。他于 6 月 27 日抵达莫斯科参加欢迎仪式，受到人群的欢呼；那天晚上参加克里姆林宫的宏大国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雅尔塔会面，在那里他们讨论了一项拟议的共同防御条约、外交关系缓和、和洲际弹道导弹条约。尼克松曾考虑提出一项全面的禁试条约，但他觉得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时间完成它。这些谈判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中东政策

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一部分，美国避免向其盟友提供直接的战斗援助，而是为他们提供自卫援助。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大幅增加了对中东，特别是针对以色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军售。尼克松政府大力支持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以色列，但支持并非无条件。尼克松认为以色列应该与其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而美国应该鼓励这种和平努力。总统认为——除了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以前的美国政府没有正确地干预以色列，使之进行切实的和平努力；美国本应当利用美国对以色列的巨额军事援助为筹码，敦促以色列回到与中东各方的谈判桌前。

1973年10月6日，以埃及和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在苏联的武器和物资支持下，在赎罪日战争中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损失惨重，尼克松下令空

运以补给以色列损失。一个多星期后，到美国和苏联开始谈判休战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深入敌国领土。停战谈判迅速升级为超级大国危机；当以色列占上风时，埃及总统萨达特要求美苏联合执行维和行动，但遭到美国拒绝。当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威胁要单方面强制执行任何维和军事任务时，尼克松下令美国军方进入三级战略戒备状态，命令所有美军人员和基地警戒核战争的危险。这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距离核战争最近的一次。最后，由于尼克松的行动，勃列日涅夫让步了。

由于以色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支持，阿拉伯欧佩克国家组织以拒绝向美国出售原油进行报复，从而导致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1973年末，欧佩克的石油禁运行动导致了美国的汽油短缺和配给制度。最终，随着中东局势的和平进展，诸产油国停止了石油禁运行动，使得西方石油危机结束。

战后，在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与埃及重新建立了自1967年以来的第一次外交关系。尼克松利用中东危机重启了陷入僵局的中东和平谈判；10月20日，他在给基辛格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写道：

“我相信，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面临 15 年来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的最佳机会。我相信，如果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历史会让我们承担责任……我现在认为永久性解决中东问题是我们必须致力于实现的、最重要的最终目标。”

1974年6月，尼克松作为总统对中东进行了最后一次国际访问，并成为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总统。

国内政策

经济

1969 年尼克松上任时，通货膨胀率为 4.7%，是朝鲜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前，约翰逊总统开创的美国社会福利政策体系，以及庞大的越南战争费用，导致了美国巨额预算赤字。失业率很低，但利率却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尼克松的主要经济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这样做的最明显手段是结束战争。这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国经济在 1970 年继续挣扎，导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表现不佳（民主党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

政治经济学家奈杰尔·鲍尔斯（Nigel Bowles）在 2011 年对尼克松经济记录的研究中表示，新总统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几乎没有改变约翰逊的政策。

尼克松对外交事务比对国内政策更感兴趣，但他认为选民倾向于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经济状况对他的连任构成威胁。作为他的“新联邦主义”观点的一部分，他向各州提议拨款、把联邦经济政策的权利更多地下放给各个州。但这些提议大部分都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的预算制订过程中落空了。然而，尼克松因倡导那些“新联邦主义”经济政策而获得了政治声誉。

1970年，国会授予总统实施工资冻结和价格冻结的权力；但民主党多数派并没有期望尼克松会真的实际使用这一权力（因为他们知道尼克松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反对这种控制）。

1971 年 8 月通货膨胀仍未得到解决，选举年即将来临，尼克松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高级经济顾问会议。随后，他宣布了临时的工资和物价管制政策，允许美元汇率浮动，并结束了美元对黄金的兑换体系。

鲍尔斯指出：

“尼克松清晰地显明，他的政策是为了消除经济通货膨胀；这让民主党政治对手们很难反对他；那些政治对手们无法提供任何合理或可信的替代政策。而且，尼克松现在实行的政策，正是那些民主党政治对手们自己曾经支持过的方法。”

尼克松的政策在 1972 年抑制了通货膨胀，尽管这些政策的后遗症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和福特政府期间导致了新的通货膨胀。

尼克松赢得连任后不久，通货膨胀又回来了。他于 1973 年 6 月重新实施价格管制。公众和商人不欢迎价格管制，他们认为强大的劳工工会要比价格委员会官僚机构更加可以被接受。价格控制措施导致食品短缺，因为肉类从杂货店消失，农场淹死鸡而不是亏本出售。尽管未能控制通货膨胀，

但价格控制还是慢慢结束，1974 年 4 月 30 日，它们的法定授权因到期而失效。

政府举措和组织机构

尼克松提倡“新联邦主义”，将权力下放给州和地方民选官员；但民主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对这些想法持敌对态度，因而几乎没有通过什么相应的法律政策。

尼克松取消了内阁级的美国邮政部，该部于 1971 年转变为政府运营的美国邮政局（一个企业化的机构）。

尼克松在执政后期成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支持者。环境政策在 1968 年的选举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候选人很少被问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尼克松在 1970 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通过讨论环境政策开辟了新政治领域。

1970 年 4 月的第一个地球日预示着选民对该主题的兴趣。6 月，他宣布成立环境保护署 (EPA)。他依靠支持保护自然资源的国内政策顾问约翰·埃利希曼 (John Ehrlichman) 来帮助他“摆脱环境问题的困扰”。尼克松支持的其他环保举措还包括，——推动 1970 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成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以及，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要求对许多联邦项目进行环

境影响评估报告。尼克松否决了1972 年的《清洁水法》——反对的原因不是在于立法的政策目标，而是由于要花在这些目标上的钱（他认为其费用过于高昂）。在国会推翻他的否决后，尼克松削减了他认为不合理的资金。

1971 年，尼克松提议进行健康保险政策改革，——包括，强制要求雇主给雇员们提供私人健康保险；联邦政府为那些家中有未成年儿女的贫困家庭提供免费医疗补助；以及对健康维护组织(HMO) 的支持。1973 年颁布了一项有限的 HMO 法案。1974 年，尼克松提议进行更全面的健康保险改革，——包括，私人健康保险的雇主要求；采用各州全民医保计划；以个人收入为基础的保费和成本分摊；等政策。

尼克松呼吁发动一场针对毒品的政治战争，并承诺切断毒品的国外供应来源。他还增加了用于教育和康复设施的资金。

作为一项政策倡议，尼克松于 1971 年 2 月呼吁为贫血症研究、治疗和教育提供更多资金，并于 1972 年 5 月 16 日签署了《国家镰状细胞贫血症控制法》。尼克松虽然呼吁增加在镰状细胞病和癌症战役等备受瞩目的项目上的资金支持，但同时他试图减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总支出。

公民权利

尼克松总统期间见证了南方公立学校的首次大规模整合。尼克松在种族隔离主义者华莱士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寻求了一条中间道路。他试图将废除种族隔离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就职后不久，他任命副总统阿格纽领导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与当地白人和黑人领袖合作，以确定如何整合当地学校。

除了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之外，尼克松还在 1970 年实施了费城计划——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联邦平权行动计划。在 1972 年通过国会两院并前往各州批准后，他还支持了平等权利修正案。他还通过一个被称为黑人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推动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和经济平等。尼克松任命的女性担任行政职位的人数比林登约翰逊多。

太空政策

经过近十年的全国努力，美国于 1969 年 7 月 20 日随着阿波罗 11 号的飞行赢得了宇航员登月竞赛。尼克松与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在他们月球漫步期间进行了交谈。他称这次谈话是“白宫有史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电话”。

尼克松不愿意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资金维持在 1960 年代美国宇航局准备将人员送上月球时所见的水平。NASA 局长Thomas O. Paine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在 1970 年代末建立一个永久的月球基地，并在 1981 年开始载人火星探险。尼克松因费用问题拒绝了这两项提议。

尼克松还在1969 年取消了空军载人轨道实验室计划，因为无人间谍卫星是实现相同侦察目标的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美国宇航局取消了最后三个计划中的阿波罗登月任务，以更有效地将Skylab 送入轨道，并为航天飞机的设计和建造腾出资金。

1972 年 5 月 24 日，尼克松批准了美国宇航局和苏联太空计划之间为期五年的合作计划，最终在 1975 年美国阿波罗号和苏联联盟号航天器在太空连接的联合任务中达到高潮。

连任、水门事件和辞职

1972年总统竞选

长期以来，民主党的“坚实南方”一直是共和党权力受挫的根源。戈德沃特通过反对1964 年的民权法案赢得了几个南方州，但却疏远了更温和的南方人。尼克松在 1968 年争取南方支持的努力被华莱士的候选资格冲淡了。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推行了南方战略，其政策（例如他的废除种族隔离计划）在南方白人中被广泛接受，使得他们在民权运动之后重新与共和党人结盟。他提名了两名南方保守派，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思和G. Harrold Carswell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关于这两人的任命都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

尼克松于 1972 年 1 月 5 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投票中名列前茅，有效地宣布了他在共和党的连任候选资格。尼克松最初预计他的民主党对手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已故总统的兄弟），但后者在 1969 年 7 月的查帕奎迪克事件后基本上被排除在竞争之外。相反，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成为民主党阵营初选中的领跑者，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紧随其后。

6 月 10 日，麦戈文赢得加州民主党初选，并因此获得民主党全国提名。次月，尼克松在 1972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提名。尼克松认为民主党纲领是懦弱和分裂的。麦戈文打算大幅减少国防开支，并支持对逃避征兵和堕胎的特赦。由于他的一些支持者被认为支持毒品合法化，所以，麦戈文被认为是“大赦、堕胎和毒品”的代表。麦戈文对他原来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的摇摆不定的支持也使他自己受到了伤害；当麦戈文得知伊格尔顿曾经接受过抑郁症治疗后，麦戈文撤换了他的竞选伙伴。

尼克松在整个竞选期间的大多数民意调查中都一直领先；1972年11月7日的总统大选，使尼克松赢得了美国历史上胜负差距最大的总统选举；他以超过 60% 的选票击败了麦戈文，仅在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失败（其余 48 州都胜选）。

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一词是指，包含尼克松政府成员在内的人士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秘密且通常是非法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窃听政治对手的办公室，以及骚扰激进团体和政治人物。1972 年 6 月 17 日，五名男子闯入华盛顿特区水门大楼的民主党总部被捕后，这些活动被曝光。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此事；其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所依靠的信息来源，是一个被称为“深喉”的人。

后来人们知道，这个“深喉”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

尼克松试图淡化此事，称新闻文章有偏见和误导性。但一系列爆料清楚地表明，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以及后来的白宫官员都参与了破坏民主党的企图。高级幕僚如白宫顾问约翰·迪安面临起诉；共有48名官员被判犯有不法行为。

1973 年 7 月，白宫助手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 (Alexander Butterfield) 在向国会宣誓作证时说，尼克松有一个秘密录音系统，并在椭圆形办公室对他自己的谈话和电话进行录音。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在法庭上要求传唤、播放这些录音磁带的內容。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由提供了录音谈话内容的抄本，但没有提供实际的录音带。

由于白宫和考克斯争执不下，尼克松在 10 月让考克斯被解雇。考克斯被

Leon Jaworski取代。11月，尼克松的律师透露，1972年6月20日在白宫进行的一次谈话的录音中有一段18分钟半的间隔。总统的私人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声称对此负责，说她自己在转录磁带的时候不小心擦除了一部分；她的说辞被广泛嘲笑。这一录音擦除事件，虽然不是总统不当行为的决定性证据，但令人怀疑尼克松关于他不知道所掩盖之事的声明。

尽管尼克松失去了很多民众（包括来自他自己的政党）的支持，但他拒绝了不当行为的指控，并发誓要继续执政。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坚称——他事先不知道入室盗窃；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直到1973年初才知道所掩盖之事。

1973年10月10日，副总统阿格纽因与水门事件无关的原因辞职：他因在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期间的贿赂、逃税和洗钱行为而被定罪。尼克松选择了杰拉尔德·福特、当时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以代替阿格纽。

1973年11月17日，在电视问答环节中，面对400名美联社主编，尼克松说：“人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总统是否是骗子。我不是一个骗子。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以诚实的工作而得来的。”

关于要求播放那些录音磁带的法律斗争一直持续到1974年初。4月，尼克松宣布公布1,200页他和助手们之间的白宫谈话的记录。1974年5月9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系列弹劾听证会。电视网络对此实况转播。7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必须播放完整的录音带，而不仅仅是公布所

选定的录音记录抄本。

丑闻逐渐涉及对总统的一系列额外指控，从不当使用政府机构、到在办公室接受礼物、以及他的个人财务和税收；尼克松一再表示愿意支付任何到期未缴的税款；后来在 1974 年支付了 465,000 美元（相当于 2020 年的 240 万美元）补缴税款。

虽然，由于持续的一系列揭露而使尼克松的民意支持大幅减少，但是，尼克松仍希望与这些指控作抗争。

然而，在华盛顿民主党总部水门大楼被闯入事件后不久的白宫所录制的其中一盘新录音显示，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被告知白宫与水门事件有关，并且批准了阻挠调查的计划。

1974 年 8 月 5 日，尼克松接受了关于他在被告知白宫参与闯入事件时的误导国家的责任，但称他已经不记得当时的具体过程。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雅各布·罗德斯不久后与尼克松会面。罗德斯告诉尼克松，他在众议院将面临弹劾。斯科特和戈德沃特告诉总统，他在参议院最多只有 15 票支持他，远少于避免免职所需的 34 票。

辞职

鉴于他失去政治支持以及几乎肯定会被弹劾并被免职，尼克松在前一天晚上在电视上向全国发表讲话后，于 1974 年 8 月 9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

辞职演讲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并在广播和电视上直播。尼克松说他辞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并要求国家支持新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尼克松接着回顾了他担任总统期间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为自己担任总统的记录辩护，引用了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的演讲《共和国公民身份》中说过的话语：——

“有时我成功了，有时我失败了，但我总是从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经说过的、关于竞技场上的人的话中振作起来，——‘他的脸被灰尘、汗水和鲜血弄脏了，他勇敢地奋斗着，他犯了错误，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站起来；没有不存在错误和缺点的努力，但他真正努力去做这件事，他有着伟大的热情，伟大的奉献，他把自己投入到有价值的事业中，他知道胜利的意义；最坏的情况是，即使他失败了，他也知道，他曾经付出了努力’”。

总统以后的时期（1974-1994）

赦免与疾病

福特总统于 1974 年 9 月 8 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他决定赦免尼克松。

在他辞职后，尼克松一家飞往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的家。根据他的传记作者乔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 的说法，“尼克松在辞职后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国会资助了尼克松的过渡费用，包括一些工资开支，但将拨款从 850,000 美元减少到 200,000 美元。由于他的一些工作人员还在身边，尼克松在早上 7:00 前就到了他的办公桌前——但无事可做。他的前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Ron Ziegler)每天与他单独坐在一起几个小时。

尼克松的辞职并没有结束许多人希望他受到惩罚的愿望。福特总统考虑赦免尼克松，尽管这在民意中不受欢迎。福特总统的信使在联系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最初不愿接受赦免，但后来同意了。福特坚持要一份忏悔声明，但尼克松认为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不应该发布这样的文件。福特最终同意了，并于 1974 年 9 月 8 日授予尼克松“完全、自由和绝对的赦免”，从而结束了对之法律起诉的任何可能性。尼克松随后发表声明：

“我在处理水门事件时没有更果断、更直率地采取行动是错误的，尤其是当它进入司法程序阶段并从政治丑闻发展为国家悲剧时。我对在水门事件时期所犯的错误给国家和总统制度、我深爱的国家和我非常尊重的机构带来的伤害深深致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的遗憾和痛苦的深度。”

1974 年 10 月，尼克松患上了静脉炎。医生告诉他要么做手术、要么死，

尼克松不情愿地选择了手术；福特总统到医院看望了他。在此期间，尼克松因他的三名前助手——迪恩、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被审判而被传唤出庭提供证词，尼克松因手术而无法到庭。华盛顿邮报不相信他的病，印制了一幅漫画，声称尼克松的“脚崴了”。

主审法官约翰·希莱卡同意尼克松因身体原因而不出庭作证，尽管被告对此反对。

国会指示福特保留尼克松的总统文件作为永久性记录——这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关于文件的法律斗争，最终由前总统及其代理机构获胜。

1974 年国会中期选举举行时，尼克松正在医院里；水门事件和福特总统对尼克松的赦免，是导致共和党失去众议院 43 个席位和参议院 3 个席位的因素。

回归公共生活

1974 年 12 月，尼克松开始计划他的复出，尽管民意对他有相当大的反感。

到 1975 年初，尼克松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他在离家 300 码的海岸警卫

队驻地设有办公室，起初是乘坐高尔夫球车，后来每天都在这条路线上散步；他主要写回忆录。

他曾希望等着以后再写回忆录；但是，他的资产被各种开支和律师费用吞噬的事实，迫使他迅速开始工作。当国会给他拨付的过渡期津贴在2月结束时，他的许多员工由于没有工资而被迫离职。

那年8月，他接受了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兼制片人大卫弗罗斯特的系列采访；后者付给他60万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290万美元）；该采访于 1977 年拍摄并被播出。他们从外交政策的话题开始，讲述了尼克松所认识的领导人，但采访中最难忘的部分是关于水门事件的部分。尼克松承认他“让这个国家失望”并且“我让自己失望了。我给了他们一把剑，他们把它插进去。他们津津有味地扭动它。而且，我想，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这些系列采访吸引了 4500万-5000 万观众——成为电视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此类节目。

该采访帮助改善了尼克松的财务状况——在 1975 年初的某个时刻，他在银行里只有 500 美元存款。

1976年2月，尼克松应毛泽东个人邀请访华。在此之前，尼克松曾想返回中国，但决定等到 1975 年福特自己的对华访问之后。

尼克松在 1976 年福特和里根之间的初选战中保持中立。福特在共和党初选过程中赢了里根，但在全国普选中被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击败。卡特政府对尼克松毫无帮助，阻止了他计划前往澳大利亚的行程，导致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的政府拒绝了正式邀请尼克松访澳。

1976年，尼克松由于在水门事件中妨碍司法，被纽约州律师协会取消律师执业资格。尼克松决定不对此提出任何抗辩。

1978年初，尼克松前往英国。美国外交官和英国詹姆斯卡拉汉政府的大多数部长都对他避而远之。不过，他受到反对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以及英国前首相希思以及哈罗德·威尔逊的欢迎。

在英国期间，尼克松就水门事件向牛津大学联盟发表讲话：“有人说我处理不当，他们说对。我搞砸了。这是我的罪过。但是让我们继续进行我所成就的那些正确的事业。到2000年，当我们回首的时候，我们将看看那时我将如何被历史评判。”

作家和资深政治家

1978 年，尼克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理查德尼克松的回忆录》，这是他退休后撰写的十本书中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成为畅销书，并引起了普遍积极正面的评论。

1979年，尼克松应卡特之邀来到白宫，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举行国宴。卡特本来不想邀请尼克松，但邓曾表示，如果不邀请前总统，他将在加利福尼亚访问尼克松。尼克松与邓小平私下会面，并于 1979 年年中再次访问北京。

在整个 1980 年代，尼克松保持着忙碌的演讲计划和写作时间表，旅行并会见了许多外国领导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他与前总统福特和卡特一起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葬礼。在中东之行中，尼克松公开了他对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的看法，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极大关注。

尼克松于 1986 年访问苏联，回国后给里根总统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其中包含外交政策建议和他对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印象。这次旅行之后，尼克松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被列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十个人之一。

1986 年，尼克松在报纸出版商大会上发表演讲；他的世界巡讲给他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政治权威伊丽莎白·德鲁写道：“即使在他错了的时候，尼克松仍然表明他知道很多，记忆力很广，还有说话的能力，有明显的权威，足以打动那些在早些年中曾经不看重他的人们。”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尼克松复出”的报道，标题是“他回来了”。

1990 年 7 月 19 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图书馆和故居纪念馆作为私人机构对外开放，尼克松夫妇出席。一大群人参加了开馆仪式，其中包括福特总统、里根总统和乔治 HW 布什总统，以及他们的妻子贝蒂、南希和芭芭拉。1994年1月，这位前总统创立了尼克松中心（一个私立机构；今天名为“国家利益中心”）；这是一个华盛顿政策智囊组织和会议中心。

尼克松的妻子，帕特尼克松于 1993 年 6 月 22 日死于肺气肿和肺癌。她的葬礼在理查德尼克松图书馆和故居地举行。前总统尼克松在整个葬礼过程中情绪忧伤，并在图书馆大楼内向她致敬。

死亡和葬礼

1994 年 4 月 18 日，尼克松在新泽西州帕克里奇的家中准备吃晚饭时严重中风。一个血块在他的心脏上导致房颤，并侵入他的大脑。他被送往位于曼哈顿的纽约医院康奈尔医疗中心；他无法说、话或移动他的右手臂或腿。大脑损伤导致脑水肿，尼克松陷入深度昏迷。他于 1994 年 4 月 22 日晚上 9 点 08 分去世，他的女儿们在他的床边。他享年81岁。

尼克松的葬礼于 1994 年 4 月 27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举行。尼克松图书馆的葬礼仪式上的致悼词者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和牧师葛培理。出席会议的还有前总统福特、卡特、里根、乔治 HW 布什和他们

的妻子。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被安葬在尼克松图书馆（Nixon Library）外的墓地上，葬在他的妻子帕特（Pat）旁边。他有两个女儿 Tricia和Julie以及四个孙子孙女在世。

送葬者在寒冷潮湿的天气中排队等候长达八小时以表达敬意。在高峰期，经过尼克松陈棺的队伍长达三英里，估计有 42,000 人在等待。

尼克松去世后，美国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提到了水门事件，但大部分报道都对这位前总统表达了很多赞誉之词。达拉斯晨报称，“历史最终应该表明，尽管他有缺陷，但他是我们最有远见的首席执行官之一。”《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漫画家杰夫·科特巴（Jeff Koterba）在一张空白画布前描绘了历史，他的主角画家是尼克松，而美国则急切地注视着。画家敦促他的观众们坐下，说，这项工作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因为“这幅画比大多数绘画都要更复杂”。

遗产

记录尼克松国会生涯的欧文·盖尔曼（Irwin Gellman）表示，“当尼克松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在国会同僚中表现出色，那是一个在困难时期取

得成功的故事；他在反对麦卡锡的过度行为的情况下引导了明智的反共产主义路线。”

艾特肯认为，“尼克松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都因其过错而受到过分的诋毁；人们对他的美德认识不足。然而，即使本着历史主义的精神，也无法做出简单的判决。”

一些历史学家说，尼克松的南方战略将美国南部变成了共和党的大本营，而其他人则认为经济因素在这一变化中更为重要。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尼克松使他的政党摆脱了孤立主义者的控制；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他是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有说服力的倡导者。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赫伯特·帕梅特（Herbert Parmet）的说法，“尼克松的角色是引导共和党走温和中间路线，介于洛克菲勒、戈德沃特和里根的竞争冲动之间。”

尼克松在国内事务上的立场体现于环境和监管立法的通过和执行。在 2011 年一篇关于尼克松与环境的论文中，历史学家保罗查尔斯米拉佐指出尼克松创建了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以及他对 1973 年濒危物种法案等立法的执行，指出“尽管没有寻求和承认，理查德尼克松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政治遗产是安全的”。

尼克松本人并不认为他在任内取得的环境进步是其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历史学家争辩说，他的选择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任何强烈的环保主义信念。

尼克松将他对越南、中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视为他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遗产的核心。尼克松曾经对手乔治·麦戈文在 1983 年评论道，“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可能比二战以来的任何其他美国总统都更实际而有效 [...]尼克松真的会在历史上获得高分。”

政治学家Jussi Hanhimäki不同意，称尼克松的外交只是冷战政策的延续，即通过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进行遏制。基辛格指出了尼克松 1972 年对中国的开放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中东外交之间的相似之处。

历史学家基思·W·奥尔森(Keith W. Olson) 写道，尼克松在越南和水门事件中留下了美国公众对政府根本不信任的遗产。在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调查中，尼克松通常被列为低于平均水平的总统。

个性与公众形象

尼克松的职业生涯经常受到他的个性和公众对它的看法的困扰。社论漫画家和喜剧演员经常夸大他的外表和举止，以至于真人与漫画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他经常被描绘成颓颓、肩膀塌陷、眉头紧皱、汗流浹背。

尼克松性格复杂，既神秘又笨拙，但对自己的反省却惊人。他喜欢与人疏远，各方面都很正式，即使一个人在家也穿外套打领带。根据尼克松传记作者康拉德·布莱克的说法，“尼克松原以为自己注定要被诽谤、被欺负、被无理骚扰、被误解、被低估、受约伯的试炼，但是，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坚韧和勤奋，他最终会得胜。”

尼克松有时会酗酒，尤其是在 1970 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顺利。他也难以与失眠作斗争，为此他要服用安眠药。尼克松还服用了杰克·德雷福斯推荐的狄兰汀。这种药通常用于治疗 and 预防癫痫发作，但对于尼克松而言，它是用来对抗抑郁症的。他周期性的过度酗酒，尤其是在阿波罗 13 号等压力大的时期，让普莱斯和其他人感到担忧，包括当时的顾问埃利希曼和长期贴身男仆马诺洛桑切斯。作家和前英国政治家大卫欧文 认为尼克松是个酒鬼。

传记作者伊丽莎白·德鲁将尼克松概括为“聪明、有才华的人，但最奇特、最受总统制度困扰的人”。

在对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描述中，作家理查德·里夫斯将尼克松描述为“一个不舒服的、害羞的奇怪人，他独自思考时表现得最好”。

1999 年 10 月，一卷 1971 年的白宫录音带被发行，其中包含尼克松被视为贬低犹太人的多项谈话。在与 HR Haldeman 的一次谈话中，尼克松说华

盛顿“到处都是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都忠诚”，但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例外。然后他补充说：“但是，鲍勃，一般来说，你不能相信这些混蛋。他们背叛了你。我说的对不对？”在 1971 年录音的其他地方，尼克松否认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他说：“如果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任何人有理由反犹太人，那么，我也有理由……但我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尼克松认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取得进步并成为总统时，与他人保持距离对他来说是必要的。甚至Bebe Rebozo，据某些说法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从不直呼他的名字，而尊称他为总统先生。尼克松这样说：“即使和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我也不觉得，你应该松弛下来、倾诉这事、诉说那事，——说，‘哎呀，我睡不着……’我认为，你应该把你的烦恼留给自己。这就是我的方式。有些人是不同的。有些人认为与亲密的朋友坐在一起无话不谈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你知道的，只要你有胆量吐出心事……[并]揭示自己的内心——无论他们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瓶喂养。但这不是我。决不是。”

当尼克松被告知，大多数美国人甚至在他的职业生涯结束时都觉得他们不认识他时，他回答说：“是的，这是真的。他们没有必要知道。”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ald_Ford

杰拉尔德·福特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913年7月14日——2006年12月26日）是一位美国政治家，1974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是共和党成员，曾于1973年至1974年担任美国第40任副总统。迄今为止，福特是唯一一位没有被选举团选为副总统或总统的美国总统。

福特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长大，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珍珠港遇袭后，他应征入伍，1942年至1946年服役：他离开时是中尉指挥官。福特于1949年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担任密歇根州第五国会选区的美国众议员。他以这一身份任职了25

年，最后9年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1973年12月，在斯皮罗·阿格纽辞职两个月后，福特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副总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根据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任命的副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辞职后，福特立即就任总统。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制度内最后一次继任总统的副总统。

作为总统，福特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这标志着美苏在冷战中走向缓和。随着南越的崩溃、被北越征服，美国对越南的介入基本上结束了。在国内，福特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的40年来最糟糕的经济；在他的任期内，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不断加剧。在他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中，他赦免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可能遭遇的法律控罪。在福特执政期间，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国会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相应限制总统的权力。在1976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福特击败了前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获得共和党提名。他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弱差距输给了民主党挑战者、前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

福特在总统任职结束多年后，一直活跃在共和党内。他在各种社会问题上的温和观点日益使他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与党内保守派成员意见相左。退休后，福特抛开1976年大选后对卡特的敌意，两位前总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经历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后，他于2006年12月26日在家中去世。

福特1913年7月14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伍尔沃斯大道3202号，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住在一起。他是多萝西·艾尔·加德纳和莱斯利·林奇·金·斯尔的独生子；他们是经营羊毛业务的商人。他的父亲是著名银行家查尔斯·亨利·金和玛莎·艾丽西娅·金的儿子。加德纳在儿子出生后十六天就与金分居了。她带着儿子去了伊利诺伊州的橡树公园，这是她姐姐坦尼斯和姐夫克拉伦斯·哈斯金斯·詹姆斯的家。从那里，她搬到了她的父母，利维·艾迪森·加德纳和阿黛尔·奥古斯塔·艾尔的家，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加德纳和金于1913年12月离婚，她获得了儿子的完全监护权。福特的祖父查尔斯·亨利·金支付子女抚养费，直到1930年去世前不久。

福特后来说，他的亲生父亲有打他的母亲的历史。在福特的传记中，福特政府成员詹姆斯·坎农写道，福特父母的分居和离婚的原因是，福特出生几天后，莱斯利·金拿起一把屠刀，威胁要杀死他的妻子、他幼子和福特的保姆。福特后来告诉知己，他的父亲当看见他的母亲在蜜月期间对另一个男人微笑时，第一次打她。

加德纳与父母一起生活了两年半后，于1917年2月1日与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结婚。他是一家由家族拥有的油漆和清漆公司的推销员。他们现在叫她的儿子小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这位未来的总统直到1935年12月3日才正式合法地改名。他与母亲第二次婚姻中的三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在大急流城长大：托马斯·加德纳“汤姆”·福特（1918-1995年）、理查德·艾迪森“迪克”·福特（1924-2015年）和詹姆斯·弗朗西斯“吉姆”·福特（1927-2001年）。

从莱斯利·金（他的亲生父亲）的第二次婚姻，福特还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马乔里·金（1921-1993年），莱斯利·亨利·金（1923-1976年）和帕特里夏·简·金（1925-1980年）。他们从小就没见过对方，直到1960年他才认识他们。福特直到17岁才认识他的亲生父亲，当时他的父母告诉他他出生的情况。

那一年（福特17岁的时候），他的亲生父亲（福特形容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富裕的人，根本就不在乎去考虑和感受他的第一个儿子的希望和梦想”）来到密歇根州大急流域的一家餐厅，走近福特；当时福特在那家餐厅当侍应生。两人后来“保持零星的接触”，直到莱斯利·金·斯尔于1941年去世。

福特说：“我的继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的母亲更加精彩。我不可能为一个优秀的家庭成长环境而找到比这更好的一个地方。”

福特参与了美国童子军，并赢得了该机构组织的最高等级勋章，童子军雄鹰。他是唯一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童子军雄鹰。

福特就读于大急流城南高中，在那里他是一名明星运动员和足球队队长。1930年，他入选大急流域联赛全城队。为此他还引起了大学招聘人员的注意。

学院和法学院

福特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为该校橄榄球队打中锋、后卫和长传手，并在1932年和1933年帮助校队两次夺得全国冠军。

在1934年、福特大学高年级时，学校橄榄球队经历了巨大的失败，整个赛季只赢了一场比赛，但福特仍然是球队的明星球员。在其中一场比赛中，密歇根大学校队在上半场与明尼苏达州大学校队打成激烈的平局——后者最终赢得全国冠军。赛后，球队助理教练本尼·奥斯特班说：“当我在半场休息时走进更衣室时，我眼里含着泪水，我为他们感到骄傲。福特和塞德里克用尽了全力打球。在防守时，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场上每一个地方”。

福特后来回忆道，“在政治动荡的25年里，我经常想到1934年那场比赛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经历。记住那些经历，使我能够多次面对严峻的形势采取行动，并尽一切可能，面对不利的局面。”他当年的校队队友后来把福特评为他们最有价值的球员，一位助理教练说，“他们觉得杰瑞（福特）是一个能够在失败中留下来战斗的人。”

在福特大四的时候，佐治亚理工学院表示，如果一个名叫威利斯·沃德的黑人球员上场，它将不会与密歇根队进行预定的比赛，这引起了争议。学生、球员和校友都提出抗议，但密歇根大学官员投降了，让沃德退出了比赛。福特是沃德在队中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巡回赛旅行时住在一起。据报

道，福特威胁要退出球队，以回应密歇根大学的决定；但他最终同意继续比赛，因为沃德亲自要求他这样做。

1934年，福特被选为一个全国联赛的东部队队员，1935年1月1日参加比赛。作为1935年大学全明星足球队的一员，福特在芝加哥大学全明星赛中对阵芝加哥熊队。

福特1935年毕业于密歇根州，获得经济学文学学士学位。他于1935年9月在耶鲁大学担任拳击教练和助理大学橄榄球教练，并同时申请了耶鲁大学法学院。

1937年夏天，他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读书，并最终于1938年春季被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那一年，他还被提升为耶鲁大学低年级橄榄球队主教练。

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福特加入了由道格拉斯·斯图亚特领导的一群学生团体，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执行1939年的《中立法》。请愿书在全国流传，是美国第一委员会的灵感来源，该委员会决心将美国排除在二战之外。福特进入政坛是在1940年夏天，当时他为温德尔·威尔基的共和党总统竞选团队工作。

福特以年级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于1941年毕业，进入密歇根律师协会，不久之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1941年5月，他与朋友菲利普·布琴开了一家大急

流域法律事务所。

美国海军预备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后，福特报名参加海军。1942年4月13日，他获得美国海军预备役的资格证书。4月20日，他向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V-5教练学校报到。经过一个月的训练，他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海军飞行预演学校，在那里他是83名教官之一，教授初级导航技能、军械、炮兵、急救和军事演习。此外，他还执教了所有9项体能运动，但主要是游泳、拳击和足球。在飞行预演学校的那一年，他于1942年6月2日晋升为少尉，1943年3月晋升为中尉。

出海任务

福特申请参加出海任务后，他于1943年5月被派往新泽西州卡姆登的纽约造船公司，参加新航空母舰蒙特利号（CVL-26）下水演练任务。从1943年6月17日该船试航到1944年12月底，福特在蒙特利号上担任助理领航员、运动教官和防空营军官。1943年底和1944年，该航母与第三和第五舰队一起参加了太平洋战区的许多军事行动。1943年，该航母帮助守卫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并在1943年参与了航母打击行动。1944年春，蒙特利号支援在夸贾林和埃尼韦托克的登陆军事行动，并参加了马里亚纳群岛、西卡罗琳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的航母袭击战役以及菲律宾海战役。经过大修后，从1944年9月至11月，蒙特利的飞机对威克岛发动了攻击，参加了在菲律宾和

琉球的空袭，并支持在莱特和明多罗岛登陆军事行动。

虽然这艘航空母舰没有被日本帝国军队的战斗损坏，但蒙特利号是1944年12月18-19日“眼镜蛇”台风中遭受损坏的几艘船之一。第三舰队在台风中损失了三艘驱逐舰和800多人。蒙特利号被大火损坏了一部分，起火原因是船上的几架飞机从电缆上散开，在机库甲板上相撞。福特当时担任甲板总区官，并被命令评估熊熊燃烧的火势。他成功地把火情报告给舰长斯图亚特H. 英格索尔。舰上的船员们最后能够控制住火势，船又恢复了航行。

火灾发生后，蒙特利号航母被宣布不适合服役。福特离开了舰队，并被派遣到加州圣玛丽学院的海军飞行预备学校，在那里他被分配到体育部当教员，直到1945年4月。1945年4月底至1946年1月，福特中尉任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海军航空站海军预备役训练司令部参谋长。

在海军服役期间，他获得了多项军功章。他于1946年2月光荣地从海军退役。

婚姻和儿女

1948年10月15日，福特在大急流城的格雷斯圣公会教堂与伊丽莎白·布卢默（1918-2011）结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婚姻，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她以前结过婚，第一次婚姻五年后，与威廉·沃伦离婚。

她本人来自大急流域，在纽约市生活了几年，在那里她担任约翰·罗伯特·鲍尔斯公司的时装模特，以及玛莎·格雷厄姆舞蹈团辅助剧团的舞蹈演员。他们订婚时，福特正在竞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席位。

这对夫妇有四个孩子：

迈克尔·杰拉尔德，1950年出生

约翰·加德纳，名叫杰克，生于1952年

史蒂文·梅格斯，1956年出生

苏珊·伊丽莎白，1957年出生

美国众议院（1949-1973）

1946年福特回到大急流域后，他开始活跃于当地的共和党政治；支持者敦促他挑战现任共和党国会议员巴特尔·琼克曼。服兵役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福特写道：“我回到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轨道上来；当然，我们当时的国会议员是一个公开的、敬业的孤立主义者。我认为他应该被替换。没有人认为我能赢，但我最终以二比一的差距赢得了选举。”

在1948年的第一次竞选中，福特拜访了他们家社区的选民；福特还参观了当地的农场。

福特在众议院任职25年；1949年至1973年担任密歇根州第五国会选区众议员。福特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谦逊。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描述的那样，福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谈判者和调和者；记录显示：他整个职业生涯没有写过任何重大立法。当选两年后被任命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成员，是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的杰出成员。福特形容他的政治哲学是‘国内事务的温和派，外交事务的国际主义者，财政政策的保守派’”。福特投票赞成民权法案，以及美国宪法第24修正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福特被众议院的同事们称为“国会议员中的代表”。

20世纪50年代初，福特谢绝了关于竞选参议院或密歇根州州长的提议。相反，他的志向是成为众议院议长；他称那将是一个“最大的成就。坐在那里，成为其他434人的领袖；除了成就感之外，还有责任努力管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机构。。。。。。我想我在众议院工作一两年后就有了这个雄心壮志。”

沃伦委员会

1963年11月29日，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福特为沃伦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为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案而成立的一个特别工作组。福特被指派准备一本被指控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传记。他和厄尔·沃伦还采访了杀害奥斯瓦尔德的凶手杰克·鲁比。根据2008年向公众发布的一份FBI的1963年备忘录，福特在沃伦委员会工作期间一直与联邦调查局保持联系，并将有关该特别调查工作小组活动的信息转达给FBI副局长卡塔·德洛

奇。福特在他的书作《总统遗产》和《沃伦委员会》的序言中为委员会的工作辩护，并重申他支持委员会的结论。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1965-1973）

1964年，林登·约翰逊领导他的政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再次获得总统任期，并在众议院从共和党人手中夺走了36个席位。选举后，共和党核心小组的成员希望选出一位新的少数党领袖。三名成员联系福特，看看他是否愿意服务；与家人商量后，他同意了。经过激烈的竞争，福特被选为取代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哈莱克议员的少数党领袖。

约翰逊政府以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被约翰逊称为“大社会”的计划（即美国社会福利计划）。仅在第八十九届国会第一届会议期间，约翰逊政府就向国会提交了87项法案；约翰逊签署了其中84项法案，占96%，可以说是国会历史上最成功的立法议程。

1966年，对约翰逊政府处理越南战争的批评开始增加，福特和国会共和党人担心美国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赢得战争。公众情绪也开始转向反对约翰逊，196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产生了47个席位的变化，转向支持共和党。这还不足以让共和党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但这场胜利给了福特阻止进一步扩大“大社会计划”立法的机会。

福特在众议院发言并质疑白宫是否有明确的计划使战争圆满结束之后，他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观点成为公众所知。福特的演讲激怒了约翰逊总统，他暗讽福特的脑子有问题。

作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福特在与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举行的一系列电视记者招待会上露面，他们在会上提出了共和党对约翰逊政策的替代方案。许多媒体开玩笑地称这为“埃夫和杰瑞秀”。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福特的角色转向了白宫议程的倡导者。国会通过了尼克松的几项提案，包括《国家环境政策法》和1969年的税制改革法案。共和党少数派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胜利是州和地方财政援助法案。该法案于1972年通过，为州和地方政府制定了收入分享计划。福特的领导在引导收入分享计划通过国会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导致两党联盟以223票赞成（相比之下，185票反对）支持该法案。

在福特担任少数党领袖的八年间（1965-1973年），他赢得了众议院的许多朋友，因为他的公正领导和不冒犯人的个性。

副总统（1973-1974）

1973年10月10日，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辞职，随后对逃税和洗钱的刑事指控不提出异议。据《纽约时报》报道，尼克松“向国会高级领导人征求有

关更换副总统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一致的。福特同意副总统提名，并告诉他的妻子，副总统将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很好的句号”。

福特于10月12日被提名担任阿格纽的职务，这是第25修正案的副总统空缺条款首次得到执行。美国参议院于11月27日以92票对3票同意福特的任命。1973年12月6日，众议院以387票对35票同意任命。在众议院确认投票后，福特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

在水门事件展开的期间，福特成为副总统。1974年8月1日星期四，幕僚长亚历山大·海格联系福特，告诉他要为总统作准备。

当时，福特和他的妻子贝蒂住在弗吉尼亚州郊区，等待他们搬进华盛顿新任命的副总统官邸。然而，“海格要求过来见我”，福特后来说，“告诉我，将有一个新的磁带在周一发布，他说，那里的证据是毁灭性的，可能会有弹劾或辞职。他说，我只是警告你，你必须做好准备，事情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你可以成为总统。我对妻子说，‘贝蒂，我不认为我们会住在副总统的官邸里。’”

总统任期（1974-1977年）

宣誓就职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职时，福特自动就任总统。这使得他成为唯一一位没有被选举团投票选入总统或副总统职位的人。福特在白宫东厅宣誓就职后，立即向聚集的听众发表讲话，向全国直播。福特注意到他立场的特殊性：“我敏锐地意识到，你没有通过你们的选票选举我为你们的总统，所以我请你用你们的祈祷来确认我为你们的总统。”

他接着说：

“我没有寻求这种巨大的责任，但我不会推卸责任。提名和确认我为副总统的人曾是我的朋友们，现在也仍然是我的朋友们。他们是两党成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并以他们的名义根据《宪法》行事。我只能向他们和你们保证，我将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

他还说：

“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漫长的全国噩梦结束了。我们的宪法有效：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一个被法律统治的政府，而不是个别人专权的政府。在这里，人民统治。但有一个更高的全能者，他不仅有正义，而且有爱，不仅是正义，还有怜悯。... 让我们恢复我们政治进程的黄金法则，让兄弟般的爱净化我们的怀疑和仇恨之心。”

8月20日，福特提名前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他刚刚辞去的副总统一职。洛克菲勒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乔治·布什。洛克菲勒在国会接受了长时间的听证会，当被揭露他向亨利·基辛格等高级助手赠送了大量礼物时，这造成了尴尬。尽管保守的共和党人对洛克菲勒被选中并不满意，但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投票支持对他的提名；他的提名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有些人，包括巴里·戈德沃特，投了反对票。

赦免尼克松

1974年9月8日，福特发布第4311号公告，给予尼克松全面无条件赦免，使他在总统任期期间可能对美国犯下的任何罪行免于受到起诉。在向全国播出的电视广播中，福特解释说，他觉得赦免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尼克松的情况“是一个悲剧，在其中我们都有一定责任。它可以继续，或有人必须为它打上句号。我已经得出结论，只有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可以，我必须这样做。”

福特赦免尼克松的决定极具争议性。批评人士嘲笑此举，称两人之间达成了“腐败协议”。他们说福特的赦免是为了换取尼克松的辞职，这使福特升任总统。福特的第一位新闻秘书和密友杰拉德·特霍斯特在赦免后辞去了职务以示抗议。据鲍勃·伍德沃德说，尼克松的幕僚长亚历山大·海格向福特建议了赦免协议。后来，福特决定赦免尼克松，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和尼克松的友谊。不管怎样，历史学家认为这场争论是福特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福特对此表示同意。《纽约时报》在当时的一篇社论中说，对于尼克松的赦免是“极其不明智、分裂和不公正的行为”，一举摧毁了新总统的“作为一个有判断力、坦率和有能力的人的信誉”。1974年10月17日，福特在国会就赦免作证。他是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第一位在众议院作证的现任总统。

在赦免尼克松后的几个月里，福特经常拒绝提及尼克松总统的名字，在公开场合称他为“我的前任”或“前总统”。1974年，在一次加州之行中，白宫随行记者弗雷德·巴恩斯就赦免尼克松一事向福特追问，福特出人意料地坦率地回答道：“我就是不能让自己不去做这件事。”

1977年1月福特离开白宫后，他私下里为对尼克松的赦免辩护；在他的钱包里装了Burdick诉美国案的部分文本；191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指出，赦免表明他有罪，接受赦免等于承认这一罪行。2001年，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基金会授予福特“勇气——约翰·肯尼迪档案奖”，以表彰他对尼克松的赦免。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向福特颁奖时说，他最初反对赦免，但后来历史证明福特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征兵躲避者和逃兵

9月16日（尼克松被赦免后不久），福特发布了总统公告4313，对逃往加拿大等国的躲避征兵者和越南战争逃兵实行了有条件的大赦计划。大赦的条件是，要求那些重申效忠美国的人，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两年，或在军队服役不到两年的人服满两年兵役。越南时代躲避征兵者和军事逃兵返回方案设立了一个宽大处理委员会，审查记录，并建议接受总统赦免和改变军队退伍状况。卡特政府完全赦免了逃避征兵者。

管理

福特上任后继承了尼克松的内阁。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他取代了除国务卿基辛格和财政部长威廉·西蒙以外的所有成员。政治评论员称福特在1975年秋天戏剧性地改组内阁是“万圣节大屠杀”。福特任命的威廉·科尔曼（运输部长）是第二位在总统内阁中任职的黑人（仅次于罗伯特·韦弗），也是第一位在共和党政府中任命的黑人。

福特于1974年选定乔治·布什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办公室主任，1975年底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福特的第一任幕僚长是前国会议员和大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1975年，拉姆斯菲尔德被福特任命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防部长。福特选择了年轻的怀俄明州政治家理查德·切尼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新的幕僚长：切尼成为福特1976年总统竞选的竞选经理。

中期选举

197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是在水门事件之后和福特上任后不到三个月举行的。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将选民的不满转化为巨大的优势，从共和党手中夺走49个席位，使民主党在435个席位中的多数席位增加到291席。这比三分之二多数所需的数字（290）多一个，是推翻总统否决议案或提出宪法修正案所必需的数字。就连福特前可靠的共和党众议院席位（代表密歇根州相应的选区）也由民主党人理查德·范德·维恩赢得，后者击败了罗伯特·范德兰。在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在100个席位中占61席。

国内政策

通货膨胀

在福特执政期间，经济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问题。1974年9月30日，新总统为处理经济问题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根据行政命令设立经济政策委员会。1974年10月，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福特来到美国公众面前，要求他们“与通胀作战（简称WIN）”。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他敦促人们佩戴“WIN”徽章。当时，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对经济的主要威胁，这比失业率上升更严重：人们相信控制通货膨胀将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有必要控制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呼吁美国人减少消费和花钱。

1974年10月4日，福特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作为这次演讲的一部分，他启动了“WIN”运动。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向国会介绍对公司和富人增加一年、5%的所得税。该计划还将从预算中拿出44亿美元，使联邦支出低于3000亿美元。当时，通货膨胀率超过12%。

预算

福特当总统后，联邦预算每年都出现赤字。尽管福特对该计划最终如何在公共预算紧张的时代获得资金持保留态度，但他还是签署了1975年《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该法案在美国各地建立了针对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机构。根据白宫为该法案签署的官方新闻稿，福特表示“强烈支持为我们的残

疾儿童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

随着美国陷入40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焦点开始发生变化。福特政府的重点转向阻止失业率上升，1975年5月失业率达到9%。1975年1月，福特提议减税1年160亿美元，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削减开支以避免通货膨胀。福特因迅速从主张增税转向减税而受到严厉批评。在国会，减税提案的减税额增加到228亿美元，而且没有削减开支。1975年3月，国会通过该法案，福特签署成为法律，这些所得税退税作为1975年减税法案的一部分。这导致1975财政年度联邦赤字约为530亿美元，1976财政年度为737亿美元。

1975年纽约市面临破产时，市长亚伯拉罕·比姆未能获得福特总统关于联邦救助的资金支持。这一事件促使《纽约每日新闻》刊出一份著名标题的文章“福特对纽约说：死吧”，指的是“福特断然宣布。。。。。。他将否决任何要求‘联邦政府对纽约市纾困’的法案。”

猪流感

福特面临着潜在的猪流感大流行。在20世纪70年代初，甲型H1N1流感病毒株从主要影响猪的流感转变为一种传染人的流感。1976年2月5日，迪克斯堡一名新兵神秘死亡，4名战友住院：卫生官员宣布，“猪流感”是病因。不久之后，福特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敦促美国的每一个人接种疫苗。虽然疫苗接种计划受到延误和公共关系问题的困扰，但到1976年12月取消该方案

时，约有25%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其他国内问题

福特是《平等权利修正案》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1975年发布第4383号总统公告：

“在这个自由之国，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应该是正确的，而且从本质上讲应该是。因此，现在，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提醒所有美国人，批准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是恰当和公正的，为了确保所有男女的法律平等，特此指定并宣布1975年8月26日为妇女平等日。”

外交政策

福特继续缓和与苏联和中国的政策，缓解了冷战的紧张局势。尼克松政府时代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仍然得到执行。1975年12月福特的对华访问，使尼克松访华时带来的解冻关系得到加强。行政当局于1975年与苏联签订《赫尔辛基协定》，建立了赫尔辛基观察组织框架，这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旨在监测关于协议的遵守情况，后来演变为人权观察。

福特于1975年出席了七国集团（G7）工业化国家（最初是G5）的成立大

会，并使加拿大获得了成员国资格。福特支持通过国际合作以解决问题。他在197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解决共同的经济问题。”

中东

在中东和地中海东部，两个国际争端发展成危机。1974年7月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争端演变成一场危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联盟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压力。8月中旬，希腊政府从北约军事结构中撤出；9月中旬，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停止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福特担心这会对土美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以及北约东线的安全形势恶化，所以否决了这项法案。第二项法案随后被国会通过，福特也否决了该法案，尽管同意援助只提供到年底之前。正如福特所料，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在1978年之前受到很大破坏。

在持续的阿以冲突中，基辛格的穿梭外交进展甚微。1975年3月初基辛格飞往以色列的飞机在最后一刻发生逆转；福特向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发出电报，其中包括：

“我要对以色列在谈判过程中的态度表示深深的失望。..... 谈判的失败将对该区域和我们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已指示重新评估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包括我们与以色列的关系，以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 受到保护。我们将通知您我们的决定。”

3月24日，福特向国会两党领导人通报了对中东政策的重新评估。实际上，“重新评估”意味着取消或暂停对以色列的进一步援助。1975年3月至9月的六个月中，美国拒绝与以色列缔结任何新的武器协定。拉宾指出，这是“预示着美以关系最糟糕的时期之一”。福特将次年夏天描述为美以“神经战”或“意志测试”。经过大量讨价还价，西奈临时协议于9月1日正式签署，援助恢复。

越南

福特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应对持续的越南战争。美国对北越的进攻行动以1973年1月27日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而告终。协议宣布南北双方停火，并要求释放美国战俘。该协议保障了越南的领土完整，并同1954年日内瓦会议一样，呼吁在北方和南方举行全国选举。《巴黎和平协定》规定美军全部撤离的期限为60天。

这些协议是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和北越政治局委员Đức Thọ谈判达成的。南越总统范蒂欧没有参与最后谈判，并公开批评拟议中的协议。然而，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迫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向南越施压，要求他们也签署协议，并允许美军撤离。尼克松在给南越总统的多封信中承诺，如果北越违反协议，美国将捍卫南越政府。

1974年12月，福特上台几个月后，北越军队入侵了普奥克隆省。北越Trần・冯・特雷将军试图在继续入侵之前，评估南越或美国对入侵的任何

反应，并解决后勤问题。

随着北越军队的推进，福特要求国会批准一项7.22亿美元的南越援助计划，这是尼克松政府承诺的。但国会以较大票数否决了这项提案。南越Thieu总统于1975年4月21日辞职，公开指责美国对该国的垮台局面缺乏支持。两天后，4月23日，福特在杜兰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宣布越南战争“就美国而言”已经结束。演讲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频繁的风”行动中，1373名美国公民和5595名越南和第三国国民从南越首都西贡撤离。在这次行动中，1975年4月29日至30日，即西贡沦陷前的大约24小时内，美国军用直升机和美航直升机将撤离人员带到近海的美军海军舰艇。在行动中，许多南越直升机降落在运送撤离人员的船只上，一些直升机被推下船，为更多的人腾出空间。其他直升飞机，由于甲板已经无处可降落，于是在靠近船只的海面抛下乘客后，故意坠入海中，他们的飞行员在最后一刻被救援船救起。

根据《印度支那移民和难民援助法》，许多越南撤离者获准进入美国。1975年《法案》拨款4.55亿美元，用于协助印度支那难民的安置。1975年，共有130000名越南难民来到美国。在随后的几年里，又有成千上万人逃到美国。

东帝汶

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于1975年宣布独立。印尼总统苏哈托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坚定盟友。1975年12月，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会见福特和亨利·基辛格时讨论了入侵东帝汶的计划。福特和基辛格都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反对印尼吞并东帝汶的提议。据本·基尔南说，1975年至1981年，入侵和占领导致近四分之一的帝汶人死亡。

马亚格斯和板门店

北越战胜南越导致亚洲政治风向发生重大转变，福特政府官员担心美国将因此失去在东亚影响力。福特政府两次证明，它愿意对该地区利益的挑战作出有力回应，一次是红色高棉部队在国际水域扣押了一艘美国船只，另一次是美军军官在朝鲜和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DMZ）中丧生。

第一次危机是马亚格斯事件。1975年5月，在西贡沦陷和红色高棉征服柬埔寨后不久，柬埔寨人在国际水域扣押了美国商船马亚格斯号。福特派遣海军陆战队营救船员，但海军陆战队降落在错误的岛屿上，并遇到了意外的顽强抵抗；此时在美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马亚格斯号船的水手已经被释放。在这次行动中，两架载有海军陆战队参加攻击行动的军用运输直升机被击落，41名美国军人被打死，50名美国军人受伤，约60名红色高棉士兵被打死。尽管美国输了战斗，但这次行动在美国被认为是成功的，福特在此次军事战斗后的支持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行动中阵亡的美国人成为最后一批在华盛顿特区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墙上刻上他们的名字的人。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福特政府认为有必要对这一事件做出有力回应，因为这被解释为苏联的阴谋。但安德鲁·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在2009年发表的一份基于对政府内部讨论的分析的研究表明，福特的国家安全团队明白，扣押这艘船是当地高棉政府的一个不成熟的、甚至可能是偶然的挑衅行为。然而，他们觉得有必要作出有力反应，以阻止亚洲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进一步挑衅。

第二次危机，被称为斧头谋杀事件，发生在朝鲜半岛板门店地区的一个村庄，位于韩朝之间的非军事区内。受美国在越南困境的鼓舞下，朝鲜一直在发动一场外交压力和轻微的军事骚扰运动，试图逼迫美国从韩国撤军。1976年8月，当两名美国军官在板门店联合安全区内砍伐一棵树时，朝鲜军队打死了他们，并打伤韩国警卫。这次袭击恰逢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之子金正日在会上将这一事件作为美国侵略的一个例子，以确保一项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的动议获得通过。

在白宫行政会议上，基辛格表示担心，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挑衅不做出回应，他们将把美国视为“西贡的纸老虎”，福特同意这一评估。在考虑了各种选择后，福特政府决定有必要以重大武力来回应。大批地面部队去砍伐那棵树，同时部署了空军，其中包括在板门店上空飞行的B-52轰炸机。朝鲜政府退让，允许砍树，后来发表了史无前例的官方道歉。

暗杀企图

福特在总统任期内曾两次遭到暗杀。1975年9月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查尔斯·曼森的追随者勒奈特·奥姆姆用一把科尔特.45口径手枪指着福特，准备扣动扳机。特勤局特工拉里·本多夫立刻上前抓住她的枪；弗劳姆被拘留。她后来被判犯有企图暗杀总统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她于2009年8月14日服刑34年后，获得假释。

作为对这次暗杀企图的反应，特勤局开始让福特与人群保持更安全的距离，这一策略可能在17天后挽救了他的生命。当他离开旧金山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酒店时，萨拉·简·摩尔站在街对面的围观人群中，用一把.38口径的左轮手枪朝他开枪。射击偏过了福特几英尺。在她发射第二颗子弹之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奥利弗·西普尔抓住她的枪，偏转了她的射击方向；子弹击中了福特头部右侧约6英寸处的一堵墙，然后从墙上反射并击中一名出租车司机，使该司机受到轻伤。摩尔后来被判处终身监禁。她在服刑32年后于2007年12月31日获得假释。

司法任命

最高法院

1975年，福特任命约翰·保罗·史蒂文斯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接替即将退休的威廉·道格拉斯法官。史蒂文斯曾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福特在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期间，曾领导过弹劾道格拉斯的努力。史蒂文斯在得到参议院批准后，最终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站在

法院自由派一边，令一些保守派感到失望。然而，福特在2005年称赞史蒂文斯。福特在谈到史蒂文斯时说：“他为国家服务得很好，有尊严、有智慧、没有党派政治顾虑。”

其他司法任命

福特任命了11名美国上诉法院法官和美国地区法院的50名法官。

1976年总统选举

福特不情愿地同意在1976年竞选总统，但首先他不得不反击共和党提名的挑战。前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和该党的保守派指责福特未能在南越做更多的工作，未能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也没有对于巴拿马运河进行谈判。

（在卡特总统的领导下，运河谈判仍在继续，卡特总统最终签署了《托里霍斯-卡特条约》）。里根于1975年秋发起竞选活动，赢得了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印第安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众多党内初选，但未能获得多数代表席位：里根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退出了竞选。保守派的挑战确实导致福特放弃更自由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为自己的副总统人选，而选择了美国堪萨斯州参议员鲍勃多尔。

除了赦免争议和挥之不去的反共情绪，福特不得不反驳媒体的负面形象。雪佛兰通经常在周六晚间直播中故意做出跌跌撞撞的动作，模仿福特；福

特在任期内曾两次被看到跌倒。正如蔡斯所评论的，“他甚至在自己的自传中提到，在一段时间内，这种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

福特1976年的竞选活动得益于他在美国两百年纪念活动前举行的数次周年纪念活动。7月4日，华盛顿烟花汇演由总统主持，并在全美电视转播。1976年7月7日，总统和第一夫人在白宫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举行的国宴上担任主持人，该晚宴在公共广播服务网播出。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战役和康科德战役200周年纪念典礼上，福特有机会在康科德向11万人发表演讲，宣称需要强有力的国防，呼吁美国和那些“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人之间“和解，而不是相互指责”，以及“重建，而不是充满敌意”。福特在此前一天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讲话，谴责政府大官僚机构日益增长的趋势，并主张回归“美国基本美德”。

自1960年大选以来，总统辩论首次重新举行。因此，福特成为第一位参加此次辩论会议的现任总统。卡特后来将他在选举中的胜利归因于辩论，称这些辩论“让观众有理由认为吉米·卡特有实质政策可以提供”。

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辩论中，福特大错特错地说，“苏联并没有对东欧进行统治；在我的任期内，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的统治出现”。福特还表示，他“不相信波兰人认为自己被苏联统治”。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福特说，他打算暗示苏联永远不会粉碎东欧人寻求独立的精神。然而，福特的措辞是如此错误而尴尬，以至于提问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很明显不相信福特所说的话。

最终，卡特赢得了选举，获得了50.1%的民众选票和297张选举人票，而福特的得票率为48.0%和240选举人票。

卸任总统职位后（1977-2006年）

关于赦免尼克松的争议最终平息了。福特的继任者吉米·卡特在1977年的就职演说中赞扬了即将离任的总统，他说：“为了我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我的前任为治愈我们的土地所做的一切。”

离开白宫后，福特一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福特成功地与马文·戴维斯一起投资了石油，后者后来为福特的孩子们提供了收入。

他继续出席对国家具有历史和仪式意义的活动，如总统就职典礼和追悼会。1977年1月，他成为费城艾森豪威尔研究基金会会长，1980年至1986年担任该研究金理事会主席。1977年晚些时候，他不情愿地同意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诺顿的采访。

1979年，福特出版了他的自传《治愈的时刻》（哈珀/读者文摘出版社，454页）。《外交事务》的一篇评论将其描述为“像作者一样，朴实无华。这是最近总统回忆录中最短、最诚实的，但是没有惊喜，没有对动机或事件的深入探究。”

在他的继任者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任职期间，福特每月都会收到卡特政府高级官员关于国际和国内问题的简报，每当他在华盛顿时，他总是被邀请在白宫共进午餐。

卡特卸任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催化剂是1981年他们一起参加安瓦尔·萨达特的葬礼。在福特去世之前，卡特和他的妻子罗莎琳经常去福特的家。福特和卡特于2001年担任全国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和2002年政府连续性委员会名誉共同主席。

福特与卡特总统、乔治·布什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一样，也是政府卓越委员会的名誉联合主席，该委员会致力于在政府绩效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为联邦高级雇员提供领导力培训。他还花了很多时间打高尔夫，经常和喜剧演员鲍勃·霍普（Bob Hope）一起参加私人和公共活动，霍普是他的老朋友。1977年至1996年，他在科罗拉多州维尔市主持了杰里·福特年度高尔夫球邀请赛。

1977年，福特在密歇根州阿尔比恩的阿尔比恩学院成立了杰拉尔德·福特公共政策研究所，为本科生提供公共政策培训。1981年4月，他在母校密歇根大学北校区安阿伯开设了杰拉尔德·福特图书馆，随后于9月在大急流城开设了杰拉尔德·福特博物馆。

福特在1980年放弃许多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机会，考虑竞选共和党提名，与卡特重新竞选总统。福特批评卡特与苏联的核武限制谈判工作进展不

畅，以及在中东和非洲的外交政策不够有效。福特还认为，更保守的罗纳德·里根将无法击败卡特，并将使得卡特能够进入第二个任期。福特受到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俄亥俄州的吉姆·罗兹和得克萨斯州的比尔·克莱门茨的鼓励，参加竞选。1980年3月15日，福特宣布放弃竞选共和党提名，并保证要支持共和党最终的提名人。

在1980年获得共和党提名后，罗纳德·里根认为他的前对手福特是潜在的副总统竞选伙伴，但里根和福特阵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谈判没有成功。福特将他的接受条件定在里根同意一个史无前例的“共同总统”上，赋予福特控制关键行政部门任命的权力（如基辛格担任国务卿和艾伦·格林斯潘担任财政部长）。在拒绝这些条件后，里根将副总统提名转而给了乔治·布什。福特确实出现在里根-布什竞选广告中，他在广告中宣称，美国将“更好地由里根总统服务，而不应是吉米·卡特的软弱和政治权宜之计的政策延续”。1980年10月8日，福特说前总统尼克松参加大选可能会对里根的竞选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我认为，如果尼克松先生在竞选期间留在幕后，那将会更有帮助。这将对罗纳德·里根更有利。”

在罗纳德·里根总统遇刺未遂后，福特在为托马斯·基恩举行的募捐会上对记者说，如果有人被武器打伤，使用枪支的罪犯应该被判处死刑。

1981年9月，福特在《早安美国》节目中建议里根不要屈服于华尔街的要求，并遵循自己的美国经济政策议程：“他不应该让华尔街的大师们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未来。在我看来，他们是错误的。” 1981年10月20日，福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停止里根政府的沙特武器计划可能会对美国在

中东的关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82年3月24日，福特对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表示赞同，同时指出，如果里根在华盛顿期间不愿意妥协，国会可能会陷入僵局。

福特于1982年创立了一年一度的AEI世界论坛，并作为杰出研究员加入美国企业研究所。1988年3月23日，他还被授予中央康涅狄格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984年1月，福特和卡特签署了一封信，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继续努力消除世界饥饿，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987年，福特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支持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前副检察长罗伯特·博克，此前博克被里根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博克的提名以58票对42票被否决。

1987年，福特的《幽默与总统》出版，这是一本幽默的政治趣闻书。

到1988年，福特成为包括商业信贷、新药业、铂尔曼公司、特索罗石油公司和老虎国际公司在内的多个公司董事会成员，福特也成为花旗集团的名誉董事，直到他去世。

1990年10月，福特与鲍勃·霍普一起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纪念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诞辰一百周年。

1991年4月，福特与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一起支持布雷迪法案。三年后，他与卡特和里根一起写信给美国众议院，支持禁止高能攻击性武器。

在1992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福特将选举周期比作1976年输给卡特，并敦促人们注意共和党国会的选举：“如果11月3日你想改变，我的朋友们，开始的地方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美国国会大厦。国会，每个学童都知道，有钱包的力量。近40年来，民主党多数派一直坚持其新政公式，包括税收、税收、支出、支出、选举、选举。”共和党稍后将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国会参众两院。

1997年11月6日，福特与比尔·克林顿总统、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吉米·卡特一起登台献艺，出席在得克萨斯A&M大学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举行的活动。

1997年4月，福特与比尔·克林顿总统、前总统布什和南希·里根一起签署了《承诺峰会宣言》，倡导公民个人参与解决美国国内问题。

1998年1月20日，福特在棕榈泉的家中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共和党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变得极端保守，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将会失败：“如果我们在政治光谱的强硬右派上越走越远，我们就不会选出共和党总统。我担心党会走这一极端保守的路线。我们应该向民主党学习：当他们的超自由派候选人试图在党内进行初选时，那些人没有获胜。”

2004年11月22日，纽约州共和党州长乔治·帕塔基任命福特和其他在世前总统（卡特、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为重建世贸中心董事会的名誉成员。

健康问题

1990年4月4日，福特被送进艾森豪威尔医疗中心接受手术，以替换他的左膝，骨科医生罗伯特·墨菲博士说：“福特的整个左膝被人工关节所取代，包括相邻股骨或大腿骨、头骨或腿骨的部分。”

福特在200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遭受了两次轻微中风，但在住进哈尼曼大学医院后很快康复。2006年1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兰乔幻影的住所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医疗中心度过了11天，治疗肺炎。2006年4月23日，时任总统的乔治·布什在福特的兰乔幻影的家中拜访了他一个多小时。这是福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并拍摄了最后一张已知的公开照片、录像和录音。

2006年7月，福特在科罗拉多州维尔度假时，因呼吸急促住院两天。8月15日，他被送往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梅奥诊所的圣玛丽医院接受检查和评估。8月21日，据报道，他已安装起搏器。8月25日，他在梅奥诊所接受了血管成形术。8月28日，福特出院，与妻子贝蒂一起回到了加州的家中。10月13日，他原计划参加密歇根大学杰拉尔德·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新建筑的剪彩仪式，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在医生的建议下，他没有参加。前一天，福特进入艾森豪威尔医疗中心进行未公开的检查：他于10月16日出院。到2006年11月，他多数时间待在书房内的一张床上。

死亡和遗产

福特于2006年12月26日在加州兰乔幻影的家中死于动脉硬化性脑血管疾病和弥漫性动脉硬化。他患有末期冠状动脉疾病和严重的主动脉狭窄和不足，这是由他的一个心脏瓣膜的钙化改变引起的。在他去世时，福特是寿命最长的美国总统，他活了93年零165天（比罗纳德·里根长45天，超越了里根的记录）。他在哈里·杜鲁门总统逝世34周年之际去世；他是沃伦委员会最后在世的成员。

2006年12月30日，福特成为第11位在美国国会大厦国葬的美国总统。2007年1月2日星期二，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国葬和追悼会。随后，他被安葬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总统博物馆外的墓地。

在国会山的福特总统雕像下，镌刻着一段话，是引自在福特总统任期结束

时、曾经担任众议院议长的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在福特国葬仪式中的、一段纪念福特总统的悼词：“上帝对美国很好，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内战时，他给了我们亚伯拉罕·林肯。在水门事件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杰拉尔德·福特——一个在正确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国家重新团结起来的合适人选”。

在那个福特总统雕像的右边，镌刻着的是福特宣誓就职时所说的话：“我们的宪法是有效的。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一个被法律所统治的政府，而不是被个别人专权所统治的政府。在这里，人民统治。”

福特的妻子贝蒂·福特于2011年7月8日去世。

公众形象

福特是唯一一位没有被民选为总统或副总统的总统。福特选择履行斯皮罗·阿格纽所辞去的前副总统一职是基于福特的开放和诚实的声誉。“在众议院任职的这些年里，我从来不知道福特先生发表过不诚实的声明，也从来不知道他的说法是部分真实和部分虚假的。他从来没有试图掩盖一个声明，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出一个不友善的话”——玛莎格里菲斯说。

他赦免尼克松，迅速严重玷污了美国公众对他的信任。然而，许多人事后承认，他相当有尊严地履行了他没有寻求的重大职责。

尽管福特有着良好的运动成绩和非凡的事业成就，他却以笨拙、讨人喜欢、头脑朴素而著称。1975年，他在奥地利走出空军一号时绊倒，雪佛兰（Chevy Chase）多次在电视秀中模仿和嘲弄他，巩固了福特作为“笨拙的人”的形象。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immy_Carter

吉米·卡特

小詹姆斯·厄尔·卡特（生于1924年10月1日）是美国前政治家、商人和慈善家，1977年至1981年担任美国第39任总统。作为民主党成员，他曾于1963年至1967年担任佐治亚州参议员，1971年至1975年担任佐治亚州第76任州长。自卸任总统以来，卡特一直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和社会项目。2002年，他因共同创立卡特中心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在佐治亚州平原长大，194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加入美国海军，在潜艇上服役。1953年父亲去世后，卡特离开了他的海军生涯，回到佐治亚州，开始他家族的花生种植业务。卡特继承的产业相对较少，因为他父亲有一些债务，并在孩子们之间分割了遗产。尽管如此，他扩大和发展卡特家族花生业务的雄心壮志还是实现了。在此期间，卡特反对具有种族隔离倾向的政治文化，并支持日益壮大的民权运动。他成为民主党内的积极分子。1963年至1967年，卡特在佐治亚州参议院任职，1970年，他当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在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州长卡尔·桑德斯（Carl Sanders）。卡特一直担任州长直到1975年。在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中，尽管卡特是一位黑马候选人，在竞选开始时在佐治亚州以外鲜为人知，但卡特还是赢得了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大选中，卡特以局外人的身份参选，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现任共和党总统杰拉尔德·福特。

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卡特通过发布公告4483赦免了所有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征兵的人士。在卡特担任总统期间，设立了两个新的内阁级部门，即能源

部和教育部。他制定了包括节约、价格控制和新技术在内的国家能源政策。在外交事务方面，卡特签署和执行了戴维营协定、巴拿马运河条约、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I），以及将巴拿马运河区归还巴拿马。在经济方面，他面临着滞胀、高通胀、高失业率和缓慢增长的持续组合。1979-1981年伊朗人质危机、1979年能源危机、三里岛核事故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标志着他总统任期的结束。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回应，卡特在结束美苏缓和后升级了冷战，对苏联实行了粮食禁运，阐明了卡特政府立场，并领导了对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抵制。1980年，卡特在初选中面临参议员泰德·肯尼迪的挑战，但他在1980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赢得了提名。卡特在全国大选中以巨大差距输给了共和党提名人罗纳德·里根。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任期满、从未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总统。卡特卸任后的活动比他的总统任期本身更受青睐。

1982年，卡特成立了卡特中心，以促进和扩大人权。他广泛出访，开展和平谈判，监督选举，推进发展中国家疾病预防和根除工作。卡特被认为是慈善组织“人类栖息地”的关键人物。他写了30多本书，从政治回忆录到诗歌，同时继续积极评论美国和全球事务，如巴以冲突。至2020年，他已经96岁；退休40年，他既是现存年龄最大的前总统，也是总统职位卸任后退休时间最长的总统。

=====

小詹姆斯·厄尔·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佐治亚州普兰斯的智者疗养院

（现为莉莉安·卡特护理中心），母亲受雇于该医院、担任注册护士。卡特是第一位在医院出生的美国总统。他是贝茜·莉莉安（Née Gordy）的长子；他的父亲詹姆斯·厄尔·卡特先生是英国移民托马斯·卡特的后裔；托马斯·卡特于1635年定居在弗吉尼亚州。托马斯·卡特的许多代后裔都是生活在佐治亚州的棉农。卡特也是康奈尔大学创始人托马斯·康奈尔的后裔，与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盖茨有着遥远的亲戚关系。

在卡特出生时，普兰斯是一个拥有600人的繁荣小镇。卡特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当地商人，经营着一家综合商店，是农田的投资者。卡特的父亲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营长团的预备役少尉。

小卡特婴儿时期，全家人搬了好几次家。卡特一家定居在附近的射箭场的一条土路上，那里几乎全是贫穷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他们最终又生了三个孩子：格洛丽亚、露丝和比利。卡特和他的父母相处得很好，尽管他的母亲工作时间很长，孩子们童年时她经常不在身边。虽然父亲厄尔坚决支持种族隔离，但他允许他的儿子与黑人农夫的孩子交朋友。卡特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少年，他得到了自己一英亩的厄尔农田，在那里他种植，包装和出售花生。他把他购买的一些住房用来出租。

教育

卡特于1937年至1941年就读于普兰斯高中。那时，家乡普兰斯已经因大萧条而陷入贫困，但这个家庭受益于新政农业补贴，父亲厄尔担任了社区领

袖。年轻的吉米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喜欢读书。卡特的老师朱莉娅·科尔曼的影响特别大。十几岁时，卡特在普兰斯高中篮球队打球；他还加入了“美国未来农民协会”，并发展了对木工的终身兴趣。

海军生涯

卡特早就梦想着进入美国海军学院。1941年，他开始在佐治亚州附近的阿梅里库斯、佐治亚西南学院修读工程本科课程。第二年，他转到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并于1943年考入海军学院。他是个好学生，但被认为保守而安静，这与学院对新生咄咄逼人的激励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在学院期间，卡特爱上了罗莎琳·史密斯，他姐姐露丝的朋友。两人于1946年毕业后不久结婚。他是海军中尉的短跑运动员。卡特在1946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820名中级士官中，获得第60名的优异成绩，并被委托担任教职。从1946年至1953年，卡特和罗莎琳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舰队服役期间住在弗吉尼亚州、夏威夷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1948年，他开始接受潜艇值班军官培训，并在庞弗雷特号上服役。1949年，他被提升为中尉。1951年，他加入柴油/电动的K-1号（又名梭子鱼号）军舰，有资格担任指挥职务，并担任过包括执行官在内的多项职务。

1952年，卡特开始与海军刚刚起步的核潜艇计划建立联系，然后由海曼·里科弗上尉领导。里科弗对他的手下和机器的要求非常精益求精；卡特后来说，除了自己的父母，里科弗对他产生了一生中最大的影响。他被送到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原子能委员会海军核反应堆管理处，临时工作三个月；而罗莎琳则带着孩子搬到了纽约的舍内塔迪。1952年12月12日，加拿

大查克河实验室的实验性NRX反应堆发生事故，导致部分熔毁，数百万升放射性水涌入反应堆大楼的地下室。这让反应堆的核心被毁了。卡特奉命前往查克河，带领一个美国维修人员与其他美国和加拿大服务人员一起协助关闭反应堆。艰苦的过程要求每个团队成员穿上防护装备，每次单独地下到反应堆中进行几分钟作业；在拆解残废反应堆的同时，尽量避免接触放射性物质。卡特在总统任期内和总统任期后说，他在查克河的经历塑造了他对原子能的想法，并导致他停止研制中子炸弹。

1953年3月，卡特入读了核电课程，这是一所为期六个月的非学分课程，内容涉及舍内塔迪联合学院的核电站运行。他的意图是最终在“海狼”号上工作；该潜艇计划成为美国第二艘核潜艇。然而，他从来没有机会在核潜艇上服役。卡特的父亲在海狼建造开始前两个月去世，卡特申请退役并获得了批准，使他能够回乡接管家族花生生意。但是，基于这种有限的训练，在以后的岁月里，卡特仍然称自己为“核物理学家”。决定离开舍内塔迪被证明是困难的。罗莎琳在搬迁了这么多之后安顿下来，对生活越来越适应了。她后来说，回到普兰斯的小镇生活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倒退”。另一方面，卡特感到受到军队僵化的限制，渴望走一条更像他父亲的道路。卡特于1953年10月9日离开现役。他在不活跃的海军预备队服役到1961年，并以中尉的军衔离开海军预备役。他曾经获得的奖项包括美国战役勋章、二战胜利勋章、中国服务勋章和国防服役勋章。作为一名潜艇军官，他还获得了“海豚”徽章。

农业

父亲厄尔卡特在去世前是一个相对富有的人，并且刚刚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然而，在清理债务和将财富分配于继承人之间以后，他的儿子吉米继承的产业相对较少。一年来，吉米、罗莎琳和他们的三个儿子住在普兰斯的公共住房里；卡特是上任前唯一一位住在补贴住房里的美国总统。卡特精通科技，他开始拓展家族的花生种植业务。从海军到农业综合企业的过渡是困难的；他的第一年收成因干旱而失败：卡特被迫从银行信贷，以维持农场的运转。同时，他还上课和阅读农业知识，而罗莎琳则学习会计来管理企业的账簿。虽然他们在第一年几乎破产，但卡特一家很快发展起业务，并变得相当成功。

早期政治生涯（1963-1971）

佐治亚州参议员（1963-1967）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作出反种族隔离的裁决，加剧了普兰斯地区的种族紧张关系。卡特赞成种族宽容和种族融合（有一次，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抵制他的花生仓库，因为他拒绝加入他们），但他经常尽量避免表达这些想法，以避免制造敌人（在佐治亚州，很多白人都对黑人持有歧视态度）。到1961年，他是社区和浸信会的杰出成员，也是萨姆特县学校董事会主席，在那里他开始大声疾呼，支持学校内的种族融合。1962年佐治亚州县单位制度解散后，州参议院席位被开放；卡特在选举前15天宣布竞选该席位。罗莎琳对政治和组织有本能，她的辅选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初步结果显示卡特输了，但这是基特曼县民主党主席乔·赫斯特在基特曼县县长的帮助下策划的欺诈性投票的结果。卡特对结

果提出质疑；当欺诈被证实时，举行了新的选举，卡特赢得了选举。

卡特上任后，民权运动正在顺利进行。他和他的家人已经成为约翰·肯尼迪的坚定支持者。从1962年开始，阿梅里库斯镇是大规模殴打和监禁黑人抗议者的场所，与全国各地的类似骚乱相呼应。卡特起初在这个问题上相对保持沉默（尽管此事使该县大部分地区两极分化），以避免疏远他的那些倾向于认同种族隔离的同事。他确实就一些分裂性问题直言不讳，发表演讲反对选举过程中的识字测试（这会给黑人参加选举造成障碍），反对修改《佐治亚州宪法》；他认为，这暗示了对宗教信仰实践的强迫。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卡特被一位顾客告知了这个噩耗；当时卡特难过地离开工作岗位，独自一人呆了很长时间。卡特后来称这次暗杀是“我在父亲去世后所遭受的最大打击”。

卡特是一位勤奋的立法者，他参加了速读培训课程，以跟上工作量（工作中需要快速阅读大量文字材料）。在两年内，他的关系使他进入州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那里他帮助改写了该州民主党的规则。他成为佐治亚州中西部规划和发展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监督联邦和州拨款用于历史遗迹修复等项目的拨款。

1964年11月，当博·卡拉威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时，卡特立即开始计划推翻他、与他在下界选举时竞选。此前，两人曾就国家将两年制大学扩大到四年制大学计划发生冲突：卡特希望资金去他的母校，佐治亚西南学院，但卡拉威希望资金去哥伦布市中心。卡特认为卡拉威本是民主党人，最近转投共和党，是代表了他从政以来所鄙视的那种继承财富者以及自私

自利者。

卡特于1964年再次当选州参议员，连任两年。在州参议院任职一段时间后，他主持了该院的教育委员会；在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时，他还参加了拨款委员会。在任期结束前，他为一项扩大全州教育经费的法案做出了贡献，并让佐治亚州西南部地区获得一项为期四年的项目。他利用自己的地区规划工作，在地区周围发表演讲，让自己更引起潜在选民的注意。在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宣布竞选国会议员。

1966年和1970年竞选州长

1966年佐治亚第三届国会选区的竞选情势在5月中旬被改变，因为当时的现任议员博·卡拉威宣布退出下届联邦众议员竞选，而决定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卡拉威在1964年刚刚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尽管他是自1876年以来第一位竞选佐治亚州州长的共和党人，但他是一位非常强有力的候选人。州民主党对失去南北战争后重建时代以来一直掌控的州长职位的前景感到恐慌。卡特决定亲自竞选州长。在民主党初选中，他与自由派前州长埃利斯·阿纳尔和保守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莱斯特·马多克斯对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形容他的意识形态是“保守、温和、自由和中间道路。...我相信我是一个比这更复杂的人”。他输掉了民主党初选，但作为除了民主党提名人（马多克斯）与共和党提名人（卡拉威）之外的第三位候选人，他获得了足够的联署票，迫使阿纳尔与马多克斯一起参加决选。马多克斯在民主党州长提名的决选投票中以微弱优势战胜阿纳尔。在最终选举中，卡拉威继续赢得多数票，但未能获得50%的多数票，州规定佐治亚州众议院

（民主党占多数）有权选举马多克斯为州长。这个选举结果对卡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负债累累。他试图从卡拉威手中夺回竞选权，结果导致种族隔离主义者马多克斯（Maddox）意外地当选，他认为这个选举结果更糟。

卡特回到他的农业事业，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精心策划了他1970年的下一次州长竞选。这一时期是卡特的精神转折点：他变得越来越福音派，在其他州承担了几个宗教信仰任务。受到他的妹妹露丝和自由派神学家如赖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启发，他宣称自己重生，这是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日益壮大的运动。他的最后一个孩子艾米在这段时间出生，1967年10月19日。

根据佐治亚州宪法，马多克斯州长被禁止寻求连任州长，因此自由派前州长卡尔·桑德斯成为卡特在1970年民主党初选中的主要对手。卡特这次采用印刷图形和统计分析，开展了一场更现代的竞选活动。在回应民调数据时，卡特比以前更加保守。他将自己定位为民众主义者，很快对桑德斯的财富（给他贴上“卡夫林克斯·卡尔”的标签）持否定态度，并将他与国家民主党联系在一起。他指责桑德斯腐败，但当媒体逼迫追问时，他无法拿出任何证据。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卡特既寻求黑人选票，也寻求“华莱士选票”（即，那些认同华莱士政治主张的选民们；乔治·华莱士是阿拉巴马州著名的认同种族隔离主义的政治人物）。虽然卡特会见了黑人人物，如马丁路德金先生和安德鲁杨，并参观了许多黑人拥有的企业，但他还称赞华莱士，并承

诺邀请华莱士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有时，卡特暗示支持私立学校，有时则表示不喜欢私立学校；这取决于他演讲时的听众是谁。随着时间的推移，卡特对种族主义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卡特的高级竞选助手分发了一张他的对手桑德斯与黑人篮球运动员一起庆祝的照片。

同年9月，卡特在第一轮投票中以49%对38%领先桑德斯，导致决选。随后的竞选活动变得更加激烈：尽管卡特早期支持民权，但他的竞选团队批评桑德斯支持小马丁·路德·金。卡特以60%的得票率赢得了决选，赢得了7%的黑人选票，并轻松战胜了当地新闻主播、共和党人哈尔·苏特，赢得了大选。当选后，卡特改变了语气，开始反对佐治亚的种族主义政治。黑人州参议员勒罗伊·约翰逊表达了他对卡特的支持，他说：“我理解他为什么参加这种极端保守的竞选活动。... 我不相信你可以赢得这个选举状态，而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佐治亚州州长（1971-1975）

卡特于1971年1月12日宣誓就任佐治亚第76任州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 任何穷人、农村人、弱者或黑人都不应承担被剥夺受教育、工作或简单司法机会”。据报道，群众对这一信息感到震惊，这与佐治亚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卡特的竞选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在竞选期间支持卡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感到被背叛了。《时代》杂志在1971年5月的一期中报道了当年一些当选的进步的“新南方”州长的故事，封面上插图是卡特。

卡特的前任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成为副州长。两人在其四年的服务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经常公开争吵。时任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的小理查德·罗素在卡特上任后第二周去世：新上任的州长任命州民主党主席大卫·甘布雷尔填补罗素在他去世后在参议院的任期。

卡特不愿参与政治反击和政治恩惠；州立法机构发现他很难于共事。他希望积极扩大州长的权力，同时降低州政府的复杂性。因此，他谈判了一项法案，允许他提出行政改组建议，并迫使对该法案进行表决。他在州内实行零预算制，并增加了一个司法遴选委员会，以核实州长任命的法官的资格。重组计划于1972年1月提交，但在立法机构中却受到冷遇。但经过两周的谈判，法案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午夜通过。最终他把大约300个机构合并为22个——这是他在州长竞选中强调的事实——尽管人们怀疑这样做可以节省总体成本。

在1971年4月3日的电视露面中，卡特被问及是否赞成要求佐治亚州州长和副州长候选人必须同票参选。他回答说：“我从没想过我们需要一位佐治亚州的副州长。副州长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一部分，我一直觉得——自从我在州参议院任职以来——行政部门应该是分开的”。卡特后来澄清说，他不会提出一项修正案来实施这样的限制。

1971年7月8日，卡特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露面时表示，他打算成立一个佐治亚州人权理事会，致力于在发生任何潜在的暴力之前解决该州内部的问题。

在1971年7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宣布命令各部门负责人在1972财政年度结束前削减开支，以防止出现5700万美元的赤字，并规定每个州务办公室都受到影响，并估计如果州务院继续充分利用拨款，政府赤字将减少。

1972年1月13日，卡特要求州议会为幼儿发展计划以及监狱改革计划提供资金，并为几乎所有州雇员支付共计4800万美元的税款。

1972年3月1日，卡特表示，如果司法部选择拒绝参众两院的任何再分配计划，州议会特别会议就有可能举行。4月20日，卡特发出呼吁，要求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关于三人法官联邦小组就四项司法改革措施执行情况，并提供建议。

1972年4月，卡特前往拉丁美洲和南美洲，与佐治亚达成潜在的贸易协议。卡特说，他会见了巴西总统埃米利奥·加拉斯塔祖·梅迪奇，有些人把他比作已故的肯尼迪总统。

民权是卡特由衷的优先事项。他扩大了黑人政府雇员、法官和理事会成员的数量。他聘请了黑人妇女丽塔·杰克逊·塞缪尔，就可能的任命向他提供建议。他把马丁·路德·金和另外两位著名的佐治亚黑人的肖像放在首都大楼里，尽管Ku Klux Klan（三K党）在揭幕仪式上捣乱。尽管如此，卡特还是试图让他的保守派盟友感到舒适。1973年1月31日，卡特在与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阿斯丘（Reubin Askew）的电视联合露面中表示，他赞成

一项宪法修正案，禁止校车计划（该计划的内容是，用校车运送学生，使得不同种族聚居区的儿童去一些不同的学区上学，从而进行强制性的种族融合）。在卡特主持的1971年全国州长会议上，他与乔治·华莱士共同提出了一项反校车计划的决议。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富尔曼诉佐治亚州案（1972年）中废除了佐治亚的死刑法规之后，卡特签署了一项修订后的死刑法规，处理了最高法院的反对意见，从而事实上在该州重新引入了这种做法。卡特后来后悔支持死刑法规，他说，“我没有看到它的不公正，但我现在明白了。”

卡特通过立法机构推动改革，为佐治亚州富裕和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平等的政府援助，为智障儿童建立社区中心，并增加罪犯教育计划。他为任命法官和州政府官员的计划感到自豪。根据这项计划，所有这些任命都是基于业绩，而不是政治影响力。

在他一项更具争议性的决定中，他否决了在佐治亚州弗林特河上修建水坝的计划。在勘察了河流和文献后，他辩称，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低估了该项目的成本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此项否决的决定赢得了全国环保人士的关注。

国家雄心

根据佐治亚州宪法，卡特没有资格竞选连任州长。考虑到潜在的美国总统竞选，卡特参与了更多的国家政治和公众露面活动。他被提名为南方几个

计划委员会的成员，是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自由派的美国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是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试图讨好保守派、反麦戈文的选民，以便大会以妥协的票数将他视为麦戈文的副总统竞选伙伴。他支持参议员亨利杰克逊，部分是为了远离乔治华莱士。卡特当时仍然相当没有声望；1972年的民主党票是麦戈文和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8月3日，卡特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会见了华莱士，讨论防止民主党在11月的选举中以压倒性差距落败。

1972年11月麦戈文失利后，卡特开始定期与他刚刚起步的竞选班子会面。他悄悄地决定开始准备参加1976年的总统竞选。他试图成为全国州长协会主席，以提高他的知名度，但没有成功。在大卫·洛克菲勒的赞同下，他于1973年4月被任命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第二年，他被任命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国会主席。1973年，他出现在游戏节目《我的台词是什么》中，一群名人小组成员会试图猜测他的职业。没有人认出他，在影评人吉恩·沙利特正确猜出他是州长之前，他不得不用了好几轮问答问题。1973年5月，卡特警告民主党不要将水门事件政治泛化，他把水门事件归咎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个人在决策中与美国人隔绝和保密。

1976年总统竞选

民主党初选

1974年12月12日，卡特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他

的演讲包含了关于国内不平等、乐观和变革的主题。

当卡特进入民主党总统初选时，他被认为很少有机会与全国知名的政治家对抗。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1976年1月26日，卡特在民主党选民中仅为4%人的第一选择。然而，“到1976年3月中旬，卡特不仅遥遥领先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其他积极竞争者，他还领先福特总统几个百分点，”舒普说。由于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在选民心目中仍然难忘，卡特作为局外人的地位，远离华盛顿，成为一种优良资产。他推动政府重组。卡特于1976年6月出版了书籍，以帮助向美国公众介绍自己。

卡特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获胜，成为领先者。他采用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南方，大多数人认同阿拉巴马州的乔治·华莱士，卡特以温和派最喜欢的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当华莱士被证明是一支败军时，卡特横扫了整个地区。在北方，卡特主要吸引保守的基督教和农村选民：他在大多数州赢得多数席位的机会微乎其微。他通过建立最大的单一集团赢得了几个北方州。卡特的战略涉及在另一位候选人扩大影响之前到达一个地区。他行程超过50,000英里（80,000公里），访问了37个州，并在任何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之前发表了200多篇演讲。卡特被证明是民主党最有效的国家战略，他赢得了提名。

正如劳伦斯·舒普在1980年出版的《卡特总统与超越》一书中指出的，全国新闻媒体发现并宣传卡特：

“卡特认为，他的对手没有接受和支持大众传播媒体的精英阶层。正是他们对卡特及其竞选活动的有利报道使他拥有了优势，使他在民意测验中名列

前茅。这帮助卡特赢得了关键的初选胜利，使他在短短的9个月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公众人物上升到当选总统。”

在1976年4月的总统竞选中，卡特回应了一位采访者，他说：“我并不反对一个正在..... 试图保持他们的社区的种族纯洁性。他的言论意在支持开放住房法，但具体表示反对政府“将黑人家庭注入白人社区，只是为了建立某种融合”。

卡特在竞选期间的明确立场包括为国会竞选活动提供公共资金，支持建立一个联邦消费者保护机构，设立一个单独的教育部，与苏联签署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和平条约，削减国防预算，一项税收提案，实施“对高收入者大幅加税”，同时对中低收入纳税人减税，对《社会保障法》进行多次修订，并在任期结束前实现预算平衡。

1976年大选

1976年7月15日，卡特选择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他在演讲中攻击华盛顿政坛，并为美国的创伤提供了宗教信仰上的救赎信息。

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在1976年大选期间的三场电视辩论中对峙。辩论是自1960年以来的第一次总统辩论。

卡特在比赛开始时以相当大的优势领先于福特，福特在竞选期间缩小了差距，但在1976年11月2日以微弱差距输给了卡特。卡特以50.1%对福特48.0%的得票率赢得选举，并获得了297张选举人票，福特获得240张选举人票。卡特的州数比福特少——23个州赢得福特的27个州——然而卡特赢得了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来任何非现任总统中最大的百分比（50.1%）。

总统任期（1977-1981年）

卡特的任期是一个持续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以及能源危机的时代。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履行竞选承诺，发布行政命令，宣布无条件大赦越南战争时期的逃兵草案，公告4483。1980年1月7日，卡特签署了H. R. 5860法，又名1979年《克莱斯勒公司贷款担保法》，向克莱斯勒公司提供了35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109.9亿美元）的援助。

卡特试图平息世界各地的各种冲突，最明显的是随着《戴维营协议》的签署。将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并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第二期削减核武器条约》。他的最后一年被伊朗人质危机所破坏，这导致他在1980年的选举中输给了罗纳德·里根。

过渡

卡特当选总统前的初步过渡计划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卡特是第一位向选举前过渡规划工作分配大量资金和大量人员的总统候选人，随后这将成为标准做法。卡特将树立一个模式，他的总统过渡模式将影响所有随后的总统过渡；采取有条不紊的方法，并有一个更大和更正式的运作。

1976年11月22日，卡特当选后首次访问华盛顿，在布莱尔宫会见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林恩和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并在白宫与福特总统举行了下午的会晤。第二天，卡特与国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表示他与内阁成员的会晤“非常有帮助”，并说福特已经要求他在需要什么时寻求他的帮助。然而，福特和卡特之间的关系在过渡期间相对冷淡。

1977年1月4日，卡特告诉记者，他将把花生生意交给受托人，从而摆脱潜在的利益冲突。

国内政策

美国能源危机

1977年4月18日，卡特发表电视讲话，宣称美国能源危机在道德上相当于战争。他鼓励所有美国公民节约能源，并在白宫安装了太阳能热水板。他穿着毛衣来抵消白宫因关掉暖气后的气温下降。1977年8月4日，卡特签署了

1977年《能源组织法》，组建了能源部，这是11年来第一个新内阁职位。在签字仪式上，卡特列举了导致立法必要性的“能源短缺危机”。在1977年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众议院“几乎全部”采纳了他五个月前提出的能源提案，并称这项妥协是“建立全面能源计划的转折点”。下个月，即10月13日，卡特表示，他相信参议院有能力通过能源改革法案，并认为能源是“我执政期间我们将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内问题”。

在1978年4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说，他成为总统以来最大的惊讶和失望，是国会在通过立法时遇到的困难，他特别提到能源改革法案：“一年前的4月，当我向国会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从未想过一年后这个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卡特能源法案经过国会的深思熟虑和修改于1978年10月15日获得国会批准。这项措施放松了对天然气销售的管制，取消了各州天然气内部和州际天然气之间长期存在的价格差距，并设立了税收抵免，以鼓励节能和使用非化石燃料。

1979年3月1日，卡特应国会的要求提交了备用汽油配给计划。4月5日，他发表了讲话，强调了节能的紧迫性。在4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说，众议院商业委员会批准备用汽油配给计划是“势在必行的”，并呼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其他几个备用节能计划。1979年7月15日，卡特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出他认为美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危机”；在民意测验专家帕特·卡德爾的建议下，他认为美国人在卡特上任前曾面临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事件的信心危机。对于卡特演讲的负面回应来自这样一种观点，即卡特本身并没有说明为解决能源危机所做的努力，而且过于依赖美国人（因此，显得他自己有些推卸责任）。

环保总署关于爱运河的超级基金

1978年，卡特宣布纽约尼亚加拉瀑布市爱运河附近进入联邦紧急状态。超过800个家庭被疏散，该社区建在有毒垃圾填埋场之上。超级基金法是针对这种情况制定的。联邦救灾资金被分配，以拆除大约500所房屋、第99街学校和第93街学校，这些学校建在毒物垃圾场之上；整治垃圾场，建设危险废物控制区。这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进程。卡特承认，全国还有一些这一类地方，发现这种危险的垃圾场是“我们现代最严峻的发现之一”。

与国会的关系

卡特拒绝遵守华盛顿政坛的约定俗成。他错过了议员的电话，从来没有回过电话。他使用口头侮辱，不愿回报政治恩惠，这导致他缺乏在国会通过立法的能力。在1977年2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卡特说，他与国会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补充说，他与国会找到了“日益增强的合作意识”，并在过去与两党的国会议员会面。卡特在试图让国会废除几个水利项目失败后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感觉，他在上任的头100天里曾要求取消这些项目，并遭到了党内成员的反对。随着白宫和国会之间的裂痕，卡特指出，民主党的自由派最热心地反对他的政策，这归因于泰德·肯尼迪想要总统职位。卡特认为他得到了7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他公布了一份19个项目的“打击名单”，他声称这些项目是“浪费”支出，他声称，如果将这些项目列入任何立法，将导致他的否决。他发现自己再次与国会民主党人意见相左，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认为总统追求传统上国会的角色是不合适的。卡特在1977年6月23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筹款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说，“我认为

今晚也很高兴指出，我们与国会已经发展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八年来，我们靠党派之争来执政。现在，我们有了合作的政府”。在7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在评估他总统任期的前六个月时谈到他对国会的了解有所提高：“我学会了在个人基础上更加尊重国会。国会议员个人能够带来一个特定主题的高度集中经验和知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多年来一直作为小组委员会或委员会主席，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生活的这一特殊方面，而我永远无法做到”。

1979年5月10日，众议院投票反对授权卡特制定备用天然气配给计划。第二天，卡特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称自己对美国政府感到震惊和尴尬，并得出结论说，“大多数众议院议员不愿意承担对我们国家的潜在严重威胁的政治责任”。他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众议院议员更加重视“地方或狭隘的利益”，并在未来90天内挑战国会众议院制定自己的配给计划。卡特的言论遭到了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批评，他们指责他的言论不符合总统在公开讲话中应该具有的正式性。其他人指出，106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他的提案，两党的批评可能会再次困扰他。

在能源提案的反对声中，《纽约时报》评论说，“正如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上下下飞来飞去的评论所表明的，国会和总统之间也存在着信任危机、怀疑感和不信任感，有可能破坏总统的立法计划，并成为明年竞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经济

卡特的总统任期有两个大致相等的经济历史时期，头两年是从1973-75年严重衰退中持续复苏的时期，当时固定投资处于1970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为9%；过去两年的特点是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加上极高的利率、石油短缺和缓慢的经济增长。1977年和1978年，他提议和国会通过的300亿美元经济刺激立法（如1977年的《公共工程就业法》）和实际家庭收入增长中位数为5%，创造了数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然而，1979年的能源危机结束了这一增长期，随着通货膨胀和利率的上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联储主席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采取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通货膨胀有所上升，从1976年的5.8%上升到1978年的7.7%。世界主要石油出口欧佩克（OPEC）的原油价格突然翻番，迫使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水平，1979年平均为11.3%，1980年为13.5%。随着1979年暑假季节的开始，汽油的突然短缺加剧了这个问题，并将象征着整个公众的危机：由于阿梅拉达赫斯炼油厂关闭而引起的严重短缺导致联邦政府于当年对该公司提起诉讼。

放松管制

1977年，卡特任命阿尔弗雷德·卡恩领导民航局（CAB）。他是推动放松对航空业管制的一部分，得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华盛顿主要“智囊团”的支持，这是一个倡导改革的民间社会联盟（以早些时候为卡车和铁路改革努力而建立的联盟为模式），包括监管机构负责人、参议院领导、卡特政府，甚至航空业的一些成员。该联盟于1978年迅速取得立法成果。

卡特于1978年10月24日签署了《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使之成为法律。

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取消政府对商业航空票价、航线和（新航空公司）市场准入的控制。民航局的监管权将逐步取消，最终允许市场力量决定航线和票价。该法案没有取消或削弱美国联邦航空局对航空安全所有方面的监管权力。

1979年，卡特解除了对美国啤酒业的管制，使向美国家庭酿酒商出售麦芽、啤酒花和酵母合法化，这是自1920年美国开始禁止啤酒厂以来的第一次。卡特的放松管制导致家庭酿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有所增加，到 2000 年代，美国已发展成为强大的工艺微酿造文化，到 2017 年底，美国有 6,266 家微型啤酒厂、啤酒厂和区域工艺啤酒厂。

医疗

在总统竞选期间，卡特接受了类似于特德·肯尼迪支持的两党全民医疗保险的医疗改革。卡特在任期间提出的医疗保健建议包括1977年4月的强制性医疗费用提案和1979年6月的一项提供私人医疗保险的提案。卡特认为，1979年6月的提议是哈里·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医疗保险方面取得的继续进展，杜鲁门总统提议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是美国人的基本权利，而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是在林登·约翰逊总统领导下提出的。1977年4月强制性医疗费用提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后来在众议院被否决。

1978年，卡特还与肯尼迪就一项妥协的医疗法举行了会谈，但未能成功。卡特后来将肯尼迪的分歧称为挫败了卡特为国家提供全面医疗体系的努

力。

教育

在任期早期，卡特与国会合作，协助履行竞选承诺，建立一个内阁级教育部门。卡特在1978年2月28日在白宫发表讲话时指出，“教育太重要了，不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这些部门和机构往往忙于重复的问题”。1979年2月8日，卡特政府公布了其建立教育部门的计划大纲，并声称对6月前颁布该法令有足够的支持。1979年10月17日，卡特签署了《教育部组织法》，将成立美国教育部。

外交政策

以色列和埃及

历史学家约尔根·延斯豪根认为，到卡特1981年1月卸任时，“他曾试图打破美国的传统政策，但最终实现了这一传统的目标，即打破阿拉伯联盟，与埃及建立联盟，削弱苏联，保卫以色列。”

非洲

卡特1977年10月4日在联合国对非洲官员发表讲话时指出，美国有兴趣“看到一个强大、充满活力、自由和繁荣的非洲，使政府尽可能多地掌握在贵国居民手中”，并指出他们在“如何解决津巴布韦罗得西亚问题”问题上的统一努力。在当月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概述了美国希望“与南非和谐合作，应对纳米比亚，特别是津巴布韦和平的威胁”，并消除种族隔离等种族问题，以及扩大该地区社会其他方面的平等机会。

卡特于1978年3月31日至4月3日访问了尼日利亚，此行是卡特政府改善与尼日利亚关系的一次尝试。他是第一位访问尼日利亚的美国总统。卡特重申有意召开一次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和平会议，该会议将涉及所有各方，并报告说，美国正在尽其所能采取行动。

12月3日，万斯国务卿向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承诺，当“英国总督抵达索尔兹伯里执行商定的兰开斯特宫解决方案，选举进程开始时，总统将迅速采取行动，解除对津巴布韦罗得西亚的制裁”。

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

在卡特担任总统期间，尽管在东帝汶出现侵犯人权事件，美国仍继续支持印度尼西亚作为冷战盟友。这些侵犯事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1975年12月入侵和占领东帝汶之后。

伊朗

1977年11月15日，卡特承诺，他的政府将继续保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积极关系，称其当代地位“强大、稳定和进步”。

伊朗人质危机

1979年11月4日，一群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这些学生属于伊玛目派的穆斯林学生追随者，支持伊朗革命。52名美国外交官和公民在随后的444天里被扣为人质，直到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接替卡特就任总统后，他们终于被释放。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卡特表示，他承诺不在“任何可能导致流血”的情况下解决争端。1980年4月7日，卡特发布第12205号行政命令，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并宣布他的内阁成员和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认为有必要确保安全释放。1980年4月24日，卡特命令“鹰爪行动”试图释放人质。这次任务失败了，造成8名美国军人死亡，两架飞机被毁。不幸的营救行动导致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辞职，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项任务。

苏联

1977年2月8日，卡特表示，他已敦促苏联与美国联合，形成“全面禁止核试验，至少长期停止所有核试验”，他赞成苏联停止部署RSD-10先锋。在6月

13日的一次会议上，卡特报告说，美国将“从本周开始与苏联密切合作，制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地下或大气层内进行所有核装置的试验”，保罗·沃恩克将从下周开始与苏联谈判印度洋非军事化问题。卡特在12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和苏联在处理一长串重要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战略核武器的部署”，两国寻求在明年春天之前结束第二阶段会谈。1979年6月18日卡特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第二号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了讨论。

卡特在1980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了两个地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现在，正如过去3年半以来一样，我们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世界是和平生活还是陷入全球冲突的最关键因素”。

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8年4月27日，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领导的共产党在阿富汗夺取政权。新政权——由塔拉基的极端主义卡尔克派和较为温和的帕尔查姆派瓜分——于同年12月与苏联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塔拉基努力改善世俗教育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处决（包括许多保守的宗教领袖）和政治压迫，这是阿富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引发了圣战者叛乱分子的反抗。1979年4月总起义后，塔拉基于9月被哈萨克族对手哈菲祖拉·阿明罢免。阿明被外国观察家视为“野蛮的精神病患者”；甚至苏联人也对阿富汗共产党的暴行感到震惊，并怀疑阿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但事实并非如此。到12月，阿明政府已经失去对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控

制，促使苏联入侵阿富汗，处决阿明，并任命帕克汉姆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马尔为总统。

卡特对入侵感到吃惊，因为美国情报界在1978年和1979年的共识——在1979年9月29日重申——是“莫斯科不会进行武力干预，即使卡尔克政府似乎即将垮台”。事实上，卡特从1979年11月到12月底关于苏联入侵的日记中只提到了两个关于阿富汗的简短句子，而是全神贯注于伊朗正在进行的人质危机。在西方，苏联入侵阿富汗被认为是对全球安全和波斯湾石油供应的威胁。此外，由于未能准确预测苏联的意图，美国官员重新评估了苏联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威胁，尽管现在人们知道，这些担忧被夸大了。例如，美国情报部门密切关注苏联在1980年入侵伊朗的演习，而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早些时候警告说，“如果苏联来统治阿富汗，他们可以促进一个单独的俾路支省。。。。。。[因此]肢解巴基斯坦和伊朗”。

这些关切是卡特和里根政府为改善与伊朗关系而作出的无回报努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并导致对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齐亚-乌尔-哈克的大规模援助。由于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和1979年4月对阿里·布托的处决，齐亚在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与美国的关系一直紧张，但卡特早在1979年1月就告诉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鉴于伊朗的动乱，“修复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至关重要。卡特授权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项倡议是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局（ISI）之间的合作：1979年7月3日，即苏联入侵前几个月，中情局通过三军情报局开始向圣战者提供价值约50万美元的非致命性武器援助。中情局官员罗伯特·盖茨后来回忆说，这种早期合作的适度范围可能受到以下理解的影响，即“美国的大规模秘密援助计划”可能会“增加利害关

系”，从而导致“苏联人进行比原计划更直接、更有力的干预”。

苏联入侵之后，卡特决心对他认为危险的挑衅行为作出积极反应。他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对苏联实施制裁，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新的援助，重新登记选择性征兵系统，并承诺美国将致力于波斯湾的防御。他禁止向苏维埃运送粮食，并要求每年增加5%的国防开支。卡特还呼吁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热情地支持卡特的强硬立场，尽管英国情报部门认为“中情局对苏联对巴基斯坦的威胁过于危言耸听”。美国在此期间政策的主旨由卡特在1980年初确定：卡特发起了一项通过巴基斯坦军情机构来武装圣战者的计划，并获得了沙特阿拉伯的承诺，以配合美国为此目的提供的资金。在卡特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的领导下，美国对圣战者的支持加速，最终使美国纳税人损失了大约30亿美元。苏联无法平息叛乱，于1989年撤出阿富汗，导致苏联解体。

然而，通过巴基斯坦运送美国援助物资的决定导致了大规模的欺诈行为，因为运往卡拉奇的武器经常在当地市场出售，而不是交付给阿富汗叛军：卡拉奇很快“成为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之一”。巴基斯坦还控制了哪些反叛分子得到援助：在齐亚政府支持的7个圣战组织中，有4个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仰，这些原教旨主义者获得了大部分资金。尽管如此，卡特对支持他仍然认为在阿富汗的“自由战士”的决定并不后悔。

韩国

在1977年3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重申他有兴趣让美国军队逐步撤出韩国，并表示他希望韩国最终拥有“足够的地面部队，以保护自己免受来自朝鲜的任何入侵”。5月19日，《华盛顿邮报》援引驻韩美军参谋长约翰·辛格劳布的话说，卡特将从朝鲜半岛撤军。当天晚些时候，新闻秘书雷克斯·格拉纳姆宣布，辛格劳布已被卡特传唤到白宫，他还证实卡特在《华盛顿邮报》上看过这篇文章。卡特在两天后于5月21日两人会晤后解除了辛格劳布的职务。5月26日，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相信韩国能够自卫。1979年6月30日至7月1日，卡特在蓝屋与韩国总统朴正熙举行会晤，讨论美韩关系以及卡特对维护其全球缓和紧张局势政策的兴趣。

1978年4月21日，卡特宣布将驻韩美军削减三分之二，理由是国会在向首尔政府提供补偿性援助方面缺乏行动。

国际旅行

卡特在总统任期内对25个国家进行了12次国际访问。卡特是1978年访问尼日利亚时第一位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他的行程还包括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他多次前往中东斡旋和平谈判。1977年12月31日至1978年1月1日，他对伊朗进行了访问，距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推翻还不到一年。

指控和调查

1977年9月21日，曾任卡特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伯特·兰斯辞职。此前，他被指控在任职期间从事不正当的银行活动，令卡特感到尴尬。

卡特成为第一位宣誓作证的现任总统，作为对总统调查的一部分，因为美国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任命保罗·库兰为特别律师，调查伯特·兰斯控制的一家银行向卡特拥有的花生业务提供的贷款，而库兰作为特别律师不允许他自行提出指控。库兰于1979年10月宣布，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从佐治亚州银行借来的资金被转用于卡特1976年总统竞选的指控，从而结束了调查。

1980年总统竞选

卡特后来写道，最强烈、和日益强烈的反对他的政策来自民主党的自由派，他归因于特德肯尼迪的野心，以取代他作为总统。在肯尼迪于1979年11月宣布参选后，关于他在竞选总统期间的活动的问题经常成为卡特在民主党总统初选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主题。肯尼迪的竞选活动软弱无力，令他的支持者大吃一惊，卡特赢得了大部分初选，并获得了重新提名。然而，肯尼迪动员了民主党的自由派，在秋季选举中，卡特的支持率很低。卡特和副总统蒙代尔在纽约市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提名。卡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以悼念已故的休伯特·汉弗莱。

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是历史上最困难、最不成功的竞选之一。他面临着来自右派（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中间派（独立派的约翰·安德森）

和左派（民主党的泰德·肯尼迪）的强烈挑战。他不得不与自己“滞胀”的经济抗争，而伊朗的人质危机每周都主导着新闻。他的重新登记征兵的政策疏远了自由派大学生，他们本应成为他的主要支持者。他的竞选经理、前任命秘书蒂莫西·卡夫在大选前五周辞职，原因是有人指控他使用可卡因。10月28日，卡特和里根参加了选举周期中唯一的总统辩论。虽然最初落后卡特几个百分点，里根在辩论后经历了民调的激增。卡特以压倒性差距被罗纳德·里根击败，参议院自1952年以来首次由共和党人占多数。卡特在败选演说中承认，他受到选举结果的伤害，但承诺与当选总统里根“有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期”。

总统后（1981年至今）

在竞选连任失败后不久，卡特告诉白宫记者团，他打算效仿哈里·杜鲁门的退休生活，而不是利用他随后的公共生活来充实自己。

卡特中心

1982年，卡特创立了卡特中心，这是一个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人权和减轻人类痛苦，包括帮助改善80多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

外交

1994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朝鲜和平使命中寻求卡特的援助，在此期间，卡特与金日成谈判达成谅解，金日成随后概述了一项条约；未经克林顿政府的同意，卡特向CNN宣布了这项条约，以刺激美国的行动。在整个2017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卡特建议两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并确认他已向特朗普政府提出愿意担任驻朝鲜外交使节的候选人。

1984年10月，卡特在前往马丘比丘后被库斯科市市长丹尼尔·埃斯特拉达授予秘鲁荣誉公民称号，卡特于2009年4月在利马政府宫与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会晤后，支持秘鲁政府。

在1986年2月与托梅斯·博尔格的会谈后，卡特在尼加拉瓜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旅行，使记者路易斯·莫拉和劳工领袖何塞·阿尔塔米拉诺被释放。

卡特于2002年5月访问了古巴，包括会晤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会见政治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艾滋病疗养院、一所医学院、一个生物技术设施、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所残疾儿童学校。卡特于2011年3月再次访问古巴三天。

卡特在中东的外交努力包括1981年9月与以色列总理梅纳切姆·贝贝德（Menachem Begin）的会晤，1983年3月访问埃及，还有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2008年12月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会晤。2006年，卡特表示他对以色列的内外政策存在分歧，同时表示他支持以色列，将批评扩大到以色列在黎巴嫩、西岸和加沙的政策。卡特于2008

年4月前往叙利亚，向拉马拉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坟墓敬献了花圈，并否认布什政府曾与他联系过与哈马斯领导人会晤。

2007年7月，卡特与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宣布参加“长老会”，这是一个由在和平与人权问题上共同努力的独立全球领导人团体。宣布后，卡特参加了对达尔富尔、苏丹、塞浦路斯、朝鲜半岛和中东等的访问。卡特于2008年11月试图前往津巴布韦，但被罗伯特·穆加贝总统的政府拦住。

卡特于1995年至1996年在埃及和突尼斯举行首脑会议，讨论非洲大湖区的暴力问题，并在1999年苏丹和乌干达谈判《内罗毕协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美国政策的批评

卡特在里根上任第一年就承诺不批评里根新政府。他在里根遇刺事件后发表了讲话；并表示同意里根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措施。他后来不同意里根对中东的处理。第二年，卡特呼吁两党合作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并批评里根政府处理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的方式。卡特对里根选择留在戴维营协议中反应积极。1983年，卡特批评里根对侵犯人权的行为缺乏关注。

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卡特表示反对伊拉克战争，他认为布什和布莱尔企图

通过“谎言和曲解”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2007年5月，卡特说布什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后来又说，他只是把布什的任期比作理查德·尼克松的任期。在布什第二任期结束时，卡特认为布什的任期令人失望。

总统政治

卡特被认为是1984年总统大选的潜在候选人，但没有参选，而是支持沃尔特·蒙代尔获得民主党提名。蒙代尔获得提名后，卡特批评里根竞选班子，在198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向蒙代尔提建议。在里根总统击败蒙代尔的选举之后，卡特说，由于后者的政纲包括增税，失败是可以预见的。

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周期中，卡特再次排除了自己作为候选人的可能性，并预测副总统乔治·布什将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大选。卡特在198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团结，他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民主党夺回白宫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之后，卡特说，布什的总统任期将比里根更加困难，因为他没有那么受欢迎。

在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卡特会见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保罗·特松加斯，他征求了他的建议。卡特对前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表示赞同，并批评罗斯·佩罗。初选结束时，卡特谈到199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需要解决过去没有关注的某些问题，并在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为克林

顿竞选，公开表示，他希望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得到咨询。

卡特在2000年总统大选前几天支持副总统戈尔（Al Gore），并在随后几年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即尽管最高法院在有争议的布什诉戈尔一案中将选举胜利交给了布什，但戈尔还是赢得了选举。

在2004年的选举周期中，卡特支持约翰·克里，并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卡特还对佛罗里达州再次发生投票事故表示担忧。

在200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期间，卡特被猜测支持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胜过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因为他对这位候选人的评价是有利的，卡特家族的言论也表明他们支持奥巴马。

卡特在2012年大选周期的初选阶段支持共和党的米特·罗姆尼获得共和党提名，尽管他澄清说，他支持罗姆尼是因为他认为这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是能够最好地确保奥巴马总统获胜的候选人。卡特在201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录像讲话。

关于特朗普政府的看法

卡特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进入初选后不久就批评了唐纳德·特朗普，卡特

预测他会输，他指出，政治气候的情况与他还是一个活跃的政治家时不同。随着初选的继续，卡特表示，他更喜欢特朗普而不是他的主要对手特德·克鲁兹，尽管他在初选期间的讲话中和他在20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谴责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在民主党初选中，卡特投了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票，后来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了该党的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

然而，2017年10月，卡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为特朗普总统辩护，批评媒体对他的报道。卡特说：“我认为媒体对特朗普的强硬态度肯定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总统都难。我认为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声称特朗普精神错乱，以及其他一切”。他还赞扬特朗普与沙特阿拉伯接触，并说总统比他的前任受到更严格的关注。采访结束后，特朗普本人赞扬了卡特的评论，并在Twitter上感谢他，他写道：“只要读一读吉米·卡特总统关于我的好话，以及媒体对我是多么的恶劣（假新闻）。谢谢总统先生！”卡特严厉批评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以及政府对贾迈勒·卡索吉遇刺事件的反应。

长寿

卡特是自2006年杰拉尔德·福特去世后最早在职的前总统，2017年92岁成为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年龄最大的总统，也是第一位活到自己退休40周年的人。两年后，即2019年3月22日，他获得了美国最长寿总统的殊荣，当时他超过了乔治·布什的寿命，后者于2018年11月去世，享年94岁；两人都出生于1924年。2020年10月1日，他成为第一位活到96岁的总统。2021年1月

20日，他成为第一位离开白宫40年后仍活着的总统。

公众形象和遗产

舆论

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在1976年总统大选的出口民调中进行了比较，卡特在选举中获胜。许多选民仍然反对杰拉尔德·福特赦免尼克松。相比之下，卡特被视为一个真诚、诚实和善意的南方人。卡特以66%的支持率开始他的任期，在他卸任时支持率已降至34%，55%的人不赞成。

在1980年的竞选中，前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表现出了轻松的自信，这与卡特严肃内省的气质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人认为卡特个人对细节的关注、他的悲观态度、他似乎优柔寡断和对人的软弱，与许多人认为里根的魅力和把任务下放给下属形成鲜明对比。里根利用经济问题、伊朗人质危机和华盛顿缺乏合作来将卡特描绘成一个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与他的前任杰拉尔德·福特一样，卡特没有连任总统。在当选总统的人中，卡特是自1932年胡佛竞选连任失败以来第一个失败的人。

遗产

卡特的总统任期最初被一些人视为失败。尽管他的总统任期受到的欢迎参差不齐，但他卸任后的维和和人道主义努力使卡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前总统之一。

纪录片《后门频道：和平的代价》（2009年）归功于卡特在戴维营的努力，该行动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带来了和平，为中东带来了唯一有意义的和平。

荣誉和奖励

他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奖，以及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于1984年获得美国成就学会金盘奖。

1991年，他被任命为堪萨斯州立大学皮贝塔卡帕分校的荣誉会员。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nald_Reagan

罗纳德·里根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是美国政治家，1981年至1989年担任美国第40任总统，成为现代保守主义中极具影响力的声音。在担任总统之前，他是好莱坞电影演员和工会领袖，1967年至1975年担任加州第33任州长。

里根在伊利诺伊州北部小城镇的一个低收入家庭长大，1932年毕业于尤里卡学院，曾任电台体育评论员。1937年搬到加利福尼亚后，他找到了演员的工作，并主演了几部主要作品。作为银幕演员协会的主席，里根努力根除所谓的共产主义影响。20世纪50年代，他进入电视界，在通用电气工厂担任励志演说家。1964年，他作为新的保守派发言人，发表了题为“选择的时间”的演讲，赢得了全国的关注。里根在1966年当选为加州州长，建立了

支持者网络。作为州长，他提高了税收，将州预算赤字转为盈余，挑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抗议者，并在抗议运动期间下令部署国民警卫队。

1980年，里根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击败了现任总统吉米·卡特。里根当年69岁，第一次就职时是担任美国总统年龄最大的人，直到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在70岁时宣誓就职。里根在1984年竞选连任时，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赢得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选举人票，525张，占选举团538张选票的97.6%。这是继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战胜阿尔弗雷德·兰登之后，美国现代历史上第二个巨大差距的总统选举。

里根就任总统后不久，就开始实施全面的新的政治和经济举措。他的供应方经济政策被称为“里根经济学”，主张降低税率以刺激经济增长、放松经济管制和削减政府开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在一次暗杀企图中幸存下来，启动了反毒品战争，入侵了格林纳达，并打击了公共部门的工会。在他的两届任期内，通货膨胀从12.5%下降到4.4%，实际GDP年均增长3.6%。里根颁布了削减政府支配开支、减税和增加军费开支等法令，这导致联邦债务整体增加。外交事务主导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包括轰炸利比亚、伊朗-伊拉克战争、伊朗-反战事件和正在进行的冷战。1987年6月，里根在柏林墙、勃兰登堡门发表演讲时，向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拆毁这堵墙”的要求。在与戈尔巴乔夫谈判期间，他与苏军的军备竞赛升级，使冷战政策从缓和转向倒退。会谈以《INF条约》而告终，该条约缩小了两国的核武库。里根在苏联衰退期间开始了他的总统任期，苏联在他卸任近三年后最终垮台。

1989年里根卸任时，他的支持率为68%，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后来的比尔·克林顿的支持率相当，是现代离任总统的最高支持率。他是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来第一位连任两届总统的总统，此前五位总统没有连任。尽管里根计划在总统任期后积极工作，但他在1994年11月透露，他于早些时候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之后，随着疾病的发展，他非正式的公开露面变得更加罕见。他于2004年6月5日在家中去世。他的任期是美国保守派政策的调整，他是保守派中的偶像。历史学家和公众对他的总统任期的评价使他成为美国总统的优秀者。

早年生活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11年2月6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坦皮科市一栋商业大楼二楼的公寓里。他是内尔·克莱德（尼·威尔逊）和杰克·里根的小儿子。杰克是一名推销员和讲故事的人，他的祖父母是来自蒂佩里郡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而内尔是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后裔。罗纳德的哥哥尼尔·里根成为广告主管。

里根一家曾短暂地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几个城镇，包括蒙茅斯、盖尔斯堡和芝加哥。1919年，他们回到坦皮科，住在H. C. 皮特尼品种商店之上，直到最后定居在伊利诺伊州迪克森。

宗教

罗纳德·里根写道，他的母亲“总是愿意看人的优点，而且经常这样做”。她定期参加基督教会的门徒会议，并在教会内积极活跃，而且非常有影响力；她经常领导周日学校的服侍，并在服侍期间给会众读圣经。作为祈祷力量的坚定信徒，她领导了教堂的祈祷会，并在牧师出城时负责周中祈祷。她也是社会福音运动的拥护者。她对教会的坚定承诺促使她的儿子罗纳德成为新教基督徒，而不是像他爱尔兰父亲那样的罗马天主教徒。他还说，她强烈地影响了他自己的信仰：“我知道她深深地把这种信念灌印在我身上”。里根自称是重生的基督徒。在迪克森，里根深受他的牧师贝希尔·克利弗的影响，他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克利弗是里根未婚妻的父亲。里根视他为第二任父亲。斯蒂芬沃恩说：

“在许多时候，里根青年第一基督教会采取的立场与后代里根的信仰相吻合。这些立场包括：对上帝旨意安排的信心、美国使命与上帝意志的联系、对进步的信念、对职业道德的信任和对那些获得财富的人的钦佩、对质疑家庭或质疑适当性行为观念的文学艺术的不自在、认为贫穷是最好留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国家的个人问题、对涉及酒精和毒品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对利用政府保护少数民族公民权利的沉默。”

根据保罗·肯戈尔的说法，里根对人的善良有着特别强烈的信心：这种信仰源于他的母亲和基督信仰的门徒的乐观信仰，他于1922年受洗。在那段时间，早在民权运动之前，里根反对种族歧视是不寻常的。他回忆起当时他的大学足球队住在当地的一家旅馆里，不允许两个黑人队友住在那里，于是他邀请他们到他父母在15英里（24公里）外的迪克森的家。他的母亲邀请他们过夜，第二天早上吃早餐。他的父亲强烈反对库克勒克斯克兰，因为他的天主教传统，但也因为克兰的反犹太主义和反黑人种族主义。里

根在成为著名演员后，在二战后发表了支持种族平等的演讲。

正规教育

里根就读于迪克森高中，在那里他对表演、体育和讲故事产生了兴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1927年在洛威尔公园的岩石河担任救生员。六年来，里根共进行了77次营救。他就读于尤里卡学院。他是一个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主修经济学和社会学，毕业时平均成绩是C。他享有“多才多艺的杰克”的美誉，擅长校园政治、体育和戏剧。他是橄榄球队的成员和游泳队的队长。他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参加了反对大学校长的学生抗议活动。

娱乐事业生涯

广播和电影

1932年从尤里卡大学毕业后，里根在爱荷华州担任多个电台的广播播音员。他搬到得梅因的世卫组织电台，担任芝加哥小熊队棒球比赛的播音员。

1937年，里根在加州与小熊队一起旅行时，接受了一次屏幕测试，结果与华纳兄弟制片厂签了7年的合同。他在好莱坞生涯的最初几年里，在“B电影

”单元中度过。

他在1937年的电影《爱在空中》中出演了主演，赢得了他的第一个银幕荣誉，到1939年底，他已经出演了19部电影，包括贝特·戴维斯和汉弗莱·博加特的《黑暗胜利》。在1940年与埃罗尔·弗林一起拍摄电影《圣达菲小径》之前，他在电影《全美国》中饰演乔治·吉普。从中，他获得了终身绰号“吉珀”。1941年，参展商将他评为好莱坞年轻一代中第五受欢迎的明星。

里根在1942年的《国王行》（35岁）中扮演他最喜欢的表演角色，他扮演一个双截肢者，他背诵着“我其余的人在哪里？”——后来被用作他1965年自传的标题。许多影评人认为《国王行》是他最好的电影，虽然这部电影受到《纽约时报》评论家博斯利·克劳瑟的谴责。

《国王行》让里根成为明星——华纳立即将他的薪水增加了两倍，达到每周3000美元。不久之后，他与弗林（当时仍是一颗巨星）在《绝望之旅》（1942年）中共同主演了《超越标题》。1942年4月，里根奉命在旧金山服兵役；尽管在许多电影中担任主角，但从未完全成为一流的电影明星。战时服兵役后，他共同主演了《海龟之声》、《约翰爱玛丽》、《仓促的心》、《邦佐的睡觉时间》、《蒙大拿州的牛女王》、《田纳西州的搭档》、《海军地狱猫》（他唯一与南希·里根一起出演的电影），以及1964年与李·马文和安吉·迪肯森合拍的《杀手》（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等影片。在他的电影生涯中，里根的母亲帮助他回复了他的许多粉丝邮件。

服兵役

在完成14门家庭学习的陆军扩展课程后，里根应征入伍，并于1937年5月25日被任命为骑兵军官预备役团的少尉。

1942年4月18日，里根第一次被命令服现役。由于视力不佳，使他不能在海外服役。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作为港口和运输办公室的联络官在加州梅森堡的旧金山登船港工作。经美国陆军空军（AAF）批准，他于1942年5月15日申请从骑兵队调到美国空军，并被分配到美国空军公共关系部，随后被分配到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市的第18空军基地单位。1943年1月14日，他被提升为中尉，并被派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陆军临时特遣部队。他完成这一任务后返回美国空军第18基地，并于1943年7月22日晋升为上尉。

1944年1月，里根奉命在纽约市临时工作，参加第六次战争贷款运动的开幕仪式。1944年11月14日，他被调到美国空军第18基地，一直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战争结束时，他的部队为空军制作了大约400部训练片，包括为计划轰炸日本的B-29机组人员制作驾驶舱模拟片。1945年12月9日，他作为陆军上尉脱离现役。

银幕演员协会主席

里根于1941年首次当选为银幕演员协会（SAG）董事会成员，并担任候补成员。二战后，他恢复在演员协会服务，1946年成为第三副主席。1947年3月，当SAG主席和六名董事会成员因工会关于利益冲突的新章程而辞职时，里根在一次特别选举中当选该协会主席。随后，他于1947年、1948年、1949年、1950年、1951年和1959年六次连任。他领导SAG执行和处理了1947年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各种劳资纠纷和好莱坞黑名单时代。1947年由工作室高管首次提出，他们同意不会雇用任何被认为是、或曾是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主义激进政治的人；随着美国国会继续调查国内政治颠覆活动，共产主义黑名单在20世纪50年代初稳步扩大。

里根在任职期间还帮助电视演员在剧集重新播放时获得薪酬，后来在电影制片厂电影在电视上播出时为电影演员争取薪酬。

联邦调查局线人

1946年，里根担任艺术、科学和职业独立公民委员会（ICCASP）全国董事会成员，并曾是其好莱坞分会（HICCASP）的成员。1946年7月10日，他参加了HICCASP会议，这引起了FBI的注意，FBI于1947年4月10日就HICCASP的调查采访了他。40年后，据透露，在20世纪40年代末，里根（代号T-10）和他当时的妻子简·威曼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电影业演员的名字，他们认为那些人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即便如此，他对政府使用SAG的方式感到不自在，在一次FBI采访中问道，“难道他们（即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期望我们把自己都变成小FBI，并决定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

好莱坞听证会

1947年10月，在好莱坞听证会上，里根以银幕演员协会主席的身份作证：

“银幕演员公会内部有一小群人一直反对公会董事会和公会官员的政策。。。怀疑或多或少遵循我们与共产党联系的策略。。。有时他们试图成为一个破坏性的影响...我听到过不同的讨论，其中一些被贴上共产党的标签。。。在另一场合，我发现自己被误导为赞助人，参加在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员会主持下举行的活动。”

然而，里根也反对即将在1948年5月的《蒙特-尼克松法案》中通过的措施：

“作为一个公民，我会犹豫，或不喜欢，看到任何政党被取缔的基础是其政治意识形态...尽管我讨厌，我憎恶他们的哲学，但我更讨厌他们的策略，这是第五纵队的战术，是不诚实的。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公民，我从来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被这个群体的恐惧或怨恨所催促，我们曾经通过这种恐惧或怨恨与我们的任何民主原则妥协。”

此外，当被问及他是否知道在银幕作家协会内的共产主义势力时，里根并不会随声附和，相反，他说，“先生，像其他先生们一样，我必须说那是道听途说。”

电视

里根在20世纪50年代末获得了更少的电影角色，因而进入电视行业。他被聘为通用电气剧院的主持人，其每周的一系列戏剧变得非常受欢迎。他的合同要求他在一年中16周内参观通用电气（GE）工厂，这常常要求他每天做14次会谈。他在这个职位上赚了大约125,000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110万美元）。从1953到1962年，这个节目持续了十年，这提高了里根的全美知名度。1959年1月1日，里根是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玫瑰花车游行的主持人和播音员。里根作为职业演员的最后作品，是从1964年至1965年在电视连续剧《死亡谷日》中担任主持人和表演者。1952年结婚后，罗纳德和南希·里根一起演了三集电视连续剧。

婚姻和儿女

1938年，里根与女演员简·威曼（1917-2007年）共同主演电影《老鼠兄弟》。他们在芝加哥剧院宣布订婚，并于1940年1月26日在加州格伦代尔的希瑟教堂结婚。他们共有两个亲生女儿，莫琳（1941-2001年）和克里斯汀（早产，1947年6月26日去世）；并收养了一个儿子，迈克尔（生于1945年）。在这对夫妇就里根的政治志向发生争执后，威曼于1948年提出离婚，理由是由于她丈夫的银幕演员协会工会职责而分心；离婚是在1949年完成的。威曼是注册的共和党人，也说，他们的分手源于政治的差异（里根在当时仍然是民主党成员）。当里根在32年后成为总统时，他成为第一个担任这个美国最高职位的曾经离婚者。里根和威曼一直是朋友，直到他去世；威曼在里根竞选时投了里根的票，在他去世时，她说，“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总统和一位伟大、善良和温柔的人。”

里根于1949年以银幕演员协会主席的身份认识了女演员南希·戴维斯（1921-2016）。他帮助她解决有关她的名字出现在好莱坞共产党黑名单上的问题；她被误认为是另一个南希戴维斯。她描述他们的会面时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完全是一见钟情，但非常接近”。他们在洛杉矶的蔡森餐厅订婚，1952年3月4日在圣费尔南多谷的小布朗教堂（北好莱坞，现为工作室城）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帕蒂（生于1952年）和罗纳德“罗恩”（生于1958年）。

这对夫妇的关系是亲密的，真实的和挚爱的。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他们经常表现出对彼此的感情：一位新闻秘书说：“他们从来没有把对方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停止求情。他经常叫她‘妈妈’，她叫他‘罗尼’”。他曾经写信给她，“无论我珍惜和享受什么...所有这些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有你”。1998年，当他患上阿尔茨海默氏症时，南希告诉《名利场》杂志，“我们的关系很特别。我们非常相爱，现在依然如此。当我说我的生活始于罗尼时，嗯，这是真的。确实如此。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南希·里根于2016年3月6日去世，享年94岁。

早期政治生涯

里根最初是好莱坞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他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于20世纪50年代转向右翼，1962年成为共和党人，并在1964年的金水竞选中成为主要的保守派发言人。

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加入了许多以左翼为导向的政治委员会，如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他与共和党提出的工作权立法进行了斗争，并在1950年支持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当时她在与理查德·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被击败。

1945年12月，迫于华纳兄弟制片厂的压力，他被禁止领导好莱坞的反核集会。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里根大力支持哈里·杜鲁门，并在洛杉矶的一次竞选演讲中与他一起登台。20世纪50年代初，他与女演员南希·戴维斯的关系发展起来；当他支持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2年和1956年）和理查德·尼克松（1960年）为总统候选人时，他转向了右翼。

里根于1954年被通用电气公司（GE）聘为通用电气剧院的主持人，这是一部每周一次的电视剧。他还走遍全国，为超过20万通用电气员工发表激励性演讲。他的许多演讲——他自己写的——都是无党派的，但带有保守的、支持商业的信息：他受到通用电气高管勒缪尔·布尔瓦勒的影响。布尔瓦勒以反对工会的强硬立场和赢得工人的创新战略而闻名，他拥护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自由市场、反共产主义、降低税收和有限的政府。

里根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因为他在通用电气的任职不允许他过多地进入政治话题；于是他辞职并正式注册为共和党人。他常说：“我没有离开民主党。党离开了我。”

1961年，当有关医疗保险的立法出台时，他为美国医学协会（AMA）制作了一张录音，警告这样的立法将意味着美国自由的终结。里根说，如果他的听众不写信去阻止该法案，“我们会醒过来发现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他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的其他民主党倡议包括食品券计划、提高最低工资和成立和平队。他还加入了全国步枪协会（NRA），并将成为终身会员。

里根在1964年为保守派总统竞选人巴里·戈德沃特的演讲中引起了全国的关注。里根在代表戈德沃特发表讲话时强调他相信小政府的重要性。他巩固了他在为通用电气发表演讲时发展的主题，“选择的时间”：

“开国元勋们知道，一个政府不能控制经济，不能控制人民。他们知道，当一个政府开始这样做时，它必须使用武力和胁迫来达到它的目的。因此，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选择时间...你和我被告知我们必须在左边或右边之间做出选择，但我建议不要做左或右。只有上升或下降。到人类古老的梦想——与秩序相一致的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或者下降到极权主义的蚂蚁堆。”

—1964年10月27日

这次“选择的时间”演讲并不足以扭转步履蹒跚的金水运动，但它是建立里根全国政治知名度的关键事件。《华盛顿邮报》的大卫·布罗德称这是“自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全国政治性演讲”。

加州州长（1967-1975）

加州共和党人对里根的政治观点和魅力印象深刻后，1965年底，他宣布竞选州长。他在共和党预选中击败了前旧金山市长乔治·克里斯托弗。在里根的竞选中，他强调了两个主要主题：“让享受福利的流浪汉重返工作岗位”，并提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的反战和反建制学生抗议活动，“以清理伯克利的混乱局面”。

1966年，里根完成了1958年美国参议员威廉·诺兰和1962年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都未能完成的任务：他击败了民主党两届州长帕特·布朗，当选加州州长。里根于1967年1月2日宣誓就职。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冻结了政府招聘，并批准了增税以平衡预算。

上任后不久，里根作为“阻止尼克松”运动的一部分，对1968年的总统竞选领域进行了测试，希望削减尼克松的南部支持率，并成为一位妥协立场的候选人；但尼克松和第二位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获胜。到大会召开时，尼克松有692张代表票，比获得提名所需的票数多25张，洛克菲勒和里根排在第三位。

里根与那个时代的抗议运动发生了几次高调冲突，包括他公开批评大学管

理者容忍伯克利校园的学生示威。1969年5月15日，在人民公园校园的抗议活动（最初目的是讨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期间，里根派遣了加州公路巡逻队和其他官员平息抗议。这导致了一个被称为“血腥星期四”的事件，导致学生詹姆斯的死亡和木匠艾伦布兰查德致盲。此外，111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其中一名警察胸部被刀刺中。里根随后召集了2200名州国民警卫队士兵占领伯克利市两周，以镇压抗议者。警卫队在伯克利停留了17天，在人民公园露营；随着大学拆除封锁的栅栏，并暂停了人民公园的所有发展计划，示威活动平息下来。事件发生一年后，里根回答了有关校园抗议运动的问题，他说：“如果发生流血事件，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没有更多的姑息”。当塞比昂斯解放军在伯克利绑架帕蒂·赫斯特并要求向穷人分发食物时，里根向一群政治助手开玩笑说，肉毒杆菌病的爆发会破坏食物。

1967年初，关于堕胎的全国辩论开始引起关注。在辩论的早期阶段，民主党加州参议员安东尼·贝伦森提出了《治疗性堕胎法案》，以减少在加州进行的“偷偷堕胎”的数量。州议会将该法案送到里根的办公桌上，经过多日的犹豫不决，他于1967年6月14日勉强签署了该法案。因此将进行大约200万次堕胎，主要是因为该法案中有一项条款允许堕胎，以保障母亲的福祉。当时里根在任仅四个月，他签署了该法案，后来表示，如果他作为州长更有经验，他就不会签署该法案。在认识到他所谓的法案的“后果”后，他宣布他反对堕胎。他在政治生涯的后期保持了这一立场，广泛撰写了有关反对堕胎的文章。

1967年，里根签署了《穆福德法案》，废除了允许公众携带枪支的法律（成为加州刑法12031和171（c））。该法案以共和党议员唐·穆福德的名字命名，在黑豹队携带武器游行到加州国会大厦抗议后，引起了全国的关

注。

尽管1968年有人试图对里根举行罢免投票，但他还是在1970年再次当选州长，击败了对手杰西·翁鲁。他决定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不寻求第三个任期。里根在位时最大的挫折之一是关于死刑的争议；他强烈支持死刑；加州最高法院发布人民诉安德森案的裁决，宣布1972年以前在加利福尼亚州作出的所有死刑判决无效；从而这挫败了他在这方面执行该州原来死刑法律的努力（但后来加州宪法修正案推翻了最高法院的判决）。里根担任州长期间唯一的死刑处决是在1967年4月12日，当时亚伦·米切尔的判决由该州在圣昆廷的毒气室执行。

1969年，里根签署了《家庭法》，该法案是加州议会两年多来起草和修订的两项法案的混合体。它成为美国第一个无过错离婚立法。多年后，他告诉他的儿子迈克尔，签署这项法律是他在公共生活中“最大的遗憾”。

里根的州长任期有助于制定他在后来的总统政治生涯中将奉行的政策。通过在“让享受社会福利的流浪汉重返工作”的论题上进行竞选活动，他公开反对福利国家的想法。他还强烈主张共和党的理想，即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包括不当的联邦税收。

1976年总统竞选

里根1976年的竞选活动依赖于竞选经理约翰·西尔斯（JohnSiers）精心制定的策略，即提前赢得几场初选，从而损害福特可能获得提名的必然性。里根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但这一战略失败了，因为他最终失去了新罕布什尔州、佛罗里达州和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得克萨斯州的竞选活动给里根重新燃起了希望，他赢得了德州代表们的支持。这场胜利的大部分功劳来自三位共同主席的工作，包括米德兰市市长欧内斯特·安杰洛和休斯顿市长雷·巴恩哈特；里根将在1981年任命他为联邦公路局局长。

然而，随着共和党大会的临近，福特似乎接近胜利。福特最后是以1187名支持代表数量战胜了里根的1070名支持代表数量。

里根的败选演说强调了核战争的危险和苏联构成的威胁。虽然他失去了提名，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了307张书面选票，在怀俄明州的选票上获得了388张独立选票。

1980年总统竞选

1980年的总统大选以里根与现任总统吉米·卡特对决为特色，是在国内外众多担忧以及伊朗人质危机不断的情况下进行的。

里根的竞选班子强调了他的一些基本原则：降低税收以刺激经济，减少政

府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各州的权利，和强大的国防。

里根在竞选开始时对联邦政府提出了控诉，他认为联邦政府“超支、过度刺激、过度监管”。在获得共和党提名后，里根从初选中挑选了他的对手之一乔治·布什作为他的竞选伙伴。10月28日，他在里根-卡特电视辩论中轻松自信的露面提高了他的声望，并有助于扩大他在民调中的领先优势。

11月4日，里根战胜卡特，赢得44个州，获得489张选举人票，卡特在6个州获得49张选举人票，加上华盛顿特区。共和党也自1952年以来首次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但民主党在众议院仍保持多数席位。

总统任期（1981-1989）

在总统任期内，里根推行的政策反映了他本人对个人自由的信念，带来了经济变革，扩大了军队规模，为冷战的结束做出了贡献。被称为“里根革命”，他的总统任期将鼓舞美国人的士气，重振美国经济，减少对政府的依赖。作为总统，里根在日记中评论了他的总统任期的日常情况和他对当今问题的看法。这些日记于2007年5月发表在畅销书《里根日记》中。

第一任期

里根当年69岁，198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成为当时年龄最大的第一任总统。他坚持这一殊荣，直到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职。里根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了该国的经济困境，认为：“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政府是问题所在。”

在学校祈祷和默哀

里根大力宣传恢复有组织的学校祈祷活动，首先作为祈祷的时刻，后来作为默哀的时刻。1981年，里根成为第一位就学校祈祷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总统。里根的当选反映了民意对1962年最高法院恩格尔诉维塔莱一案的反对；该案禁止州政府规定官方的祈祷词并要求在公立学校背诵。

里根1981年提出的修正案指出：“本宪法中不得解释为禁止在公立学校或其他公共机构中个人或集体祈祷。美国或任何州不得要求任何人参加祈祷”。1984年，里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问国会，“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教室里，孩子们不能再次享受承认上帝的自由呢？”

1985年，里根对最高法院的裁决仍然禁止公立学校默祷表示失望，并说在公立学校恢复祈祷的努力是“一场艰苦的战斗”。1987年，里根再次呼吁国会支持学校自愿祈祷，结束“将上帝逐出美国教室”。

暗杀

1981年3月30日，里根、他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华盛顿警官托马斯·德拉万蒂和特勤局特工蒂姆·麦卡锡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外遭到准刺客约翰·辛克利的枪击。

虽然里根抵达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后“接近死亡”，但他在急诊室病情稳定，随后接受了紧急手术。他康复了，于4月11日从医院出院，成为第一位在暗杀未遂中存活的现任美国总统。这一尝试对里根的受欢迎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大增、约为73%。里根相信上帝饶了一命，这样他才能继续实现更高的目标。

桑德拉·戴·奥康纳

1981年7月7日，里根宣布，他计划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接替即将退休的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他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曾承诺，他将在9月21日任命第一位女性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以99票对0票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确认。

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

1981年8月，联邦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PATCO举行罢工，这违反了禁止政府工会罢工的联邦法律。里根宣布情况为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所

述的紧急情况，他说，如果空中交通管制员“在48小时内不报到工作，他们就失去工作，将被终止”。他们没有返回，8月5日，里根解雇了11,345名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使用主管和军事空管员来处理国家的商业空中交通，直到新的管制员能够被雇用和培训。

公共行政方面的一项主要研究工作得出结论，“PATCO雇员被解职不仅表明总统控制官僚机构的明确决心，而且还向私营部门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不再需要担心工会”。

“里根经济学”与经济

在吉米·卡特上任的最后一年（1980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12.5%，而里根上任的最后一年（1988年）为4.4%。里根执政期间，失业率从7.5%下降到5.4%；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均达到10.8%，1983年达到10.4%，8年平均增长率为7.5%。

里根推行以供给方经济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倡导自由放任的政策哲学和自由市场的财政政策，寻求通过大规模、全面的减税来刺激经济。他还支持美国恢复某种金本位制，并成功敦促国会成立美国黄金委员会，研究如何实施金本位制。里根引用了阿瑟·拉弗的经济理论，将减税提案宣传为可能刺激经济，足以扩大税基，抵消因税率降低而造成的收入损失。里根经济学是辩论的主题，支持者指出某些关键经济指标的改善是成功的证明，批评者指出联邦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大幅增加。他的“通过力量实现

和平”的政策导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创纪录，包括1981年至1985年间国防开支实际增加40%。

在里根执政期间，随着1981年《经济复苏税法》的签署，联邦个人税税率大幅降低，三年内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至50%（作为“5+10+10”计划的一部分），最低税率从14%降至11%。

国会通过并签署了1981年至1987年每年某种性质的增税法案，继续资助1982年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案（TEFRA）、社会保障和1984年赤字削减法案（DEFRA）等政府项目。TEFRA 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增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在1980年代初衰退于1982年结束之后强劲复苏，在他任职的八年中以每年7.9%的速度增长，1981年增长率高达12.2%。1982年12月，失业率达到每月10.8%的峰值，高于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期，随后在里根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里下降。创造了16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通货膨胀则显著下降。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是里根倡导的两党合作的又一努力，通过将税阶减少到4个税阶并削减多项税收减免来简化税法。最高税率降至28%，但对收入最高的人群征收资本利得税从20%提高到28%。最低税率从11%提高到15%，这被个人免税、标准扣除和所得税抵免的扩大所抵消。最终结果是将600万美国穷人从所得税名册中除名，并减轻了所有收入水平的所得税负债。

与财政部1月份首次预计的收入相比，里根时代所有税单的净效果是政府收入减少了1%。然而，从1980年至1989年，联邦所得税收入从3087亿美元增加到549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8.2%（2.5%归因于社会保障收入增加），

联邦支出以每年7.1%的速度增长。

里根的政策提出，当边际税率低到足以刺激投资时，经济增长就会出现，进而导致就业和工资的提高。批评者将这种“滴流式经济学”称为“滴水经济学”——认为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将给穷人带来“滴流”效应。随着里根1981年削减了对未得收入的最高经常税率，他把最高资本利得率降低到20%。里根后来将资本利得税率设定为与工资和薪金等普通收入税率相同的水平，两者均高达28%。里根被视为反税英雄，尽管他在总统任期内11次增税，都是以财政责任的名义。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总的说来，1982年的增税幅度大约是1981年减税的三分之一：占GDP的比重，增幅大大超过克林顿1993年的增税幅度”。根据历史学家和国内政策顾问布鲁斯·巴特利特的说法，里根在总统任期内增税收回了1981年减税的一半。

里根反对政府干预，他削减了非军事计划的预算，包括医疗补助，食品券，联邦教育计划和EPA。政府对储蓄和贷款行业的立场导致了储蓄和贷款危机。少数批评里根经济学的人也认为，这些政策部分地影响了1987年的股市崩盘，但对股市崩盘的单一原因没有达成共识。为了弥补新产生的联邦预算赤字，美国在国内外大量借款，将国债从9970亿美元增加到2.85万亿美元。里根形容新债务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大的失望”。

他再次任命保罗·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1987年他任命货币学家艾伦·格林斯潘接替他。里根终止了对国内石油的价格控制，石油价格随后下跌，没有像1970年代那样的燃料短缺。里根还履行了1980年竞选时的承诺，废除了1988年的暴利税，此前，该税增加了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一些经济学

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蒙代尔，认为里根的税收政策振兴了美国经济，促进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其他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认为里根的赤字是他的继任者乔治·布什背弃竞选承诺并诉诸增税的主要原因。

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情报界发起了一项计划，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实力。苏格拉底项目开发并展示了美国为获得竞争优势而产生和引领技术获取和利用的下一轮进化飞跃所需的手段——自动化创新。为了确保美国从自动化创新中获得最大的好处，里根在第二个任期内起草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建立一个新的联邦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苏格拉底项目的结果。然而，里根的任期在行政命令能够协调和签署之前就结束了，而即将上任的布什政府，将苏格拉底计划称为“工业政策”，并使之终止。

民权

里根政府经常被批评为执行不力，如果不是积极破坏民权立法的话。1982年，基层游说和立法运动迫使他放弃放宽该法律限制的计划后，他签署了一项法案，将《投票权法》延长了25年。他还签署了立法，设立联邦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虽然他这样做持保留态度。1988年3月，他否决了1987年的《恢复公民权利法》，但他的否决被国会否决。里根认为，这项立法侵犯了各州的权利以及教会和企业主的权利。

冷战升级

作为第一位受邀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1982年6月8日），里根预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将成为“历史灰烬”。

里根升级了冷战，下令大规模集结美国武装部队，并实施针对苏联的新政策：他恢复了被卡特政府取消的B-1兰瑟计划，并生产了MX导弹。作为对苏联部署SS-20的回应，里根监督北约在西德部署“佩尔辛”导弹。1982年，里根试图通过阻碍莫斯科向西欧输送天然气来切断莫斯科获得硬通货的机会。它损害了苏联的经济，但也造成了指望获得这些收入的美欧洲盟国的恶意。里根在这个问题上退却了。

1984年，记者尼古拉斯·莱曼采访了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总结了里根政府击退苏联的战略：

“他们的社会经济薄弱，缺乏进入信息时代的财富、教育和技术。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投入到军事生产中，因此他们的社会开始显示出可怕的压力。他们不能以我们的方式维持军事生产。最终，它将打破它们，然后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将只有一个超级大国”。

莱曼指出，当他在1984年写到，他认为里根派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但到2016年，莱曼说，这段话代表了“对里根实际所做所为的相当无可争议的描述”。

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以意识形态谴责苏联。1982年6月8日，里根在威斯敏斯特宫皇家画廊向英国议会发表著名讲话时说，“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留在历史的灰烬堆上”。1983年3月3日，他预言共产主义将崩溃，他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悲伤、离奇的篇章，其最后一页甚至现在都在书写”。1983年3月8日，里根在全国福音派协会发表演讲时称苏联为“一个邪恶的帝国”。

1983年9月1日，苏联战斗机在莫纳龙岛附近击落了大韩航空公司007航班，机上载有269人，其中包括佐治亚州国会议员拉里·麦克唐纳，里根将这一行为称为“大屠杀”，并宣称苏联已经转向“反对世界，和反对指导各地人民之间人际关系的道德戒律”。里根政府对此事件作出了回应，暂停了所有苏联飞往美国的客运航空服务，并放弃了与苏联谈判的几项协议，在财政上伤害了他们。由于此次击落事件，以及由于KAAL 007误入歧途的原因被认为是与其导航系统不足有关，里根于1983年9月16日宣布，全球定位系统一旦完成将免费提供给民用，以避免今后类似的导航错误。

在里根主义的政策下，里根及其政府还公开和秘密地向反共抵抗运动提供援助，以“击退”苏联支持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政府。然而，里根在打破卡特政府根据《台湾关系法》武装台湾的政策后，也同意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关于减少对台军售的要求。

里根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署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别活动司。他们在训练、装备和领导圣战者部队对抗苏联军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里根总统的“秘密行动”计划因协助结束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而获得赞扬，尽管当时美国资

助的一些军备后来将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中对美军构成威胁。中情局也开始与伊朗政府分享秘密的信息；有一次，在1982年，这种做法使伊朗政府能够识别和清除其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并几乎消除伊朗的亲苏联力量。

1983年3月，里根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计划（SDI），这是一个防御项目，该项目将利用地面和天基系统保护美国免受战略核弹道导弹的攻击。里根认为，这种防御盾牌可能使核战争不可能进行。围绕该计划的科学可行性，人们非常不相信，导致反对者将SDI描述为“星球大战”，并认为其技术目标无法实现。苏联人开始担心SDI可能产生的影响：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说，这将使“整个世界处于危险之中”。出于这些原因，里根总统的前助手大卫·格根认为，回想起来，SDI加速了冷战的结束。

尽管美国主要保守派人士认为里根的外交政策战略对保护美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但批评人士将政府的外交政策举措贴上了侵略性和帝国主义的标签，并斥责这些举措是“好战的”。政府也因支持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的反共领导人而受到严厉批评，如乍得的侯赛因·哈布雷和危地马拉的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

黎巴嫩内战

经国会批准，里根于1983年向黎巴嫩派兵，以减少黎巴嫩内战的威胁。1983年10月23日，作为黎巴嫩内战期间多国部队的一部分，美国驻贝鲁特维和部队遭到袭击。贝鲁特军营爆炸案造成241名美国军人死亡，60多人受

伤。里根派遣美国新泽西号战舰炮击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阵地。然后，他从黎巴嫩撤出了所有海军陆战队员。

入侵格林纳达

1983年10月25日，里根命令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代号为“紧急愤怒行动”）；此前，1979年的格林纳达政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府。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的正式呼吁导致美国军队的干预：里根总统还提到，苏联-古巴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集结构成的地区威胁，以及对圣乔治大学数百名美国医科学生安全的担忧，是入侵的充分理由。“紧急愤怒行动”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首次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几天的战斗开始了，导致美国取得胜利，有19名美国人死亡，116名美国士兵受伤。12月中旬，在总督任命新政府后，美军撤出。

1984年美国总统大选

里根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共和党的提名。他宣称，对于经济复苏和美国运动员在1984年夏季奥运会上在本土取得的优异成绩等，表明了现在是“美国又是早晨”。他成为第一位举办奥运会的美国总统。

里根在1984年总统大选中的对手是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在第一次总

统辩论中表现不佳之后，里根赢得连任的能力受到质疑。

里根在第二次辩论中反弹；面对有关他年龄的问题，他打趣道：“我不会把年龄作为这次竞选的问题。我不会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的对手的青春和缺乏经验”。这句话引起了掌声和笑声，甚至来自蒙代尔本人。

同年11月，里根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胜利，在50个州中拥有49个州【本书作者注：美国总统选举制度为“赢者全拿”；即，总统候选人如果在某一个州中获得超过该州半数选民的选票，则赢得该州选举人票数的全部】。蒙代尔只赢得了他的家乡明尼苏达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里根赢得了538张选举人票中的525张，是美国历史上赢得选举人票数最多的总统候选人。就选举人票而言，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第二不平衡的总统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战胜阿尔夫·兰登，赢得98.5%的选票，即当时总共531张选举人票中的523张。里根赢得了58.8%的民众选票，蒙代尔赢得了40.6%。他的民意支持率优势为——将近1690万张选票（里根5440万张，蒙代尔3750万张）——只有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战胜乔治·麦戈文时才多于他。

第二任期

1985年1月20日，里根在白宫举行的私人仪式上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因为1月20日是星期天，所以没有举行公众庆祝活动，而是在第二天在国会大厦举行。

反毒品战争

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毒品流行的担忧，里根于1982年开始了反毒品战争，这是联邦政府为减少非法毒品贸易而采取的政策。虽然尼克松以前曾向毒品宣战，但里根主张采取更激进的政策。他说，“毒品正在威胁我们的社会”，并承诺争取无毒品的学校和工作场所，扩大戒毒治疗，加强执法和缉毒工作，提高公众意识。

1986年，里根签署了一项毒品执法法案，预算为17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40亿美元），用于资助反毒品战争，并规定了对毒品犯罪的强制性最低惩罚。该法案因造成监狱人口严重种族差异而受到批评，批评者还指责这些政策在减少街头毒品供应方面收效甚微，同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努力的捍卫者指出，他们成功地降低了青少年吸毒率，他们把这归因于里根政府的政策：高中高年级学生吸食大麻从1980年的33%下降到1991年的12%。第一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将反毒品战争作为她的首要任务，发起了“说不”毒品宣传运动，旨在通过提供各种“不”的方式，阻止儿童和青少年从事娱乐性毒品使用。南希·里根走访了33个州的65个城市，提高了人们对包括酒精在内的毒品危害的认识。

应对艾滋病流行

根据ACT UP等艾滋病活动家组织以及唐·弗朗西斯和彼得·阿诺等学者的说法，里根政府基本上忽视了1981年开始在美国爆发的艾滋病危机。他们

还声称，在里根执政期间，艾滋病研究长期资金不足，疾病控制中心（CDC）的医生要求提供更多资金的要求经常被拒绝。

里根总统在就艾滋病问题准备发表首次演讲时，已有36,058名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20,849人死于艾滋病。到1989年里根卸任时，美国有10万多人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其中59,000多人死于艾滋病。

里根政府官员反驳了对忽视的批评，指出联邦政府对艾滋病相关项目的资金在他的任期内从1982年的数十万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23亿美元。在1985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里根说：“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是毫无疑问的严重性，并需要找到一个答案”。里根的国内政策顾问加里·鲍尔（Gary Bauer）在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时辩称，里根对内阁政府的信念促使他把反对艾滋病的工作分配给他的美国外科医生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解决种族隔离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公众越来越强烈地反对南非白人少数派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坚持要求美国对南非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

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的替代战略，里根政府制定了与南非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以此鼓励南非政府逐步摆脱种族隔离制度。这是旨在促进整个

南部非洲和平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更大倡议的一部分。然而，这项政策引起了许多公众的批评，并再次呼吁实施严厉的制裁。作为回应，里根宣布对南非政府实施新的制裁，包括1985年底的武器禁运。然而，这些制裁被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视为软弱无力，而且总统在国会的反对者认为不够。1986年8月，国会通过了《全面反种族隔离法》，其中包括更严厉的制裁。里根否决了这项法案，但否决权被国会否决了。之后，里根重申他的政府和“全美国”反对种族隔离，并说，“辩论。。。不是是否反对种族隔离，而是如何最好地反对种族隔离，以及如何最好地给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带来自由”。几个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很快效仿美国，对南非实施制裁。

利比亚轰炸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6年与里根一起）批准美国利用英国空军基地发动利比亚袭击。

从1981年西德拉湾事件开始，里根总统领导下的利比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到1982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与苏军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被中情局官员视为“我们的国际头号公敌”。这些紧张局势后来在1986年4月初重新抬头，当时一枚炸弹在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造成63名美国军事人员受伤，一名军人死亡。里根说，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利比亚指挥了“恐怖主义爆炸”，他授权对利比亚使用武力。1986年4月15日深夜，美国对利比亚的地面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空袭。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允许美国空军利用英国的空军基地发动这次袭击，理

由是英国支持美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自卫权。这次袭击旨在阻止卡扎菲的“出口恐怖主义能力”，为他提供“改变其犯罪行为的激励和理由”。总统在袭击发生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指出：“当我们的公民在世界任何地方受到敌对政权的直接命令的攻击或虐待时，只要我在这个办公室，我们就会作出反应。许多国家谴责了这次袭击。联合国大会以79票赞成、28票反对、3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第41/38号决议，”谴责1986年4月15日对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人民发动的军事攻击，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移民

里根于1986年签署了《移民改革和控制法》。该法案规定，故意雇用或招募非法移民是非法的，要求雇主证明其雇员的移民身份，并赦免了1982年1月1日之前进入美国的大约300万非法移民，并允许他们持续居住在美国。里根在新修的自由女神像旁举行的仪式上签署这项法案时说，“该法案的合法化条款将远远改善一类人的生活，他们现在必须躲在阴影中，而不能享受自由和开放社会的许多好处。很快，这些男人和女人中的许多人将能够踏入阳光下，最终，如果他们选择，他们可能会成为美国人”。里根还说，“雇主制裁计划是关键和主要因素。它将消除吸引非法外国人的就业机会，从而消除非法移民的动机。”

伊朗-反政府事件

1986年，伊朗-反政府事件成为里根政府的问题，原因是在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利用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来资助反政府武装在尼加拉瓜与其政府作战，而国会的一项法案明确宣布此为非法。80年代，这一事件在美国成为政治丑闻。国际法院裁定，美国以各种方式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尼加拉瓜的条约。里根后来撤回了美国与国际法院之间的协定。

里根总统声称他不知道阴谋的存在。他展开了自己的调查，并分别任命了两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约翰·塔、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埃德蒙·穆斯基来调查这一丑闻。委员会找不到里根事先知道该计划的直接证据，但严厉批评他脱离了管理他的员工，使得资金的转移成为可能。国会的另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如果总统不知道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在做什么，那他应该知道”。里根的支持率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从67%下降到46%，这是有史以来对总统来说最显著、最快的下降。丑闻导致里根政府中的11人被定罪和面临14项起诉。

许多中美洲人批评里根支持反共组织，称他为反共狂热分子，对侵犯人权视而不见，而另一些人则说他“拯救了中美洲”。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说，他希望上帝能原谅里根对尼加拉瓜的“肮脏战争”。

1988年，在伊朗-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海军导弹巡洋舰“文森尼斯号”意外击落伊朗航空公司655航班，造成290名平民乘客死亡。这一事件进一步恶化了本已紧张的伊朗与美国的关系。

苏联的衰落和关系的解冻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直依靠其武器的质优势来从根本上吓唬苏联，但差距已经缩小。虽然苏联在里根总统军事集结后没有加速增加军费开支，但他们本已巨大的军事开支，加上集体化农业和低效的计划制造，是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1985年石油价格下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石油是苏联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因素促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任期内苏联经济停滞不前。

与此同时，里根的言辞升级。在1983年对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著名演讲中，他概述了他的胜利策略。首先，他把苏联制度称为“邪恶帝国”和失败——它的灭亡将是世界的天赐之物。其次，里根解释说，他的战略是建立武器，使苏联远远落后，别无选择，只能谈判削减武器。最后，他表现出他特有的乐观主义，赞扬自由民主，并承诺这种制度最终将战胜苏联共产主义。

里根赞赏苏联与戈尔巴乔夫政策方向的革命性变化，转而从事外交活动，意在鼓励苏联领导人寻求实质性的武器协议。1985年至1988年期间，他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四次首脑会议：第一次在瑞士日内瓦，第二次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第三次在华盛顿特区，第四次在莫斯科。里根认为，如果他能说服苏联允许更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这将导致改革和共产主义的结束。1986年10月，关键的首脑会议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他们单独会见，除了翻译，没有助手。让世界惊讶的是，里根最保守的支持者也感到懊恼，他们同意废除所有核武器。戈尔巴乔夫随后要求结束SDI。里根说不，声称这只

是防御性的，他将与苏联分享秘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987年6月12日，里根以总统身份首次访问西柏林五年后，在柏林墙发表讲话，他要求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他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寻求和平，如果你为苏联和东欧谋求繁荣，如果你寻求自由化，就到这扇门来！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后来，1989年11月，东德当局开始允许公民自由通过边境检查站，并在第二年6月开始拆除隔离墙：拆除工作于1992年完成。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时，他和里根在白宫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INF条约），废除了全部核武器。两位领导人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奠定了框架。里根坚持将条约名称从战略武器限制会谈改为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1988年里根访问莫斯科参加第四次峰会时，他被苏联视为名人。一位记者问总统，他是否仍然认为苏联是邪恶的帝国。“不，”他回答，“我说的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就自由市场问题发表了演讲。

健康

里根在总统任期早期就开始佩戴定制的、技术先进的助听器，先是右耳，

后来是左耳。1983年，他决定公开他穿着这种小型的音频放大设备，这促进了它们的销售。

1985年7月13日，里根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了手术，切除了结肠癌息肉。他以与第25修正案类似的程序将总统权力让给副总统8小时。手术持续了不到三个小时，并取得了成功。里根当天晚些时候恢复了总统的权力。那年8月，他接受了切除鼻子上皮肤癌细胞的手术。10月，在他的鼻子上检测到更多的皮肤癌细胞并被切除。

1987年1月，里根接受了前列腺手术，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没有发现癌变生长。那年7月，76岁的他接受了第三次鼻子皮肤癌手术。

1989年1月7日，里根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接受了手术，以修复左手无名指的收缩。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在区域麻醉下进行。

司法

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里根承诺，如果有机会，他将任命第一位女最高法院法官。这一机会是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当时副法官波特·斯图尔特退休；里根选择了桑德拉·戴·奥康纳，她得到了参议院的一致确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里根有三次机会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当首席大法官

沃伦·伯格于1986年9月退休时，里根提名现任副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接替汉堡担任首席大法官（任命现任助理大法官为首席大法官须经过单独的确认程序）。然后，在伦奎斯特的确认后，总统任命安东宁·斯卡利亚填补随后的助理司法空缺。里根填补空缺的最后机会出现在1987年年中，当时副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宣布他打算退休。里根最初选择保守党法学家罗伯特·博克接替鲍威尔。博克的提名遭到民权和妇女权利团体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10月，在参议院一场有争议的辩论之后，提名以42票对58票的点名表决被否决。不久之后，里根宣布他打算提名道格拉斯·金斯堡出庭。然而，在他的名字提交参议院之前，金斯堡退出了审议。安东尼·肯尼迪随后被提名并确认为鲍威尔的继任者。

除了4次最高法院任命外，里根还任命了83名美国上诉法院法官和290名美国地区法院法官。里根在总统任期早期任命圣地亚哥的小克拉伦斯·彭德尔顿为第一位担任美国民权委员会主席的非裔美国人。彭德尔顿试图引导委员会朝着保守的方向发展，以符合里根在1981年至1988年期间对社会和民权政策的看法。

总统卸任以后（1989–2004年）

突击

1992年4月13日，里根在接受拉斯维加斯全国广播协会颁发的奖项时，在一次午餐演讲中遭到一名反核抗议者的袭击。抗议者理查德·斯普林格砸碎

了广播公司送给前总统的一座两英尺高（61厘米）、重30磅（14公斤）的鹰形水晶雕像。飞来的玻璃碎片击中了里根，但他没有受伤。斯普林格利用媒体的资历，打算在第二天宣布政府在内华达沙漠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的计划。斯普林格是一个名为“第100只猴子”的反核组织的创始人。在因攻击罪被捕后，特勤局发言人无法解释斯普林格是如何通过一直保护里根生命的联邦特工的防护圈的。后来，斯普林格认罪，减轻指控，并说他无意通过他的行为伤害里根。他承认了联邦对于干涉特勤局的轻罪指控，但其他攻击和反抗官员的重罪指控被撤销。

公开演讲

1989年卸任后，里根夫妇除了在圣巴巴拉的里根牧场外，还在洛杉矶贝尔艾尔购买了一套房子。他们经常参加贝尔教堂，偶尔代表共和党露面；里根在199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广为人知的演讲。此前，1991年11月4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五位总统和六位第一夫人出席了颁奖仪式，这是五位总统首次聚集在同一地点。里根继续公开发言支持布雷迪法案：宪法修正案，要求平衡预算；废除第22修正案，禁止任何人担任超过两届总统。1992年，里根与新成立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一起设立了罗纳德·里根自由奖。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发生在1994年2月3日。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94年4月27日理查德·尼克松的葬礼上。

阿尔茨海默病

公告和反应（1994）

1994年8月，83岁的里根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这是一种不治之症，会破坏脑细胞并最终导致死亡。同年11月，他通过一封手写的信向全国通报了诊断结果，其中写道：

“我最近被告知，我是数百万将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美国人之一...此刻我感觉很好。我打算活在上帝赐予我在地球上做我一直做的事情的余下时间里...我现在开始的旅程，将带领我进入我生命的夕阳。我知道，对于美国来说，总会有光明的曙光。谢谢你，朋友们愿上帝永远保佑你。”

诊断后，祝福者的支持信涌进他加州的家。然而，也有人猜测里根表现出精神退化症状的时间有多长。在1981年6月为市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在暗杀未遂后不久，里根向他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塞缪尔·皮尔斯致意，说：“市长先生，你好吗？你城市的情况怎么样？”尽管他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2011年一本名为《我的父亲在100岁时》的书中，里根的儿子罗恩说，他早在1984年就怀疑父亲患有痴呆症的早期迹象：这一指控引起了他的弟弟迈克尔·里根的强烈反应，他指责罗恩“出卖父亲卖书”。罗恩后来缓和了他的说法，他告诉《纽约时报》，他不相信他的父亲在任期间确实受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抑制，只是“这种疾病很可能存在于他身上”，在他1994年诊断之前的几年里。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白宫记者莱斯利·斯塔尔回忆说，在1986年与总统的最后一次会面中，里根似乎不知道她是谁。斯塔尔声称，她差点报告里根已经老了，但到会议结束时，他已经恢复了敏感性。

然而，医学专家，包括许多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和之后治疗里根的医生，都广泛驳斥了里根在任期间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观点。关于他在任期间的精神能力，里根的四位白宫医生都坚称，他们从未“即使事后”对前总统的诊断有任何顾虑。神经外科医生丹尼尔·鲁格（Daniel Ruge）在1981年至1985年担任总统医师，他说，他几乎每天都与里根交谈时，从未发现这种疾病的迹象。1985年至1989年任职的约翰·赫顿说，总统“绝对”没有“表现出任何痴呆症或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迹象”。虽然所有人都熟悉这种疾病，但里根的白宫医生都没有专门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一位审查里根公共和医疗记录的外部专家同意这样的结论，即他在总统任期内没有痴呆症的迹象。里根的医生说，他第一次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在1992年底或1993年。其中一个例子可能包括里根在1993年2月6日82岁生日的聚会上用同样的言辞和手势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重复祝酒。《纽约时报》的劳伦斯·奥特曼（医学博士），虽然指出“单纯健忘和阿尔茨海默氏症开始之间的界限可能是模糊的”，在审查里根的医疗记录并采访他的医生后同意，在里根任职期间似乎没有痴呆症的迹象。其他工作人员、前助手和朋友说，在他当总统期间，他们没有看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迹象。不过，里根确实偶尔会经历记忆的失误，尤其是名字。

里根在1989年7月遭受了头部创伤。他在墨西哥被从马背上扔下后，在晚些时候发现了一个下部血肿并进行了手术治疗。南希·里根援引医生告诉她的话断言，她丈夫1989年的跌倒加速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尽管急性脑损伤尚未得到确凿的证明可以加速阿尔茨海默氏症或痴呆症的发作。鲁格说，马事故有可能影响里根的记忆。

进展（1994-2004年）

随着岁月流逝，这种疾病慢慢摧毁了里根的精神能力。他只能认出几个人，包括他的妻子南希。然而，他仍然活跃：他经常在自己家附近的公园和海滩上散步，经常打高尔夫球，直到1999年，他经常去他位于世纪城附近的办公室。

2001年1月13日，里根在贝尔艾尔的家中摔倒，臀部骨折。骨折在第二天修复。2001年2月6日，里根年满90岁，成为继约翰·亚当斯和赫伯特·胡佛之后第三位如此长寿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公开露面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变得不那么频繁，因此，他的家人决定，他将和他的妻子南希一起生活在安静的半隔离中。2001年，她告诉CNN的拉里·金，很少有访客被允许见到她的丈夫，因为她觉得“里根希望人们记住他从前的样子”。在她丈夫的诊断和死亡之后，南希·里根成为干细胞研究倡导者，声称这可能导致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

死亡和葬礼

2004年6月5日下午，里根在加州洛杉矶贝尔艾尔区的家中死于肺炎，死于阿尔茨海默氏症。南希·里根在他去世后不久，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我和我的家人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罗纳德·里根总统在患老年痴呆症10年后去世，享年93岁。我们感谢大家的祈祷”。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法国巴黎发表讲话，称里根的死是“美国生命中的悲伤时刻”。他还宣布6月11日为全国哀悼日。

里根的遗体被送往加州圣莫尼卡的金斯利和盖茨葬礼馆，祝福者在草地上献上鲜花和美国国旗，以示敬意。6月7日，他的尸体被转移到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在那里举行了由迈克尔·温宁牧师主持的简短的家庭葬礼。里根的遗体在图书馆大厅休息到6月9日：超过10万人瞻仰了灵柩。6月9日，里根的遗体被空运到华盛顿，在那里他成为第十位躺在美国国会大厦的美国总统。在34小时内，104,684人从灵柩前走过。

6月11日，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国葬，由美国总统布什主持。悼词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加拿大前总理布赖恩·穆罗尼以及前总统乔治·布什和现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致词。出席的还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包括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内的许多世界领导人。查尔斯王子，代表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德国总理施罗德；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阿富汗临时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和伊拉克总统加齐·亚维尔。

葬礼结束后，里根的随行人员被空运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在那里举行了另一场仪式。里根去世时，是美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总统，他活了93年零120天（他超越了约翰·亚当斯的记录）。他也是21世纪第一位去世的美国总统。里根的墓地上刻着他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开幕时的讲话：“我心里知道人是善良的，正确的人终究会胜利，每一个生命都有目的和价值。”

遗产

自里根1989年卸任以来，学者、历史学家和公众围绕他的遗产进行了大量辩论。支持者指出，由于里根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的胜利，包括和平结束冷战、和恢复美国人的自豪感和士气，经济更加高效和繁荣。支持者说，在吉米·卡特被认为领导不力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美国人的信心和自尊心下降，以及他在1980年大选期间对美国未来的悲观、沉闷的前景之后，他对美国怀有有增无减和充满激情的爱，恢复了对美国梦的信心。批评者指出，里根的经济政策导致预算赤字上升，贫富差距扩大，无家可归者增加，伊朗问题降低了美国的信誉。

美国主要决策者和记者对里根遗产的看法也不同。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费尔纳说，里根“帮助创造了一个更安全、更自由的世界”，并谈到他的经济政策时说：“他让一个遭受‘不适’的美国。。。。。。并使其公民再次相信他们的命运”。然而，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马克·魏斯布罗特（Mark Weisbrot）认为里根的“经济政策大多是失败的”，而《华盛顿邮报》的霍华德·库尔茨则认为里根“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比电视上大量涌出的奥比特所暗示的更具争议性的人物”。

尽管围绕他的遗产的争论不断，但许多保守派和自由派学者都认为里根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总统，通过他有效的沟通和务实的妥协，他在美国政治、外交、文化和经济上留下了印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M. J. Heale总结的那样，自里根卸任以来，历史学家们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即他恢复了保守主义，把国家转向了右翼，实行了相当务实的保守主义，平衡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约束，恢复了对总统和美国优异论的信心，为冷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冷战

2017年，C-SPAN对学者的调查显示，里根的领导地位与所有42位总统相比，他在国际关系中排名第九。

里根的主要成就是在离任时结束了冷战。此外，苏联和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瓦解，在他卸任三年后彻底崩溃。美国因此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崇拜者说，他赢得了冷战。1989年，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对所有东欧卫星的控制。1991年，共产主义在苏联被推翻，1991年12月26日，苏联不复存在。由此产生的新国家对美国没有威胁。里根的确切角色正在争论中，许多人认为里根的国防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政策以及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强硬言论，以及他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晤，在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是第一位拒绝遏制和缓和，并实践苏联可以被击败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地谈判。这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外交部发言人根纳迪·格拉西莫夫

（Gennadi Gerasimov）所证明的，他说，战略防御倡议“是非常成功的敲诈勒索”。... 苏联经济无法忍受这样的竞争。里根对苏军的咄咄逼人的言辞效果好坏参半：杰弗瑞·克诺普夫指出，被贴上“邪恶”的标签可能对苏联没有影响，但对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欧公民给予了鼓励。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谈到他的前对手冷战时期的作用时说：“（他是）一个

在结束冷战方面有帮助的人”，并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不承认战争的成败，而是承认和平结束：他说他没有被里根的严厉言论吓倒。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到里根时说：“他警告说，苏联对军事力量有着贪得无厌的动力……但他也感觉到它被不可能改革的系统性失败所吞噬”。她后来说，“罗纳德·里根比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更主张赢得冷战的自由，他这样做没有开枪”。加拿大前总理布赖恩·穆罗尼说：“他以（冷战时期）一个强大而戏剧性的角色进入历史”。波兰前总统莱赫·瓦文萨承认，“里根是为共产主义垮台做出重大贡献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杰弗里·克诺普夫教授认为里根的领导只是冷战结束的几个原因之一。杜鲁门总统的遏制政策也被视为苏联垮台背后的力量，苏联入侵阿富汗破坏了苏联制度本身。

国内和政治遗产

里根重塑了共和党，领导了现代保守主义运动，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动态。

卸任后，里根成为共和党内的标志性人物。自1988年以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经常援引他的政策和信仰。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不例外，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在初选辩论中把自己比作他，甚至模仿他的竞选策略。共和党提名人约翰·麦凯恩经常说，他上任时是“里根革命的一名步兵”。里根关于小政府作用的最有名的陈述是：“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美国历史上最受里根统治的时期，以及他涉及税收、福利、国防、联邦司法和冷战的政策，今天被称为里根时代。这一时期强调，里根领导的保守的“里根革命”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比尔·克林顿政府经常被视为里根时代的延伸，乔治·布什政府也被视为里根时代的延伸。历史学家埃里克·福纳指出，2008年奥巴马的参选“激起了那些渴望在里根主义近三十年后改变的人的很多一厢情愿的想法”。

文化和政治形象

专栏作家查克·拉施认为，“里根改变了美国总统的任期，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重新定义了时代的政治议程，主张降低税收，保守的经济哲学和更强大的军队。他在冷战中的角色进一步提升了作为另一种领导人的形象”。里根的“朴素风格、乐观主义和朴实的风度”也帮助他“将抨击政府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自1989年以来，里根的受欢迎程度有所提高。1989年里根卸任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为68%。这个数字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支持率相当（后来与比尔·克林顿相提并论），是现代离任总统的最高支持率。2001年、2007年和2011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当记者被问及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时，他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里根在2007年拉斯穆森报告民调中排名第三，在2000年美国广播公司（ABC）民调中名列第五，在2007年拉斯穆森民调中名列第九，在英国报纸《泰晤士报》2008年末的民调中名列第八。然而，在锡耶纳学院对200多名历史学家的调查中，里根在42位历史学家中排名第16位。虽然关于里根遗产的辩论仍在进行中，但

2009年C-SPAN总统领导人年度调查将里根列为第十大总统。这项对主要历史学家的调查在2000年将里根评为第11位。

2011年，美洲研究所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对美国总统进行评分的学术调查。这项针对美国历史和政治领域的英国专家的民意调查显示，里根是美国第八位最伟大的总统。

里根能够用可以理解的术语谈论实质性问题，并专注于美国主流关切，这为他赢得了“伟大的沟通者”的赞誉。其中，里根说，“我赢得了伟大的沟通者这个绰号。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的风格多么重要——而是内容本身。我不是一个伟大的沟通者，但我传达了伟大的事情”。他的年龄和柔和的演讲给了他一个温暖的祖父形象。

里根还赢得了“特氟隆总统”的绰号，因为公众对他的看法并没有被他执政期间出现的争议所玷污。据科罗拉多女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说，这个绰号提到里根有能力“几乎做任何事情，而不是为此受到指责”。

公众对里根的反应总是好坏参半。他是当时年龄最大的总统，并得到年轻选民的支持，他们开始结成联盟，将他们中的许多人转移到共和党。里根在少数族裔群体的赞同方面表现不佳，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然而，他在总统任期内对以色列的支持赢得了许多犹太人的支持。他在竞选和总统任期内强调家庭价值观，尽管他是第一位离婚的总统。里根的演讲风格、毫不

掩饰的爱国主义、谈判技巧以及他精明地利用媒体相结合，在界定20世纪80年代和他未来的遗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里根在有生之年经常开玩笑，在总统任期内表现出幽默，并以讲故事而闻名。他的众多笑话和单行本被贴上了“经典俏皮话”和“传奇”的标签。他最引人注意的笑话是一个关于冷战的笑话。作为1984年8月每周广播讲话的麦克风测试，里根开了一个玩笑：“我的美国同胞们，我很高兴今天告诉你，我已经签署了立法，将俄罗斯永远取缔。我们五分钟后就开始轰炸了”。1987年6月12日，数百名美国人在坦普尔霍夫美国空军基地也观察到了里根的幽默感。在庆祝柏林750周年的演讲中，前排突然飞速弹出一个气球。里根没有错过任何机会，他打趣道：“没打着我”，这指的是他1981年的暗杀企图。前助手大卫·格根评论道：“就是因为那种幽默...我认为里根可爱的人。”

他还有能力在悲剧时刻给整个国家带来安慰和希望。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解体后，灾难发生当晚，里根向全国发表讲话说，

“未来不属于胆小鬼：它属于勇敢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今天上午，当他们准备他们的旅程，挥手告别，‘挣脱地球的纽带’，‘触摸上帝的脸’。”

荣誉

里根在总统前和总统任期后曾多次获奖。里根当选总统后，获得了银幕演

员协会的终身金会员资格，并入选了全国演讲者协会演讲名人堂，获得了美国军事学院的西尔瓦努斯·泰耶奖。1981年，里根被伊利诺伊州林肯学院授予伊利诺伊州州长林肯勋章（该州最高荣誉）。1982年，他被美国军团授予“杰出服务勋章”，因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国防。1983年，他获得了日本童子军协会的最高荣誉——金菲桑奖。1989年，里根被授予英国最高勋章之一的荣誉骑士大十字勋章。里根还被任命为牛津凯布尔学院的荣誉研究员。1989年，日本授予他菊花勋章。1990年，里根被授予WPPAC最高荣誉奖，因为他与时任俄罗斯总统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阁下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并结束了冷战。

1993年1月18日，里根从副总统兼继任者乔治·布什总统那里获得总统自由勋章（授予荣誉），这是美国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里根还被授予共和党参议员自由勋章，这是参议院共和党议员授予的最高荣誉。

1998年里根87岁生日时，华盛顿国家机场被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法案改名为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根据1999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他是盖洛普20世纪最受尊敬的18人之一。两年后，一艘航空母舰被美国海军命名为“罗纳德·里根号”。这是为数不多的为纪念活着的人而命名的海军舰艇之一，也是第一艘为纪念一位活着的前总统而命名的航空母舰。1998年，美国海军纪念基金会授予里根海军遗产奖，以表彰他在电影生涯和担任总统期间对美国海军和军队的支持。

《时代》杂志也把里根列为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探索频道要求观众在2005年6月投票给最伟大的美国人：里根排在第一位，领先于亚

伯拉罕·林肯和小马丁·路德·金。

2007年，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授予里根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称里根激励波兰人民为变革而努力，帮助推翻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卡钦斯基说，“要不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坚强、决心和使命感，这是不可能的”。里根在总统任期内支持波兰全国反共团结运动。

2009年6月3日，南希·里根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塔为她已故丈夫的雕像揭幕。前一天，奥巴马总统签署了《罗纳德·里根百年委员会法案》，将该法案写入法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计划开展活动，纪念里根诞辰一百周年。

1960、1970年代的美国与西方世界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47%E2%80%931953\)](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47%E2%80%931953))

冷战（1947-1953）

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

在欧洲美英与苏联的联盟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年后，冷战正式出现，并延续到 1989-91 年。1947 年，千万富翁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哈里·S·杜鲁门的总统顾问），创造了“冷战”一词来描述二战盟国：美国、大英帝国，与苏联之间逐渐趋冷的关系。

在较早之前，西方和苏联之间就曾经出现过一些冲突。1945-46 年，美国
和英国强烈抗议苏联在东欧和伊朗的政治接管努力，而对苏联间谍的追捕
使紧张局势更加明显。

=====

东方集团的建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吞并了共产国际联盟之内的几个社会主义共和
国。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大多数这些
国家已被该协议秘密地割让给苏联。

这些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地交给苏联的国家或地区包括，东波
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东部的一部分和罗马尼亚北部。

苏联占领的其他几个没有被直接并入苏联的国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他
们虽然在名义上独立，但却在实质层面，在其国家政府的专制组织和国家
运作的许多方面，受到苏联的直接掌控）。

在东德地方选举失利后，社会主义统一党中的多个政党被迫合并，随后是

1946 年的选举，政治反对派受到压迫。

在非苏联吞并的波兰部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波兰人口投票支持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于是举行了第二次操纵选举以得到预期的结果。1947 年 1 月举行的欺诈性波兰选举，导致波兰正式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人民共和国。

在匈牙利，苏联设置了一个共产党政府；拉科西·马加什被任命为匈牙利共产党的总书记；它开始了一个在欧洲的最恶劣的独裁政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在保加利亚，二战即将结束时，苏联越过边界，为第二天晚上的共产主义政变创造了条件。索非亚的苏联军事指挥官拥有最高权力；他所指导的共产党人，包括基蒙·格奥尔基耶夫（Kimon Georgiev）（他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其政治组织与共产党合作），完全掌握了国内政治的控制权，使之成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在苏联的支持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4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变中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可争议的控制权，迎来了独裁统治。

在1946年的罗马尼亚大选中，罗马尼亚共产党(PCR) 采用广泛的恐吓策略和选举舞弊获得 80% 的选票，此后取消了中间派政党的作用。强制合并的

结果是，到 1948 年，大多数非共产主义政治家被处决、流放或入狱。

1945年12 月阿尔巴尼亚大选，唯一有效的选票选择是由恩维尔·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民主阵线的选票。1946年，阿尔巴尼亚被宣布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从一开始，斯大林领导的东方集团国家的制度就拒绝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征、民主治理（在苏联的说法中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并且国家法治制度受到专制统治者的任意压制。

他们在经济上是共产主义的，并依赖苏联提供大量的材料。虽然在二战后的头五年里，发生了从这些国家到西方的大规模移民，但此后实施的限制措施阻止了大多数东欧国家人民向西方移民；但有限的双边和其他协议除外。

=====

遏制

1945 年之后的时期可能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流行的历史高点。红军和苏联在二战中所曾经承受的重担为它赢得了巨大的尊重，如果约瑟夫·斯大林

充分利用它，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共产主义的欧洲。

共产党在中国、希腊、伊朗和马哈巴德共和国等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共产党已经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执政。这让英国和美国担心，那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选举胜利都可能导致西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

摩根索和马歇尔计划

1947 年的饥饿冬天，成千上万的西德人抗议灾难性的粮食状况。游行的牌子上写着：“我们要煤，我们要面包”。

苏联在战争中损失了 2700 万人，决心摧毁德国进行另一场战争的能力，并在战时的盟军会议上推动了这一点。

由此产生的摩根索计划政策的期望目标是，使德国回归一个没有重工业的牧区。

由于为避免德国的大规模饥荒而进口食品的成本不断增加，并且有整个德国国家被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美国政府于 1946 年 9 月在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的演讲中放弃了摩根索计划中关于德国的政策。

1947 年 1 月，杜鲁门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国务卿，并颁布了 JCS 1779 法令；该法令规定，一个有序和繁荣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和多产的德国”的经济贡献。

该指令符合 Lucius D. Clay 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共产主义在德国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欧洲其他经济体在没有德国工业基础的情况下无法复苏的观点（在二战以前，那些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工业基础关系密切）。

美国政府官员会见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敦促实现德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包括对苏联已经拆除的工厂、商品和基础设施进行详细核算。

经过六周的谈判，莫洛托夫拒绝了这些要求；谈判被迫休会。

马歇尔在与斯大林会面后特别沮丧，斯大林表示对解决德国经济问题没有兴趣。

美国的结论是，解决方案不能再等了。在 1947 年 6 月 5 日的演讲中，根据杜鲁门主义的思想，马歇尔宣布了一项美国向所有希望参与的欧洲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援助的综合计划，称为马歇尔计划。

由于害怕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渗透，斯大林最终禁止那些新成立的、实行共产主义政权的东欧国家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导致了1948 年的一场残酷政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本要同意接受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美国援助，但是，苏联通过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内部动乱和政变，导致原政府中的领导势力被推翻。这场政变的残酷性比迄今为止任何事件都震惊了西方国家，并引发了一场短暂的恐慌。

=====

希腊内战和杜鲁门主义

东方和西方都认为希腊是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国家。斯大林本不打算在希腊问题上得罪丘吉尔。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不顾苏联的阻止政策，向希腊内战中的共产党军队运送军备物资。因而，英国向希腊的保皇党希腊军队提供了援助，使共产党人（他们没有苏联的正式援助，并抵制选举）处于不利地位。

然而，到 1947 年，濒临破产的英国政府无法再维持其大规模的海外承诺。除了授予印度独立地位、以及把巴勒斯坦的治理权利交给联合国，英国政府还决定从希腊和土耳其附近撤回、不再继续提供援助。这将使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希腊，处于共产主义领导的革命的边缘。

美国政府得知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将在不到六周内结束；并且，美国已经对苏联的意图怀有敌意和严重质疑（因为苏联人不愿从伊朗撤军）。——因此，杜鲁门政府决定采取额外行动是必要的。

由于国会牢牢掌握在共和党手中，加上美国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高涨（美国民众并不想对于国际外交事务进行过多干涉），杜鲁门采取了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方法。

在与国会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桶里的苹果会被一个腐烂的苹果感染”的论点被用来说服他们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重要性。

它成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

1947 年 3 月 12 日上午，哈里·S·杜鲁门总统出现在国会面前，要求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 4 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呼吁国会批准美国“支持那些抵抗武装少数派、或外部征服压力的自由人民”，或者简而言之——“遏制”

政策。

杜鲁门阐述了意识形态斗争；这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虽然这是基于对希腊和土耳其内部冲突的简单分析，但至少在越南战争之前，它成为对美国政策的唯一主导影响。

杜鲁门的演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刚开始萌芽的反共情绪得到极大的推动，沉默的国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援助法案。

美国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撤回西半球。从那时起，美国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帜下，积极与全球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作斗争。美国承担起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的角色。与此同时，苏联则炫耀着自己作为“进步”和“反帝”阵营领袖的地位。

=====

纳粹-苏联关系，与《历史的伪造者》一书

1948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还出版了名为《1939-1941 年纳粹与苏联的关系：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的文件集，其中包含纳粹德国外交部的文件。这导致美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该出版的文件集揭示了，——德国

与苏联所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包括其中的分割东欧的秘密协议；以及1939年的苏德商业协议；该文件集还表明，苏德曾经讨论了，苏联有可能加入德意日集团而成为第四个轴心国。

作为回应，一个月后，苏联出版了《历史的伪造者》，这是一本斯大林编辑并部分改写的攻击西方的书。该书并未试图直接反驳或解释《1939–1941年纳粹与苏联的关系：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中发表的文件，而是将重点放在西方对1939年爆发战争的责任上。它认为，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西方列强”协助纳粹重整军备和侵略，包括美国银行家和工业家为德国战争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同时故意鼓励希特勒向东扩张。该书还声称，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执行期间，斯大林拒绝了希特勒瓜分世界的提议；但并未提及苏联曾经想要加入轴心国的提议。自从1948年《历史的伪造者》一书在苏联出版以后，直到苏联在1990年代解体之前，苏联以及共产主义东欧的官方话语讲述，历史回忆录，以及教科书，都是以这本书为历史陈述的基础。

=====

柏林封锁

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西德引入了一种新货币，以取代贬值的德国马克；同时，共产党在1946年的西德选举中遭受巨大失败；这导致了，1948年6月，苏联占领军（当时，在二战结束、纳粹投降以后，英美法占领军控制

德国的西侧部分，而苏联占领军控制德国的东侧部分；柏林位于两者之间、但偏东的位置、处于苏联占领区的包围之中，但与西德经济有密切联系）切断了从西德其余地区通往柏林的地面公路。

在柏林封锁当天，一位苏联代表告诉其他占领国：“我们警告你们和柏林人民，我们将实施经济和行政制裁，这将导致在柏林只使用苏联占领区的流通货币。”

此后，柏林的街道和水上交通被切断，铁路和驳船交通停止；苏联人停止向柏林的非苏联地区的平民提供食物（此时，柏林城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英美法西方国家占领军所掌控的部分，另一部分是苏联占领军所掌控的部分）。

由于柏林位于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内，而其他占领国此前曾依赖苏联的善意进入柏林，现在，在苏联封锁柏林的情况下，——如果西方要对柏林进行物资援助，那么，唯一可用的供应城市的方法是三个有限的空中走廊。

到 1948 年 2 月，由于战后大规模裁员，整个美国军队已减至 552,000 人。

非苏联柏林地区的军队总数只有 8,973 名美国人、7,606 名英国人和 6,100 名法国人。

在德国的、包围柏林在内的、苏联占领区内，苏联军队总共有一百五十万人。驻柏林的两个美国团几乎无法抵抗苏联的进攻。

苏联占领军相信，英国、法国和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默许苏联军队对柏林的封锁行动。

苏联驻德国军事管理局庆祝封锁柏林行动的开始。

此后，美、英、法等国发起大规模空运粮食、水等物资。苏联人嘲笑，这是“美国人为挽回面子和维持他们在柏林站不住脚的地位所做的徒劳尝试”。

但是，空运的成功最终促使苏联于 1949 年 5 月解除封锁。

然而，苏联军队仍然能够毫不费力地征服西欧。1948 年 9 月，美国军事情报专家估计，苏联在其德国占领区和波兰约有 485,000 名士兵，在欧洲总共有约 178.5 万名士兵。与此同时，1948 年美军人数约为 14 万人。

=====

铁托-斯大林分裂

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与苏联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问题上发生分歧后，发生了铁托-斯大林分裂。随后南斯拉夫于 1948 年 6 月被驱逐出共产国际集团，并在贝尔格莱德发生了短暂的、失败的、苏联主导的政变。

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分裂，在欧洲造成了两支独立的共产主义势力。一场激烈的反对“铁托主义”的运动在东方集团立即展开。苏联以及东方集团卫星国家说，在东欧各处地方，都有西方和铁托所支持的从事颠覆活动的代理人。这导致，在东欧各个共产党国家中，许多主要的党干部受到迫害，其中包括东德的干部。

除了柏林之外，斯洛文尼亚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也是二战后的一个特别焦点。

在铁托和斯大林决裂之前，西方国家和东方集团毫不妥协地对峙。1947 年与联合国一起成立的中立缓冲国“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在 1954 年和 1975 年分裂并解散；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和铁托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

=====

北约

1949年，美国与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葡萄牙、挪威、比利时、冰岛、卢森堡、意大利和荷兰，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这是美国在成立以后的170年中，第一次加入的这样一个“纠缠不清”的欧洲联盟组织。

西德、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后来加入了这个北约联盟。

东欧领导人通过在他们的马歇尔计划版本“经济互助委员会”中整合他们国家的经济来报复这些步骤。

1949 年爆炸了第一颗苏联原子弹装置；1950年2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同盟；并于1955 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华约）。“华约”是东欧的“北约”版本。

苏联、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建立了“华约”这个军事联盟。

=====

NSC 68

美国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升级和扩大“遏制”。

在 1950 年的一份秘密文件“NSC 68”中，美国官员提议加强西欧的联盟系统，将美国国防开支增加四倍，并展开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以说服美国公众与这场代价高昂的冷战作斗争。杜鲁门下令研制比原子弹爆炸力更加强大的氢弹。1950年初，美国在越南率先反对共产主义势力；计划组建一支西德军队，并准备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提案，以保证美国在日本的长期军事基地。

=====

欧洲以外

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在欧洲以外的时间和轨迹部分不同。

在非洲，非殖民化首先发生；它主要是在 1950 年代完成的。主要竞争对手随后在新的国家政治联盟中寻求支持。

在拉丁美洲，第一次重大对抗发生在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0年古巴新卡斯特罗政府转向苏联时，古巴成为苏联支持的反美冷战势力的中心。

=====

中国内战

随着日本于 1945 年崩溃，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在中国重新开始。苏联于 1945 年与国民党签署了友好条约，并否认支持中国共产党（尽管后来，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占领军对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暗中支持，包括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大量枪支武器，以及许多坦克大炮等重型设备交给中国共产党军队，并帮助中国共产党掌控或占领东北）。

结果是激烈的战斗，共产党最终以优越的军事战术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虽然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有优势，最初控制的领土和人口比对手大得多，并得到了相当多的国际支持，但他们因与日本的长期战争而筋疲力尽、以及面对随之而来的内部责任（中国国民党在多年抗战以后，人心思定、不愿再战；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大部分中国地区在经过多年抗日战争的摧残以后，经济体系已经几乎崩溃，社会各阶层缺乏团结与斗志）。

此外，苏联军队撤出满洲后，中国共产党人得以填补满洲地区留下的政治真空，从而获得了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中国共产党从北方和东北打仗、兴起战事；到 1949 年底几乎整个中国大陆都被中国共产党人占领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和 60 万国民党军队、以及 200 万难民，主要来自政府和商界，从大陆逃到台湾岛。1949年12月，蒋宣布台北为 中华民国（ROC）的临时首都，并继续宣称他的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权威。

大陆的共产党人与台湾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敌意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持续。尽管美国拒绝协助蒋介石“收复大陆”，但它继续以军事物资和专业知识支持中华民国，以防止台湾落入中国手中。在西方集团的支持下（大多数西方国家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保留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到 1971 年。

=====

茉莉芬事件

茉莉芬叛乱事件发生于 1948 年 9 月 18 日在东爪哇的茉莉芬市。

联合了印度尼西亚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的人民民主阵线（FDR，人民民主阵线）——实施了这次叛乱。

叛乱发生以后，印尼政府军逮捕并处决了其领导人。这场叛乱在 3 个月后结束。

这场叛乱始于埃米尔·沙利夫丁内阁的垮台，因为它签署了使荷兰人受益的伦维尔协议；最终，沙利夫丁内阁被不属于左翼的哈达内阁所取代。这导致 Amir Syarifuddin 宣布反对哈达内阁政府、并宣布成立人民民主阵线（FDR）。

在此之前，在1948年8月13日至14日的印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印尼共产党人穆索提出了一个名为“Jalan Baru”的政治概念。他还想要一个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为 PKI（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由非法共产党人（即那些反对合法运动、主张实行暴力革命的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工党和 Partai Sosialis（社会党）组成。

1948 年 9 月 18 日，印尼人民民主阵线（FDR）宣布成立苏维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此外，共产党人还在帕蒂地区进行了叛乱，并绑架了被认为是反对共产党人的团体。甚至这次叛乱导致了当时的东爪哇总督 Raden Mas Tumenggung Ario Soerjo 被谋杀。

针对叛乱运动的镇压行动开始了。这次行动由AH Nasution领导。印度尼西亚政府还派遣苏迪曼将军进行军事行动。苏迪曼将军命令Gatot Soebroto 上校和 Sungkono 上校动员了印尼政府军和警察镇压叛乱。

1948年9月30日，茉莉芬叛乱地区被印尼政府军平定。穆索在逃跑时被枪杀，另一位叛乱领袖、阿米尔沙里夫丁在中爪哇被捕后被处决。1948 年 12 月上旬，茉莉芬叛乱事件结束。

=====

朝鲜战争

1950 年初，美国首次承诺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以保证美国在日本的长期军事基地。

朝鲜在二战结束时沿北纬 38 度线被划分为苏联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本书作者注：在二战日本投降之前，自从十九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在控制和统治朝鲜半岛。在二战结束期间，苏军和美军分别进入朝鲜半岛，并以北纬38度线为界限，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当时，苏军是经由中国东北地区、在战胜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三省以后，进入朝鲜的。美军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在进入日本本土的同时，从朝鲜半岛南侧登陆、占领南韩的】。

在苏联占领区内，朝鲜半岛北方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府。

朝鲜半岛南方的民选政府在 1948 年联合国监督的选举后上台执政。【本书作者注：——此前，在1945年二战结束、美苏军队进入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的时候，美苏之间曾经同意，在朝鲜半岛政治局势稳定以后，美苏双方军队就立即撤出朝鲜，并帮助和鼓励在当地举行民主选举，建立朝鲜半岛的民选政府。但是，尽管美国军队很快就撤出了半岛，然而，苏联却用各种借口拖延不走。之后，虽然苏军离开了，但却以各种理由使得北韩无法进行民主选举。直到1948年，南韩已经举行了民主选举，但北韩却仍然在共产主义政权的控制之下，拒绝民主选举进程。苏联军队的这种军事占领以及拖延政治战术，早在1900年代俄罗斯占领中国满洲的时候，以及二战结束时期占领东欧各国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显明。1900年，中国发生了义和团暴乱；慈禧太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世界各国宣战、并围攻北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区域。这导致了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京解救使馆外交人员。然而，在1900年以后，除了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其他外国军队，在局势稳定以后很快就撤离了中国。但俄罗斯军队却赖在中国满洲地区不走。这间接导致了几年之后，日本军队在清朝政府的同意下、出兵中国满洲，与俄罗斯军队爆发了日俄战争。日军在日俄战争中得到胜利；这导致，随后的日本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大增，并为三十年后的日本全面侵华、以及中国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

1950年6月，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侵略韩国。杜鲁门总统担心金日成独裁统治下的共产主义朝鲜可能威胁日本并在亚洲滋生其他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派遣美军并获得联合国的帮助以对抗朝鲜的入侵。苏联抵制联合国安理会

会议，同时抗议安理会未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席位，因此没有否决安理会批准联合国反对朝鲜入侵的行动。

来自韩国、美国、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菲律宾、荷兰、比利时、新西兰等国家加入联合国军，阻止北韩对南韩的入侵。

在中国入侵以协助朝鲜人之后，战火在将朝鲜半岛分开的 38 度线沿线稳定下来。此时，杜鲁门总统面临敌对的中国、中苏伙伴关系以及在 18 个月内翻两番的美国国防预算。

朝鲜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签订。这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所签订的；斯大林曾一直坚持，朝鲜战争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北朝鲜，金日成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和残暴的独裁政权；他扩大了自己的无限权力，并建立了强大的个人崇拜制度。

=====

氢弹

氢弹是基于核聚变、而不是核裂变；最早由美国在1952年11月发明建造；苏联在1953年8月研制和测试了这种炸弹，并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部署。

=====

文化与媒体

对核战争的恐惧促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民防部门制作了公共安全电影，这些电影展示了保护自己免受苏联核攻击的方法。1951 年的儿童电影《Duck and Cove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反乌托邦主义的小说《1984》于 1949 年出版。这部小说探索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中的生活，在那里极权政府已经达到了可怕的权力和控制水平。

在《1984》中，奥威尔探讨了未来几十年将继续困扰西方许多人的反共恐惧。

在冷战背景下，他的描述几乎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苏联共产主义、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似乎愿意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控制苏联集团内的人。

奥威尔著名的极权统治寓言《动物农场》于 1945 年出版，激起了类似的反共情绪。

=====

重要文件

冷战产生了无数文件。171 份文件的文本出现在冷战百科全书（2008 年）中。

。 。 。 。

巴鲁克计划：1946 年。

美国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 (UNAEC) 提出的一项建议：a) 扩大所有国家之间为和平目的交换基础科学信息；b) 对原子能实施必要的控制，以确保其仅用于和平目的；c) 从国家军备中消除原子武器和所有其他适用于大规模杀伤性的主要武器；d) 通过检查和其他方式建立有效的保障措施，以保护遵守国免遭违反和规避的危险。

当苏联是唯一拒绝签署的成员时，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核武器试验、开发和部署计划。

。 。 。 。

长电报和“ X 文章”，1946-1947。

正式名称为“苏联行为的来源”。这篇文章描述了成为美国冷战政策基础的概念，并于 1947年发表在《外交事务》上。这篇文章是对广为流传的国务院绝密电报“X文章”的扩展，并因阐述美国冷战政策、遏制学说而闻名。

。 。 。 。

NSC 68：1950年4月14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概述了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从军事、经济、政治和心理的角度对苏联和美国的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NSC 68 的主要论点是苏联打算成为单一的主导世界大国。报告认为，苏联有一套旨在使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系统性战略，并建议美国政府采取遏制政策，以阻止苏联权力的进一步蔓延。国家安全委员会概述了从防御性到积极遏制的急剧外交政策转变，并提倡积极的军事准备。NSC 68 塑造了未来 20 年冷战中的美国政府行动策略，随后被贴上了冷战“蓝图”的标签。

。 。 。 。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的演讲——“对德国政策的重述”》；演讲发表于德国斯图加特市，1946年9月6日。

它也被称为“希望的讲话”。它设置未来美国政策的基调，因为它否定了摩根索计划经济政策（这是在二战结束以前、由苏联推动的计划，其主旨是彻底摧毁德国发动另一场战争的工业能力，摧毁德国的重工业，使德国土地回归为牧场），给了德国人对未来的希望。

西方国家最担心的是贫困和饥饿会驱使德国人走向共产主义。卢修斯·克莱将军说：“在每天摄入 1,500 卡路里热量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摄入 1000 卡路里热量的民主信徒之间，没有选择”。

伯恩斯演讲也被视为反对苏联的立场，因为它表明了美国无限期地在欧洲保持军事存在的坚定意图。但正如伯恩斯一个月后所说，信息的核心是“我们计划的核心是赢得德国人民……这是我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思想之战”。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53%E2%80%931962\)](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53%E2%80%931962))

冷战（1953–1962）

这一时期是从1953年的斯大林逝世，到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的新领导人试图“去斯大林化”；这在苏联联盟、东部集团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引起混乱。尽管如此，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这表现为，重新统一的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署，以及结束印度支那战斗（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地区）的日内瓦协议。

然而，这段美好的时光只是短暂的；在此期间，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仍在继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也发生了一场不那么令人担忧、但代价高昂的太空竞赛。非洲国家加入冷战阶段的舞台，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入苏联；这在西方引起了更大的动荡。

=====

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

1953 年，当哈里·杜鲁门被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接替成为美国第 34 任总统时，民主党失去了对美国总统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控制权。然而，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美国的冷战政策基本保持不变。

虽然艾森豪威尔在上任以后曾经试图推出一些新的外交政策，但是，其多数新兴思想（如“击退共产主义”与“解放东欧”）迅速被视为是不可行的。因而，美国此后广泛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以“抵制苏联共产主义运动”为基础关注点。

虽然从杜鲁门总统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过渡在性质上是一个温和的过渡（从保守到温和），但苏联的变化是巨大的。1953 年，约瑟夫·斯大林（他从 1928 年开始领导苏联并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去世，乔治·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领导人。然而，这是短暂的，因为尼基塔·赫鲁晓夫

很快削弱了马林科夫作为领导人的所有权威，并亲自控制了苏联。1957年马连科夫参加了反对赫鲁晓夫的未遂政变，之后被送往哈萨克斯坦。

在随后的集体领导时期，赫鲁晓夫逐渐巩固了他的权力。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苏共20大的闭门会议演讲中，赫鲁晓夫震撼了听众。赫鲁晓夫谴责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发生了许多罪行。

赫鲁晓夫讲话内容虽然保密，但被泄露给了外人，令苏联盟国和西方观察家都感到震惊。（1958年，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总理）。

赫鲁晓夫1956年的闭门演讲对苏联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赫鲁晓夫以此一举剥夺了他的那些剩余的斯大林主义对手的合法性，极大地提升了党的第一书记的国内权力。赫鲁晓夫随后放宽政治限制，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并启动了强调商业产品而不仅仅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经济政策。

=====

美国战略：“大规模报复”和“边缘政策”

。。。。。

相互冲突的目标

当艾森豪威尔 1953 年上任时，他致力于两个可能相互矛盾的目标：维持——甚至加强——对抗苏联影响力的蔓延；并满足平衡预算、减税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需求。

从这个目标中产生的最突出的学说是“大规模报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 1954 年初宣布了这一点。避开杜鲁门政府昂贵的常规地面部队，并运用美国核的巨大优势；——1956 年 1 月 16 日，杜勒斯在接受《生活》杂志采访时将这种方法定义为“边缘政策”。即，把苏联逼到战争边缘，以求让步。

1953 年，艾森豪威尔从杜鲁门政府那里继承了大约 420 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以及由艾奇逊、哈里曼和洛维特起草的一份文件（NSC-141）（其中更呼吁在现有军事预算基础上增加 70 亿-90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

在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的带领下，在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 Taft）为首的国会压力下，以及由于共和党人削减成本的情绪强化了这一点，——所以，国会将新财政年度（将于 1954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预算目标减少到 360 亿美元。

虽然朝鲜停战协议即将在部队部署和资金方面产生大量节省，但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仍然总是想要增加他们的预算支出。

针对此情况，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削减财政。汉弗莱希望在 1955 年 2 月实现平衡预算和减税，并制定了 120 亿美元的储蓄目标（其中一半来自军费开支的削减）。

尽管不愿过度地削减国防，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希望预算平衡，所以，国防拨款减少。“除非我们能把东西交到饿死的人手中，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抵制共产主义，”他告诉他的内阁。

考虑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继续资助美国在整个欧洲的创新文化外交计划，其中包括第七军交响乐团的“士兵-音乐家大使”的善意表演。此外，艾森豪威尔担心臃肿的“国防工业军事复合体”“要么把我们送进战争，要么把我们变成某种形式的独裁政府”，甚至使得美国“主动发动战争”。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位曾经指挥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的军事指挥家，在私下场合的时候感叹道：“当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不像我那么了解军事时，上帝会帮助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注意力正在转移到亚洲其他地方。在华盛顿，“中国游说团”或“主张亚洲重要性”的政治人士们，坚持主张应当积极努力地帮助蒋介石在

中国恢复掌权。他们所带来的持续压力仍然是对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强大国内影响。

1953 年 4 月，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和其他强大的国会共和党人突然呼吁，立即更换五角大楼的最高领导人，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对于所谓的“中国游说团体”和塔夫脱而言，布拉德利被视为倾向于欧洲优先方向，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成为他们所青睐的军事政策新变化的障碍。

麦卡锡主义者声称，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成员都包含秘密的共产主义特工或同情者。但在 1954 年的中期选举、和参议院同事们的批评之后，约瑟夫·麦卡锡的影响力在他对美军的不受欢迎的指责之后逐渐减弱。

。 。 。 。

艾森豪威尔的管理策略

“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我们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需要听到炮弹声音。他们没有为没有实际战斗、却可能处于战争状态的概念做好心理准备。”

—海曼·G·里科弗海军上将于 1958 年 1 月 6 日在美国参议院国防准备委员会发表讲话。

1958 年在朝鲜部署美国原子武器，同时减少常规部队的规模。

政府试图调和来自“主张亚洲重要性”的政治人士的压力，和削减联邦开支的压力，同时继续有效地对抗冷战。

1953 年 5 月 8 日，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在“日光室行动”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该行动以总统进行秘密讨论的白宫日光室命名。总统与幕僚们在削减政府开支的目标和理想的军事姿态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总统的幕僚们权衡了明年军事预算的三个政策选择：（1）杜鲁门-艾奇逊遏制和依赖常规部队的方法；（2）威胁要用核武器对苏联在一个地点的有限“侵略”作出回应；以及（3）基于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挑战，进行以经济回应为基础的“解放”，进行政治宣传战和心理战。

上述第三个选项被强烈拒绝。艾森豪威尔和幕僚小组（由艾伦·杜勒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CD 杰克逊和罗伯特·卡特勒组成）选择了上述第一选项和第二选项的组合。在这个组合战略中，既依赖于常规地面部队的遏制的有效性，但更依赖于美国的空中核威慑力量。这是为了避免代价高昂且不受欢迎的地面战争，例如朝鲜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原子武器视为美国国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它们能

够增强美国相对于苏联的战略优势。美国政府还保留了使用它们实际上作为首选武器的前景，希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获得战略主动权。通过运用国家的核优势，新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方法是一种更便宜的遏制形式，旨在为美国人提供“物有所值”的攻击能力。

因此，美国政府将核弹头的数量从 1953 年的 1,000 枚增加到 1961 年初的 18,000 枚。尽管美国已经拥有压倒性优势，但仍然每天都继续增加一枚核武器。政府还开发了新技术。1955年研制出八引擎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这是第一架真正设计用于携带核武器的喷气式轰炸机。

1961年，美国把15个“木星”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其射程范围涵盖苏联领土西部的城市，包括莫斯科。它们的射程有 1,500 英里（2,410 公里）；发射以后仅 16 分钟就能够到达莫斯科。美国还可以从水下潜艇发射具有1000英里（1,600公里）射程的“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

1962 年，美国拥有的原子弹和导弹弹头是苏联的八倍多：27,297（美国原子弹数量）比 3,332（苏联原子弹数量）。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拥有 142枚“阿特拉斯型”和 62枚“泰坦 I型”洲际弹道导弹；它们大部分都在加固的地下发射仓中。

=====

对于苏联影响力和民族主义的担忧

共和党以一个承诺加强遏制政策的政策主张赢得了美国国内选举。

但克里姆林宫并非是越来越多的中东，拉美，东南亚等国际危机的唯一来源。

艾伦·杜勒斯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一样，认为许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基本上受到华沙条约组织的影响，如果不是控制的话。

例如，在战争、和平与变革时期（1939年），他称毛泽东为“土地改革者”，而在二战期间，他将毛泽东的追随者视为“所谓的‘红军派’”。但到1950年，他不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本土根源。

在《战争或和平》一书中，他写道：

“中国4亿5000万人就这样落入了强烈反美的领导之下，并从莫斯科那里得

到了它的启发和指导……苏联共产党在中国所取得的胜利，超过了日本在中国所想要寻求的目标。而那个目标，我们曾经付出了战争的代价去试图避免。”

在起草 NSC-68 文件之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单一世界共产主义的基本假设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外交政策的假设基本一致。保罗·尼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如下：

“新的、持续的危机是权力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地使奴隶社会与自由对立……与以前的霸权野心不同，苏联被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所激励，与我们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并寻求强加其绝对权威……先是在苏联内部，然后是在苏联现在所控制的地区中……然而，在苏联领导人的脑海中，这种设计的实现需要他们的动态扩展权威……为此，苏联的努力现在指向对欧亚大陆的统治。”

=====

朝鲜战争结束

在1953年当选总统之前，Dwight D. 艾森豪威尔就已经对杜鲁门在朝鲜战争中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

北韩入侵了南韩，试图在共产主义朝鲜政权下统一整个朝鲜；美国获得联合国的决议，领导联合国军进入韩国进行军事防御；杜鲁门总统派遣海陆空军事力量登陆朝鲜半岛，开展保卫战；美国卷入战争，迅速将北韩向南韩的军事推进方向，逆转为向北韩推进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北韩军队被迫退到中朝边界；这导致数十万中国共产党军队赴朝参战，抗击联合国军和南韩军队。

1952年底，当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不久，为履行他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做出的竞选承诺，1952年12月2日，艾森豪威尔访问韩国以评估局势。艾森豪威尔的调查包括与南韩军队、指挥官和政府官员会面，艾森豪威尔在会议结束后总结道，“我们不能永远站在静止的战线上，继续接受没有任何明显结果的伤亡。对小山丘的小攻击不会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敦促韩国总统李承晚妥协，以加快和谈。再加上美国威胁说如果战争不能很快结束就使用核武器，导致了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的签署。

停战协定结束了美国最初的“有限战争”冷战概念。

大量本地战俘们被允许自行选择命运，——他们可以决定，要么被遣返北韩，要么继续留在南韩。而在南韩与北韩之间，则设定一个“非军事区域”。

关于朝鲜半岛的联合国协议所实施的“警察行动”阻止了共产主义从北韩蔓延到南韩。美国卷入朝鲜战争表明，它已准备好，与世界团结起来援助被入侵的国家。

共产主义的入侵，导致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赋予了作为反对暴政的有效领导者的权力形象。这最终导致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得到加强，并引导了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发展。这些事态发展对美国的主要影响是为应对冷战挑战所要求的军事力量建设，如NSC 68 文件所示。

=====

太空竞赛的起源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太空竞赛是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核军备竞赛相反，这是一场和平竞争，两个大国可以展示他们在技术和理论上的进步。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成为第一个通过发射Sputnik 1进入太空领域的国家。苏联的这颗卫星只是一个 83.6 公斤的铝合金球体，比最初的 1,000 公斤设计大大缩小了尺寸，它携带一个无线电设备与四个天线进入太空。

苏联卫星的这个尺寸让西方科学家感到震惊，因为美国当时正在设计一颗小得多的 8 公斤卫星。由于武器技术的差距，这种尺寸差异很明显；但美国能够开发出比苏联同行小得多的核弹头。

不到一个月后，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 2 号。苏联的卫星成功发射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们质疑为什么美国落后于苏联，以及苏联人是否可以对芝加哥、西雅图和亚特兰大等美国大城市发射核导弹。

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回应是创建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该委员会被任命领导美国的科学和国防战略政策。美国对苏联成功卫星任务的另一个反应是，在海军领导下，尝试使用其先锋 TV3 导弹将第一颗美国卫星发射到太空。然而，这一努力导致完全失败，导弹在发射台上爆炸。

这些事态发展导致了媒体和美国公众的狂热、沮丧和困惑，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为控制将美国卫星送入太空所做的努力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他的总统的科学顾问，詹姆斯·瑞尼·基安，与PSAC进行磋商，以制定一个解决方案。

=====

美国宇航局的创建

作为对苏联发射人造卫星 1 号的反应，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转变为一个新的组织，以便在美国的太空探索努力中得到更专注的科研进步。

该组织将被命名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该机构将有效地将太空研究和太空旅行的控制权从军方转移到 NASA 手中；NASA 将成为一个文职政府机构。NASA 将负责所有非军事太空活动，而另一个组织（DARPA）负责太空旅行的军事用途的技术。

1958 年 4 月 2 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了立法草案，以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会的回应是对该法案进行补充，增加了一个名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NASC)的委员会。NASC 将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和 NASA 局长。立法由国会通过，然后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58 年 7 月 29 日签署。美国宇航局于 1958 年 10 月 1 日开始运营。

=====

肯尼迪航天局

自从美国宇航局成立以来，就一直在考虑载人登月的可能性。1961年7月5日，乔治·洛领导的“载人航天研究指导委员会”向美国宇航局“太空探索委员会”提出了阿波罗计划的概念。尽管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政府期间，NASA几乎没有被授予进一步探索太空旅行的权力，但有人提议，在“水星计划”载人地球轨道飞行任务之后，政府与民间政府应努力成功完成载人航天任务——月球航天任务。

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美国太空计划得到了革命性的极大加速。

“这个国家应该致力于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实现一个目标，让一个人登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约翰·肯尼迪

在约翰·肯尼迪总统于 1961 年 5 月 25 日向国会提出这项建议后，在接下来的时间之中，直到他被暗杀之前，肯尼迪一直信守这个承诺，对于美国宇航发展计划给予了极大支持。在他提出载人登月建议之后，美国宇航局的政府资金增加了 89%，随后一年增加了 101%。这标志着美国登月任务的开始。

=====

太空竞赛中的苏联

1957 年 8 月，苏联试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成功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即 R7 Semyorka。在 Semyorka 发射仅两个月后，人造卫星 1 号就成为了地球轨道上的第一个人造物体。随后发射了人造卫星二号，它搭载了一只名叫莱卡的狗，她是第一位太空旅行者，尽管她没有在这次太空旅行中幸存下来。随后，苏联在 1960 年实行了东方计划，并把有史以来的第一对太空旅行中幸存的生物，苏联太空犬贝尔卡、斯特雷尔卡，成功送到了太

空。之后，东方计划负责将第一个人类送入太空，这是苏联将在美国之前完成的另一项任务。

=====

R7洲际弹道导弹

在太空竞赛开始之前，苏联和美国正在努力制造和获得一种不仅可以携带核弹头，而且可以有效地从一个国家发射到另一个国家的导弹。这些导弹，也称为洲际弹道导弹，是两国在冷战初期获得重大战略优势的关键。然而，美国在最初的洲际弹道导弹飞行试验中失败了，而苏联的 R7 计划证明它在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方面领先多年。R7导弹于1953年10月首次试射，最初设计为携带一个鼻锥加3吨重的核弹头，保持7000至8000公里的航程，发射重量为170吨，分两级发射，包括发射与飞行系统。然而，在最初的测试中，R7 洲际弹道导弹被证明对于所需的载弹量来说太小了，于是在1954年5月实施了重大改动。这些改动包括一个更重的机头，可以携带3吨有效核载荷，以及一个设计上的改动，允许把新的发射重量提高为280吨，因此可以控制起飞和飞行。这枚火箭在1957年5月的测试中证明是有效的，然后稍作调整以支持太空飞行。

=====

人造卫星一号和人造卫星二号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将第一颗地球卫星送入太空。Sputnik 1 的官方任务是从太空发回数据，但是这次发射的影响对苏联和美国来说都是巨大的。对两国来说，人造卫星一号的发射引发了太空竞赛时间表的开始。它激发了人们对太空飞行的好奇心，并导致了关于登陆月球的相对和平的竞争。

然而，人造卫星一号对美国的最初影响不是探索问题，而是国家安全问题。

苏联向世界（主要是美国）证明的是，他们有能力向太空发射导弹，并可能向美国发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人造卫星未知能力的恐惧引发了美国人的恐惧，许多政府官员公开表达了他们对此事的看法。西雅图参议员杰克逊表示，人造卫星的发射“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总统]艾森豪威尔应该宣布这一周为耻辱周和危险周”。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表明了他们在冷战中的优势，因为它确保了他们目前在战争中的领先地位；在美国发动核打击时，苏联有了一种新的报复力量，并使得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研发上获得竞争优势。

近一个月后的 1957 年 11 月 3 日，人造卫星 2 号发射升空，其任务目标是将第一只狗莱卡号送入地球轨道。这次任务虽然失败了，因为莱卡没有在任务中幸存下来，但进一步确立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地位。苏联不仅能够将导弹发射到太空，而且他们可以在美国完成一次发射之前继续完成成功的太空发射。

=====

月球任务

苏联在 1959 年进行了三项月球任务。月球任务相当于俄罗斯的美国“水星计划”和“双子星”太空计划，其主要任务是准备将第一个人类送上月球。

第一次月球任务是月球1号火箭，它于1959年1月2日发射。它成功地建立了绕地球轨道上的第一个火箭发动机重启过程，并把第一个人造物体送入日心轨道。

月球 2 号于 1959 年 9 月 14 日发射升空，在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首次成功地用人造物体撞击了另一个天体（月球）。

最后，月球3号于1959 年 10 月 7 日发射升空，拍摄了月球暗面的第一张

照片。在 1953 年的这三项任务之后，苏联人继续在其他 21 项月球任务中探索月球及其环境。

=====

1960 年至 1962 年的苏联太空旅行

月球计划使得苏联在实现把第一人送上月球的目标的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它还为苏联“在低地球轨道上安全、高效地维持人类”计划“奠定了基石”，创造了苏联的“联盟号太空舱”（相当于美国阿波罗号太空指挥舱）。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苏联在登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一项任务失败了，即人造卫星 4 号。该人造卫星于 1960 年 5 月 15 日正式发射，作为对未来宇航员生命支持系统的测试。

然而，在 5 月 19 日，“太空舱脱离轨道的尝试失败了”，并不得不将舱室送入高地球轨道，使之同年 9 月坠入地球。

苏联人继续他们的太空计划，在 1960 年 8 月 19 日发射了人造卫星 5 号，它将第一批动植物带入太空并将它们安全送回地球。

其他值得注意的活动包括：

东方 1 号：1961 年 4 月 12 日发射，成功将人类第一人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并完成了首次载人轨道飞行。

东方 2 号：1961 年 8 月 6 日发射。成功执行了载人任务，持续了一天，搭载了Gherman Titov。

东方 3 号和东方 4 号：1962 年 8 月 12 日发射。东方 3 号搭载安德烈·尼古拉耶夫，东方 4 号搭载帕维尔·波波维奇。成功完成首次双载航天飞行、首次飞船之间无线电联络、和首次同时飞行载人航天器。

=====

比赛继续

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继续扩大其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这使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个离开地球大气层并进入太空的人类。

一个月后，即 1961 年 5 月 15 日，美国在自由 7 号项目期间将艾

伦·谢泼德(Alan Shepard)送出地球大气层进行了 15 分钟的飞行，从而取得了一些进展。

1962 年 2 月 20 日，随着约翰·格伦(John Glenn)成为第一位在其“水星任务Friendship 7”中绕地球运行的美国人，美国取得了进一步进展。

=====

苏联核战略

1960年和1961年，赫鲁晓夫试图将核威慑的概念强加于军队。核威慑认为，拥有核武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潜在敌人使用核武器；由于战争升级为核冲突的威胁，双方都被阻止了战争。赫鲁晓夫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将永久性地使得社会主义的先天优势在与西方的经济文化竞争中显现出来。

赫鲁晓夫希望完全依赖新组建的战略火箭部队的核火力可以消除增加国防开支的需要。他还试图利用核威慑来证明他大规模裁员的合理性。他对地面部队进行了裁员和降级；地面部队传统上是苏联武装部队的“核心战斗力”；他计划用导弹代替轰炸机，用核导弹潜艇代替水面舰队。

然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只有四个R-7 Semyorkas和一些R-16s洲际导弹部署在脆弱的表面发射器中。1962年苏联潜艇舰队只有 8 艘配备短程导弹的潜艇，这些导弹只能从浮出水面、并失去隐藏状态的潜艇发射。

赫鲁晓夫试图将核“威慑理论”引入苏联军事思想的尝试失败了。自 1920 年代以来第一部权威的苏联战略专著，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军事战略”（1962、1963和 1968 年出版）和 1968 年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与军队》中对核战争的讨论，专注于使用核武器进行战斗而不是威慑战争。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双方都会以最有力的手段和方法来追求最果断的目的。洲际弹道导弹和飞机将对敌人的军事和民用目标进行大规模核打击。这场战争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地理范围，但苏联军事作家认为，在战争初期使用核武器将决定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无论在理论还是战略上，核武器都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

相互保证毁灭

1961 年，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 100 多枚能够用核弹头打击莫斯科的美制导弹。

冷战发展稳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基于相互保证毁灭（MAD）的概念。虽然苏

联在 1949 年获得了原子武器，但他们花了数年时间才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此同时，美国人研制了氢弹，苏联人在赫鲁晓夫时代与之匹敌。诸如潜射弹道导弹和带有MIRV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等新的运载方法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即使在遭到敌方攻击后也可以轻松摧毁对方。

这一事实往往让双方领导人都极不愿意冒险，担心一些小小的突发事件可能会引发一场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尽管如此，两国领导人仍继续推行军事和间谍计划以压倒对方。与此同时，人们寻求不同的途径来推动他们的事业；这开始包括田径运动（奥运会成为意识形态和运动员之间的战场）和文化（各个国家都支持钢琴家、棋手和电影导演）。

非暴力竞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是太空竞赛。苏联领先于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随后是第一次太空载人飞行。苏联太空计划的成功对一直认为自己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将物体发射到轨道上的能力尤其不祥，因为它表明苏联导弹可以瞄准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很快，美国人有了自己的太空计划，但一直落后于苏联，直到 1960 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承诺到 1960 年代末，美国人将载人登月，他们做到了，从而在太空竞赛中击败了苏联人，实现了更重要的目标。

直接战斗的另一种选择是在间谍世界中发生的影子战争。西方发生了一系

列令人震惊的间谍丑闻，其中最著名的是涉及“剑桥五人组”。苏联则有几
次引人注目的“向西叛逃”，例如彼得罗夫事件。克格勃、中央情报局、军
情六处以及一些像斯塔西这样的小型组织，它们的运作资金随着其代理人
和影响力遍布全球而大幅增加。

1957 年，中央情报局开始使用洛克希德 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进行侦察飞
行。1960年5月1日，当这样的飞机被苏联击落（1960年U-2事件）的时候，
美国政府先是否认了飞机的宗旨和使命；但是，苏联政府透露，它已经俘
获了美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 Gary Powers），他还活着；并且被击落的
U-2飞机大部分完好无损；因而，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其监视作用。两周以
后，美苏集团之间本来预定要在巴黎举行外交峰会。这一事件导致谈判破
裂，关系明显恶化。

=====

东方集团所发生的诸事件

随着冷战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公认因素，早期的战场开始趋于稳定。一个
事实上的缓冲区在两大阵营之间建立，即中欧地区。在欧洲南部，南斯拉
夫与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紧密结盟。与此同时，奥地利变得中立。

=====

1953年东德起义

二战以后，大量东德人通过东欧移民限制中唯一的“漏洞”向西移动，即柏林城边界。之后，东德政府把东德工人的人均产量要求提高了百分之十。这是试图将东德转变为苏联的卫星国。已经心存不满的东德人可以看到西德在柏林的相对经济成功，他们变得愤怒，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和罢工。近一百万德国人参加了此时发生的抗议和骚乱。东德政府宣布重大紧急状态，苏联红军介入了。

=====

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

1955 年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部分上是为了响应北约将西德纳入其中，部分是因为苏联需要一个借口在可能存在问题的匈牙利保留红军部队驻扎。在长达35 年中，华约组织延续了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国家安全概念，其基础是帝国扩张和对东欧卫星国家政权的控制。通过其制度结构，该条约还部分地弥补了约瑟夫·斯大林在 1953 年去世后缺乏个人领导的情况。

在整个冷战期间，欧洲仍然是双方的核心关注点；到 1950 年代末，情况已被冻结。联盟义务和地区力量集中意味着任何事件都可能导致全面战

争，因此双方都努力维持现状。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都拥有庞大的军队和现代武器，以保证可以击败对方。

=====

1956 年波兰抗议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波兰共产主义政权放松了一些政策。这导致波兰公众渴望进行更多此类激进的改革，尽管大多数波兰官员并不认同这种愿望并且对改革犹豫不决。这引起了开始罢工的产业工人的不耐烦；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更低的工作配额和更便宜的食物。30,000名示威者举着要求“面包与自由”的横幅进行游行。Wladyslaw Gomułka作为波兰共产党的新领导人领导了抗议活动。

在波兰，工人要求改善条件的示威活动于 1956 年 6 月 28 日在波兹南的Cegielski 工厂开始，在苏联军官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下令军队镇压起义后遭到暴力镇压。大约 100,000 人聚集在UB 秘密警察大楼附近的市中心。斯坦尼斯拉夫·波普拉夫斯基将军指挥的 400 辆坦克和 10,000 名波兰军队士兵奉命镇压示威活动，并在和平期间向抗议的平民开火。死亡人数介于 57人 至 78 人之间，包括 13 岁的Romek Strzałkowski。还有数百人受到各种伤害。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在斯大林死后，斯大林式的独裁者 Mátyás Rákosi 被Imre Nagy取代；并且波兰改革派Władysław Gomułka能够制定一些改革主义政策；——因而，1956 年大量抗议的匈牙利人制定了一份匈牙利革命者的要求清单，包括自由无记名投票选举、独立法庭以及对斯大林和拉科西匈牙利活动的调查。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命令下，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抗议者对议会的袭击迫使政府垮台。

革命期间上台的新政府正式解散了匈牙利秘密警察，宣布打算退出华约，并承诺重新建立自由选举。此后，苏联政治局以一支庞大的苏联军队入侵布达佩斯和该国其他地区来镇压革命。大约 200,000 名匈牙利人逃离匈牙利。大约 26,000 名匈牙利人被苏联设立的、新的János Kádár政府审判，其中 13,000 人被监禁。Imre Nagy, Pál Maléter和 Miklós Gimes在 1958 年 6 月被秘密审判之后，一起被处决。到 1957 年 1 月，新的匈牙利政府镇压了所有公众的反对。这些匈牙利政府的暴力镇压行动疏远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加强了共产主义控制，培养了共产主义既不可逆转、又单一极权的观念。

U-2事件

1960 年 5 月 1 日，美国派遣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驾驶 U-2 间谍飞机在俄罗斯领空执行任务，以收集有关苏联的情报。美苏关系紧张。这一天，鲍尔斯的飞机被苏联击落并回收。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试图声称这架飞机仅用于天气科研目的。这一事件发生在美苏本应与法国和英国一起参加峰会的几周前。

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峰会前几天故意不发布有关这架飞机或其飞行员的任何详细信息（而仅仅简单地说在苏联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以便美国继续其“气象飞机”谎言，尽管最终艾森豪威尔将被迫承认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执行此类监视任务多年；——这是因为，在峰会上，赫鲁晓夫承认苏联人已经活捉了飞行员，并找到了侦察机未损坏的部分。他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峰会上道歉。

艾森豪威尔确实同意结束这类情报收集行动，但不会为事件道歉。在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后，由于赫鲁晓夫不再参与会议讨论，峰会结束。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参加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善美苏关系，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交流损害了这种关系。此次峰会也是两国领导人敲定有限核禁试条约的契机，但在美国处理此事后，这已不再可能。

=====

1961年柏林危机

关键的症结仍然是在于，占领德国后的英美法等盟军合并他们的占领区，于1949年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的西德）；而苏联则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来的东德），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双方都没有承认分裂，从表面上看，双方都坚持在各自政府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德国。

德国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被视为欧洲大陆的权力中心，双方都认为它对世界力量平衡至关重要。虽然双方都可能更喜欢统一的中立德国，但双方都担心其陷入敌营的风险太高，因此战后临时占领区成为永久边界。

1958 年 11 月，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给予西方国家六个月的时间，同意从柏林撤出，使其成为一个自由的非军事化城市。在那段时期结束时，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完全控制与西柏林相连的所有交通线；只有得到东德政府的许可，西方国家才能进入西柏林。美国、英国和法国对这一最后通牒作出了回应，坚定地表示他们决心留在西柏林并保持他们自由进入该城市的合法权利。

1959年，苏联取消了最后期限，转而在四大外长会议上与西方国家会谈。为期三个月的会议虽然未能达成任何重要协议，但确实为进一步谈判打开了大门，并促成了赫鲁晓夫总理于 1959 年 9 月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结束时，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共同表示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全面裁军、柏林问题、以及“所有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通过武力解决，而应

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

然而，在 1961 年 6 月，赫鲁晓夫总理再次威胁要与东德签署单独的和平条约，从而在西柏林的权利地位上制造了新的危机。英美法三个大国回答说，任何单边条约都不能取消他们在西柏林的责任和权利，包括畅通无阻地进入这座城市的权利。

随着柏林冲突升级，肯尼迪总统于 7 月 25 日要求将陆军总兵力从 875,000 人增加到大约 100 万人，同时将海军和空军现役兵力增加 29,000 人和 63,000 人。此外，他还下令将征兵数量加倍，并要求国会授权某些准备就绪的预备役部队和个人预备役人员服现役。肯尼迪还要求提供新资金，以确定和标记现有建筑结构中可用于在发生核袭击时用作防辐射避难所的空间，为这些避难所储备食物、水、急救箱和其他最低限度的生存必需品，并改善空袭警报和坠落探测系统。

1961 年头几个月，东德政府积极寻求阻止其人口向西方移民的手段。到 1961 年初夏，东德总统沃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显然已经说服苏联人必须立即解决问题，而阻止外流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武力。这给苏联带来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柏林的四国地位规定了区域之间的自由旅行，并特别禁止德国军队在柏林的存在。

在春季和初夏，东德政权采购和储存建筑材料，用于建造柏林墙。尽管这项广泛的活动广为人知，但在苏联和东德规划者的小圈子之外，很少有人

相信东德会真的被封锁。

1961年6月15日，柏林墙的施工启动前两个月，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Staatsrat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国际新闻发布会上说，“没有人有意竖起一堵墙！”

1961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东德领导人参加了在东柏林北部林区 Döllnsee 的政府宾馆举行的花园派对，沃尔特·乌布利希 (Walter Ulbricht) 签署了关闭边界和竖立隔离墙的命令。

午夜时分，军队、警察和东德军队的部队开始关闭边界，到 1961 年 8 月 13 日星期日早上，通往西柏林的边界已经关闭。东德军队和工人已开始拆除沿路延伸的道路，使大多数车辆无法通行，并在三个西区周围 156 公里（97 英里）和 43 公里（27 mi）范围内实际上划分隔离了西柏林和东柏林。大约有 32,000 名战斗部队和工程部队参加建造隔离墙。一旦他们的努力完成，边防警察就承担了人员配备和改善屏障的职能。东德的坦克和大炮在场是为了阻止西方的干涉，并可能在发生大规模骚乱时提供帮助。

1961 年 8 月 30 日，约翰·肯尼迪总统下令 美国148,000 名国民卫队和预备役军人服现役，以应对东德切断盟军进入柏林的行动。美国国民空中警卫队 (ANG) 在动员中的份额为 21,067 人。10 月动员的 ANG 部队包括 18 个战术战斗机中队、4 个战术侦察中队、6 个空中运输中队和一个战术

控制组。11 月 1 日，空军动员了另外三个 ANG 战斗机拦截中队。10 月底和 11 月初，8 个战术战斗机部队带着 216 架飞机飞往欧洲，执行“阶梯”任务，这是空军历史上最大的喷气式战机部署。由于航程短，11 月底，60 架 Air Guard F-104 拦截机被空运到欧洲。美国驻欧洲空军 (USAFE) 缺乏 ANG 老旧的 F-84 和 F-86 所需的备件。一些部队只接受过投送战术核武器的训练，而不是常规炸弹和子弹。一旦他们到达欧洲大陆，他们就必须接受常规任务的再培训。大多数动员的美国国民空中卫队人员留在美国。

柏林的四个大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在 1945 年的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东德警察不会在柏林的任何地区拦截盟军人员。但在 1961 年 10 月 22 日，也就是隔离墙建成两个月后，美国驻西柏林使团团长 E. 艾伦莱特纳在前往东柏林剧院的途中被拦住汽车（该汽车有占领军牌照）。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西柏林的特别顾问、陆军将军卢修斯·D·克莱（已退休）决定展示美国的决心。

一名美国外交官进入东柏林的企图得到了美军的支持。这导致了 1961 年 10 月 27 日至 28 日在查理检查站美国和苏联坦克之间的对峙。只有在 Ulbricht 和肯尼迪直接会谈后才解决了对峙。

柏林危机中，美国军队与东德军队对峙，直到东德政府做出让步。危机在 1962 年夏天结束，人员返回美国。

在危机期间，克格勃制定了一项精心策划的颠覆和虚假信息计划，“以在世界各个地区创造一种导致美国及其附从国家被分散注意力和力量的局面；并在解决德国和平条约和西柏林问题的过程中将其束缚住。”。苏共中央1961年8月1日批准了这一计划。

=====

第三世界的冲突舞台

朝鲜战争标志着冷战焦点的转变，从战后的欧洲转移到了东亚。此后，第三世界的代理人战争成为超级大国在这些新兴国家建立联盟和争夺影响力的重要战场。然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想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印度，埃及和奥地利所领导的不结盟运动试图把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

=====

防御条约

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协议将其联盟体系正规化。它的东亚盟友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而拉丁美洲的朋友则加入了美洲国家组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签署了澳新美同盟关系条约。这些组织中没

有一个像北约在欧洲那样成功。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一个顽固的反共主义者，他积极关注第三世界政治。他加紧努力将整个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整合”到一个共同防御条约的体系中；为此，他旅行超过 500,000 英里以巩固新的联盟。杜勒斯于 1954 年发起了马尼拉会议，最终达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协议，将八个国家（位于东南亚或在那里有利益的国家）联合为一个中立的防御协议。1955 年签订了巴格达条约，后来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将中东的“北部”国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

=====

非殖民化

两次欧洲大战的综合影响削弱了欧洲国家对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与影响。这导致了二战后一系列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浪潮；一个被殖民统治和影响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由新兴的非洲、中东和亚洲国家组成的世界。民族国家的绝对数量急剧增加。

冷战开始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与超级大国之一结盟。双方都承诺提供大量的财政、军事和外交援助以换取联盟；在联盟中，腐败和

侵犯人权等问题常被忽视。当盟国政府受到威胁时，超级大国往往准备并愿意进行干预。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苏联宣传自己的领袖角色，在第三世界讨好，称其是比非洲和亚洲许多独立国家更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赫鲁晓夫通过与印度和整个第三世界其他重要的不结盟、非共产主义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拓宽了莫斯科的政策。新兴的不结盟运动中的许多国家都与莫斯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根据非殖民化的影响调整了美国的政策。这将1947-1949年的焦点从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转移了。到1950年代初，北约联盟已经将西欧纳入共同防御条约体系，为西欧联盟的反对颠覆或保持中立提供保障。马歇尔计划已经重建了一个正常运作的西方经济体系，挫败了西欧激进政治左派对于选民的吸引力。当经济援助结束了美元短缺并刺激了战后重建的私人投资，从而使美国免于生产过剩危机并维持对美国出口的需求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关注其他地区。

在根据杜勒斯的学说采取新的“逼退”政策时，艾森豪威尔挫败了苏联的干预，利用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一些不友好的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焦点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公司已经在该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美国担心该地区政府是否稳定和友好，美国经济的健康越来越依赖于这些。

非洲

冷战期间，非洲将成为主要战场。美国将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视为获得先前被欧洲强国垄断的原材料的机会。此外，美国决策者认识到，由于非洲持续存在的贫困和不稳定将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温床，因此美国将通过向非洲新兴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来做出回应。

共产主义政府在非洲也有有时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苏联试图通过与新生国家建立联盟来对抗西方国家，以应对美国在非洲的干预。苏联认为消灭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资本主义是促进这些国家进步以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认为苏联的命令式经济很有前途，因为它允许该国从农业经济发展为工业经济。然而，苏联学说不仅受到美国的挑战，也受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挑战。中国还开始支持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挑战“帝国主义”。尽管苏联提供了更多实质性的援助，但是，毛主义在非洲往往受到更多的欢迎。这是因为，毛主义强调农村人口，而不是像苏联学说那样更侧重于城市无产阶级。在非洲，毛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比苏联意识形态更具吸引力。因此，毛主义意识形态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中流行起来。

苏联和中国经常发现彼此在非洲支持着互相敌对的“解放”运动。例如在津巴布韦，苏联支持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而中国支持的是津巴

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的分裂运动。

古巴还将在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及其同事将古巴视为非洲国家如何摆脱帝国主义魔爪的榜样。毕竟，古巴已经摆脱了压迫性的独裁统治，并抵御了美国所支持的对该岛的入侵。古巴对非洲的关注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非殖民化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提供了舞台。古巴支持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古巴和非洲之间的共同联系。大约三分之一的古巴公民至少有一些非洲血统。因此，许多古巴人有动力帮助将非洲人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并帮助将古巴革命传播给他们。

=====

苏伊士运河危机

冷战时期的中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区，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区。该地区位于苏联以南，传统上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有很大影响。该地区还拥有豐富的石油储备，这对于 1950 年代的超级大国（他们各自拥有大量石油储备）来说并不重要，但对于迅速重建的、美国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至关重要。美国最初的中东计划是在该地区北部形成防御圈。因此，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巴格达条约并加入了CENTO合作组织。

东方集团的反应是在叙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寻求影响力。据此，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与埃及进行了价值高达 2 亿 2500 万 至 2 亿 5000 万美元的武器交易，以换取棉花，使华约成员国在该地区拥有强大的存在。埃及曾是属于英国控制的受保护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整个地区拥有庞大的人口和政治权力。

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将军与苏联及其盟友的往来激怒了西方政府，包括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1956 年 7 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为大规模的阿斯旺高坝项目提供资金。作为回应，同年，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将英国军队驱逐出埃及。

艾森豪威尔说服英国和法国退出与以色列联合的计划不周的入侵行动，该入侵是为了从埃及重新控制运河而发起的，因为担心疏远其他阿拉伯国家，并将它们赶入苏联的怀抱。当美国人被迫秘密行动，以免让他们的盟友难堪时，东方集团国家大声威胁“帝国主义者”，并努力将自己描绘成第三世界的捍卫者。纳赛尔后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称赞，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

因此，苏伊士运河的僵局是一个转折点，预示着大西洋冷战盟友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相比，它们变得远不像一个统一的巨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西德、挪威、加拿大和英国建立了共同市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种裂痕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变化。面对日本和西德的挑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步履蹒跚，日本和西德从各自工业基地的战时毁灭中迅速恢复。作为 20 世纪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接班人，美国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同时在国内市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外国竞争。与此同时，华沙条约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紧密结盟。

=====

拉丁美洲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方法是试图推翻不友好的政府，但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的。

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政治寡头通过与军事精英和美国的联盟进行统治。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的角色性质在冷战前多年就已经确立，但冷战给美国的干预主义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到了 20 世纪中叶，该地区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更高的经济发展状态，这增强了下层阶级的权力和地位。这对社会变革和政治包容的呼声更加明显，从而对美国对该地区经济的强大影响力构成挑战。到 1960 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发了美国对拉丁美洲不稳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担忧。

未来的拉丁美洲革命者转向游击战术，特别是在古巴革命之后。当他的军队抛弃他时，阿尔本斯倒下了。此后，一些未来的拉美社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最值得注意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桑地诺在尼加拉瓜由单一单元

的军队和政府部分，最终建立了一个政党的状态。推翻这样的政权需要一场战争，而不是简单的中央情报局行动、海军陆战队登陆或像猪湾入侵这样的粗略入侵计划。

=====

古巴

古巴革命和通往卡斯特罗的道路

卡斯特罗政权推翻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后者通过军事革命和又一次军事政变上台。巴蒂斯塔的第一次起义被称为“中士起义”。叛乱后，巴蒂斯塔通过一些傀儡统治者管理政府。然而，在一系列失败的傀儡总统之后，巴蒂斯塔本人从 1940 年到 1944 年成为总统。巴蒂斯塔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和平结束，并因他实施的公共工程计划而实现了大量经济增长。巴蒂斯塔总统任期结束后移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直到 1952 年他决定回到古巴竞选总统。但是，就在选举日前三个月，一场军事政变让巴蒂斯塔重新掌权。他声称现任总统正在策划他自己的政变以继续掌权，从而为自己的这次政变辩护。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持续了七年，直到1959年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

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是第一位在西半球建立共产主义国家

并控制古巴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政治生涯始于他进入哈瓦那大学法学院。随后他加入了正统党运动。1947年他曾试图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特鲁希略，但以失败告终。1952年他竞选古巴众议院席位，但因独裁者的崛起而未能成功。1953 年，卡斯特罗发动政变企图推翻巴蒂斯塔，但没能成功，不久便入狱。在狱中，他将自己的革命团体改名为“7 月 26 日运动”，并在狱中协调指挥该革命团体的行动。1955 年根据特赦协议，他从古巴监狱获释，之后逃往墨西哥，以争取支持他第二次推翻巴蒂斯塔和独裁统治的企图。1956 年 12 月，卡斯特罗和他的大约 80 名战友一起登陆古巴。虽然他的大部分战士们在这段时间里因企图推翻政府而被杀或被俘，但卡斯特罗和他的残余部队逃入山区并开始了他们的游击战活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卡斯特罗继续他的游击战，同时慢慢地壮大了他的武装力量。1959 年，卡斯特罗的军队在古巴的重要据点取得了关键胜利，再加上巴蒂斯塔失去人气和军事力量，导致巴蒂斯塔逃离古巴，卡斯特罗上台。

卡斯特罗于 1959 年 2 月 16 日宣誓就任古巴总理，此时他控制了古巴政府的 3 万人军队。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领导人的第一项行动是将美国在岛上的资产无偿国有化。在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垮台之前，美国的利益集团拥有该岛公用事业公司五分之四的股份、近一半的糖业和几乎所有的采矿业。针对卡斯特罗的这些行为，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卡斯特罗为古巴领导人。美国政府发起了臭名昭著的猪湾入侵，这是推翻卡斯特罗的多次尝试中的第一次。

卡斯特罗随后于 1960 年 2 月与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古巴的农产品可以销往那些共产主义国家，而古巴所需的机

械、重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也有了新来源。这可以取代该国的传统赞助人——美国。

1959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成功革命后，东方集团与古巴结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苏联的重大胜利，苏联在美国海岸附近获得了盟友。推翻古巴新政权成为中央情报局关注的焦点。

====

试图推翻卡斯特的统治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接管古巴的时候，美国对该国新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感到不确定。1959 年，苏联和古巴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潜在的经济合作直接导致了美国的不安。此时最令人担忧的是一颗距离美国本土仅 90 英里的苏联卫星国家。然后，美国政府开始试图计划干预这种情况。中央情报局（CIA）最初提议破坏古巴的糖厂，但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威胁来自卡斯特罗，而他才是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1959 年 12 月，中央情报局开始计划推翻或可能暗杀卡斯特罗。1960 年 2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中央情报局制定一项正式计划，以解除卡斯特的权力。该请求导致了由计划副主任 比塞尔（Richard Bissell）领导的工作组成立。该特遣队的初始阶段是培养和训练一批古巴流亡者组成准军事组织。然后，这个团体将部署到古巴，组织、训练和领导抵抗力量推翻政府。由于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

比塞尔特遣队，也称为Brigade 2506（即2506旅）。由于难以与反卡斯特罗的古巴反对派协调，这支部队后来从最初的游击渗透模式转变为更加准军事化的入侵概念。在艾森豪威尔在任的剩余几个月里，他推动中央情报局加快其 2506 旅的计划。艾森豪威尔不希望总统任期的过渡停止任何发展。该计划于11月至1月之间最后敲定。11月份是肯尼迪选举胜利的时间。1月份是肯尼迪就职的时间。

比塞尔希望在危地马拉训练2506旅的战斗人员，同时在尼加拉瓜使用一条简易机场，并从美国获得物资补给。肯尼迪总统与美国政府多部门负责人会面时，面临着是否执行还是取消这一计划的决定。肯尼迪最终决定全额资助并加速该计划，并为运营及其结果承担责任。

=====

猪湾入侵和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在 1959 年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和1961 年中苏正式分裂之前，受苏联影响的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土范围达到最大的程度。

中央情报局希望复制 1961 年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成功。他们注意到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人大量移民美国的浪潮，于是训练并武装了一群在猪湾登陆的古巴流亡者。他们试图在那里引发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起义。然而，

这次袭击惨遭失败。之后，卡斯特罗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把古巴建立为美洲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且继续将该国几乎所有主要产业国有化。

苏联政府将这次失败的入侵作为在古巴部署苏联军队的理由。还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导弹，该导弹可以同时打击美国的多个地点。

作为回应，约翰·肯尼迪总统对该岛进行了隔离封锁，经过几天紧张的日子后，苏联决定撤退，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和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承诺。这场冲突与核战争擦肩而过。两国领导人在1962年后禁止了空中和水下的核试验。苏联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苏联军队撤离古巴的行动，削弱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威望，不久后他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勃列日涅夫。

古巴革命导致肯尼迪发起了“进步联盟”计划。该计划旨在在 1960 年代为经济发展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以避免社会主义革命。该联盟还包含反叛乱措施，例如在巴拿马运河区建立丛林战学校和培训警察部队。

=====

亚洲

摩萨台和中央情报局在伊朗

美国在关注自 1951 年以来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伊朗的事态发展时，做出了震惊的反应。

通过英伊石油公司（AIOC），英国垄断了伊朗大部分地区的石油运输、泵送和提炼。该公司向 自从1941 年由英国人协助登上王位的沙阿伊朗政府支付了生产税。但考虑到该公司的收入是其支出的 10 倍，向伊朗支付的生产税和工资较少。伊朗饱受贫困之苦，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控制该公司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许多伊朗人要求该公司支付更高份额的收益。对此，AIOC 回应称，它与伊朗国王达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直到 1993 年，并与一些伊朗政治力量合作起草了一份反对国有化的报告。1951年2月，被人怀疑参与起草该报告的伊朗总理被暗杀。他被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台取代。那年晚些时候，这位伊朗新总理将伊朗境内的英国人拥有的油井收归国有。

随着伊朗人开始夺取石油储备，杜鲁门政府试图进行调解。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确信伊朗正在与共产主义国家发展关系，于是利用中央情报局，准备与伊朗军事领导人联手推翻伊朗政府。

民族主义者摩萨台得到了伊朗人民党（即共产党Tudeh）的大力支持。然

而，到了 1953 年，该党开始批评他是美国的傀儡。由于人民党是中东最强大的共产党，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共产党在中东的潜在接管作为干预的理由。

伊朗总理摩萨台援引共产主义威胁来获得美国的让步。总理认为，如果伊朗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政府会担心共产主义接管，因而，美国将抛弃英国，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另一方面，为了取代摩萨台，美国青睐年轻的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作为回报，巴列维承诺允许美国公司参与其国家储备的开发。根据中央情报局 2000 年公开的文件，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协助的 1953 年政变中提供了枪支、卡车、装甲车和无线电通信，将巴列维从立宪君主的地位提升为绝对统治者。随着摩萨台被排除在外，石油利润在巴列维国王政权和一个新的国际财团之间分配。在财团利益中，英国获得了 40% 的石油收入，五家美国公司（海湾、SOCONY-Vacuum、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再获得 40% 的股份，其余的则归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法国石油公司所有。石油利润在财团和伊朗之间平均分配。

=====

印度支那（即越南、老挝、柬埔寨）

奠边府战役，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国联盟的势力、法国远东远征军，与北越胡志明共产主义革命势力（越盟）之间的战斗高潮。

这场战斗发生在 1954 年 3 月至 5 月之间，最终以法国的大规模失败而告终，从而有效地结束了战争。

由于法国决策过程中的失误，法国承诺在越南山区深处的奠边府建立一个空中供应基地。其目的是切断胡志明越盟与邻近的法国保护国、老挝之间的补给线，同时将越盟拖入一场将使他们瘫痪的战斗。

相反，在武元甲将军领导下的越盟，包围并围困了法国人。法国人不知道越盟拥有重型火炮（包括高射炮）以及他们将这种武器移至俯瞰法国营地的山峰的能力。

越盟占领了奠边府周围的高地，并能够准确地向法国阵地开火。随后进行了顽强的地面战斗；这让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法国人多次击退越盟对其阵地的进攻。补给和增援是通过空运提供的，尽管，随着法军阵地被占领和防空火力造成损失，到达他们的补给越来越少。经过两个月的围攻，法国守军被击败，大多数法国人投降了。尽管失去了大部分最好的士兵，胡志明越盟还是集结了剩余的军队，追击那些逃入荒野的法国人，击溃了他们并结束了战斗。

此次战斗结束后不久，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以 1954 年的日内瓦协定结束。根据该协定，法国同意从其前印度支那殖民地撤出。协议将国家一分为二（南越与北越）。1959 年，敌对的越南军队之间的战斗恢复，称为越南战争（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

影响最大的美国干预是在印度支那。1954 年至 1961 年间，美国政府向正在与民族解放阵线(NLF) 游击队作战的（南越）越南共和国(RVN)派遣了经济援助和 695 名军事顾问。NLF的队伍从南部的农民和北越那里得到支持，而北越又由苏联和中国得到支持。RVN后来被北越军队征服，北越与南越合并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越南是世界上仅存的四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以及中国、古巴和老挝）。

=====

南亚

冷战期间，南亚印度次大陆从来都不是超级大国关注的主要焦点。欧洲、东亚、拉丁美洲和中东一直被视为对超级大国的利益更为重要。南亚各国，尽管包含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却没有像日本和西欧那样的强大的经济体。与拥有石油的中东不同，南亚缺乏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利益是建立机场，这些机场可用作U-2高空飞机在苏联领土上空飞行的基地，或者在战时成为可能袭击中亚的核轰炸机的所在地。最初，美国人和苏联人都认为该地区会留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但事实并

非如此。

涉足南亚有一些战略原因。美国人希望可以利用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来阻止苏联进入关键的中东地区。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大而引人注目的国家，如果印度落入任何一个阵营，它都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量。印度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民主国家，从来没有特别陷入叛乱分子的危机，或受到来自大国的外部压力的严重危险。它也不想与美国结盟。

南亚冷战竞争舞台上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954年巴基斯坦和美国签署了《互防互助协定》。该协定将限制该地区所有主要大国后来的选择。美国承诺与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对巴基斯坦而言，美国联盟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信条，尽管对它有很多失望，但它始终被视为一种非常宝贵的联系，不能放弃。中苏分裂后，巴基斯坦还寻求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苏联对南亚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非常相似。起初，与美国人一样，苏联人对该地区基本上不感兴趣，并在印度巴基斯坦争端中保持中立立场。随着1954年巴基斯坦和美国签署协定，以及巴基斯坦加入CENTO和SEATO的国家集团组织，情况发生了变化。1955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承诺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苏联领导人宣布，苏联将放弃中立立场，在持续的克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印度。

然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印苏关系持怀疑态度。出于许多与他希望避

免与美国发生过多纠葛的相同原因，他还希望防止印度与苏联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一些援助，尽管尼赫鲁成为第一位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的非共产主义领导人，但两国仍然相对疏远。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恢复了中立立场并调解了1965 年战争的后果。印巴和平谈判在中亚城市塔什干举行。

到 1960 年代后期，印度的经济发展努力再次陷入停滞。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严重的干旱给农业部门带来了沉重打击。与十年前的经济衰退一样，印度再次寻求外部援助。然而，与美国的关系处于低潮，美国主要专注于越南。最重要的是，几个较小的问题使美国人的冷漠态度变成了对印度的反感态度。世界银行等西方国际组织也不愿意在没有印度贸易政策让步的情况下为印度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与其他华沙条约国家一起，苏联开始为印度建立工业基地的努力提供广泛的支持。1969 年，印苏两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友好条约；该条约的内容将使印度的“不结盟运动”变成一纸空文。两年后，当面临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日益严重的危机时，印度签署了该协议。

=====

中苏分裂

在中苏分裂之前，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使苏联与这两个亚洲主要新兴国家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努力变得复杂。

1959年3月，中国在西藏镇压起义，导致中印之间发生公开冲突。3月31日，西藏精神领袖和世俗统治者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在那里他获得了印度政府庇护，尽管有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

后来，在联合国大会中，尽管有苏联、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和蒙古的反对，印度支持就中国在西藏压制人权的指控进行全面辩论。

然而，尽管华沙条约组织、蒙古和朝鲜反对在联合国举行的印度支持的辩论，但是，毛对苏联在中国的西藏行动上采取相当的沉默态度、很不情愿支持中国，越来越感到沮丧。

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W·杜勒斯（Allen W. Dulles）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能在政治和经济上打击共产主义中国，但指出中国对西藏起义的无情镇压可能会导致印度巴基斯坦将军事资源集中用于保护其喜马拉雅边界。这可能会使竞争升级，而不是有利于印度。

当中国用军事力量积极地镇压和占领了西藏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印度和中国之间更加危险的对抗。历届中国政府都拒绝了英国在20世纪初所

划的中印边界，即麦克马洪线。随着中国在中国认为是其边界的地方建立前哨，印度在有争议的地区建立了更多的前哨以驱逐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的前瞻政策。边界侵犯和侵略的指控和反指控沿边境交换。9月9日，就在启程赴美前几天，匈牙利的贾诺斯·卡达尔试图调解中印之间的争端，希望通过他在双方的友好关系中发挥作用。赫鲁晓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也试图调解中国和印度。

然而，中国对苏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呼吁与西方和印度“和平共处”的反应并不令人鼓舞。喜马拉雅山沿线紧张局势的影响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华沙条约组织与中国联盟的猜测，该联盟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利益。

当中印边界争端发展为1962年的中印战争全面爆发时，世界两大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联盟已不可挽回地破裂。尽管华约国家支持中国 1962 年 10 月的和平提议，敦促尼赫鲁接受它，但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向印度提供米格战斗机的提议使中阿和中罗关系陷入危机。这也使中国反对其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到 1963 年底，东方集团和中国开始相互公开争论，开启了前盟友之间公开敌对的时期，持续了冷战时期的剩余时间。

=====

文化与媒体

在美国二战后的随后几年里，媒体和文化描绘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和恐惧感，担心苏联共产主义在美国娱乐、政治、社会 and 科学领域的蔓延。随着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在 1940 年代、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加剧，公众对共产主义颠覆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歇斯底里被描绘为“红色恐慌”，但更尤其地，是关于 1950 年代的第二次红色恐慌。

媒体对冷战的报道成为了承认两国意识形态差异的催化剂。在 1960 年代之前，书面和说明性的交流形式是美国的主要信息来源；美国报纸卡通、传单和电影海报中带有“易于理解的”和“情感图像”的政治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巩固美国理想对抗苏联对手的铸模。

事实上，美国和苏联媒体都成功地制造了支持各自国家动机的修辞和意象，同时在他们的人民中建立了一种沙文主义意识；这实际上被称为“政治宣传”。

冷战时代的两极分化和核军备竞赛带来的恐惧，美国 and 苏联之间的冲突，加上政治化的媒体渲染系统，导致社会情绪高涨，其中包括美国媒体和文化中的“宁死也不要红”等言论。

早在 1947 年，美国众议院审查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就开始就美国娱乐专业人士的政治取向举行听证会，从著名的好莱坞十人开始。这些活动导致 10 名好莱坞导演和作家被指控藐视国会，并最终导致建立更广泛的娱乐业黑名单。

众议院委员会HUAC行动的高峰发生在 1953 年至 1956 年之间。其中包括麦卡锡查判。HUAC 娱乐业黑名单的目标包括导演、演员、编剧、音乐家和其他著名的娱乐专业人士，这些人最终因涉嫌为共产主义组织成员或同情共产主义而被从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列入黑名单。

在美国生活中传播的苏联共产主义理想被用作广为宣传的 HUAC 和麦卡锡查判所采取措施的理由。在这一时期的美国，随着联邦和私人公司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电视台和电影公司对公众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美国推进了一项旨在促进战争时期针对苏联的军事和情报工作的积极共识的措施。

参议员麦卡锡以及他所推动的查判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蛊惑人心的风格，充满了毫无根据的指责。这导致了他的倒台。由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不久后开始陷入破产，后来又被在1975 年正式解散。

就在 1960 年代初之前，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宣布该委员会本身是“当今美国所发生的最不美国的事情”。

在这些事件之前，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文化和媒体中向民众公开广泛宣传过如此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 20 世纪美国民主面临的国内威胁。

在这个伟大的时期，冷战主题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首次进入主流文化。例如，1959 年的电影《在海滩上》描绘了一个逐渐消亡的、世界末日后的世界，它在第三次世界核战争后仍然存在。

詹姆斯邦德于 1954 年首次出现；这些电影与冷战的联系松散，但影迷们喜欢美丽的女人、异国情调的地方、高科技的小玩意、和不死的特技，并且可能不太关注政治。邦德电影顺应了政治气候，描绘了苏联人和“红色”中国人。

Frederick Forsyth 的公式间谍小说销量达数十万。他 1984 年的小说《第四议定书》，其标题指的是一系列公约，如果这些公约被打破，将导致核战争，现在除了第四条也是最后一条线外，这些公约都被打破了；小说被拍成了 1987 年由迈克尔凯恩主演的重要电影。这类小说——比如 1950 年代的美国电影，如《我的儿子约翰》、《致命地吻我》和《满洲候选人》——描绘了“内心的敌人”、和平运动的背叛者、和朴实的工党选民；到 1988 年，他们正在反抗冷战。

=====

冷战中的计算机

计算机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40 年代中期开始产生影响，并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继续增加使用。第一台计算机是在英国和美国设计制造的，用于存储数字程序。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被用于大规模军事计算。这些计算机将继续帮助弹道导弹、核导弹和反导弹防御系统领域的科学家。

=====

苏联的计算机

苏联面临的两难困境是，西方科学是衡量苏联科学进步的标准。苏联人的困境在于，他们在想超越西方科学的同时，又不得不借用它来推动自己的科学进步。结果是，许多苏联人一面在谴责西方科学，但另一面又会转过身来表达他们是多么需要他们自己所刚刚谴责过的西方科学理论。

1940 年代，当苏联首先开始收到有关 英国和美国设计和建造的电子存储数字程序的报告的时候，这引起了从事需要大量计算的国防项目的苏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极大关注。

苏联科学家从出版物和调查文章中获得了有关这些计算机的信息。但他们也可能通过他们的间谍情报渠道获得了一些此类信息。一名前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情报官员最近透露，在 1942-1946 年间，他从在 RCA、西部电

气、西屋电气、通用电气的工厂和实验室、和持有军事合同的两个飞机公司工作的七名特工那里，获得了 20,000 份技术情报文件。这些文件包含有关雷达、声纳、计算机和其他电气设备的科学和技术信息。

第一批电子数字计算机被用于大规模军事设备科研计算。弹道导弹程序是苏联数字计算部门的主要客户，用于计算导弹弹道。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是，用大型高速计算机 M-2 来计算导弹设计的热力学和流体动力学参数。反导弹防御也推动了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机首先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计算目标破坏概率对破片弹头爆炸效率的依赖性。

苏联科研部门很早就进入了计算机领域，并进一步开发了计算机，使其成为有用的军事装备。部分原因也是想要与西方科学竞争；在冷战期间，这意味着美国若在投资计算机，就给了苏联继续投资计算机的额外动力。

=====

美国的计算机

美国 and 英国是最早开始开发计算机的国家之一，美国并没有停止发展。美国认为将计算机用于军事目的是有益的，这发生在冷战初期。苏联也开始将计算机整合到军事计划中，于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计算机竞争开始了。

美国很快开始使计算机适应国防和军事目的。空军是最早适应和使用计算机的军事部门之一。空军在代托纳的莱特空军开发中心建立了一台 Reeves 模拟计算机，用于开发武器系统。它已在朝鲜战争中用于追踪敌方炮弹的来源，然后将其摧毁。海军随后部署了其海军军械研究计算器（NORC），作为一种向目标准确发射舰炮的手段，同时考虑到舰船速度、风速、方向以及船只的横摇和俯仰等多个变量。

由于美国知道计算机将如何影响军事计划，他们开始收集有关苏联如何使用自己的计算机程序的信息。美国得到的信息是，苏联并没有真正跟上美国的步伐，因为他们制造计算机所需的设备不足且标准很差。美国 1959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苏联拥有 400 台各种类型的通用数字计算机，而美国生产了 4000 多台，而 1958 年苏联计算机的产量最多为 5500 万美元，而美国则为 10 亿美元。这将表明，与美苏之间的核计划相当平等不同，美国在与苏联的计算机竞争中具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

美国在计算机发展方面领先于苏联。不仅军事部门热衷于使用计算机，而且平民百姓也能够使用计算机。美国 66% 的计算机用于军事目的，而 30% 用于民用。二战后，计算机在军队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供平民使用，美国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引领了这一技术变化进入技术世界。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62%E2%80%931979\)](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62%E2%80%931979))

冷战（1962-1979）

1962-1979年的冷战时期，是从1962年10月下旬古巴导弹危机开始，于1969年开始进入缓和周期，缓和在70年代末结束。

在此期间，美国在维持与苏联的冷战的同时，美国内部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肯尼迪遇刺案，民权运动，以及为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而导致的美国民间大规模抗议活动。

1968 年，东欧集团成员捷克斯洛伐克尝试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随后遭到苏联和其他华约成员国的入侵，恢复了苏联模式。到1973年，美国已退出越南战争。尽管共产党人在某些东南亚国家掌权，但他们被中苏分裂所划分。在此期间，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靠拢西方阵营。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第三世界的国家日益分化为，——苏联支持的国家阵营（如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南也门）；北约支持的国家阵营（如沙特阿拉伯）；以及越来越多的不结盟国家阵营。

苏联和其他东方集团的经济继续停滞不前。1973 年石油危机之后发生了全球通货膨胀。

=====

冷战政治受到非洲、亚洲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拉丁美洲非殖民化的影响。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需求使它们容易受到外国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的影响。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扩散，主要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

苏联领导人对刚刚起步的前殖民地的事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它希望在那里培养社会主义客户，从而剥夺西方的经济和战略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急于建立自己的全球选民，试图在非殖民化领土中发挥领导作用，呼吁其作为一个非白人、非欧洲农业国家的形象。

中苏两国都将全球非殖民化作为纠正世界平衡以对抗西欧和美国的机会，并声称被殖民地区的人民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使他们自然倾向于社会主义。

西方对与共产主义集团就殖民地进行常规战争的恐惧很快转变为对共产主义颠覆和代理人渗透的恐惧。在许多殖民地，土著居民和殖民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为许多反殖民政党采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沃土。这也为西方的宣传提供了弹药，这些宣传谴责许多反殖民运动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

随着非殖民化压力的增加，即将离任的殖民政权试图将权力移交给致力于与西方保持经济和政治联系的温和而稳定的地方政府。

政治过渡并不总是和平的；例如，当喀麦隆独立时，由于其中的讲英语的地区要不得不与讲法语的地区在一个国家政府中联盟，因此，在讲英语的喀麦隆南部爆发了暴力事件。

在刚果，当比利时政权离开的时候，新的刚果军队发生了叛乱，导致当地欧洲人口外流，并使该领土陷入整个 1960 年代中期的内战。

葡萄牙试图积极抵制非殖民化，并被迫与所有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叛乱作斗争，直到 1975 年。

罗得西亚的两个敌对游击派系（其中一个由苏联支持，另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发生了毁灭性的内战。但分离出来的、由当地白人所组成的政府在罗得西亚保留了权力，直到 1979 年。

=====

第三世界联盟（不结盟运动）

一些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种战略，将冷战变成了他们所谓的“创造性对抗”——利用冷战参与者为自己谋利，同时保持不结盟地位。

不结盟外交政策将冷战视为国际事务中一个悲惨而令人沮丧的局面，阻碍了巩固新兴国家及其结束经济落后、贫困和疾病的努力的压倒一切的任务。

不结盟运动认为，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和平共处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

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中立主义视为在不结盟国家之间建立“第三股力量”的一种手段，就像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在欧洲试图做的事情一样。

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在东西方集团之间，试图左右逢源，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目标。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于1947 年在新德里举行了亚洲关系会议。会议承诺支持所有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并探讨亚洲人民的基本问题。

也许最著名的第三世界会议是1955 年举行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万隆会议，讨论共同利益和战略，最终导致1961 年不结盟运动的成立。参加会议的有29 个国家，代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正如在新德里，反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和文化合作是主要议题。

第三世界国家大力推动在国际理事会，特别是联合国中获得发言权，并获得对其新主权地位的承认。这些新国家的代表也对轻视和歧视极为敏感，尤其是基于种族的歧视。在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生活水平低得可怜。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正在成为区域大国，但大多数国家又小又穷，无法渴望获得这种地位。

联合国大会最初有 51 个成员，到 1970 年增加到 126 个。西方成员的主导地位下降到成员的 40%，亚非国家掌握着权力平衡。随着前殖民地赢得独立，联合国大会的队伍迅速膨胀，从而形成了一个由拉丁美洲成员组成的有投票权的大集团。反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强化的这种情绪常常转化为反西方的立场，但不结盟国家的主要议程是确保社会和经济援助措施的通过。

然而，超级大国拒绝为此类项目提供资金往往会削弱不结盟联盟的有效性。万隆会议象征着建立旨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政策和经济合作统一的区域组织的持续努力。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创建于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

非统组织的设计是为了：

“促进非洲国家的团结；协调和加强合作和努力，为非洲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捍卫他们的主权；根除非洲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并促进国际合作……”

非统组织要求其 30 个成员国中的每一个都采取不结盟政策，并催生了几个在概念上类似于欧洲共同市场的次区域经济集团。非统组织还奉行与其他第三世界区域联盟，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合作政策。

不结盟国家表达的大部分挫败感源于富国和穷国之间极其不平等的关系。在西方跨国公司开发关键资源和当地经济的地方，这种怨恨最为强烈，对世界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在1960年的形成，反映了这些问题。欧佩克制定了反渗透战略，希望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工业经济体容易受到第三世界压力的影响。

最初，该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美国及其盟国的外援减少，加上西方亲以色列政策，激怒了欧佩克的阿拉伯国家。1973 年，该集团将原油价格翻了两番。能源成本的突然上升加剧了西方的通货膨胀和衰退，并突显了世界社会的相互依存。次年，联合国的不结盟集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该秩序中资源、贸易和市场将得到公平分配。

不结盟国家还建立了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作为对抗超级大国的杠杆。欧佩克、非统组织和阿拉伯联盟的成员重叠，在 1970 年代，阿拉伯人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巨额财政援助，以减少非洲对美国 and 苏联的经济依赖。

然而，阿拉伯联盟因专制的亲苏联国家（例如纳赛尔的埃及和阿萨德的叙利亚）与贵族君主制（通常是亲西方的）政权（例如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之间的分歧而饱受折磨。

尽管非统组织在非洲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成员通常主要对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整个非洲大陆层面的利益感兴趣。

1977 年在开罗举行的非洲-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石油生产商承诺向非洲提供 15 亿美元的援助。最近欧佩克内部的分歧使得采取一致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如此，1973 年的世界石油危机为资源供应商在与更发达的世界打交道方面的潜在力量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据。

=====

古巴革命和古巴导弹危机

从1959年的古巴革命到 1970 年代的军备控制条约，这几年标志着苏联和美国在控制其势力范围方面做出了越来越大的努力。1965 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了 22,000 名士兵，声称要阻止另一场古巴革命的发生。

虽然从 1962 年到1970年代缓和期间没有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危险的事件，但冷战的主要参与者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丧失合法性和善意。

=====

9月30日运动

“9月30日运动”是一个自称的印度尼西亚军事组织；其成员在1965年10月1日凌晨，暗杀6名印尼军队将军，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

遇难者中有陆军部长/指挥官艾哈迈德·亚尼中将。未成为绑架目标的未来总统苏哈托指挥军队，说服占领雅加达中心广场的士兵投降，并监督结束政变。爪哇中部的一场规模较小的叛乱也瓦解了。

军队公开指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发动政变的企图，并在 10 月，对共产主义者嫌疑人开始了大屠杀。1966 年 3 月，苏哈托在收到苏加诺授予他恢复秩序权力的文件后，禁止了印共。一年后，他取代苏加诺成为总统，建立了强烈反共的“新秩序”政权。

=====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在东部集团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一段政治自由化时期，称为布拉格之春。

此次活动受到多项事件的推动，包括解决 1960 年代初期经济衰退的经济改革。4 月，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发起了一项自由化“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增加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以及对消费品的经济重视，以及一个多党政府并限制秘密警察的权力。

东方集团内部的最初反应喜忧参半，匈牙利的亚诺斯·卡达尔表示支持，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则对杜布切克的改革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削弱东方集团在冷战期间的地位。

8月3日，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签署了《布拉迪斯拉发宣言》，宣言重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并宣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所有“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无情的斗争。

1968 年 8 月 20 日至 21 日晚上，来自四个华沙条约国家——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的东方集团军队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

入侵符合勃列日涅夫主义。这是一项迫使东方集团国家将个别国家利益从属于整个集团的政策，并行使苏联在东方集团国家似乎发生转变、走向资本主义时进行干预的权利。

入侵之后是一波移民潮，其中估计有 70,000 名捷克人最初逃离，最终总数达到 300,000 人。

1969 年 4 月，杜布切克被古斯塔夫·胡萨克取代为第一书记，开始了一段“正常化”时期。

胡萨克推翻了杜布切克的改革，清除了党内的自由派成员，将反对者从公职中解职，恢复警察当局的权力，寻求重新集中经济并重新禁止主流媒体和不被认为具有“完全政治信任”的人。

苏联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尤其是在受“新左派”和不结盟运动国家所启发的西方学生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谴责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是帝国主义者。

=====

越南战争

1965 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了 42,000 名士兵，以阻止“另一个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出现。

然而，1965 年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干预。1965 年，约翰逊在南越驻扎了 22,000 名士兵，以支持摇摇欲坠的南越反共政权。南越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结盟。北越胡志明是由苏联和中国支持。反过来，北越支持从南越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汲取力量的南越反叛游击队——“民族解放阵线”（NLF）。为了遏制共产党的扩张，约翰逊于 1968 年将军队人数增加到 575,000 人。

北越在 1959 年的战争努力获得了苏联的批准和支持；战争期间，苏联向北越派遣了 15,000 名军事顾问和每年价值 4.5 亿美元的武器运输，而中国则向北越派遣了 320,000 名军队和每年价值 1.8 亿美元的武器运输。

虽然战争初期美国伤亡惨重，但政府向公众保证，这场战争是可以取胜的，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美国的胜利。1968 年 1 月 30 日，当 NLF 在南越发动春节攻势时，美国公众对“隧道尽头的曙光”的信念破灭了。尽管 NLF 这些攻势都没有实现任何军事目标，但敌人甚至发动这种攻势的惊人能力本身，使美国许多人相信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国内，随着 1960 年代的反文化采取声势浩大的反战立场，以大学校园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成为一个显著特征。特别不受欢迎的是威胁要派遣年轻人在东南亚丛林中战斗的征兵计划。

美国总统理查德 M. 尼克松在 1968 年采取了从战争中开始缓慢脱离的政策。目标是逐步建立南越军队，使其能够独立作战。这一政策成为所谓“尼克松

主义”的基石。应用于越南时，该学说被称为“越南化”。越南化的目标是使南越军队能够越来越多地独自对抗 NLF 和北越军队。

美国于 1973 年从越南撤军，1975 年北越占领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冲突终于结束。就死亡人数而言，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

195,000–430,000 名南越平民在战争中丧生。50,000–65,000 名北越平民在战争中丧生。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在战争期间损失了 171,331 至 220,357 人。58220 名美国军人也死在了冲突中。

=====

尼克松主义

到尼克松政府的最后几年，很明显，第三世界仍然是世界不稳定局面的、最不稳定和最危险的根源。尼克松-基辛格的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核心是努力维持稳定的现状，而不会让美国太深地卷入地方争端。1969 年和 1970 年，为了应对越南战争的高潮，总统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要素，美国将“参与盟国和朋友的防御和发展”，但将这些“朋友”的未来的“基本责任”留给各国自己。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政府越来越蔑视联合国，在联合国，欠发达国家正通过其庞大的数量获得影响力，并越来越多地支持试图抵御来自内部民众挑战的威权政权。

例如，在 1970 年代，中央情报局向智利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帮助支持已建立的政府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当马克思主义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通过自由选举上台时，美国开始向反对派提供更多资金，以帮助“破坏”新政府的稳定。1973 年，美国支持的军政府从阿连德手中夺取了权力。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新专制政权得到了美国作为反共盟友的热烈支持并增加了军事和经济援助。1989 年，智利终于重新建立了民主。

=====

中苏分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跃进等以农业代替重工业的政策挑战了苏式社会主义和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的迹象。随着苏联“去斯大林化”的推进，中国革命创始人毛泽东谴责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国人也越来越对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一直处于第二角色感到恼火。1960 年代，两国开始公开分裂；紧张局势导致中苏边境发生一系列边境冲突。

中苏分裂对东南亚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长期战争中得到了中国的大量援助，越南共产党人仍与苏联结盟以对抗中国。1975 年，已经被红色高棉完全控制的柬埔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之一。新统一的越南和高棉政权从一开始就关系不佳，因为红色高棉开始在柬埔寨屠杀越南人，然后向越南发动袭击。

红色高棉与中国结盟，但这并不足以阻止越南入侵柬埔寨、并在 1979 年摧毁该政权。

虽然无法拯救他们的柬埔寨盟友，但是，中国在当年稍晚的时候，确实通过入侵越南北部来回应越南对于柬埔寨的惩罚性远征。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和双方巨大伤亡，中国宣布行动完成并撤退，结束了战斗。

美国在这些事件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在越南失败后不愿介入该地区。共产主义集团的极其明显的解体，以及中美缓和紧张局势，对东西方国家集团之间、以及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

缓和和改变联盟

在勃列日涅夫 1973 年访问华盛顿期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站在白宫阳台上交谈——这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缓和的高潮。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冷战参与者努力适应一种新的、更复杂的国际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世界不再分为两个明显对立的集团。苏联与美国实现了粗略的核平衡。从战后初期开始，西欧和日本迅速从二战的破

坏中恢复过来，并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人均 GDP 接近美国，而东欧经济体则停滞不前。

中国、日本和西欧；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联盟内部日益严重的不团结；都预示着一个新的多极国际结构。此外，1973 年的世界石油危机使超级大国的经济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重创美国经济，导致“滞胀”和增长放缓。

缓和对冷战双方都具有战略和经济利益，这得益于他们试图阻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共同利益。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署了“SALT”条约限制战略武器的发展。军备控制使这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减缓其膨胀的国防预算的螺旋式增长。

与此同时，分裂的欧洲开始寻求更紧密的关系。西德总理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导致承认东德。

赫尔辛基协议的合作促成了多项关于政治、经济和人权的协议。制定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如 SALT I 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以限制战略武器的发展并减缓军备竞赛。

中美之间也出现了和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开启了贸易和文化联系，最著名的是尼克松 1972 年开创性的中国之行。

与此同时，苏联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几个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在缓和期间，竞争仍在继续，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南部和东部。美苏两国继续在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争夺影响力。美国对于印尼苏哈托政权的支持，对于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的支持，对于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政权的支持，也招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破坏了美国人对总统职位的信心。国际上的挫折，包括 1975 年南越的垮台、1979 年至 1981 年的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国际恐怖主义的增长以及军备竞赛的加速，引发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被嘲笑为“滞胀”的能源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引发了关于美国繁荣未来前景的根本问题。

与此同时，石油资源丰富的苏联受益匪浅，石油财富的涌入帮助掩盖了苏联经济中的许多系统性缺陷。与此同时，整个东方集团继续经历大规模停滞，经济体的消费品严重短缺，发展停滞，以及严重的住房数量和质量不足。

=====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流行文化中对冷战主题的关注仍在继续。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电影之一是 1964 年的黑色喜剧、由斯坦利·库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 导演、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 主演的《奇爱博士，或：我如何学会停止担心并爱上炸弹》。在影片中，一位疯狂的美国将军凌驾于总统的权力之下，下令对苏联进行核空袭。这部电影大受欢迎，今天仍然是经典之作。

在英国，《战争游戏》，一个由彼得·沃特金斯编剧、导演、并制作的BBC 电视电影，是对冷战进行深思的艺术作品。这部电影描绘了苏联对英国的核攻击的影响，在 BBC 和政府内部都引起了沮丧情绪。它原定于 1966 年 8 月 6 日（广岛袭击周年纪念日）播出，但直到 1985 年才播出。

1976 年夏天，一种神秘而又似乎非常强大的信号开始渗透到全球的无线电接收器中。它有一种标志性的“敲击”声，并且由于这种强大信号的起源是在苏联的某个地方，因此该信号被称为俄罗斯啄木鸟。许多业余无线电听众认为它是苏联超视距雷达的一部分，但苏联否认他们与此类信号有任何关系。1976 年至 1989 年间，该信号来来往往，在短波无线电频段最为突出。直到冷战结束，俄罗斯人才承认这些雷达信号确实是杜加的雷达信号，这是一种先进的超视距雷达系统。

2004 年的电子游戏Metal Gear Solid 3: Snake Eater以 1964 年为背

景，大量涉及核威慑、秘密行动和冷战等主题。

2010 年的电子游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设定在冷战时期。

=====

重要文件

部分或有限禁试条约 (PTBT/LTBT)：1963 年。

由肯尼迪提出；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太空进行核试验。然而，法国和中国（都是核武器国家）都没有签署。

核不扩散条约 (NPT)：1968 年。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确定为五个“核武器国家”。禁止无核武器国家拥有、制造或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有 187 个签署国都致力于（最终）核裁军的目标。

反弹道导弹条约 (ABM)：1972 年。美国和苏联之间签订，以限制用于防御导弹运载核武器的地区反弹道导弹（ABM）系统；2002年被美国终结。

战略武器限制条约I & II (SALT I & II): 1972 / 1979。限制了美国和苏联导弹库的增长。

防止核战争协议: 1973 年。承诺美国和苏联在核对抗情况下相互协商。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79%E2%80%931985\)](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79%E2%80%931985))

冷战 (1979–1985)

1979-1985年，在冷战的后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敌对急剧增加。1979年12月，苏联因入侵阿富汗而受到强烈谴责。同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在此期间，对苏联的西方外交政策方针的相应变化的特点是拒绝缓和；支持里根主义的逼退政策；其既定目标是消除苏联在苏联集团国家的影响。此时，核战争的威胁达到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从未见过的新高度。

在阿富汗境内发生苏尔革命后，苏联入侵该国，最终导致约 100 万平民死亡。阿富汗圣战者成功地迫使苏联在1989年撤军。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宣布了以美国为首的针对莫斯科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国际抵制行动。1984年，苏联的反应是，抵制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举行的1984年夏季奥运会。当美国宣布将在西德部署潘兴 II型导弹时，紧张局势加剧；之后，里根宣布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并在 1983 年里根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时，敌对态势进一步加剧。

1983 年 4 月，美国海军进行了FleetEx '83-1 演习，这是迄今为止在北太平洋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舰队演习。大约 40 艘船、23,000 名船员和 300 架飞机的集合，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舰队。美国飞机和舰船试图挑起苏联人的反应，使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能够研究苏联的雷达特性、飞机能力和战术机动。4月4日，至少六个美国海军飞机飞过苏联占领的千岛群岛，沉降值岛，以及最大的一组岛屿、所谓的齿舞群岛。苏联人被激怒

并下令报复性飞越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苏联还发布了正式的外交抗议照会，指责美国多次侵入苏联领空。次年 9 月，民用客机大韩航空 007 号班机在附近的莫尼龙岛被苏联战斗机击落。

1983年11月，北约进行了一次名为“ Able Archer 83 ”的军事演习。北约部队对核攻击的真实模拟在苏联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和警惕，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自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

这一冷战时期包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第一任期（1981-1985），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于 1982 年去世、以及由尤里·安德罗波夫（1982-1984）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4-1985）组成的短暂过渡时期。

冷战的这一阶段于 1985 年随着具有改革意识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结束，他承诺减少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为苏联社会带来重大改革。

=====

前奏：缓和十年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苏联一直奉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因此双方试图改善自己的地缘政治局势，同时尽量减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的风险。北约与华约这两个集团国家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以至于苏联约有70% 的粮食来自美国。1975年，北约与苏联集团国家（即Ostpolitik）之间扩大政治联系的步骤以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而达到高潮。此外，还签署了几项主要的军备控制协议，例如SALT I 和 II。

此外，美国还努力达成和平条约，以结束其参与的越南战争。为此，尼克松试图诱导中国支持和平进程，开始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虽然这种与中国的接触最终无法避免共产主义在越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它仍然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行为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动态。

虽然这种缓和的努力得到了双方公众的普遍支持（例如 68% 的美国人认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将改善世界和平），但这种努力仍然受到批评。在美国，巴里戈德沃特等保守派谴责缓和，继续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摧毁敌人作为拥有权力手段的意识形态力量”，并警告说，与苏联的贸易有助于维护苏联在东欧的霸权。美国左翼政治成员也反对缓和，例如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他认为美国需要与苏联积极对抗。尽管有这些批评，缓和在整个 1970 年代仍在继续，得到了美国政治分歧双方成员的支持，共和党与民主党双方在1976 年总统选举中都提名了亲缓和候选人（福特与卡特）。

在西欧，也有人反对缓和。由于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的“东方政策”，西德政府否认了对奥得河-涅斯河以东的所有领土主张，放弃了二战结束时失去的历史悠久的德国领土。虽然此举有助于缓解德国对苏联和波兰报复的担忧，但它引起了勃兰特的主要对手、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的批评。

在苏联国内，安德烈·萨哈罗夫（也是前苏联核计划的成员）等持不同政见者警告说，如果缓和没有伴随着苏联的自由化，西方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在此期间，苏联和东方人权活动家再次遭到克格勃等共产主义情报机构的攻击。西方对持续侵犯人权行为缺乏重大批评导致东欧持不同政见者日益不满，捷克剧作家（和未来总统）瓦赫拉夫·哈维尔将缓和贴上标签为“天真、笨拙”。

=====

国务卿亨利·基森格 (Henry Kissenger) 博士被广泛认为在 1970 年代上半期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冷战政策方面。

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是1964 年至 1982 年间苏联事实上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决定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政策方面发

挥了主导作用。

=====

缓和的崩溃

1979年以前的相对合作的时代并非没有冲突。在整个缓和时期，双方继续储存核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运载系统。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MIRVs）的出现，从根本上增加了苏联和美国在核战争的情况下的杀伤能力，增加了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

SALT II于1979年签署，试图遏制MIRV的扩张。然而，由于当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该条约没有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都对阿富汗产生了兴趣，争夺在这个中立的山区国家的影响力。为此，苏联和美国都在这个不发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超级大国的援助是如此慷慨，以至于阿富汗总理 穆罕默德·哈希姆·迈万德瓦尔曾经说过，“他可以用俄罗斯的火柴点燃他的美国香烟。”

1973 年查希尔沙阿国王被推翻后，阿富汗经历了政治动荡加剧的时期。在

此期间，阿富汗见证了共产主义运动规模的大幅增长，以及阿富汗军队的规模的大幅度增长。这在1978 年的苏尔革命中达到高潮，在这场革命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个由苏联支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一场血腥政变中夺取了政权。

在阿富汗，共产党人发起了一场激进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消灭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和“阶级敌人”。

政变和随后的政治暴力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反对者之间的内战，其中包括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

共产党军事地位的恶化促使苏联介入冲突。苏联加入阿富汗战争被广泛认为结束了对东西方缓和外交时代的支持，并引发了美国的一系列报复性反应，例如上述退出 SALT II 以及实施粮食禁运，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并开始向阿富汗反苏叛军出售武器。

此外，入侵事件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孤立了苏联，特别是在中东。

罗纳德里根的选举被广泛地预示着美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转折点。根据亨利·基辛格的说法，里根是“二战以后的第一位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都采取攻势的总统”。虽然卡特在苏联干预阿富汗后开始了军事集结，但在里根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积极集结其常规和核储备，标志着以竞争代替合作的

新时期。

=====

逼退学说

1984年，记者尼古拉斯·莱曼采访了里根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总结了里根政府对抗苏联的战略：

“他们的社会经济薄弱，缺乏进入信息时代的财富、教育和技术。他们把一切都投入到军事生产中，结果他们的社会开始表现出可怕的压力。他们无法像我们一样维持军事生产。最终它会打破他们，然后在一个安全的世界中将只有一个超级大国。”

莱曼指出，当他在 1984 年写这篇采访文章时，他认为里根政府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中。但在 2016 年，他说，这段话代表了“对里根实际所做的相当无争议的描述”。

里根战略还包括针对苏联卷入的不断升级的冲突，尤其是苏阿战争和中美洲危机。它包括说服西欧各国政府接收指向苏联的美国导弹的外交举措。此外，它还包括尝试构建一个被称为战略防御计划的天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许多评论家称其为“星球大战”）。

这些策略一直持续到1989 年东欧革命。

东欧卫星国的人民反抗他们所受到的独裁统治并渴望实现议会民主制。俄罗斯人民在 1991 年结束了他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没有莫斯科的支持，许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获得资助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崩溃了。

=====

波兰危机（1980–1981）

在 1970 年代，波兰经济经历了生产力下降的时期，最终在 1979 年该国在二战后首次出现衰退。1980 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罢工工人宣布成立非共产主义贸易团结工会联盟。1980 年 8 月 31 日，波兰政府同意了工会的许多要求，包括其合法化，使团结工会（现在有 1000 万成员）成为华沙条约组织中第一个不受共产党政府控制的工会。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随着团结工会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波兰经历了日益严重的政治混乱，威胁到共产主义政府的生存。1981 年 12 月 13 日，波兰军方首脑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波兰全国进入戒严状态，下令逮捕团结工会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员。

在波兰政府宣布戒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铁幕双方都在猜测苏联军事干预危机的幽灵，类似于以前苏联对东欧的干预（即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然而，由于担心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制裁，苏联最终决定不直接干预波兰。

波兰将一直处于戒严状态，直到 1984 年波兰政府开始逐渐将波兰反对派成员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团结工会和雅鲁泽尔斯基政府之间的冲突最终在 1989 年结束，波兰转向民主化，执政的共产党在波兰二战后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失败。

=====

核武器对峙加剧（1981–1983）

=====

向欧洲部署中级核力量

在 1970 年代，苏联开发了一种新型的能够携带核武器的中程弹道导弹。到 1979 年底，它向苏联西部和华约盟国部署了 130 枚 SS-20 导弹，能够发

射 390 多个弹头。这一举动在北约联盟中引起了警报，北约联盟依靠战术核优势来抵消苏联的常规优势。

为了增强北约联盟的核威慑力，成员国承诺向西欧部署数百枚导弹，主要是潘兴II型。

====

技术发展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之前的冷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主要重型战略轰炸机是B-52 Stratofortress。然而，更复杂的机载预警和控制(AWACS) 技术的发展使 B-52 更容易受到地面和敌方战斗机的攻击。

空军认为需要一种飞行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且仍能向目标运送大量有效载荷的轰炸机。这导致了1970 年代早期到中期B-1A Lancer的开发。B-1A 计划于 1977 年被取消，但后来在 1981 年被里根总统以新的名称B-1B 重新命名。B-1B 的速度能够达到或超过 1.2 马赫，并且可以提供 75,000 磅的有效载荷。Lancer 是一种有核能力的轰炸机，直到 1994 年该轰炸机的核任务被取消，转而使用常规武器。

在此期间生产的另一种武器是潘兴 II 中程弹道导弹（MRBM）。潘兴 II 于 1983 年首次部署在欧洲。它的射程约为 1,000 英里，并携带一个 W-85 可变当量核弹头，当量在 50 至 80 千吨之间。尽管这种弹头的当量比 W-50 弹头小（后者高达 150 千吨），但潘兴 II 导弹射击精度的提高意味着不需要大当量弹头。相反，导弹能够使用其雷达和惯性制导装置非常接近其目标。

=====

核误报和危急呼叫

“也许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局势从未像 1980 年代上半期那样具有爆炸性，因此更加困难和不利。”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6 年 2 月

冷战期间最接近核战争的一次危险发生在 1983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进行的 Able Archer 演习期间。Able Archer 83 是 1983 年 11 月进行的现实军事模拟演习。作为演习的一部分，北约部队模拟了一次全面的核攻击。这次核攻击演习可能会引起苏联的意外反应。在他们收到有关北约军队似乎在欧洲动员的信息后，苏联的许多军事官员认为美国正在利用这次演习来掩饰战略核先发打击。这导致了苏联的不同寻常的反应。这种反应涉及苏联在东德和波兰的军事单位处于戒备状态，并且侦察飞行数量异常。

=====

反核与和平运动

整个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公众越来越关注战争和核战争的持续和日益增长的威胁。国际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急剧发展，许多抗议、事件和激进活动传播意识，推动了裁军并改变政治议程。这些运动在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最为活跃，并在 1982 年 6 月 12 日达到高潮，当时有 100 万人在纽约游行以结束冷战军备竞赛和核武器。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者集会。

=====

第三世界冲突

=====

中东

中东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几次冲突。

在两伊战争期间，新的伊斯兰革命政府统治的伊朗，与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伊拉克复兴党之间爆发了战争。尽管伊拉克得到了苏联和西方共同的武装，但伊朗仍然能够顽强对抗伊拉克入侵者。双方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直到1988年，安排签订停火协议。这场战争夺去了超过一百万人的生命。

这个时代还见证了黎巴嫩内战（1975-1990）的延续，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人和苏联支持的叙利亚人与他们反过来支持的各种黎巴嫩政治派别并肩作战。

=====

非洲

在非洲，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没有直接卷入非洲大陆上肆虐的无数冲突。然而，几次非洲内战变成了涉及外国势力的代理人战争，南非和古巴士兵在安哥拉内战中相互交战。非洲的其他冲突是埃塞俄比亚内战、莫桑比克战争、第二次苏丹内战和索马里叛乱。这与总共 20 次成功的政变相结合，意味着非洲是整个 1980 年代持续不稳定的根源。

随着整个非洲大陆上发生的各种军事对抗，当时仍处于种族隔离政府控制之下的南非，由于其国内对土著黑人人口的镇压和强硬的外交政策而面临

越来越多的孤立。

苏联集团国家继续赞助非国大和其他反种族隔离运动，提供致命和非致命的武器与物资援助。随着公民抗命和针对白人少数民族政府的激进暴力愈演愈烈，南非的不稳定局势日益加剧。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运动呼吁中止与南非的经济关系，这通常被称为撤资运动。虽然该运动未能立即结束西方与南非的贸易，但到1980年代末，美国国会将通过（以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而使得里根总统无法以总统否决权对之否决）《全面反种族隔离法案》，该法案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类似措施，将对南非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

南亚和中亚

1980 年代初期，阿富汗继续抵抗苏联的入侵。美国和其他反苏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向阿富汗叛军提供了物质援助，他们通常被称为圣战者组织（阿拉伯语为“圣战士”）。

美国每年向阿富汗叛军提供大约 7.5 亿美元物资，主要是通过中央情报局。这种对阿富汗叛军的支持，最终将包括销售防空“毒刺”导弹，被广泛认为有助于阿富汗人反抗苏联武装入侵力量。

=====

东南亚

黄雨

在 1970 年代中期和 1980 年代初期，阿富汗、老挝和柬埔寨出现了生物战的证据。许多袭击中常见的物质是T-2 霉菌毒素，一种单端孢霉烯毒素，因其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国家的“黄雨”袭击中的作用而臭名昭著。它被称为黄雨，因为这种物质通常与黄色有关，许多目睹袭击事件的人将这种物质描述为掉在地上时听起来像雨。化学剂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运送，包括：飞机火箭和炸弹、喷雾罐、迫击炮弹、手榴弹和陷阱。

据信，这些化学品要么由苏联人提供，要么由苏联人运送发射，至少在 400 多次袭击中使用过，并在这些袭击中造成至少一万多人死亡。这种化学制剂有许多严重的症状，包括但不限于：呕吐、神经系统损伤、皮肤和眼睛刺激、视力受损或丧失以及腹泻。

=====

柬越战争

在苏联支持的越南军队和中国支持的柬埔寨军队几年的武装对战之后，越南于 1978 年圣诞节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入侵。越南人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在 1977-78 年达到顶峰。

=====

第二次马来叛乱

1968年6月17日，马来亚共产党（MCP）发动了他们的第二次叛乱。这是他们二十年以来的再一次叛乱。当天，马共发动了一次袭击，杀死了 Kroh-Bentong 附近的 17 名安全部队成员。然而，当 1970 年 MCP 内部开始出现问题时，事情很快就会变得更糟。人们相信政府间谍已经渗透到 MCP 并开始分裂该组织。

许多马共成员开始互相指责对方与政府合作，如果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政府特工，通常会被处死。到 1974 年底，政府特工的行动已被证明是成功的。MCP 分裂成两个主要团体。MCP 的残余力量越来越弱，到 1987 年，最后剩下的团体投降了。因此，它标志着 MCP 叛乱的结束。

====

拉丁美洲

反对派发动了一场有效的叛乱，威胁到桑地诺政府对农村的控制。

1979年，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丹尼尔·奥尔特加领导的左翼桑地诺运动。刚上任的里根政府致力于解散尼加拉瓜政府，并武装该国的反共革命力量。1983年底，美国国会将里根政府对反对派的援助限制在2400万美元。里根政府下属成员试图非法规避这些限制，结果导致了伊朗门丑闻。

由于担心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美国增加了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友好政府的军售，这些政府都在处理自己的左翼叛乱。美国的援助在1985年达到12亿美元的峰值，然后在1996年下降到仅1.67亿美元（后者几乎全部是非军事援助）。

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推翻了古巴支持的人民革命政府。

在哥伦比亚，美国支持的胡里奥·塞萨尔·特尔贝·阿亚拉政府持续了数十年的内战，该政府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叛乱分子和毒品走私者作战。占主

导地位的反叛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得到了古巴政府的财政和物质支持。

这些冲突都不会在1980年代得到解决，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初；或者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叛乱的情况下，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

1983 年：危机之年

=====

RYAN 行动

潘兴 II中程弹道导弹在德国的竖立发射器上。

1981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苏联情报搜集活动，代号“RYAN行动”，意为“核导弹攻击”。此次行动的目的在于部署特工，以收集尽可能多的关于美国或其他北约大国首先发动核打击的可能性的信息。

这项为期八年的间谍行动似乎让苏联感到更加不安，而不是让苏联放心。随着所有信息的流入，尚不清楚哪条情报标志着“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开始，这将要求苏联方面立即采取行动，甚至在美国可以向空中发射武器之前。

当美国推出新型中程弹道导弹潘兴 II 时，克格勃知道美国人已经做好了出击的准备，如果是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苏联的报复性武器库将面临很高的风险。1983 年 2 月，克格勃对 RYAN 行动加倍投资，重点关注美国计划攻击的任何可能迹象以及成倍增加的紧张局势。

=====

KAL-007 被击落

1983 年 9 月 1 日，大韩航空 007 号航班（KAL-007）从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飞往韩国首尔，途中经过苏联堪察加半岛，这不是该航班预先飞行路线计划的一部分。

苏联战斗机在苏联指挥官的命令下发射了空对空导弹并击落了客机。KAL-007 坠入太平洋，机上 269 名乘客遇难。死者中有来自佐治亚州的美国国会议员拉里·麦克唐纳（Larry McDonald）。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 1983 年美国 and 苏联之间的多场其他冲突造成了高度紧张的政治气氛，可能会迅速升级为任何一方的灾难性行动作为回应。

=====

Able Archer-83 演习

正如苏联通过 RYAN 行动史无前例地加强对核活动的侦查一样，美国 and 北约开始了他们迄今为止最先进、最深入和最现实的战争模拟，称为 Able Archer 演习。该军事演习于 1983 年 11 月开始。使这个特殊的战争演练如此不同、并最终如此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个模拟核战争的真实模拟场景部分。

苏联情报部门能够收集到关于此次战争演习的信息，但他们无法判断这是否真的仅仅只是一个演习，还是存在释放实际核武器的潜在威胁。

北约正在执行的模拟战争类型升级，再加上西德出现潘兴 II 型导弹，使苏联处于紧张状态。除了据报道来自东德华沙部队的通讯有所增加之外，还有异常多的苏联军队监视飞行，并且大量武装和准备就绪的 Mig-23 驻扎在边境附近。来自苏联消息来源的报道还称，某些苏联部队处于高度戒备

状态，多架SS-20和SS-19移动战略核导弹被移动并等待、处于备战状态。

许多学者将此事件列为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最接近核战争的事件，而其他人则认为苏联军队的行为与北约军事演习期间的标准操作程序相去甚远，可能是出于谨慎考虑而犯了错误。新型潘兴 II 导弹在西德的出现使得苏联异常紧张。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事件以及如此多的其他类似事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累积的影响使 1983 年成为冷战中最激烈、几乎是灾难性的年份之一。

=====

苏联的领导和继任

=====

勃列日涅夫之死（1982）

从 1964 年到 1982 年去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担任了 18 年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原因是他在领导苏联的时间即将结束时，他大量吸烟和沉迷于安眠药。当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时，苏联开始出现问题，因为他

无法管理国家。

勃列日涅夫试图帮助缓解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紧张局势。1979年，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SALT II协议。该协议是一项新的双边战略军备限制条约。然而，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因此美国参议院从未批准该条约。Hafizullah Amin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min与苏联的关系不错，但最终变得紧张，这也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的早期政策帮助苏联经济增长，并在 1970 年代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1980 年代则完全不同。由于勃列日涅夫晚年身体不好，他无法领导苏联，损害了该国的经济、军事、生活水平和政治。由于健康原因，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开始更多地依赖他的顾问。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会做出关键决定，而勃列日涅夫则慢慢地成为苏联的傀儡。政治腐败蔓延到整个苏联领导层。勃列日涅夫最终因苏联公民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的生活质量差而受到批评。

====

安德罗波夫时代（1982–1984）

尤里·V·安德罗波夫接替 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领导人。然而，由于他身

体虚弱，他的领导地位很短暂。他只当了 15 个月的苏联领导人（1982年11月至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于1983年2月迅速病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开始频繁住院。1983 年 11 月 7 日，他成为第一位错过红场年度十月革命游行的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在 1984 年 2 月 9 日去世前在医院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天。

安德罗波夫想清理苏联的腐败并尝试进行系统改革。由于腐败，他解雇了许多党的部长和书记。安德罗波夫还建立了苏联理性的国家-社会关系，旨在预防和应对来自精英与群众的反抗。由于安德罗波夫去世，国家主义者的计划没有奏效，而且仅凭该计划没有力量取得成功。

在他生命的尽头，安德罗波夫开始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认为这不符合苏联的最佳利益，他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提供了四个主要原因，说明入侵并不重要。安德罗波夫甚至在 1981 年底和 1982 年初访问了阿富汗，但他意识到没有恰当的军事解决方案。安德罗波夫的措施是对阿富汗的领导层施加压力，试图使得苏联可以毫无问题地撤退。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意味着他对阿富汗的愿景永远不会实现。

安德罗波夫想修复苏联经济，因为它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权即将结束时苦苦挣扎。安德罗波夫对如何改善苏联经济，特别是通过农业和农业工人，有了几个想法。安德罗波夫还希望工业部和其他部委实现他们的目标计划。

苏联的经济存在国内外问题，这让苏联领导人感到担忧。安德罗波夫确实同意勃列日涅夫外交政策的某些部分，但他也想制定更好的政策。苏联领导人也努力寻找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多个问题。安德罗波夫的死意味着他的经济愿景从未得到充分发展。

=====

契尔年科的统治（1984–1985）

安德罗波夫去世以后，契尔年科被选为苏联下一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在去世前并不希望契尔年科成为他的继任者，因为契尔年科患有肺气肿和健康问题。相反，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首选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的在位时间比安德罗波夫的还要短，从 1984 年 2 月到 1985 年 3 月仅持续了 13 个月。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经帮助契尔年科在政治队伍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契尔年科遵循勃列日涅夫的一些经济理想，但他并不公开讲述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契尔年科希望改进苏联的农业方法、生产和分配，以帮助启动经济。

契尔年科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谈判并签署了价值12亿美元的新贸易协定。这也有助于缓和苏中关系。该贸易协定使得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增

长 50%，也使得苏联出口机械、汽车和木材。

契尔年科也做了一些工作来帮助改善苏美关系。自从苏联在日内瓦结束中程核力量谈判后，美苏所有战略武器谈判都停止了，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双方都没有与对方交谈。尽管如此，契尔年科主动与新近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联系，并与里根于1985年1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谈判会议。经过两天的谈判后，双方同意“根据新的会议而恢复正式谈判框架。”

这是苏联和美国关系的一个新进展，因为它解决了有关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问题。这项新协议是契尔年科帮助苏联与美国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然而，契尔年科并没有结束在阿富汗的苏联入侵战争，否则，这本可以开始结束冷战的进程。

即使在苏联和美国达成协议之后，苏联仍然抵制美国在洛杉矶举办的1984年夏季奥运会。苏联称里根政府无法确保苏联运动员的安全。

苏联抵制 1984 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也是对美国抵制在莫斯科主办的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直接回应。当时，美国等许多国家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苏联。但即使在美国抵制 1980 年夏季奥运会之后，契尔年科仍继续实施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契尔年科领导下的苏联与里根领导下的美国仍有分歧，因此冷战不可能在契尔年科去世前结束。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85%E2%80%93199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_(1985%E2%80%931991))

冷战（1985–1991）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革命领袖，他是第一个推动政治格局（Glasnost）和经济（Perestroika）自由化的人。

在此之前，苏联一直严格禁止自由改革并维持指令经济。苏联尽管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但与罗纳德·里根总统领导下的美国进行了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不管怎样，苏联开始崩溃，因为自由化改革被证明难以处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改革措施不力并引发了重大问题。随着苏联在阿富汗的最后一次占领战争结束，柏林墙在德国倒塌，以及1989年一系列主要是和平运动的革命席卷东欧的苏联集团国家，冷战也随之结束。

=====

在关系中解冻

在1982年以来连续三位年长的苏联领导人相继去世后，苏联政治局于1985年3月选举戈尔巴乔夫为共产党总书记，标志着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

改革派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去斯大林化”全盛时期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是相对年轻的改革型技术官僚，迅速巩固了权力，为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为培育更温和的关系提供了动力，并与西方进行贸易。

在西方战线上，里根总统的政府对苏联采取了强硬路线。根据里根主义，

里根政府开始向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其他地方的反共武装运动提供军事支持。

1985-1987 年取得了重大突破，中程核力量条约 (INF) 的谈判取得成功。1987 年 12 月由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的 INF 条约，消除了所有射程为 500-1,000 公里 (310-620 英里) (短程) 和 1,000-5,500 公里 (620-3,420 英里) (中距离) 的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及其发射器。该条约不包括海射导弹。到 1991 年 5 月，经双方现场调查，共销毁导弹 2700 枚。

里根政府还说服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增加石油产量。这导致石油价格下降了三倍，而石油是苏联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继苏联之前的大规模军事集结之后，里根总统下令在和平时期对美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国防集结；苏联没有通过扩增军队来回应这一点，因为巨大军费开支，加上国家的集体农业和低效率的计划制造业，会给苏联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任职之前，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处于贫困状态。尽管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未能振兴经济。

1985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四次“峰会”会议中的第一次。这一次是在瑞士日内瓦。在讨论了政策、事实等之后，里根邀请戈尔巴乔夫和他一起去海滩附近的一个小房子。两位领导人在这所房子里讲话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定时间；随后传出消息称他们计划再举行两次（很快又会增

加到三次）峰会。

第二次首脑会议发生在次年，于1986年10月11日，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讨论缩减他们在欧洲的中程弹道导弹库。会谈接近实现核军控的全面突破，但因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取消该计划的建议而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合作继续增加；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削减了一些战略武器。

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因素是，重组（戈尔巴乔夫的重组、改革的政策措施）和开放（公开化），在整个苏联地区产生涟漪效应，包括最终使其无法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控制华沙条约成员国。

1987 年 6 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柏林墙发表演讲，呼吁苏联总书记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堵墙！ ”。

1987 年 6 月 12 日，里根向戈尔巴乔夫发起挑战，要求他推倒柏林墙，进一步推进改革和民主化。里根在墙边的勃兰登堡门发表演讲时说：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和平，如果你要苏联、中欧和东南欧的繁荣，如果你要自由化，就到这里来；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当年迈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将他们的国家置于“正常化”的控制之下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主义政策暴露了一个曾经革命性的共产党如何在系统的中心垂死。

由于油价下跌以及与军备竞赛和指令经济相关的支出增加，收入下降，苏联在 1980 年代被迫从西方银行业承担大量债务。越来越多的公众反对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在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巨大而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这些事情增加了公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支持。

到1989年春天，苏联不仅经历了激烈的媒体辩论，而且还举行了第一次多候选人选举。在近代历史上，自由化的力量第一次从西方集团蔓延到东方集团。

=====

起义在共产主义欧洲蔓延

1989年8月，“泛欧野餐”发生在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

草根组织，例如波兰的团结运动，凭借强大的群众基础迅速站稳脚跟。

1989 年 2 月，波兰政府与反对派开始谈判，即波兰圆桌协议，允许在

1989 年 6 月举行有反共政党参与的选举。

1989 年 8 月，发生了“泛欧野餐”事件，即，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铁幕边境门最初不显眼地打开。随后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不复存在，东方集团解体。“泛欧野餐”的想法来自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目的是检验当铁幕打开时苏联是否会做出反应。泛欧联盟奥地利随后在匈牙利利用传单做广告，让东德人意识到逃跑的可能性。自柏林墙建造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和东方集团国家的不反应的结果表明，在被压迫的人民面前，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了绝对权力。随后，大量东德难民试图逃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应疲软，表明他们失去了更多权力。

同样在 1989 年，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府开始协商，组织 1990 年举行的竞争性选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大规模抗议使根深蒂固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下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政权也因暴力起义而崩溃。态度已经发生了足够的变化，美国国务卿 詹姆斯贝克建议美国政府不会代表反对派反对苏联干预罗马尼亚，以防止流血事件。变革的浪潮以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为高潮，这象征着欧洲共产主义政府的垮台，并以影像方式结束了欧洲的铁幕分裂。

东欧政府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垮台，无意中鼓励了几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寻求摆脱莫斯科统治的更大程度的独立。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运动，首先导致立陶宛、然后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布独立。其他共和国的不满得到了更大程度分权的承诺。更开放的选举导致人民选举反对共产党统治

的候选人。

为了阻止体制的快速变化，以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为代表的一群苏联强硬派于 1991 年 8 月试图发动政变推翻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召集人民和大部分军队反对政变。强硬派的政变努力失败了。尽管重新掌权，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已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破坏。9 月，波罗的海诸国获得独立。12月1日，乌克兰退出苏联。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正式解体，分裂为 15 个独立的国家。

=====

冷战结束

1989年东欧革命之后，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总统在中立的马耳他岛上会面，讨论所发生的事件、苏联军队从东欧撤出、以及他们关系的未来进程。经过讨论，两位领导人公开宣布，他们将共同为德国统一、关系正常化、解决第三世界冲突以及促进和平与民主（布什总统称之为“世界新秩序”）而努力。

在马耳他首脑会议和苏联解体之间，关于几项军备控制协议的谈判开始了，产生了诸如START I和《化学武器公约》等协议。此外，仍然相信苏联会长期存在的美国开始采取措施建立积极的长期关系。

美苏联合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表明了这种新关系。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授权针对其前中东盟友（伊拉克）使用武力。

第三世界国家（即柬埔寨、安哥拉、尼加拉瓜）与冷战有关的几场冲突将在这个合作时代结束，苏联和美国共同向各自的代理人施压，要求与其敌手和谈。总体而言，伴随冷战末期的这种缓和将有助于带来一个相对更加和平的世界。

由于 1989 年东欧和平革命和苏联采取了基于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华沙条约组织被解散，苏联军队开始撤回苏联，并在 1990 年代中期完成撤军。

美国在 1990 年代建立了复杂的全球影响力，决策者认为需要某种结构来解释指导外交政策的“威胁、利益和优先事项”，但没有就如何进行达成一致。安东尼·莱克曾表示，在此期间尝试制定教义有可能引入新的孤立主义或他所谓的“非理性”想法。当时老布什和克林顿在任期间的目标是制定支持共识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不是加速美国势力范围内的碎片化。

=====

遗产

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经历了经济重建、增长以及与欧盟和北约的快速融合，而他们的一些东部邻国则建立了自由市场寡头政治体制、后共产主义腐败行政管理的混合体和独裁。

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继承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混乱和恶劣的状态过渡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下的苏联解体状态。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中，GDP增长下降，预期寿命急剧下降。前东欧集团其他一些地区的生活条件也有所下降。

后冷战时代见证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空前繁荣的时期，以及遍及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欧、东南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浪潮。

一些历史学家，包括历史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里根将好战性政策和行动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使苏美关系取得了二战结束以来最显著的改善。这个被称为“里根胜利学派”的集团构成了与冷战结束不同的史学视角。

在没有太空竞赛的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和俄罗斯的太空探索已经逐渐消退。

相关事件的时间表

1985 年 1 月 20 日——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在第二任期开始的时候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1985 年 3 月 10 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逝世

1985年3月11日——苏联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共产党总书记

1985年3月24日-阿瑟·D·尼科尔森，一个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官员，在东德被苏联哨兵开枪打死。他被列为美国在冷战中的最后一名伤亡者。

1986 年 4 月 26 日 -切尔诺贝利灾难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推出公开化政策

1987年1月27日——美国承认蒙古独立并建交。

1987 年 3 月 4 日——在电视讲话中，里根对伊朗门事件（此事涉及里根政府下属官员违反国会所限制的金额上限而对南美洲的反共产主义力量提供物资支持）负全部责任。

1987 年 6 月 12 日——里根在西柏林的“推倒这堵墙”演讲

1987 年6月 29 日 -韩国的六月斗争

1987年7月15日——中华民国38年戒严结束

1987年11月15日-布拉索夫叛乱，在罗马尼亚

1987 年 12 月 8 日 - 《中程核力量条约》在华盛顿特区签署

1988 年 2 月 12 日 -在黑海克里米亚海岸附近，苏联护卫舰Bezzavetnyy与美国导弹巡洋舰约克镇号充满敌意地相撞。

1988年2月20日-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决定成为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但克里姆林宫拒绝同意。随后的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将成为苏联内部冲突中的第一场战役，后来演变为后苏联分裂主义冲突。

1988年8月8日- 8888起义在缅甸

1988 年 8 月 17 日——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去世

1988 年 8 月 20 日 -两伊战争结束

1988年9月17日-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尔举行。自1976年以来，苏联和美国首次参加；这也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1988 年 10 月 5 日——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全国公投中落败

1988 年 12 月 21 日 - 泛美航空公司 103 号航班爆炸事件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 裕仁逝世，其子明仁继位。

1989 年 1 月 20 日——乔治 HW 布什成为美国总统

1989 年 2 月 -苏阿战争结束；阿富汗在没有苏联军队的情况下继续内部冲突

1989 年 6 月 3 日——伊朗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去世

1989年6月4日-六四事件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9 年 6 月 4 日——团结工会在战后波兰第一次部分自由议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引发了1989 年的一系列反共革命，横跨中欧、后来的东南欧和东欧

1989 年 8 月 14 日——南非总统彼得·威廉·博塔因三方协议的实施而辞职

1989 年 8 月 19 日 - 奥地利和匈牙利在泛欧野餐会上开放边境大门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东德不再存在，东方集团解体

1989 年 8 月 23 日——苏联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谴责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秘密协议

1989 年 8 月 24 日——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成为波兰总理，组建了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

1989 年 10 月 23 日 -匈牙利共产主义结束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

1989 年 11 月 24 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天鹅绒革命期间辞职，有效地结束了该国的一党统治

1989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峰会。戈尔巴乔夫说：“我向美国总统保证，我永远不会对美国发动热战。”

1989 年 12 月 10 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的辞职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使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成为华沙条约组织中仅存的强硬共产主义政权。

1989 年 12 月 25 日 - 罗马尼亚叛乱者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1989 年 12 月 29 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天鹅绒革命结束时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1989 年 12 月 30 日 - 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国安局解散。

1990年1月13日-东德的秘密警察组织被解散。

1990年1月22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联盟在其代表大会期间解散，结束了该国的一党制。

1990年2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组织解散。

1990 年 3 月 15 日——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第一任总统

1990 年 4 月 12 日 - 南斯拉夫境内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举行首次多党选举

1990年4月22日至23日和5月6日至7日——南斯拉夫境内的克罗地亚共和国举行首次多党选举

1990 年 4 月 25 日——维奥莱塔·查莫罗宣誓就任尼加拉瓜总统，结束桑地诺统治和反对派叛乱

1990年5月22日-南北也门统一

1990 年 6 月 8 日 - 发布了被称为“首次正式承认冷战结束”的坦伯利消息

1990 年 7 月 5 日至 6 日——北约在伦敦举行第11 次峰会。

1990年7月13日——苏联共产党第28次代表大会宣布结束其垄断权力

1990 年 8 月 2 日 -海湾战争开始

1990 年 9 月 9 日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赫尔辛基峰会

1990 年 9 月 12 日 -关于德国的最终解决条约在莫斯科签署

1990 年 10 月 3 日 -德国正式统一

1990 年 11 月 6 日——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加入欧洲委员会的苏联集团国家

1990 年 11 月 11 日 -南斯拉夫境内的马其顿共和国举行首次多党选举

1990 年 11 月 18 日 -南斯拉夫境内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举行首次多党选举

1990 年 11 月 19 日——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签署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1990年11月28日-撒切尔夫人卸任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上任

1990 年 12 月 9 日 -南斯拉夫境内的黑山共和国举行首次多党选举

1990 年 12 月 9 日至 23 日 -南斯拉夫境内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举行首次

多党选举

1990 年 12 月 22 日——莱赫·瓦文萨成为波兰总统；波兰流亡政府结束

1990 年 12 月 23 日 - 斯洛文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大多数斯洛文尼亚人投票支持斯洛文尼亚寻求从南斯拉夫独立

1991 年 1 月 -停止从捷克预算向斯洛伐克转移资金，开始导致天鹅绒分离的过程

1991 年 2 月 28 日 - 海湾战争结束

1991 年 3 月 3 日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举行独立公投，多数票决定恢复独立。

1991 年 3 月 31 日——格鲁吉亚举行独立公投，多数格鲁吉亚人投票支持格鲁吉亚脱离苏联独立。

1991 年 5 月 1 日——中华民国废除了中国内战期间制定的反共抗暴暂行规定

1991 年 5 月 19 日 - 克罗地亚举行独立公投，多数克罗地亚人投票支持克罗地亚寻求从南斯拉夫独立

1991年5月29日-在埃塞俄比亚结束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

1991年6月27日-在斯洛文尼亚开始了的南斯拉夫内战

1991 年 6 月 28 日 - Comecon（二战后苏联组织的、主要包括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

1991 年 7 月 1 日——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1991 年 7 月 10 日——鲍里斯·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

1991 年 7 月 31 日 - 批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START I条约

1991 年 8 月 19 日 - 苏联发动政变企图

1991 年 8 月 21 日——苏联政变集团被解散。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1991 年 9 月 6 日——苏联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独立

1991 年 9 月 8 日 - 马其顿共和国举行独立公投，多数马其顿人投票支持马其顿寻求从南斯拉夫独立

1991 年 9 月 21 日——亚美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大多数亚美尼亚人投票支持亚美尼亚脱离苏联独立。

1991 年 10 月 26 日——土库曼斯坦举行独立公投，多数票赞成土库曼斯坦脱离苏联。

1991年11月6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克格勃解散。

1991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北约在罗马举行第12 次首脑会议。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别拉维扎协定，标志着苏联解体和独联体的成立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职位被取消；红色的苏联国旗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降下，并在其位置升起了俄罗斯联邦国旗。

1991 年 12 月 26 日——最高苏维埃解散苏联。